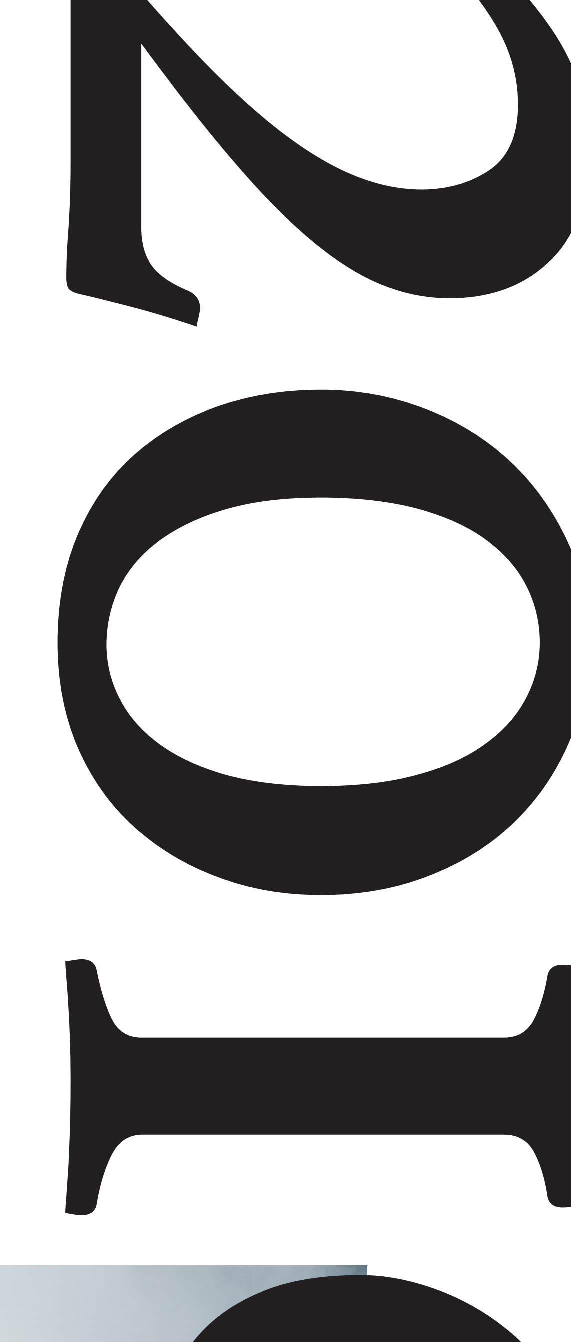
What Happened in Hong Kong ?

香港究竟发生了什么？



序：香港究竟发生了什么？

/

在过去超过一年的时间裡，很多人都在问「香港究竟發生了什麼？」关于这个问题，数百万名曾经涌现在街头的人们可能都有不同版本的答案。

关于 2019 年爆發的「反修例」运动，官媒的定性及假新闻铺天盖地，尽管民间也有大量来自参与者、记者、学者贡献的纪录，但随着运动的急剧变化，中文世界的读者要穿透国家舆论机器的叙事、辨析海量的信息、理解运动的發展轨迹仍是非常困难。相信不少朋友心裡都有这些疑问：香港的运动是由一小撮激进份子搞出来的吗？为什麼《逃犯条例》已经撤回了，示威者还继续上街？为什麼运动能持续这麼久？「无大台」的运动是怎麼组织起来的？这是一个争取港独的运动吗？2020 年运动还在继续吗？《国安法》对运动有什麼影响？

正因为想推进关于这些问题的思考和真诚的讨论，我们在 2020 年的春天开始这个写作计划，梳理香港社会运动的历史脉络，以及〈逃犯条例〉所引爆的民主运动由 2019 年春天至 2021 年春天的發展轨迹。这本书着重系统性呈现运动的历史脉络、整体结构和發展历程。受限于篇幅，这本书未能涵盖所有细节，但有兴趣了解更多的读者可以查阅右侧的媒体报导访谈、视频二维码及每章末页的「延伸阅读」。

本书分作七个部分：〈**历史脉络与运动背景**〉、〈「**反修例**」**运动**〉、〈「**群众协作**」**如何發生？**〉、〈**抗争在街头**〉、〈**街头抗争背后的后勤网络**〉、〈**街头之外的抗争**〉、〈**后《国安法》时代**〉。

1

2019 年的香港运动源自过去 30 年的民主运动，却也是对于过往民运范式的否定。在〈**历史脉络与运动背景**〉，我们透过三部分的历史概述，认识「反修例」前夕的香港政治环境，以及构成这个环境的历史因素。第一部分梳理「英国殖民统治遗留的政治框架」所种下的社会矛盾宏观脉络；第二部分回顾主权移交后中央的对港治理思路、政经制度的变迁、市民的认同推移；第三部分则整理在 2019 年以前，香港社会运动中政治思潮和「抗争剧目」的变迁轨迹。

2

「反修例」运动虽由香港政府提出的《逃犯条例》修订草案引爆，但运动的目标在短时间内超越修例争议，演变为对反抗政府和警队、要求更全面社会改变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在〈「**反修例**」**运动**〉一章，我们从导火索的「修订草案」开始介绍，再整理从 2019 年 2 月（保良局提出修例草案）到 2020 年 6 月 30 日（《国安法》刊宪）之间的运动發展。为方便读者掌握和理解变迁的轨迹，我们粗略分作三个阶段罗列关键的事件，讲解抗争者的运动目标和抗争策略的变迁。最后，简答常见的问题，包括「反修例」是否有民意基础、是否是「港独」的运动、「揽炒」是什麼等。

3

〈**「群众协作」如何發生？**〉分两个部分整理在「反修例」运动中，当没有「大台」，群众如何大规模地连结、动员及参与。第一部分介绍「不分化、不割席、不笃灰」、「和勇不分」等抗争者广泛接受的行动共识。第二部分介绍「新媒体平台」作为群众沟通和协作的载体，在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受到的政府打压及侷限。

4

在 2019 年下半年，「街头」是抗争者直接反抗、形成共同经验和集体连结的重要场域。〈**抗争在街头**〉，第一部分整理警队的暴力镇压、酷刑和性暴力、大规模的滥捕及来自政府支持者的法外暴力；第二部分疏理示威者的街头抗争策略和示威形态，包括大型和平示威、激进化的冲击行动、阻碍城市运作的游击堵路、「私了」、「装修」、社区快闪表态行动。大规模的示威使得抗争的能量在公共领域持续可见，驱使更多市民投身运动，并开拓其他「战线」对政权施压。

5

在街头示威的浪潮中，大量的抗争者自發组织后勤网络回应示威者各方面的需要，造就街头行动在政治打压和监控下的韧性。〈**街头抗争背后的后勤网络**〉介绍「文宣队」、「即时资讯台」、「后勤支援」、「医疗和情绪支援」、「被捕抗争者支持」网络的生成和运作。这些绵密的微型社会网络也成为连结抗争者的重要节点，将抗争者之间的关係保留下来，成为运动在日常生活、社区中生根發展的基础。

6

在 2019 年年底，当街头抗争在镇压下出现延续的困境，后勤支援网络、工会线、国际线、议会线、黄色经济圈等抗争阵地递补而上。〈**街头之外的抗争**〉整理新工会、区议会、「黄色经济圈」三个阵地在运动中的發展过程、总结抗争者的实践、意义和限制。2020 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在香港爆發，在急遽收窄的政治环境中，运动中形成的网络变作公民社会「自救抗疫」的主体，「抗疫」的目标承载运动的能量。同时，这些网络也是维繫抗争者连结、抵抗政治打压对日常生活的侵蚀、發声反抗的重要阵地。

7

2020 年 6 月 30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港区国安法》，翌日香港特区政府公布实施。《国安法》并不只是一部法律，而是一个新时代的意识形态纲领和管治思维。〈**后《国安法》时代**〉一章简要梳理《国安法》的政治意涵，再以意识形态、大检控、议会线、公民社会网络等面向回顾《国安法》实施后，政府结合既有的法律和行政手法，对公民社会的打压及控制。

在本书發佈之际，超过万名被捕人士面对不公义的审判和漫长的刑期；虽然从 2020 年开始彷佛没有硝烟，也没有憷目惊心的画面，但《国安法》后大规模的社会改造和控制迅速开展；抗争的「前线」由街头推移到各个职场和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历史正悄悄地被改写、城市裡运动的痕迹被抹去、宣传机器震耳欲聋地广播 2019 年的「真相」。

然而，人民不会忘记，2019 年發生了什麼。在 2019 年，数以万计的群众不再沉默隐忍，以「反抗」和「行动」回应政权步步进逼的压迫，揭露「原来的正常就是问题」。在 2019 年后，香港的人们不再假装生活如常。现在是晦暗的时刻，也是一起创造未来的时刻。

这本书写给所有在监狱裡的人们、上街的人们、没有放弃挣扎找出路的人们，还有愿意和我们一起了解香港运动的人们。我们的整理和记录恐怕无法囊括香港运动的全貌，仅能为有心理解香港的读者留下一些线索。但由衷地希望这个书写的尝试能在阻隔交流的石壁高牆上凿出一个洞，带来对话的可能，也炼成连结和反抗的起点。

封面图片由 JIMMY LAM 林健恆拍摄。

目录

歷史脉络与运动背景

HISTORY AND BACKGROUND



香港的「反修例」运动举世瞩目，但关于抗争者所提出的政治主张、所採取的抗争手法背后的歷史脉络的探讨并不多。事实上，2019 年的运动在各方面都和过去 30 年的民运歷史有千丝万缕的关係——它既源自民主运动，却也是对于过往民运范式的否定。

在这一章，我们用简单的歷史概述「反修例」前夕的香港政治环境，以及构成这个环境的歷史因素。第一部分《殖民统治遗留的政治框架》整理香港政府沿袭和冻结殖民统治期间遗留的统治框架，成为今日社会矛盾的宏观脉络。第二部分《中港政治变迁》梳理中央在回归后对港治理思路的变化、香港政制改革和经济交流政策的变迁，及其对普罗市民社会生活和政治认同的影响。第三部分《香港社会运动发展的脉络》则记述由 1980 年代至「反修例」运动前，在香港的民间社会曾出现的重要抗争事件、政治思潮和抗争路线递嬗轨迹，这些发展又如何成为 2019 年香港爆发大型社会运动的背景。

前页图片取自：SCMP（上）。

1 - 殖民统治遗留的政治框架

/

▶ 1
/
1.1
/
1.2
/
1.3

英国殖民政府在香港奠定向资本倾斜的经济制度和低限度的福利政策，一方面透过「行政吸纳政治」的手段维持稳定；另一方面以严苛的法律强硬打压大规模的社会抗争。殖民政府在治术上刻意迴避国共政治斗争，同时经歷动乱来港的难民对政治冷漠，形成了战后不热衷政治事务的社会氛围。

直至主权移交前后，中央一方面实行国族认同宣传，一方面冻结70、80年代的管治模式，以最大程度满足稳定统治的利益。在主权移交之际，社会上的讨论主要关注如何维繫香港的「繁荣稳定」，在不改变原来的殖民权力格局、保障既得利益阶层利益的前提下顺利过渡。因此，香港虽「回归祖国」，但却从未完成真正的「去殖民化」，殖民统治遗留的治理框架种下今日社会矛盾的宏观脉络。

1.1 - 「官商勾结」的制度和没有民主的社会

/

由 19 世纪中开始，香港是英国商船频繁使用的港口，「保障英资在远东的商业利益」是英殖政府的重要任务。这些商贸公司想香港保持低税、自由贸易、缺乏劳工保障的制度，于是在经济和社会制度上，殖民政府按照「自由放任」及后来的「积极不干预」方针施政，务求香港在最低限度的福利及社会保障下发展经济，直接造成财富集中在少数人身上的大环境[1]。另外，在英殖时期的土地制度下，地产商发展土地时必须向政府购买土地使用权，在低税率的环境下，卖地成为政府主要财政收入渠道，也令政府有诱因维持高昂地价，间接促成地产商享有经济特权[2]。

在政治上，殖民时期的政制不民主。殖民初期，政府以委任方式让贸易洋行和后来的华人买办参与立法局和行政局，确保管治是以精英的利益为依归。在中英就香港前途展开谈判前的数十年，虽然立法局和市政局实现了局部民主化，但民选议员的权力相当有限，而位居主导位置的行政局则从未开放选举。殖民政府透过招聘和委任等方式将民间的政治力量（如地区领袖、专业人士）吸纳到行政机关中，以保持管治稳定，被称为「行政吸纳政治」[3]。

1. 吴仲贤（1997），〈香港经济发展的批判理论〉，载于吴仲贤《大志未竟：吴仲贤文集》（页 27-57）。香港：吴叶丽容。
2. 潘慧娴（2010），《地产霸权》。香港：天窗出版社有限公司。
3. King, A. (1975). Administrative Absorption of Politics in Hong Kong: Emphasis on the Grass Roots Level. Asian Survey, 15(5), 422-4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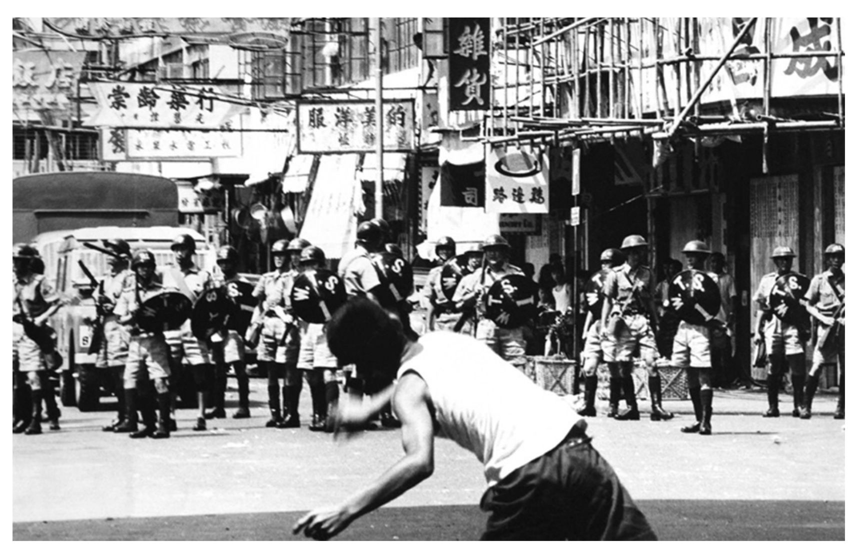
1.2 - 「镇暴」的殖民恶法

/

殖民政府以吸纳精英的方式保持稳定，但仍受到不少社会抗争的挑战。1922 年，香港海员要求英资公司加薪不遂，引发海员大罢工，促使政府制定《紧急情况规例条例》(下称《紧急法》)，政府可在属紧急或危害公安的情况下订立任何规例，而毋须先经过立法机关审议。1967 年，在工业发展引致大量社会问题的背景下，香港亲中共左派呼应内地文化大革命，向英殖政府发起抗争。运动由罢工开始，渐转用更激烈的手段，然而土製炸弹误杀途人等事件令运动丧失民意支持，加上英殖警暴的严刑峻法，运动持续约半年后便结束，今日香港社会主流称为「六七暴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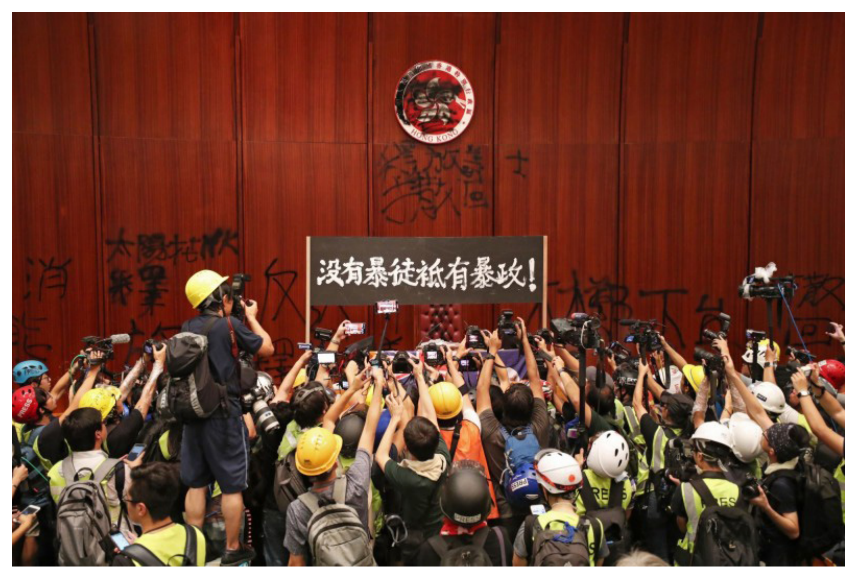
在「六七暴动」后，英殖政府随后制定严苛的《公安条例》以阻吓反抗人士。《公安条例》提出一系列以言入罪的煽动罪名：要求公众集结需向警方申请许可[1]，否则便违反刑罚高达 5 年的「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非法集结罪」与「暴动罪」门槛甚低，严重伤害集会自由。条例的内文大多取自当时的非洲英属殖民地，不仅赋予政府与警方相当大的权力，且罪行的字义模糊，刑罚重。《公安条例》在 1970 年作出进一步修订，「暴动罪」刑期由 2 年提高到 10 年。

1. 即后来的「不反对通知书」



「六七暴动」期间，有人用石块或玻璃瓶攻击警察。(图片取自：香港旧照片网站)

在「六七暴动」后，香港社会长期未有发生大规模的激烈抗争，殖民时期遗留的恶法也逐渐被社会遗忘。直到近年的社会运动，香港政府又再「借尸还魂」，重新利用殖民时期的恶法打压抗争者。在 2019 年的「反修例」运动，香港政府以《紧急法》订立《禁蒙面法》，定性示威为暴动并且大规模使用「暴动罪」检控示威者，「暴动罪」是最多人被起诉的罪名，涉及高达 653 人（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



「反修例」示威者在 2019 年 7 月 1 日衝入立法会议事厅并悬挂「没有暴徒祇有暴政」标语，吸引媒体争相拍摄。（图片取自：欧新社）

1.3 - 未能解殖的「回归」

/

1984 年，中英两国政府签署《中英联合声明》，在中央政府主导下建立临时立法会、草拟和实施《基本法》。在「回归」的讨论中，社会上主要关注的是如何维繫香港的「繁荣稳定」、在不改变殖民权力格局及保障既得利益阶层利益的前提下顺利过渡[1]，而争取「民主」或改革殖民体制的流弊并不是大部分人关注的议题，主权移交前后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社会运动。

在确立香港将在 1997 年主权移交后，港英政府在殖民末期逐步鬆绑对政治自由的限制、增加民众在代议政治制度的参与。1982 年区议会成立，部份议席为地区直选，比例其后渐渐增加。1991 年，立法局首次以地区直选产生议席，但也同时实行部分议席由「功能组别」产生的制度。「功能组别」的议席代表由不同界别[2]投票产生，然而大部份只有「公司票」，故只代表僱主的投票意向，而非该界别的所有工人，是有利精英管制的制度。

1990 年，中国政府公佈《基本法》，其中定明根据「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行政长官「最终达至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后普选产生的目标」；立法会「最终达至全部议员由普选产生的目标」。中央考量功能组别可令立法机关全由「选举」产生，同时易于保留维持由建制精英把持的局面，并且很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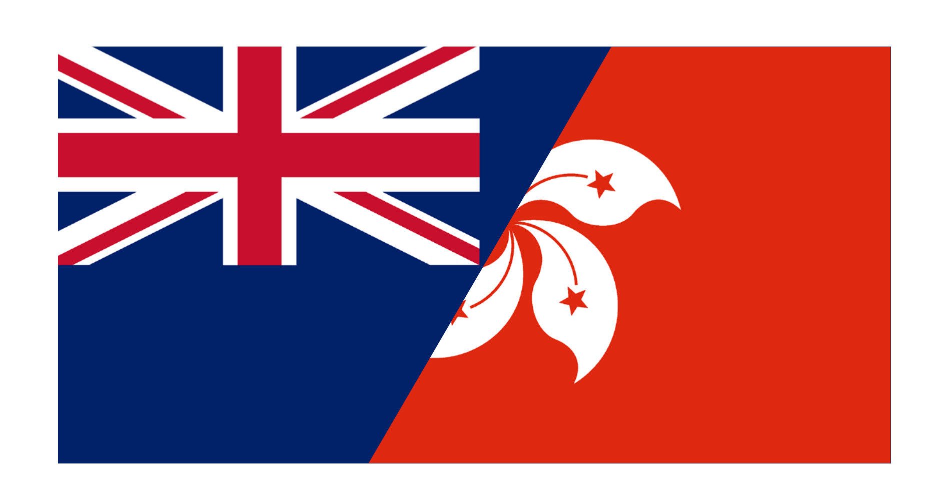
1. 罗永生 (2014)。〈迈向具主体性的本土性〉。载于罗永生《殖民家国外》（页 14-30）。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2. 其中包括商界（如金融界）和专业界别（如法律界）

便掌握了绝大部份功能组别议席。关于殖民时期遗留的恶法，英国殖民政府在主权移交前曾进行部份修订[1]，可是，中央政府认为这些改革是英国为中国留下管治麻烦，因此保留《公安条例》，并倒退回 90 年代前较严苛的版本。

总的来说，「回归祖国」后的香港事实上并没有去殖民化，而是承袭过去殖民统治的管治模式。在政治上，中央冻结香港70、80年代的管治模式，以保持稳定、最大程度满足中央政府的统治利益；在经济上，延续政府公共开支微薄的特点[2]，无视社会上不断加剧的贫富悬殊。在主权移交后的数十年间，这些政治与经济的结构性矛盾日渐加深，触发一波波的群众运动。与此同时，香港的民主化进程已经启动，中央政府也在《基本法》落下了（哪怕是部份措词模糊的）普选承诺，群众运动与承袭自殖民时期的镇压体制剧烈斗争，终导致香港管治模式的全盘破产。

1. 例如：在 1995 年，英国殖民政府修订《公安条例》，游行集会不必再向警方申请牌照，只须七日前通知。

2.《基本法》列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财政预算以量入为出为原则，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并与本地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相适应。」，延续了殖民时期政府开支低于收入，库房长期累积的财政原则。



2 - 中港政治变迁

/

如果殖民体制是香港社会的宏观脉络，那「中港政治变迁」无疑是近年社会矛盾的根源。在这一节，我们梳理中央在主权移交后对港治理思路的变化、香港政制改革和经济交流政策的变迁，及其对普罗市民社会生活和政治认同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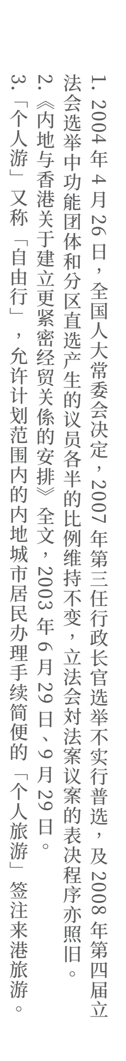
2.1 - 1997 – 2003

「廿三条立法」和中央经济让利

/

「八九民运」遭暴力镇压告终无疑触发香港人对中央威权统治的恐惧，但在主权移交初期，中央对香港社会的介入不多，逐渐增强香港人对一国两制的信心。然而，2003 年前后的「廿三条立法」首次令香港社会对中央政府的统治产生不信任。《基本法》第二十三条规定，香港应自行立法禁止任何有损该国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统一及国家安全的行为，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法律条文，当港府提出「落实立法」，则触发回归后首次巨型的群众运动，最后使法例撤回。建制派在随后的选举中失利，社会上也出现一连串的集会、大型游行要求「尽快落实行政长官和立法会普选」，然而 2004 年的全国人大常委否决政治制度改革的提案，维持现有选举制度[1]。

在「廿三条立法」同年，香港受「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简称 SARS）肆虐，经济陷入低潮，中央政府向香港採取怀柔管治的「让利」策略。2003 年，内地和香港政府签订《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係的安排》（简称 CEPA）[2]，提供香港产品零关税的优惠、向港商开放内地服务业市场，并开放「自由行」以刺激本港的零售、餐饮业[3]。当时，这些经济措施迅速振兴当时的经济、增加就业机会、加强中港交流，但也对香港社会影响深远，埋下了日后中港矛盾的伏笔。


1. 2004 年 4 月 26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2007 年第三任行政长官选举不实行普选，及 2008 年第四届立法会选举中功能团体和分区直选产生的议员各半的比例维持不变，立法会对法案议案的表决程序亦照旧。
2.《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係的安排》全文，2003 年 6 月 29 日、9 月 29 日。
3.「个人游」又称「自由行」，允许计划范围内的内地城市居民办理手续简便的「个人旅游」签注来港旅游。

2.



2.2 - 2003 – 2008

中港交流增加，中国认同提高

/

2
/
2.1
/
▶ 2.2
/
2.3
/
2.4
/
2.5

2003 年的「七一游行」使中央政府改变对港的治理思路，开始公开表达对特区政府的要求，更大程度和更全面地介入香港社会和政治。在政制改革上，2004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主动释法，将特首与立法会产生方法的修改程序增加到五步，增加了行政长官在研拟政改方案前，需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报告，并获得人大常委会决定批准修改。在经济政策上，中央的让利持续协助香港渡过金融风暴的重创，也令香港社会对中央政府的信心逐渐复苏。

2008 年 5 月的汶川大地震令香港社会关注内地的发展，逾八成的市民满意中央政府的救灾表现、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因此增加，当年来自各界的捐款打破香港的歷史记录。同年 8 月的「北京奥运」令香港市民为有正面国际形象的国家感到骄傲，将「中国人」的身份认同推至最高峰。然而，随着普选的承诺迟迟不能兑现、国内的负面消息不断出现，2008 年是各种民调数字的分水岭[1]，香港社会对中央政府的管治信心、「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在 2008 年达到高峰后也开始下滑。





「同一个世界 同一个梦想」(One World One Dream）是 2008 年北京奥运会、2008 年北京残奥会主题口号。(图片来源：domawe.net）

1.〈赵永佳：香港 2008 年，无关痛痒还是民心转捩点？〉，《端传媒》，2016 年 5 月 17 日。

2.3 - 2008 – 2014

中港矛盾恶化期

/

2
/
2.1
/
2.2
/
▶ **2.3**
/
2.4
/
2.5

在这个时期，在政治上，中央政府在政制改革上寸步不让，重申「全面管治权」，推进中港融合的基建和教育指引。在经济上，香港逐步被纳入中国全国发展的规划蓝图中，政府积极推动中港融合的基础建设，推行爱国主义国民教育，加强对香港社会的控制。与此同时，中港矛盾在社会上持续积累，并出现大量日常生活层面的摩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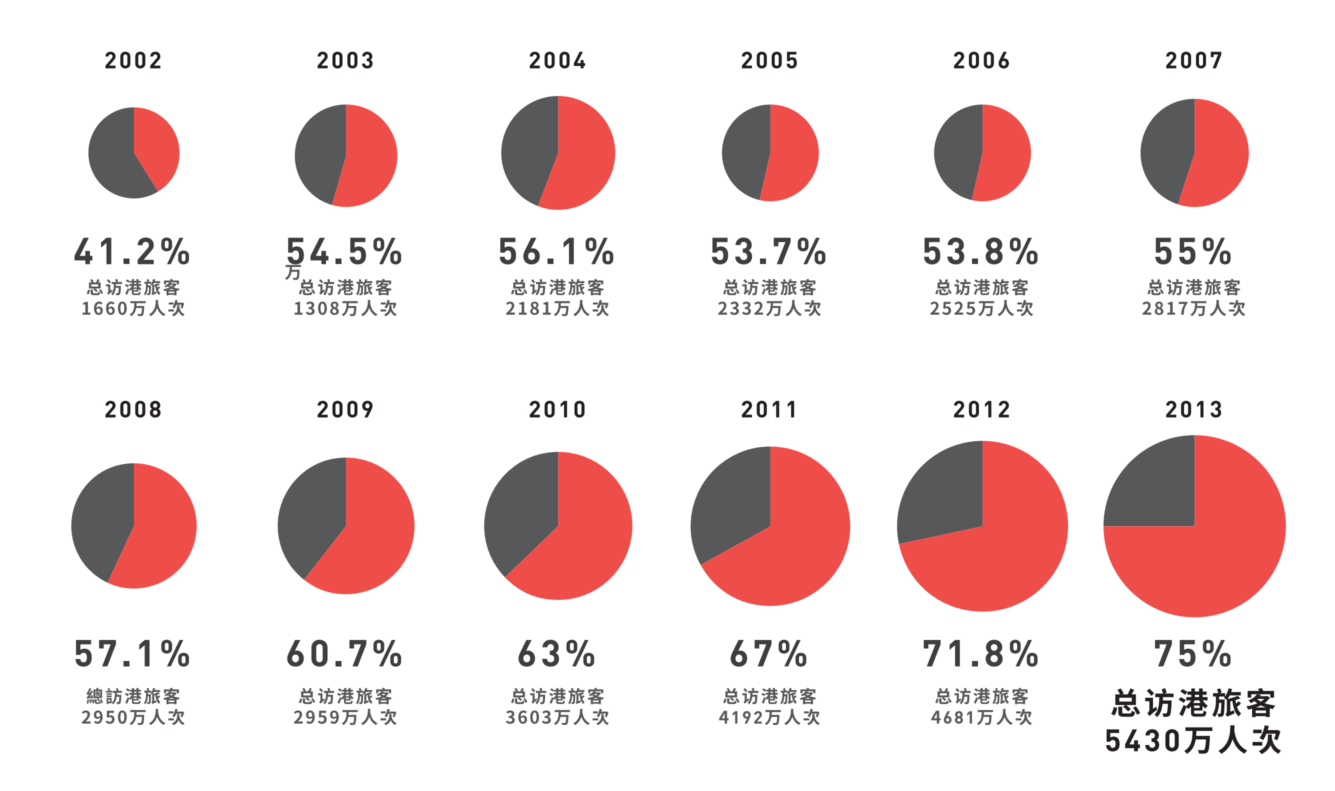
2009 年，香港政府和中央商议已久的「广深港高速铁路」和「港珠澳大桥」进入具体兴建计划、拨款的讨论，前者连接深圳或广东以及内地大多数枢纽城市，后者连结香港、珠海、澳门三地。2012 年，特首正式提出课程指引，要求「德育及国民教育科」成为中小学的必修课。这两个中央授意的政策影响深远，中港融合的基建带来「反对大白象工程」的「反高铁」运动，而国民教育带来青年的「反国民教育运动」（下称「反国教」），最终令课程指引被搁置。

在日常生活的交流层面，2010 年后中港矛盾以族群衝突的方式出现。过去建制论述普遍认为「自由行」和「CEPA」带来的中港交流为港人的经济发展带来机遇。可是，由于香港政府奉行「大市场，小政府」，薄弱的福利制度带来政策性的资源短缺，当中港人口来往增加，便会衍生出不少

2
/
2.1
/
2.2
/
▶ 2.3
/
2.4
/
2.5

社会问题，如当访港内地旅客的数量急增，大量「水货客」在香港抢购奶粉及其他日用品[1]，带来交通拥挤、货品短缺、物价提高等问题，也对部份社区造成生活不便[2]。政策允许父母皆非香港居民以生育旅行方式在香港所生子女（俗称：「双非」）可取得香港永久居留权，加剧医院床位和学额短缺问题，被当年仍在萌芽中的本土派用作宣扬排外的理念，触发社会上将矛头指向内地人。

1. 一些内地人对内地生产的婴儿奶粉等必需品的品质失去信心，在港售卖的产品成为抢手货，跨境「水货」市场兴旺。水货客就是在港购买产品，带回深圳等地售卖以赚取差价的平行进口商。
2. 靠近边境地带如粉岭、上水等地尤为严重。



2002 年至 2013 年内地旅客占访港旅客总人数的比例。在推行「自由行」前，香港接待的旅客达 1,660 万人次，其中 41.2% 来自内地；在 2013 年，访港旅客数字已飙升至 5,430 万人次，当中 75.0% 来自内地。(数据取自：立法会秘书处资料研究组「个人游」计划研究简报）

在 2008 年至 2014 年间，中港融合政策、政制改革、社会问题的交织，让社会上酝酿着对政府不满的情绪。青年人的「香港人」身份认同持续上升、「中国人」身份认同持续下跌 [1]，参与大型示威的人数显着增加。

在 2012 年《十八大》报告，中央首次在治理港澳事务的原则上加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强调「一国两制」的红线。2014 年，国务院提出《「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强调香港的「自治权利」是中央授予，中央拥有「全面管治权」，并加强北京对香港事务用权的「机制化」[2]。同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香港行政长官选举和立法会产生办法的「831 决定」[3]。

中央的连串政治推进令市民对香港落实普选感到绝望，在种种矛盾的积累下，终致「雨伞运动」在 2014 年的 9 月爆发。

1. 参考「图说：回归后的变迁趋势」的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的「香港人」认同和「中国人」认同数据。
2. 例如：以「人大释法」的形式，确立特首和立法会选举的方式和政改的方向。
3. 确立 2017 年的行政长官候选人由 1,200 人的提名委员会产生；不实行公民提名及政党提名，特首参选人须获过半数提委会委员支持才能成为候选人；候选人限 2 至 3 名，而后才先让选民进行普选。另外，2016 年立法会选举全数保留一半的功能组别议席。

2.4 - 2014 – 2019

中央加速收紧对港控制

/

相较于过去3个时期，在「反国教」和「雨伞运动」等社会运动爆发后，中央加速推行中港融合政策，并且大力收紧社会控制，一面高调打压本土思潮，一面深化中港经济融合政策。另一方面，中央对香港的政治干预步步进逼，2015 年，内地执法部门在「铜锣湾书店事件」中跨境掳人[1]；2016 年「人大释法」取消立法会直选议员资格；2018 年「人大决定」通过一地两检[2]，一连串的事件令香港社会对「一国两制」的信心滑落谷底。

2015 年，中央正式在「一带一路」政策文件上提出「粤港澳大湾区」的概念，将香港纳入全国经济发展的战略蓝图，确立香港以其制度政策、集资便利等优势帮助中国经济发展的分工。在「雨伞运动」后，关于「香港独立」的讨论增加，触碰中央政府最敏感的「国家安全」红线，香港大学学生刊物《学苑》因此被梁振英和亲北京媒体大力挞伐[3]。2018 年，港府以《社团条例》作出命令，正式将主张香港独立的「香港民族党」列为非法组织并禁止其运作，数个中央驻港机构[5]高调对此表示支持，指出「对『港独』必定是零容忍」。在打压港独的同时，政府积极推动《国歌法》和「普教中」[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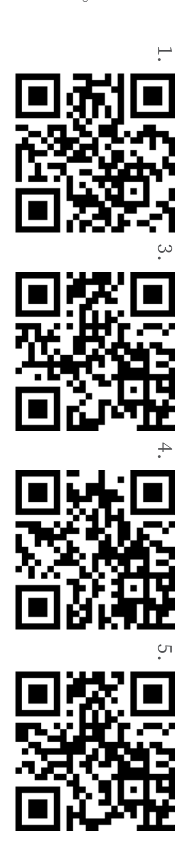
1.〈铜锣湾书店五子失踪事件簿〉，《立场新闻》，2016 年 3 月 24 日。
2.〈【懒人包】高铁一地两检拗啲乜？〉，《立场新闻》，2017 年 10 月 24 日。
3.〈梁振英施政报告 轰港大《学苑》「香港民族论」〉，《立场新闻》，2015 年 1 月 14 日。
4.〈「港独」组织民族党遭禁止运作：言论自由与国家安全之争〉，《英国广播公司》，2018 年 9 月 24 日。
5.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香港中联办、外交部驻香港特区特派员公署。
6. 意即以「普通话」取代「广东话」教授中小学的中文科。



在第 4 个时期，中央政府屡次动用《基本法》中的制度影响香港政治。在 2016 年立法会议员的宣誓风波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基本法》释法[1]，令多位本土派及自决派的民选议员丧失议员资格，失去制度内的政治平台和资源。2018 年，政府提出在高铁西九龙站内划出「内地口岸区」，容许内地人员在香港境内执行职务，「一地两检」的安排引发社会舆论反弹，但最后由「人大常委会」宣称符合《基本法》。在政府高调限缩香港自治空间、加强控制的同时，民间社会陷入「雨伞运动」后的低潮期，虽有零星的游行示威，但未能形成大规模的群众运动。2016 年，本土派发起「旺角事件[2]」，数名示威者被控「暴动罪」，其中卢建民被判囚 7 年，为香港开埠以来最重的暴动刑期。

在这数年间，「本土思潮」在社会上冒起，作为一种政治立场具有相当影响力。2016 年，「本土派」首次被纳入民调计算[3]，虽然不及温和民主派的支持人数多，但自称本土派的市民占社会 8.4%，在 18 至 29 岁的青年人中，更占近三成。在 2016 年的选举中，所有提倡本土、自决或独立的候选人，合共取得近 39 万票[4]，在 35 个立法会议席中取得 6 席。同年的民调亦发现，「香港独立」的支持者占 17.4%，反对者占 57.6%；在年轻一辈间，支持的比率近四成，多于反对的比率。然而在 2016 年政府针对独立思潮的打压后，支持独立者在 2017 年明显减少[5]。

1.《港裁定「取消议员资格」梁颂恒游蕙祯上诉》，《英国广播公司》，2016 年 11 月 15。
2. 本土派称为「鱼蛋革命」
3.《多少市民自认属本土派？3 月调查研究的结果》，《明报》，2016 年 4 月 15 日。
4.《本土自决派共得 39 万选票，学者：民主自决成香港重要议程》，《端传媒》，2016 年 9 月 5 日。
5.《中大民调：本土派支持者依旧，但支持港独年轻人减少》，《众新闻》，2017 年 6 月 7 日。



2.5 - 图说

主权移交后的变迁

/

2
/
2.1
/
2.2
/
2.3
/
2.4
/
▶ **2.5**

在这部份以「一国两制信心」、「香港人身份认同」、「六四集会」和「七一游行」的参加人数作为指标，呈现从 1997 年的主权移交到 2019 年的「反修例」运动前的香港社会变迁。这些变迁趋势和上述中港政治框架的转变和重大社会事件大致吻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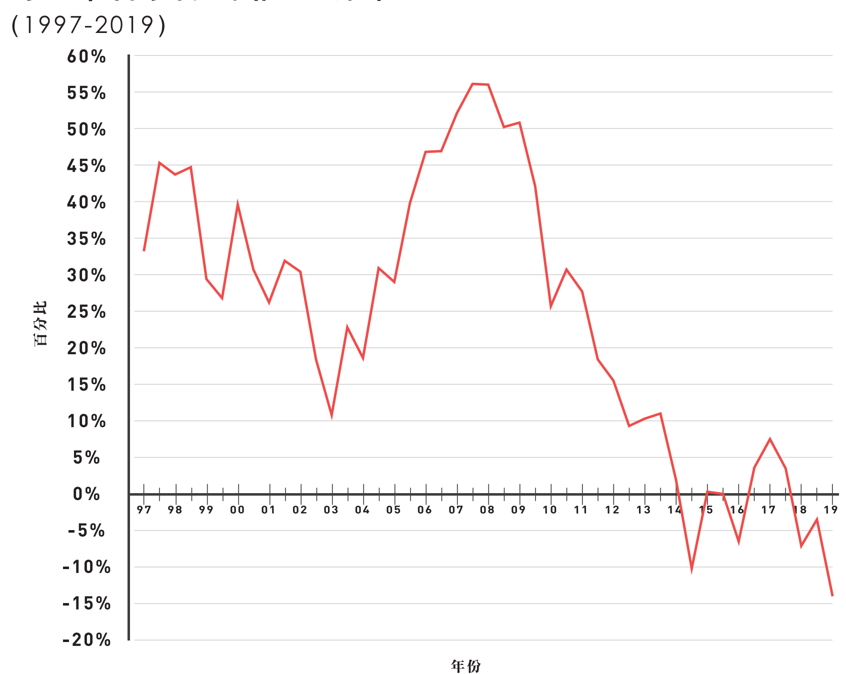
在这些图表中，从主权移交到 2003 年推行「廿三条立法」前，香港市民对中央政府的信心、中国人身份的认同逐渐上升。2003 年的，「廿三条立法」首次令香港社会对中央政府的统治产生不信任，「六四集会」和「七一游行」的人数出现首个高峰。然而在 2004 年至 2008 年的北京奥运前后，香港市民对「一国两制」的信心和「中国人」的认同皆稳定回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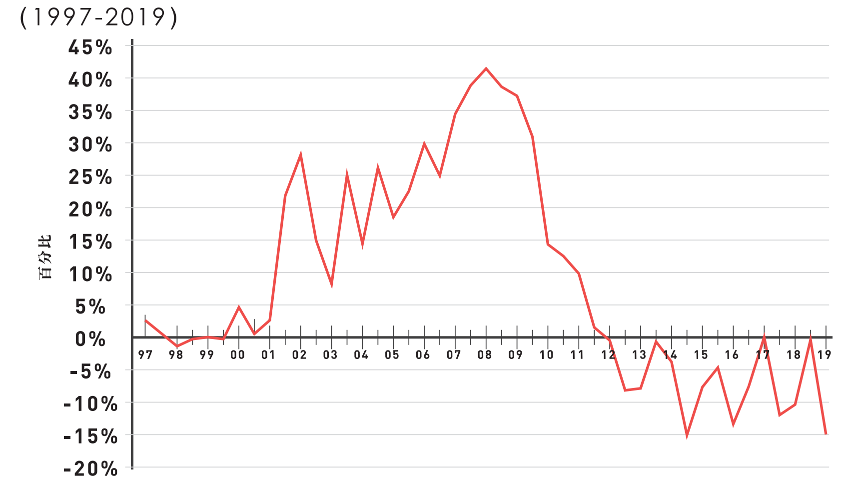
2008 年至 2014 年是「中港矛盾恶化期」，中央政府在政制改革上寸步不让，中港矛盾在社会层面爆发，市民对「一国两制」的信心逐年下跌，「六四游行」和「七一游行」的参与人数逐年增加。与此同时，市民的「香港人」认同持续攀升，「中国人」的认同持续下跌。在 2014 年，18 至 25 岁市民的「香港人」认同高达 75.8%；「中国人」认同低至 6.5%[1]。

1. 参考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的「市民的身份认同感」数据。

在 2014 年的「雨伞运动」后至 2019 年的「反修例」 运动爆发前，中央加速收紧对港控制，市民整体对「香港人」的认同持续上升，对「中国人」的认同持续下降。但社会运动陷入低潮，社会上瀰漫着「游行无用」的氛围，大型集会参加人数显着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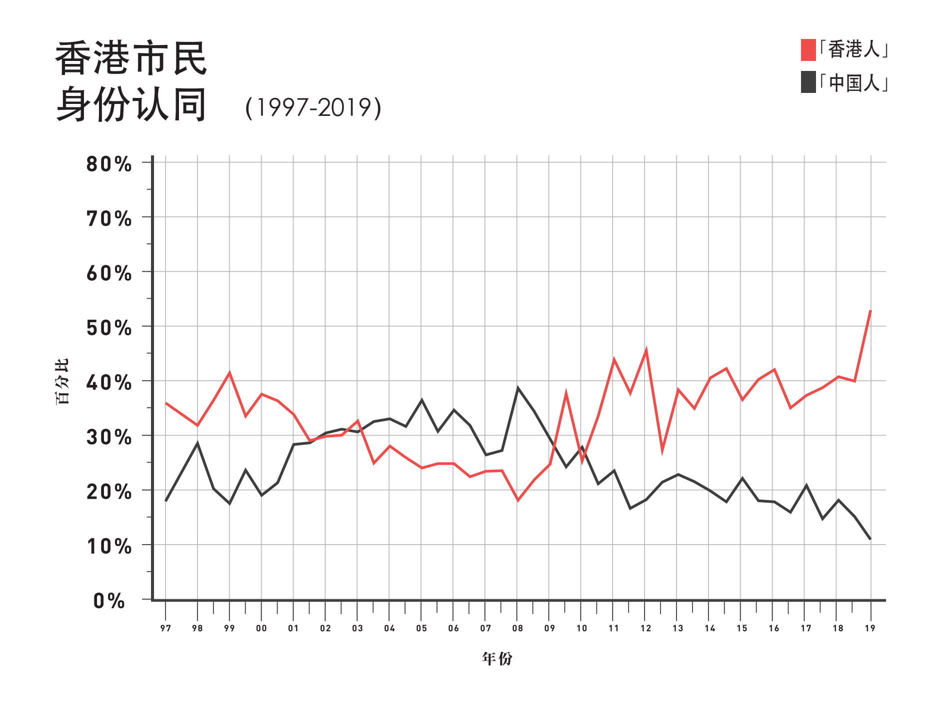
组图一：香港市民对「一国两制」和中央政府的信心（1997-20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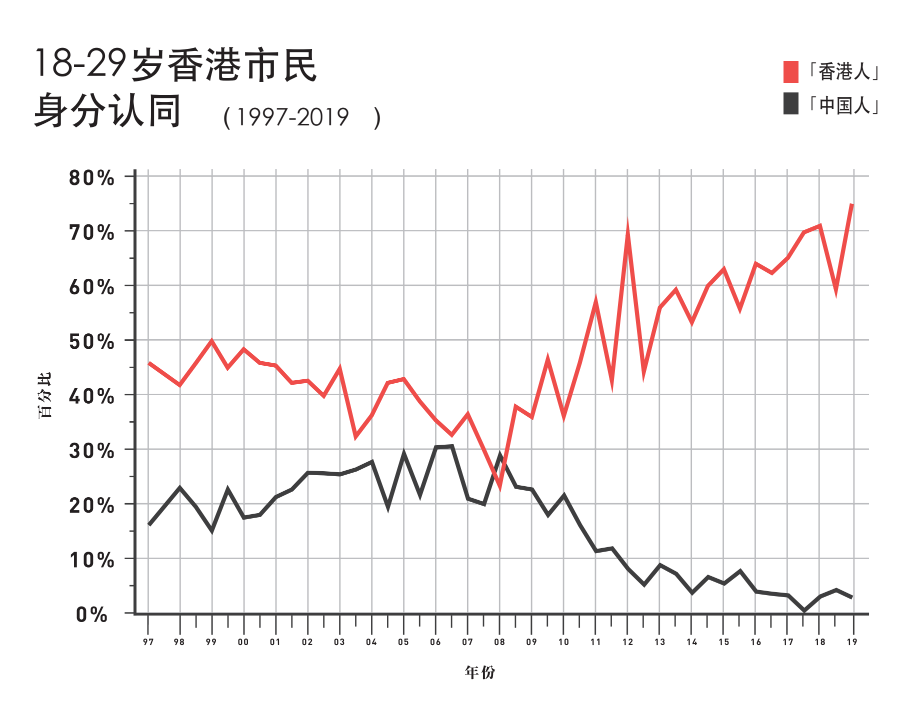




参考：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市民对一国两制的信心」、「市民对北京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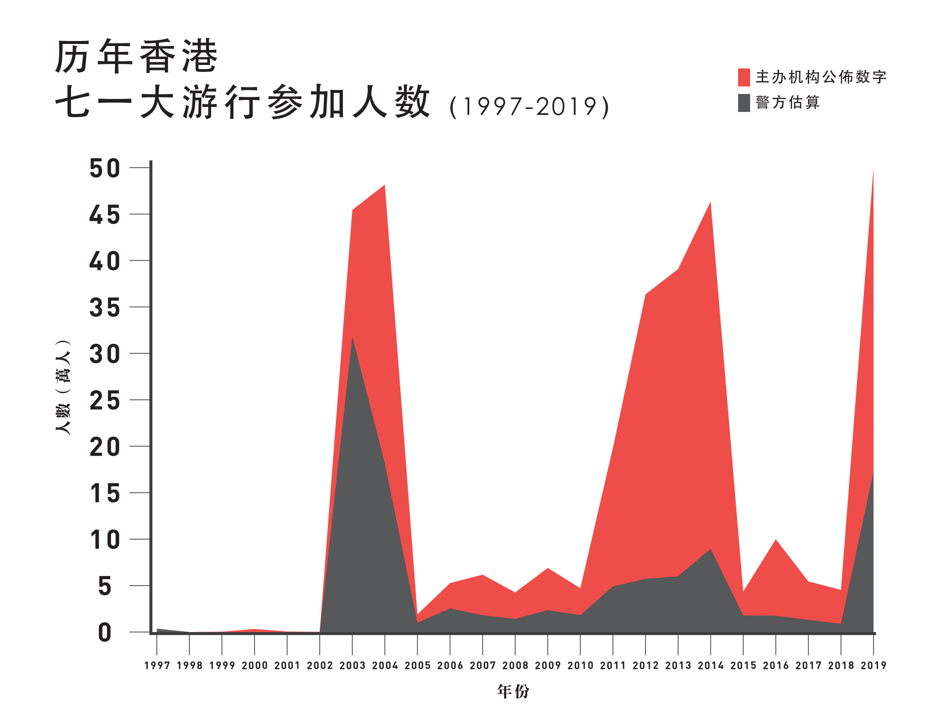
组图二：香港市民的身份认同（1997-20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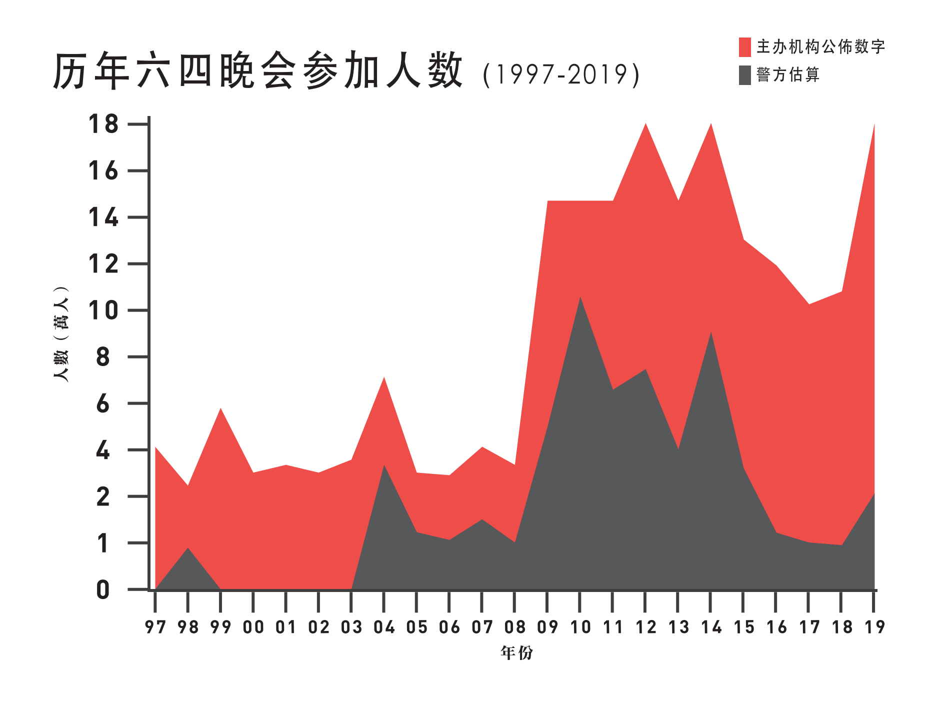




参考：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市民的身份认同感」数据。

组图三：歷年「六四晚会」、「七一游行」参加人数（1997-2019）





数据取自：歷年媒体报导游行主办机构公佈的数字和警方数字。

3 - 香港社会运动发展的轨迹

/

香港社会运动有源远流长的歷史，由 19 世纪的多起罢工潮 [1]、「妹仔 [2]」解放运动、到二战后「火红年代 [3]」的反殖运动、「四反 [4]」运动。在战后，不少关注住房、教育、性别、劳工等范畴的团体进行组织和倡议，以压力团体的方式抗争，要求政府施行惠民的政策。1980 年代商讨主权移交之际，政制改革获得远超其他议题的关注，各范畴的积极份子在民主运动的旗帜下匯聚成共同阵线，也定调往后 30 多年社会运动的主旋律。

下文将记述由 1980 年代至「反修例」运动前，在香港的民间社会曾出现的重要抗争事件、政治思潮和抗争路线递嬗轨迹。这些发展又如何成为 2019 年香港爆发大型社会运动的背景。

1. 详见：梁宝龙（2017），《汗血维城：香港早期工人与工运》，香港：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
2. 即婢女。当时蓄婢被视为相同于奴隶制度，与宗主国英国法律违背，最后蓄婢被立法禁止。
3. 1970 年代的激进学生运动热潮，其中思潮涵盖反殖、无政府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等。详见：罗永生（2017），〈「火红年代」与香港左翼激进主义思潮〉，《二十一世纪》，第 161 期，71-83。
4. 即「反加价、反失业、反贫穷、反压迫」。

3.1 - 1980 – 1990

主权移交争议与民主运动

/

战后，大批由内地逃离政治斗争的难民涌入香港，成为重要的人口组成。他们对政治抱持冷漠的态度，再经歷港英迴避国共斗争的治术和「六七暴动」，社会上形成不热衷政治事务的氛围。然而，在中英政府就香港前途展开谈判的 1980 年代，「回归」问题引发社会关注。这章分作四个部分，我们分别回顾「回归」前后的香港前途和民主化讨论，在 1980 年代选举局部开放后形成的「议会路线」，「八九六四」对香港民主运动的影响，以及《基本法》中「民主普选」的承诺。这些在 1980-1990 年代奠定的民主运动框架对往后的民主运动影响深远。

3.1.1 - 「民主回归」

/

在 1980 年代，随着中英政府就香港前途展开谈判，「回归」渐成香港社会各界的焦点。在当时的香港社会，被殖民统治数十年的华人经歷殖民政府的种族歧视、社会不平等、缺乏民主参与，并且有较高的「中国人」认同。在「反殖」的背景下，当时的社运人士或知识份子也反对维持殖民统治，并怀有主权移交将为香港带来民主化的憧憬。在关于「回归」的社会讨论中，普罗大众最关心的还是如何延续香港在经济上的「繁荣稳定」，关于政制民主化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少数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

尽管在 1980 年代，各种关于香港前途的讨论曾在公共讨论中出现，但在 1984 年《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后，基于难以改变的政治现实，民主派人士将「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承诺看作政治契机，以在「回归」的前提上「渐进落实民主」为政治目标[1]，奠定「民主回归」的民主化想象。在当时受到劳工团体、法律学者、社工等关心社会的群体支持、视此为共同争取的目标[2]。然而，「民主回归」的政治想象也是自限的，罗永生形容当时的民主运动「以『中产主体』为想象的蓝本、配合他们只求改良、不求革命，甚至以技术管理为核心意识形态的特色」，这种「回归」的想象不挑战香港的主权问题，也不讨论衝击本地资产阶级利益的阶级问题[3]。

1. 罗永生（2018），〈身份政治往何处去〉，载于郑煒、袁瑋熙（合编），《社运年代》（页 19）。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 马岳（2012），《香港 80 年代民主运动口述歷史》。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
3. 罗永生（2018），〈身份政治往何处去〉，载于郑煒、袁瑋熙（合编），《社运年代》（页 19）。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3.1.2 - 「议会路线」

/

在 1984 年《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1980 年代有限度选举的逐步开放下，香港的政治参与者和社会组织者纷纷被吸纳入「政治参与模式[1]」，透过选举政治的建制渠道提出诉求。主权移交的问题使「积极的政治参与者集中于政治事务，特别是有关中港关係的政治事务[2]。」另一方面，曾在 1970 年代活跃一时的学生、住屋、劳工等基层运动在 1980 年代获得的关注远不及政制改革议题，未能打进主流社会的讨论。另一方面，当时立法局的局部民主化，亦令多年来居于体制外的社运人士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活动空间，有意改善社会问题的人士纷纷充当「代理人」在立法局为基层发声。

自 1980 年代开始，泛民主派的政治团体一方面积极参与殖民地的代议政治，一方面要求在《基本法》中加入民主政制的相关内容。逾百个团体在 1986 年发表「一九零人政制方案[3]」，其中一些团体后组成「民主政制促进联委会」，也就是泛民主派政党的雏形。然而，在殖民末期和主权移交后的政制框架下，民选议员都只能在体制内扮演监察政府的角色，实际的影响力相当有限。与此同时，议会参政路线因选票导向所衍生的保守性、基层群众组织的缺乏等问题随时间推移曝露出来，和更基进的民间团体产生张力，这也成为未来民主运动中重要的矛盾所在。

1. 吕大乐（1994），〈迷失于急剧转变政治环境中的香港民众运动〉，《香港社会科学学报》，4，67-78。
2. Tai-lok Lui (1997),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Movement in Contemporary Hong Kong,」 in Hong Kong' s Social Movements: Forces from the Margins, ed. Sophia Woodman (Hong Kong: July1 Link and Hong Kong Women Christian Council, 1997), 140
3. 民主派提出的回归后选举方案，主要内容为支持行政长官由普选产生、至少半数立法局议席由直选产生。由于当时有 190 人公开联署支持，因而得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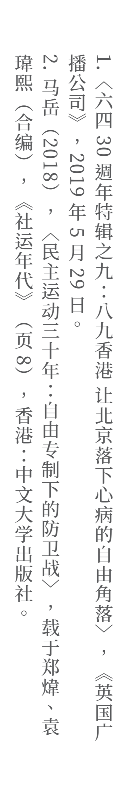
3.1.3 - 「八九六四」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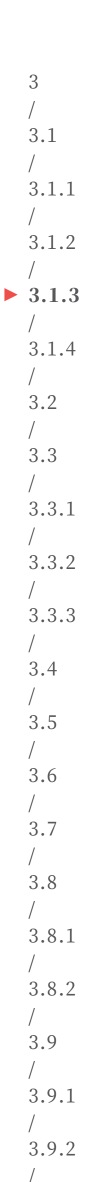
「八九六四」对香港人来说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时刻。1989 年，在中国数个城市爆发歷时近 2 个月的民主抗议运动。香港记者率先将北京示威现场的报导传回香港，媒体铺天盖地地播放群众大规模示威和学生绝食的画面，震动整个香港社会。社会各界自发组织各种声援集会、募款、在狂风暴雨中游行声援北京的民运人士。在北京宣佈戒严的第二天，香港更出现百万人大游行。香港当时的全民动员和香港即将「回归」，市民感受到内地的民主化和自己的命运相连。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支联会）主席司徒华曾在访谈中提到：

> 「香港游行中有一个口号最能体现港人的心态：『今天的北京就是明天的香港』。香港就要回归中国了，如果中国不走上民主化，香港会变成什么样？香港的人权自由能存在吗？[1]」

总的来说，「八九六四」是很多香港民运人士和市民的政治启蒙，也引起普罗大众对于中港体制趋同的恐惧，并为民主派政党带来空前的支持。在此之后，「民主抗共」、香港维持现状等主张渐渐成为主流，而在往后的数十年间，民主派的定位亦由「共同建设民主中国」，转变为抵抗中共干预、维持香港仅有的民主[2]。


1.〈六四 30 週年特辑之九：八九香港 让北京落下心病的自由角落〉，《英国广播公司》，2019 年 5 月 29 日。
2. 马岳（2018），〈民主运动三十年：自由专制下的防卫战〉，载于郑煒、袁瑋熙（合编），《社运年代》（页 8），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



1989 年 5 月 20 日，李鹏在北京下令戒严，而后 4 万香港市民在飈风中上街示威。（图片取自：众新闻）



1989 年 5 月 21 日，100 万香港市民在多条主要干道游行。（图片取自：中大学生报）

3.1.4 - 《基本法》的普选承诺

/

在 1984 年《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后，在没有香港社会民意的授权下，由中央政府委任的委员会草拟《基本法》，确立香港「一国两制」、渐进达至「民主普选」的宪政框架。《基本法》中明订，根据「循序渐进」的原则，行政长官「最终达至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后普选产生的目标」；立法会「最终达至全部议员由普选产生的目标」。在往后的数十年间，依照《基本法》的承诺落实「民主普选」成为主流民主运动的诉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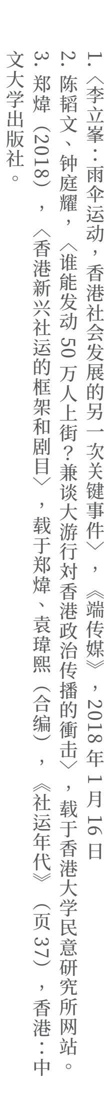


（图片取自：东方日报）

3.2 - 2003「七一游行」/

2003 年「七一游行」是香港主权移交后的一次关键事件[1]，树立回归以来，以大型群众动员，迫使政府妥协的先例，使更多人关注和投身到社会运动当中。在主权移交后，社会运动团体在每年的 7 月 1 日举行小规模游行；但由于中央政府在主权移交初期对香港政治的介入不多，参加游行的人数非常少。直到 2003 年港府推出「廿三条立法」，促使 50 万人参加由民阵所举办的「反对二十三，还政于民」大游行，要求撤回立法、特首下台。政府在巨大的民意压力下撤回立法，随后特首辞职。

2003 年的「七一游行」也揭示过去「民主党」高度主导民主运动的局面面临挑战。50 万人的大游行是市民自发动员多于政党组织号召的结果，过半的示威者认为人际网络的动员和媒体的号召影响其参与游行的决定[2]。示威者虽然来自不同阶层，但高教育程度、中产背景、及专业人士的参与较为突出。在抗争手法上，50 万人秩序井然的示威画面受到媒体的关注，奠定一种「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民主运动模式，「尽管集体行动在大游行之后有增无减，抗争的剧目依然是专业领导、局部动员、合法抗争。[3]」



1.〈李立峯：雨伞运动，香港社会发展的另一次关键事件〉，《端传媒》，2018 年 1 月 16 日
2. 陈韬文、钟庭耀，〈谁能发动 50 万人上街？兼谈大游行对香港政治传播的衝击〉，载于香港大学民意研究所网站。
3. 郑煒（2018），〈香港新兴社运的框架和剧目〉，载于郑煒、袁瑋熙（合编），《社运年代》（页 37），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



在隔年的立法会选举中，部分的社会运动能量被吸纳入选举政治中，数名积极反对「廿三条立法」的专业人士当选，冀利用体制内的权力寻求改变。2006 年，由民主党领导的泛民主派政党格局出现变化——以中产背景的专业人士为主的「公民党」成立；以社会民主主义为号召、走基层路线的「社会民主连线」成立，为往后泛民主派政党的路线分歧埋下伏笔。



2003 年反对「廿三条立法」游行。（图片取自：法新社）

3.3 - 2003 – 2013 主流民运外百花盛放的社会运动

/

这个时期，「泛民主派」继续主力参选、发展政党、和「建制派」在议会里拉锯，虽然持续号召每年的「六四」和「七一」示威，但在普罗大众当中并没有投票以外的直接动员能力。

在议会的拉锯外，大量由青年人和社运团体自发组织的街头「直接行动」百花盛放，「街道和网络取代议会，成为政治运动和公共论述的主场景」[1]，这些行动包括 2004 年的「反市区重建迫迁」[2]、2007 年的「保育天星、皇后码头」、2009 年起长达数年的「反高铁」抗争。这些社会运动的关注较政制改革广泛，对中港融合、发展主义、地产霸权的批判都成为焦点。一些抗争带有左翼色彩，分享关怀基层、批判资本、保障劳工权利和分配公义等共识；一些抗争深化对「本土」的讨论和实践。其中，「反高铁」运动中围绕着财政支出、收地所引致的新界农村迫迁触发长达数年的抗争，不仅启蒙了一代的青年，也带来之后 10 多年关于土地正义、香港本地农业、环境保育的抗争。

尽管在这些抗争中并不多「成功争取」的事例，但在被议会路线和「和理非」制约的社会风气下[3]，开创了「直接行动」的实践和积累网络，在后续的社会运动发挥影响。伴随着媒体报导和公众讨

1. 郑煒（2018），〈香港新兴社运的框架和剧目〉，载于郑煒、袁瑋熙（合编），《社运年代》（页 37），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 H15 关注组，〈五年利东街血汗艰辛抗争路〉。
3.「和平、理性、非暴力」之简称。

2.



论，静坐、占领、衝击等手法渐渐在年轻一辈间取得支持。另一方面，抗争的规模有不断增加的趋势，由「反市区重建」的数十人、「保卫皇后码头」的 500 人、到「反高铁」的 8,500 人。在 2010 年后，社会上对政府的不满急升，网络动员变得普遍，社会运动的规模出现变化。在 2012 年，「学民思潮」发起的「包围政府总部」行动获 12 万市民响应，迫使政府搁置设立「国民教育科」。在 2013 年，码头工人发起罢工，学生投入后勤和声援并争取到社会的支持，同年的「港视发牌争议」，引发 12 万人包围政总。

2003 年利东街居民和舖户挂满黄幡，抗议重建所带来的迫迁。（图片取自：苹果日报）



2010 年，立法会通过高铁拨款，反高铁示威者包围立法会，要求与时任运输及房屋局局长对话。（图片取自：独立媒体）





2009 年的「千人怒撑菜园村」抗议行动。（图片取自：独立媒体）



2007 年的建筑工人罢工工潮。（图片取自：独立媒体）

3.3.1 - 「直接行动」的转向

/

在这十年的社会运动中，这些体制外「直接行动」的主要组织者是多为 1980 年代出生的青年，与泛民恪守的议会路线保持距离。

在这些社会运动中，「绝食抗议」和「占领留守」是常见的抗议方式。为反对利东街被清拆重建，居民绝食数日；「保卫皇后码头」的示威者占领码头举办音乐会和人民规划大会。从「反高铁」开始，更多示威者尝试堵塞道路交通、包围政府建筑、用身体推进警方防线。在「反国教」运动中，「学民思潮」和数万名市民占领政府总部、并发起罢课和接力绝食；在「码头罢工」期间，数百名学生到码头留守支援，衝击保安的防线，和工人们一起占领码头内的行车道，不少香港的抗争者指出：2005 年数千名韩国农民在「世界贸易组织第六次部长级会议」中，结合包围、衝击防线、「三步一叩」苦行的抗争令他们深受启发，例如在「反高铁」、「码头罢工」中，示威者分别手持象徵土地的白米、身着印有「重夺劳动尊严」上衣苦行。

在这些社会运动中，数日至数週的公共空间「占领」打开群众自发组织、参与的空间。数百名积极的社会运动参与者的网络逐渐形成，他们组成行动小组，彼此之间亦有连结。这些社会运动的参与者不少对议会抗争争取政制改革的运动路线抱以批判，他们更在乎在这些行动中开展民主自

3 / 3.1 / 3.1.1 / 3.1.2 / 3.1.3 / 3.1.4 / 3.2 / 3.3 / ▶ 3.3.1 / 3.3.2 / 3.3.3 / 3.4 / 3.5 / 3.6 / 3.7 / 3.8 / 3.8.1 / 3.8.2 / 3.9 / 3.9.1 / 3.9.2 / 3.10

治实验，创造集体充权的过程。在这些行动中，一些积极份子轮流占领空间、筹募物资、向外发佈现场资讯，并透过网络动员更多的市民前来参与。

在当时，主流泛民主派和社会舆论仍认为「用群众力量胁迫官员或议员顺从民意『不理性』、衝击代议政治的核心[1]。」然而，这些多样而频繁的基进抗争引起社会的讨论，不断挑战社会大众对于抗争的想象。另一方面，在这个时期，虽然警方偶有打压这种直接行动模式，但在 2003 年至 2014 年 5529 次的公众活动中，只有 16 名示威者被起诉。相较于「伞运」后，政府在执法上仍保留一定的现实空间[2]。



码头工人罢工期间，学生穿上白色、写着「重夺劳动尊严」的上衣，手持红玫瑰，慢行去北角，再坐船到红磡，最后步行至葵涌货柜码头，表示对罢工工人的支持。（图片取自：东方日报）



高铁拨款通过后触发反高铁示威者包围立法会。（图片取自：苹果日报）

1. 郑煒（2018），〈香港新兴社运的框架和剧目〉，载于郑煒、袁瑋熙（合编），《社运年代》（页 37）。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 尽管根据《公安条例》，组织和参与未经批准的集会游行构成刑事犯罪，然而在这个时期，未经批准的集会和游行往往没有被检控。

3.3.2 - 第一代「本土」的建构

/

香港社会目前关于「本土」的认识大多来自 2011 年后崛起的本土思潮，不过，关于「本土」的讨论在 2007 年的「保卫皇后码头」运动已经出现。2006 年年底政府计划清拆皇后码头以启动填海工程，「保卫皇后码头」的抗争者占据码头展开抗争，更在运动期间成立民间团体「本土行动」。他们举行多场以「本土」作主题的活动，包括鼓励民众「自主自决」参与城市规划的「保留皇后人民规划大会」、摄影展、新本土运动论坛和「人民登陆皇后」行动。

这些抗争者尝试提出一种改写殖民歷史、批判「发展主义」的本土论述初探。然而在当时的社会，普罗市民主要关注皇后码头的歷史文化记忆，「解殖」的本土论述未能广泛地打入社会的讨论。

「保卫皇后码头」行动的参与者陈景辉曾写到：

> 「天星保卫运动开启了一种新本土视野，意欲摆脱各种自上而下的官方本土想象（如在利东街和大会堂对出的新填海地上筑建格格不入的巨厦高楼式规划），重拾香港人的主体性……[1]」「假使要让九七后的香港真真正正地脱离九七前的殖民地状态，需要做的并不是直接拆掉皇后码头此一殖民标志，相反，我们要作的是真正将政治权力交还下放给香港的普罗民众。[2]」



在 2007 年 1 月 21 日，一艘命名为「本土号」的轮船，载着约 100 名不同种族和界别的市民，当中包括皇后码头保卫者、新来港移民、外劳团体、文化保育团体成员等，象徵着重新为「香港人」下定义。「本土号」由尖沙咀开往中环的皇后码头，登上轮船前，人民举着不同的横额和标语，由尖沙咀钟楼步行到码头。在皇后码头登岸后，又仿效港英时期港督和皇室人士的登岸仪式，领着两条各长 50 公尺写着「回忆添创造、人民自决路」的横额，从码头登岸之处领到昔日殖民时代由港督主持升旗仪式的检阅台。（图片取自：苹果日报）

1. 〈维多利亚港・利东街・天星码头〉，《独立媒体》，2007 年 2 月 15 日。
2. 〈【回归 20 年】十年回想 皇后码头运动的「本土」〉，《明报》，2017 年 6 月 17 日。

1.


2.


3.3.3 - 左翼思潮的冒起

/

左翼运动在香港歷史源远流长，早在 19 世纪，香港已爆发过不止一场反帝国主义的罢工。香港的左翼分子就殖民主义的祸害、码头工人的苦况、女性的卑微地位挺而抗争。战后，不少民间团体如「街工」[1] 的群众组织工作都具有左翼色彩。然而，左翼思潮一直都不是香港社会中的主流，长久以来在冷战的意识形态下，共产主义在市民眼中与极权划上等号，以致批判资本主义的立场一直都不受待见。在 1980 年代，主权移交谈判激发了争取民主的呼声，可是泛民主派的议员在各种议题上向资本家的利益倾斜 [2]，社会上也较少围绕社会不平等、贫富悬殊的社会抗争。

然而，在 1997 年的金融风暴后，社会不平等问题日益显着，其中「地产霸权」的问题获得不少市民的共鸣，楼价飙升、「居屋」停售、公共房屋减建，使市民难求窝身住所；待遇恶劣的外判工作越来越普遍、旧区重建以致居民遭迫迁。种种积累已久的民生问题曝露于人前，也使得主流政制议题外的工运、社运有如雨后春笋般发展。

在 2004 年，左翼旗帜鲜明的梁国雄（长毛）高票当选立法会议员，在 2006 年成立了「社会民主连线 [3]」，为首个主张左翼意识形态的民主派政党，在议会中带入了相对激烈和具阶级意识的抗争 [4]。2011 年，「工党 [5]」成立，多位议员倡议标准工

1. 街坊工友服务处，由 1970 年代开始着力服务和组织工业区工人和公共屋邨居民的团体。
2. 1999 年，李卓人所提出的「设立最低工资提案」被民主派议员否决。
3. 在议会审议过程中喧嚷、掷物、去官员住所前抗议乃至衝破警方防线，这些行为屡次被泛民主派批评，亦不为社会主流接受，但开启了回归后抗争激进化的先声。
4.「社会民主连线」的政策纲领。
5.「工党」的政策纲领。

4.



5.



3 / 3.1 / 3.1.1 / 3.1.2 / 3.1.3 / 3.1.4 / 3.2 / 3.3 / 3.3.1 / 3.3.2 / ▶ 3.3.3 / 3.4 / 3.5 / 3.6 / 3.7 / 3.8 / 3.8.1 / 3.8.2 / 3.9 / 3.9.1 / 3.9.2 / 3.10

时、合理最低工资、退休保障等政策。在民间，「旧区街坊自主促进组」、「中大基层关注组」等发展基层组织并有左翼色彩的团体纷纷成立。「改善民生」和「打倒地产霸权」的口号一度成为「七一游行」的主题。在 2007 年，出现「紮铁罢工」[1]。在 2010 年，意识形态更为旗帜鲜明的政治团体「左翼廿一」成立。在 2013 年，出现「码头工人罢工」[2]，社会整体的气氛出现了相当改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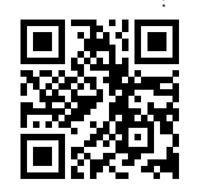
然而，在政制民主化的社运主调面前，这些批判资本、反对劳动剥削的立场的推进挑战重重，在议会里关于劳工保障相关的法例因传统民主派不支持而进展缓慢；在街头上也未有一定的群众支持，未能成为有影响力的运动。与此同时，每逢民主运动抗争，政府往往以「保民生、拼经济」作为宣传，暗指「民主」运动损害「民生」经济发展，久而久之令民主运动的抗争者对民生议题心生排拒，甚至将民主和民生视为互相对立的诉求。



码头工人罢工受职工盟、学联、左翼廿一的支持，在当时市民更捐款达 400 万用作罢工基金。（图片取自：明报）

1. 《麦德正：轰动全港的 36 天 扎铁工潮十周年》，《独立媒体》，2017 年 10 月 13 日。
2. 《诚哥暗黑帝国——码头工人抗争专题》，《左翼 21》，2013 年 3 月 28 日。

1.


2.


3.4 - 2009 泛民主派步向分裂

/

以「民主党」为首的泛民主派政党是「回归」初期民主运动的重要力量，2003 年，「公民党」和「社民连」等政党出现。这些泛民主派的政党大多视「一国两制」为保护香港自由法治的制度框架，以「渐进落实《基本法》的民主普选」为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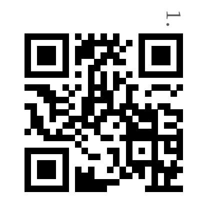
在寻求改变的路径上，主流泛民主派认为要和中央政府保持沟通，才有望逐步兑现普选承诺，于是发展出一方面发起游行表态、一方面和政府在体制内谈判，俗称「又倾又砌」的互动模式[1]。为令该互动模式得以延续，主流的泛民主派政党主张「和平、理性、非暴力」（和理非）的抗争手法，并不认同对体制外更激烈的抗争。泛民主派在社会运动中的参与并不积极，但一度扮演着「霸占战场、搭建动员民间反对运动的平台[2]」的角色。在功能组别的限制下，居于少数的泛民主派议员无法否决议案，但可透过发问、提出修订等方式延长审议法案的程序，俗称「拉布」。当议案受到公民社会的质疑，「拉布」能争取时间动员更多的群众行动。但换言之，议会外的抗争群众才是施压的主力，「拉布」本身并没有影响力。

1. 1980 年代基层组织者开始主张的倡议模式，即一方面在议会内商议，另一方面在议会外施加群众压力。
2. 马岳（2018），〈民主运动三十年：自由专制下的防卫战〉，载于郑煒、袁瑋熙（合编），《社运年代》（页 8）。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09 年年底，特区政府公佈《2012 年行政长官及立法会产生办法谘询文件》，没有回应民间关于政改的诉求，也没有提出迈向双普选的步骤和日程。于是「社民连」和「公民党」提出「五区总辞，变相公投」[1]，希望民间透过公投表态，迫使政府尽快实行普选。然而以民主党为首的「终极普选联盟」拒绝参与公投，更走入中联办和中央「沟通[2]」。最后由中央推出的妥协方案在民主党和建制派联手支持下高票通过，「五区公投」以低投票率收场，而后中央并没有如民主党期盼的继续建立沟通平台，政改仍然毫无推进。

随着中央的普选承诺一再落空，社会上的矛盾不断升温，温和议会路线遭到挑战。2009 年的政治风波令温和议会路线顿失支持，民主派温和派和激进派几近决裂，民主党在支持者间的公信力大幅下降。当体制内的议会路线无法回应社会积累的矛盾，本土派的崛起和大规模的街头抗争于是浮现。


1.〈五区公投十周年 — 参与者访谈〉，《立场新闻》，2020 年 5 月 17 日。
2.〈【概观民主党 · 想中国 5】走入中联办，信任让梦魇成真（上）〉，《立场新闻》，2016 年 6 月 6 日

1.


2.


3.5 - 2011 – 2013

本土派崛起

/

「本土主义」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基于对先前的民主运动与其他社会运动的不满。随着政制改革受阻、中港关係恶化（详见〈2008-2014：中港矛盾恶化期〉）、香港人身份认同高涨，「本土主义」在社会上崛起。今日香港普遍理解的「本土派」可以追溯至 2010 年左右围绕着中港矛盾的讨论。其中，陈云是首位本土思潮的论述者[1]，他的理论为本土派提供了最初期的论述。他在 2011 年出版《香港城邦论》，自称「国师」，并以偏锋的言论在网上受到瞩目，吸引了一批支持者。

在这里我们概括陈云的重要观点：第一，他反对泛民最初提出的「民主回归论」，认为中国哪怕有民主，未必对香港有利，而泛民将精力浪费于关心中国民主发展，牺牲了香港利益。第二，他主张香港本位、港人优先的政治纲领，追求人口、文化、经济、资源各方面的自治。第三，为推动自治运动，他提倡族群政治，撰文为网民使用「蝗虫」一词辩护。第四，陈云认为美国的「香港政策法」未来会成为中美斗争中的一环，而香港的国际地位和金融制度对中国有特殊的利用价值，这些可以成为香港自治运动的筹码，他的观点受到社会学者孔誥烽长期的补充与宣传。第五，陈云反对泛民的「和理非」信念，并为激进抗争创作「勇武[1]」此一形容词。陈云所建立的政治纲领

1. 陈云是民俗学博士，在岭南大学中文系任教，长年书写传统文化及语文相关的专栏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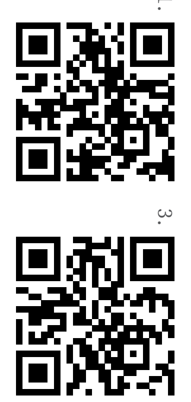
显然针对传统的泛民主派：在政治认同上以「本土意识」挑战「民主回归」，在抗争的剧目上以「勇武」挑战「和理非」。本土派鼓吹族群矛盾的论述，引起左翼人士不满，双方时有争执。本土派攻击泛民人士为「大中华胶」，左翼人士为「左胶」[2]，这些派系之争一直影响到「雨伞运动」及伞运后的数年。

在当时，本土派所推动的排外立场和新移民抢夺资源的论述不是社会主流，但在网络上颇有迴响。在 2012 年，因应内地夫妇来港产子的情况，网民筹得十万元港币，在报章上刊登「香港人，忍够了」广告，暗喻内地人为蝗虫。2013 年，有社福界团体提出司法覆核，争取到内地来港新移民住满一年便合乎资格申请综援，引起社会反弹。从 2012 年开始，上百名网民透过网络动员，在新界数区进行多次「光復行动」驱逐水货客[3]，具体行动包括街头漫骂、肢体碰撞、阻挡游客排队购物，示威者视之为「勇武」抗争。在零星示威外，陈云和一些政治人物成立「香港復兴会」、「普罗政治学苑」、「热血公民」等组织。

1. 《陈云：我理性，所以我勇武》，《am730》，2011 年 5 月 24 日。
2. 「胶」为粤语脏话「鸠」的谐音，有一定侮辱成份。
3. NOW 新闻关于「光復上水」行动的报导片段，2012 年 9 月 15 日。



网民筹款刊登的「香港人，忍够了」广告。（图片取自：苹果日报）

1.
3.


3.6 - 2012 「反国教」运动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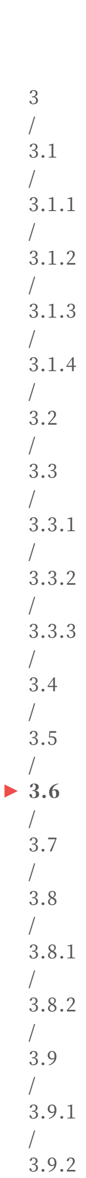
在「五区公投」和 2010 年政改方案通过后，政改的诉求并没有任何推进。泛民主派内部分裂，温和议会路线的侷限愈见明显，但未有大型社会运动爆发，「反国教」运动为社会运动的模式带来推进，相较于那 10 年间的社会运动，在规模上有很大的突破。「反国教」运动有两个重要的特性。

第一，发起运动的团体「学民思潮」有意识地和泛民政党保持距离，拒绝过去在体制内和政府沟通的路线，直接用大规模群众行动向政府施压。在当时所有政治势力未能回应课纲的时候，「学民思潮」无疑是行动的先锋[1]。第二，在「反国教」运动中，社交网络的动员发挥很大的作用。「学民思潮」的 300 位中学生最初是透过脸书认识；在媒体的报导下，中学生为「反洗脑」绝食和罢课的画面获得很多同情，更带来社会各界的高度动员。

在持续 10 日的包围政总行动后，港府承诺在 5 年内搁置「国民教育科」并由学校自行决定是否开科，「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宣佈结束占领[2]。在「反国教」后，「学民思潮」继续在中学组织「政改关注组」，并在「雨伞运动」中成为罢课的先锋。

1. 黄之锋曾在访谈中说到：「在 2011 年，大家看到政府要推『国民教育科』，我原本想（民主党）和（教协）会出来抗议，但他们却没有反应，当时我们有十几个学生就想，应该说出自己的声音，所以大家就觉得要做一个学生组织。」泛民主派团体、家长、教师组织则是在「学民思潮」的行动引起很大的社会关注后，翌年才成立「反对国民教育科大联盟」。

2. 港府的让步和示威者所坚持的「撤回」诉求有很大的落差，当时黄之锋的决定令数百名现场市民感到错愕甚至不满。「大台」和「群众」在运动路线和决策上的张力已经浮现。


3
/
3.1
/
3.1.1
/
3.1.2
/
3.1.3
/
3.1.4
/
3.2
/
3.3
/
3.3.1
/
3.3.2
/
3.3.3
/
3.4
/
3.5
/
▶ **3.6**
/
3.7
/
3.8
/
3.8.1
/
3.8.2
/
3.9
/
3.9.1
/
3.9.2
/
3.10



「学民思潮」在政府总部扎营静坐数日后，诉求仍不获回应，三位中学生成员宣佈开始绝食。（图片取自：苹果日报）



2012 年的「反国教运动」，高峰时期有高达 12 万人包围政府总部。（图片取自：明报）



中文大学百万大道集会。（图片取自：苹果日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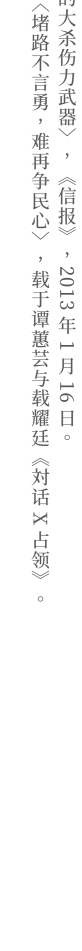
3.7 - 2013

「占领中环」

/

2013 年的「占领中环」为社会运动的模式带来推进，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为「雨伞运动」累积能量。2013 年 1 月，法律学者戴耀廷在信报发表一篇名为〈公民抗命是香港民主运动的大杀伤力武器〉的文章 [1]，提出「以非暴力的公民抗命方式，由示威者违法地长期占领中环要道，以瘫痪香港的政经中心，去迫使北京改变立场。」该文章获得很大的社会迴响，而后戴耀廷、陈健民、朱耀明等非政党人物成为骨干，正式发起「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的运动。戴耀廷在访谈中提到计画背后的想法，他当年接触到不少人，对政党有疑虑、不愿意由政党代表他，并且认为在这个占领计划中「应该是再无大佬，再无教主，这运动是每一个热爱民主的人都 count as one，才是达至真正民主的模式。[2]」

「占领中环」计划比过去 30 年泛民主派的抗争来得激进。一方面，其有意识地回应过去几年社会大众对泛民政党的信任危机，以及保守的议会政党谈判路线，改而动员市民「直接行动」占领马路。但另一方面，并没有改变的是，占中本质上是以「公民抗命」作为「谈判筹码」向中央施压、谈判、寻求政府让步。基于这个推动改变的路径设想，尽管「占中计划」包含民众的参与，但发起人对于行动方式、日程及目标都设下严格



1. 〈公民抗命是香港民主运动的大杀伤力武器〉，《信报》，2013 年 1 月 16 日。
2. 谭蕙芸与戴耀廷（2013），〈堵路不言勇，难再争民心〉，载于谭蕙芸与载耀廷《对话 X 占领》。香港：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

1.



的规定，并且强调「非暴力」、透过缜密的铺排和规限来确保行动「不失控」、「不过激」。戴耀廷是这样形容他对行动的设想：

> 「公民抗命的力量在于以违法、但非暴力方式去感召广大群众的正义感……要产生最好的效果，组织者可以事前向全港表明，会在某一天某一刻进行占领行动，并让参与的人事前签订誓言书，明确表明不会使用暴力，只会和平占领中环要道。」

「作为运动组织者的三子，设定的这种对运动、目标、形式的认知框架，并不能成功统合香港越趋激烈的意识形态[1]。」最后，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并没有依照占中三子的计划而爆发，但「占领中环」的提案引发大量的公共讨论，在社会上推广了「非暴力、公民抗命」的抗争剧目，而「全民商讨日」、公开辩论、和数十万人参与的「622 全民投票日」则很大程度上鼓舞市民并为「雨伞运动」的大规模群众动员铺垫。



占中三子。（图片取自：中央社）

1. 罗永生（2015），《在运动与革命之间读书》，香港：进一步多媒体有限公司。

3.8 - 2014 「雨伞运动」 /

3 / 3.1 / 3.1.1 / 3.1.2 / 3.1.3 / 3.1.4 / 3.2 / 3.3 / 3.3.1 / 3.3.2 / 3.3.3 / 3.4 / 3.5 / 3.6 / 3.7 / ▶ **3.8** / 3.8.1 / 3.8.2 / 3.9 / 3.9.1 / 3.9.2 / 3.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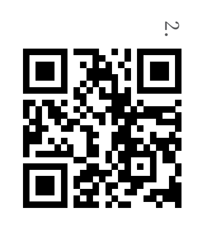
2014年7月，「双学[1]」不顾「占中三子」的反对，在政改首阶段谘询结果公佈前，发起「占中预演[2]」，约500名抗争者响应。全国人大常委会在8月31日，通过「831决定[3]」，确立2017年的特首普选和2016年的立法会议员的产生办法。市民对中央拍板的「小圈子」政改方案[4]感到非常愤怒，「双学」发起罢课表示抗议。

在9月26日，罢课的最后一天，黄之锋突袭号召市民「重夺公民广场」，警方清场和抓捕逾百名占领公民广场的示威者，促使上万名市民包围政府总部声援和要求释放被捕人士。9月28日凌晨，戴耀廷在金钟添美道的学联「命运自主」大台上宣布「占领中环」正式启动；下午，警方对示威者施放催泪弹，触发数以万计义愤的市民上街抗争；当晚，学联和多个组织不断转发警方将开枪的消息，请求示威者撤离，但示威者不但没有散去，反而自发占据市区主要街道，形成金钟、旺角、铜锣湾的占领区，开启长达79日的占领。

10月21日，政府官员和「学联」展开公开对话，然而政府官员并无做出任何退让，只是再次重申「831决定」中关于提名委员会提名特首候选人的规定符合《基本法》；提出考虑成立政改讨论平台、并且向港澳办提交一份报告，交代自人大

1.「香港专上学生联会」和「学民思潮」两个学生组织的合称。
2.〈动员大游行后通宵抗命 学界组织力争公提 2,500人占中11小时〉，《苹果日报》，2014年7月1日。
3. 确立2017年的行政长官候选人由1,200人的提名委员会产生；不实行公民提名及政党提名，特首参选人须获过半数提委会委员支持才能成为候选人；候选人限2至3名。另外，2016年立法会选举全数保留一半的功能组别议席。由香港特区全体合资格选民普选产生行政长官人选，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4.「831决定」的政改方案表明，特首候选人由1200人的委员会提名，委员会选出2-3名候选人后再付诸选民投票选出。这1200人的组成与原有的选举委员会一样，只有极少数是由全民选出。

2.



决定及罢课以来香港社会的变化。11 月中后期，「雨伞运动」在长期占领中士气衰退、示威者内部出现大量分裂和衝突，渐失民意支持，最后被警方清场告终。



旺角佔领区。（图片取自：立场新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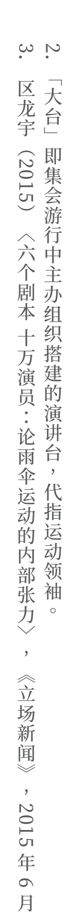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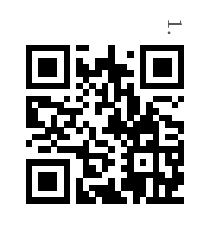
金钟佔领区。（图片取自：立场新闻）

3.8.1 - 大规模的「自发组织」 /

在 2019 年的运动爆发前，「『雨伞运动』无疑是香港战后以来，第一场直接与中共权威对着干的、本地化的、群众性民主运动。[1]」据统计约有 120 万人曾参与占领运动。在「雨伞运动」中，学联、学民思潮、占中三子的动员虽然有一定的影响力，然而数以万计的群众自发斗争也非常重要，这场运动既不是「大台[2]」由上而下发号司令，亦不是群众的纯然自发，而是两者互动的结果[3]。在「雨伞运动」中，「双学」超越过去「泛民」的政改框架，提出「命运自主」、撤回人大「831 决定」、特首候选人须实行公民提名等诉求，但占领区的示威者亦有各自参与的诉求。事实上，直至 9 月中，只有约 3,000 人签署占中三子所推动的「占中意向书」，但有过半数的参与者因警方在 9 月 28 日施放催泪弹上街。「雨伞运动」的参与者当中，有「七一游行」和「反国教」经验的比例比较突出，同时也有 15% 的人完全没有社会运动参与的经验。不少研究指出，很多参与者来自中低阶层的青年职工、学生，在旺角占领区更多见草根的参与者。

「雨伞运动」的组织方式大抵上是去中心化的，在占领的中后期，没有任何团体可以有效地协调，或者指挥数以万计散落于金钟、铜锣湾、旺角占领区的参与者的去留。在占领的空间里，示威者以多元且去中心的网络自发组织，从日常的物资


1. 〈伞运的意义及伞后路向〉，《立场新闻》，2015 年 9 月 14 日。
2. 「大台」即集会游行中主办组织搭建的演讲台，代指运动领袖。
3. 区龙宇（2015）〈六个剧本 十万演员：论雨伞运动的内部张力〉，《立场新闻》，2015 年 6 月 29 日。

1.


3.


3 / 3.1 / 3.1.1 / 3.1.2 / 3.1.3 / 3.1.4 / 3.2 / 3.3 / 3.3.1 / 3.3.2 / 3.3.3 / 3.4 / 3.5 / 3.6 / 3.7 / 3.8 / **3.8.1** / 3.8.2 / 3.9 / 3.9.1 / 3.9.2 / 3.10

站、医疗站、纠察队，到流动教室、自修室、艺术创作、小店地图等项目，背后都有大大小小的网络当面或者以即时通讯软件调配人手和资源，也令参与者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投入运动[1]。尽管最后「雨伞运动」并没有达成其推动政改方案的目标，却是重要的群众运动经验，成为很多市民的政治启蒙、抗争想象的开拓，这些「雨伞运动」中的自发组织在「反修例」运动中又以更大规模、更多元的形式重新出现。









2014「雨伞运动」的占领场面。（图片取自：明报、A Step Forward、「默泉随想」雨伞运动札记十四。）

1. 陈慧燕（2018），〈雨伞运动的聚散：突发、自主和碎片化〉，载于郑煒、袁瑋熙编《社运年代，香港政治抗争的轨迹》（页 189），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3.8.2 - 「大台」、群众、分裂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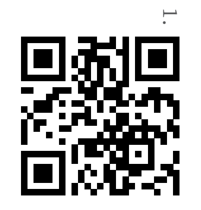
在「雨伞运动」中，被视为「大台」的双学、占中三子、泛民主派政党和其他团体之间都存在政治立场和运动判断的分歧，更遑论数万名占领区的示威者。「雨伞运动」的参与者们对于是否退场、是否行动升级、如何使用占领空间都有不同的意见，这些分歧也带来示威者阵营的衝突和分裂。

在众多的意见分歧里，抗争手法是最主要的争议所在。在「六七暴动」后，暴力抗争成为香港社会的禁忌，在声援「八九民运」时，「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简称）的抗争模式最早被积极组织声援的民主派人士提出，而后一直是香港社会主流的抗争想象。在 2013 年，「占中三子」确立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行动原则「公民抗命 [1]」，在长达一年的公共讨论和宣扬下，这种抗争想象被社会大众和大部分的「雨伞运动」示威者接受，也是当时的「大台」所主张的抗争剧目，和「本土派」所宣扬的「勇武」抗争产生张力。

其中，「衝击立法会事件」加剧部分「勇武」示威者和「大台」的矛盾。在接近警方清场的 11 月中，有网民散播立法会将讨论「网络廿三条」的谣言，号召衝击立法会，数十位示威者向大台寻求支援被拒、被纠察和泛民议员阻止，最后在用铁马撞穿立法会玻璃门后被捕。翌日，社会各界

1. 〈戴耀廷的结案陈词：公民抗命的精神〉，《独立媒体》，2018 年 12 月 12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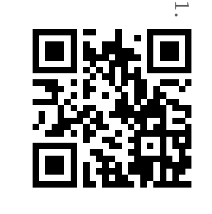
1.



公开与激进示威者划清界线，「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民主党主席刘慧卿纷纷谴责暴力衝击行动[1]，呼吁参与占领行动的市民应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式表达意见。当时主流舆论对衝击行动的态度负面，和平示威者中甚至衝击者是「鬼[2]」、「破坏运动」等说法。这个运动路线上的分歧也令示威者对「大台」的不满加剧，于是在网上发起「拆大台」和「解散纠察」行动[3]。

在「雨伞运动」中，本土派以较激进的立场定位自己，与传统泛民和其他社运人士斗争，却未能获得社会主流舆论的支持。一方面，因「大台」和「和理非」示威者不理解「本土派」激进示威者的主张，激进示威者的抗争手法被舆论挞阀和边缘化。另一方面，本土派倡议「拆大台」、大规模散播「提防左胶」、抹黑个别社运人士的文宣[4]。在占领现场举办民主讨论的示威者也被指控骑劫集会、嘉年华式抗争。在运动的中后期，在政治光谱、抗争手法上有分歧的示威者间出现大量的怪责、指骂和分化。「雨伞运动」中不同派系抗争者衝突和分裂的经验，也令「反修例运动」的示威者有意识努力摸索不同光谱的示威者共同抗争的方法。

1.〈和平占中强烈谴责暴力衝击立法会〉，《独立媒体》，2014年11月19日。
2. 即卧底。
3.〈「拆大台」变四小时讨论会〉，《苹果日报》，2014年11月23日
4. 在「反修例」运动仍被示威者重新提起。

1.

3.

4.


3.9 - 伞后本土派的上升

/

在「雨伞运动」爆发时，中央政府一早将运动定调为「港独」，但其实大部分示威者的诉求仅止围绕着政制改革的进程，包括要求人大撤销「831决定」、特首候选人须实行公民提名、要求特首梁振英下台负责等，远远谈不上港独。然而，当政府在「雨伞运动」中寸步不让，越来越多市民意识到「民主回归」简直是天方夜谭，拥抱消极防守的「一国两制」也不再堪用。在伞运后，选举必然经北京筛选、中央直接管治的讯息非常清晰，这变相令社会上关于本土主义的政治认同不断升温。

另一方面，「雨伞运动」以大抵以「非暴力」的方式抗争，但运动最后未能迫使政府让步，令不少抗争者因此扬弃「和理非」规条，并认为和政府沟通的做法并不可行，继而开始接受由本土派提倡的「勇武」抗争方式。同时，在伞后泛民政党、左翼、传统组织成为怪责的对象。本土派认为「双学」领导不力，要为运动失败负责，在各间院校发起公投退出学联，学联的成员由 8 间院校跌至 4 个。2016 年，9 间院校学生会与 2 个本土派团体发表联合声明，认为五一劳动节游行「行礼如仪」，不会参加。

3.9.1 - 本土派的政治想象

/

「雨伞运动」后，本土派内部对于香港前途的想象亦产生重大变化。2014 年，港大学生报「学苑」出版《香港民族论》，带来新的本土论述。在被特首梁振英点名批评后，一时洛阳纸贵。论述上的变化包括：过去《城邦论》虽然强调港人和内地人的族群矛盾，但并不定义香港人为另一个「民族」，反而时常以香港比内地更保存了中华文化的精神为招徕；《民族论》援引 Benedict Anderson 等人的理论，将香港人理解为一个别于中国人的民族。关于香港前景，陈云未有清楚指向，2016 年城邦派参选立法会，以「永续基本法」为目标，仅追求长远维持一国两制；《民族论》基于民族主义，追求香港独立。

城邦派在 2016 年败选后日渐边缘化，新一代的本土派和陈云等人因为立场分歧和人事纠纷，关係渐渐疏离甚至对立，本土派由「城邦自治运动」迈向「民族独立运动」。在本土派以外，雨伞运动后亦出现「自决派」，自决派认为，香港应该透过公投决定政治前景，包括但不必然是港独，代表人物包括朱凯廸、黄之锋等人。

3.9.2 - 本土派的社会运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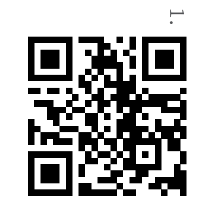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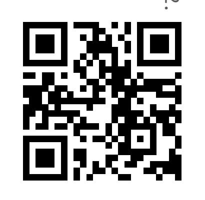
伞后出现了新一批本土派组织，包括「本土民主前线」和「青年新政」。「香港民族党」和「学生动源」在 2016 年成立。在地区上，也出现了不少地区性的本土派组织，包括东九龙社区关注组、天水围民生关注平台等等。本土派的街头运动在伞后盛行一时，反对水货客、新移民的「光復行动」蔓延至各区，包括上水、沙田、元朗、屯门。新一批本土派组织，在香港前景上，主张「民族自决」以至「香港独立」；在抗争手段上，摒弃旧有的游行和静坐模式，并且主张与警方武力抵抗。

2016 年 2 月，「旺角事件 [1]」爆发，起始于食环署驱赶无牌小贩，演变成本土派示威者和警方的激烈衝突。示威者燃烧杂物、扔砖围攻警察等画面首次出现在公众眼前，被视为标志性的「勇武派」行动。而后数十人被捕，部份人被控告最高监禁年期为 10 年的「暴动罪」罪成，当时的本土民主前线发言人梁天琦因暴动罪判监 6 年，而召集人黄台仰逃亡至德国。

新本土组织也积极参选区议会及立法会。2016 年，梁天琦参加新东立法会补选，提出「光復香港，时代革命」的竞选口号、「以武抗暴」、「无底线抗争」等支持武力抗争的说法，梁虽落败，但得到 6 万多票。同年 9 月，梁天琦欲参选立法

1. 〈12 小时旺角黑夜全程还原，通宵骚乱如何发生?〉，《端传媒》，2016 年 2 月 10 日。
2. 〈《社团条例》五问：谈香港民族党被禁的合理性与影响〉，《端传媒》，2018 年 10 月 11 日。

1.


2.


3
/
3.1
/
3.1.1
/
3.1.2
/
3.1.3
/
3.1.4
/
3.2
/
3.3
/
3.3.1
/
3.3.2
/
3.3.3
/
3.4
/
3.5
/
3.6
/
3.7
/
3.8
/
3.8.1
/
3.8.2
/
3.9
/
3.9.1
/
▶ **3.9.2**
/
3.10

会选举，但因选举主任认为其 「无意拥护《基本法》」，参选资格被撤销；同年共有 6 位候选人因其香港前途的立场而被撤销参选资格。随后，青年新政的梁颂恆和游蕙祯成功当选，却因宣誓风波[1]被政府取消资格。2018 年，公开主张香港独立的香港民族党被政府禁止运作[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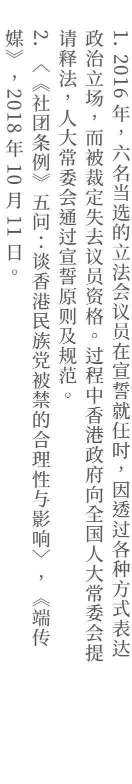
在 2016 年之后，港独本土派在议会内的空间被压缩，失去制度内的政治平台和资源，在街头的抗争也遭受严厉的清算，政治打压并没有停息，但反抗运动整体陷入低潮。



2015 年的「光復元朗」行动。(图片取自：苹果日报)



2016 年新年期间爆发的「旺角事件」。（图片取自：立场新闻）



1. 2016 年，六名当选的立法会议员在宣誓就任时，因透过各种方式表达政治立场，而被裁定失去议员资格。过程中香港政府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请释法，人大常委会通过宣誓原则及规范。

2. 〈《社团条例》五问：谈香港民族党被禁的合理性与影响〉，《端传媒》，2018 年 10 月 11 日。

2.



3.10 - 「反修例」的爆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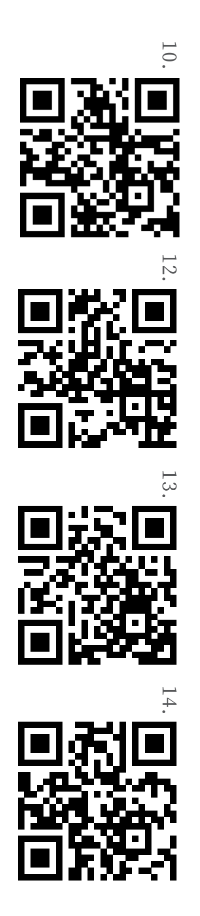
/

在「反修例」运动爆发前，香港社会面对中央政府步步进逼的全面管制，以及前所未有的政治打压，市民对政府的不满情绪高涨、对「一国两制」的框架失去信心、本土主义升温。然而，各种反抗渠道又被堵死，体制内的议会路线不再堪用（泛民主派政党的议会路线被不少群众扬弃、「不拥护《基本法》」的民选议员遭撤销资格）；体制外的街头抗争动员则出现疲态、抗争所面对的法律后果急遽上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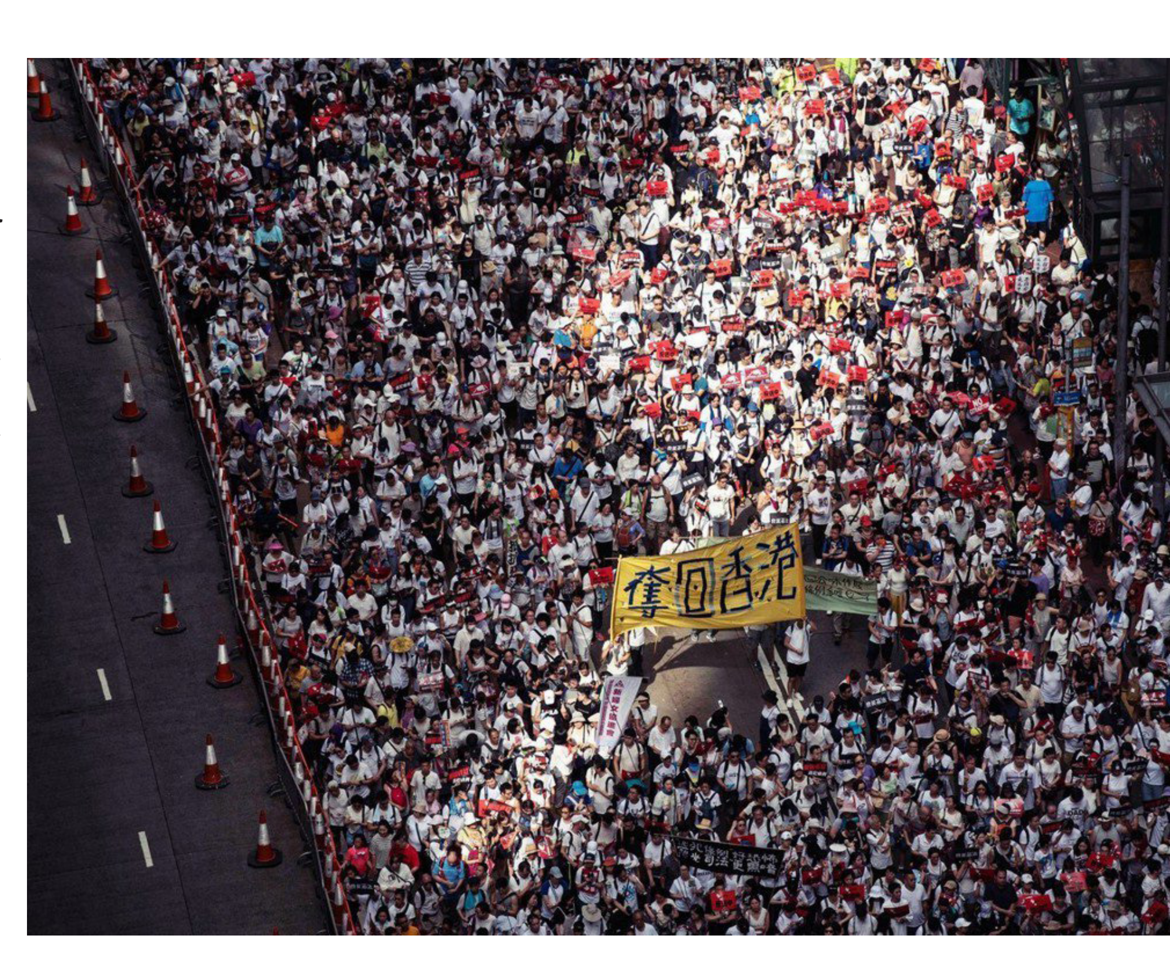
在下一章，我们会分阶段介绍「反修例」运动的抗争目标和发展的过程。2019 年的香港运动大抵上是不愿意在沉默中灭亡，所以在沉默中爆发的运动。当歷史的时刻降临，数以万计的群众在「隐忍压迫」和「行动」之间，选择站出来反抗以回应政权步步进逼的压迫，一边摸索新的社会运动模式，一边探寻香港政治的前路。

延伸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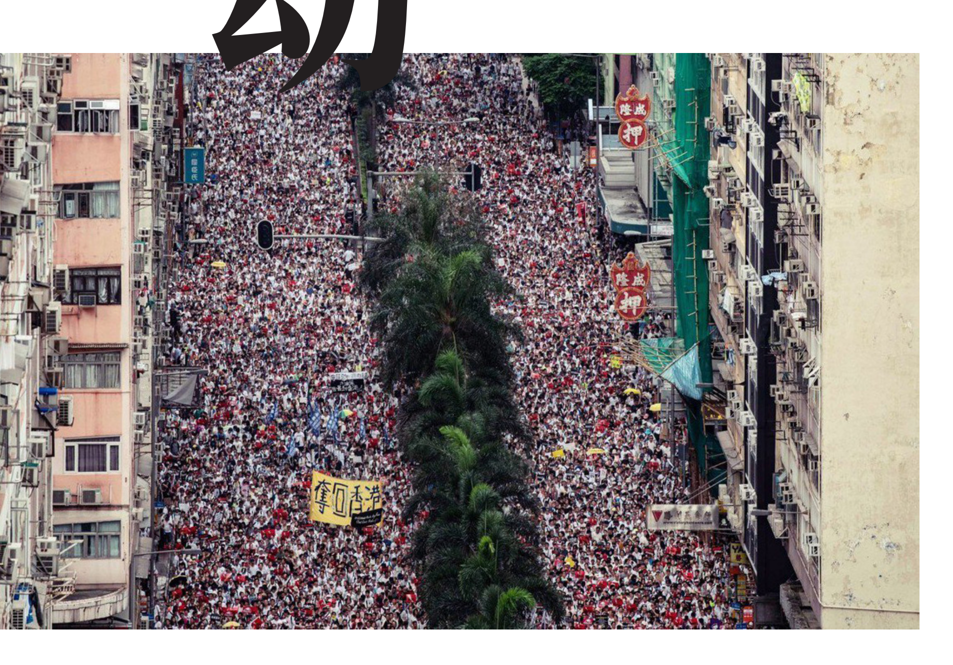
1. Carroll, & 林立伟（2013），《香港简史 : 从殖民地至特别行政区》，香港：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
2. 吕大乐（1994），〈迷失于急剧转变政治环境中的香港民众运动〉。《香港社会科学学报》，4，67-78。
3. 马岳（2012），《香港 80 年代民主运动口述歷史》，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
4. 吴仲贤（1997），《大志未竟 : 吴仲贤文集》，香港：吴叶丽容。
5. 罗永生（2014），《殖民家国外》，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6. 郑煒、袁瑋熙编(2018)，《社运年代》，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7. 谭蕙芸、载耀廷（2013），《对话 X 占领》，香港：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
8. 罗永生（2015），《在运动与革命之间读书》，香港：进一步多媒体有限公司。
9. 陆洁玲、孙珏（2020），《抗命女声》，香港：新锐文创。
10. 梁启智（2020），《香港第一课》，台湾：春日出版。
11. 〈林致茵：中央「全面管治」进场后，香港的「高度自治」，还有多少 ?〉，《端传媒》，2020 年 5 月 22 日。
12. 〈【本土休止符】专题前言：中共击杀之下　时代革命去咗边？〉，《立场新闻》，2017 年 2 月 6 日。
13. 〈【概观民主党】专题前言：一个大党的「死亡」〉，《立场新闻》，2016 年 5 月 6 日。
14. 〈立会票王朱凯廸：他们要民族自决，我要民主自决〉，《端传媒》，2016 年 9 月 7 日。



「反修例」运动







THE ANTI-ELAB MOVEMENT

在争取普选无望，对「一国两制」的不信任与日俱增的大背景下，由香港政府提出的《逃犯条例》修订草案引爆一连串的社会运动。但运动的目标很快超越撤回修例草案，演变为反抗政府及警队，以及争取政治制度改革的大规模群众运动，至今仍未完结。

在这一章，我们从导火线修订草案开始介绍，再整理由 2019 年 2 月（保良局提出修例草案）到 2020 年 6 月 30 日（《国安法》刊宪）的运动发展。为方便读者掌握和理解变迁的轨迹，我们将运动粗略分作三个阶段，罗列关键的事件，讲解运动目标和抗争策略的变迁。最后，我们透过简单的问答，回应官方叙事中经常出现的运动指控。

前页图片取自：Philip Fong/AFP（上、下）。

《逃犯条例》修订时间线

第一阶段：「反修例」示威和第一发催泪弹

（2019 年 3 月— 6 月 30 日）

2019 年 2 月 12 日：保安局提出《逃犯条例》修订草案

2019 年 3 月 29 日：特区政府将修例草案刊宪

2019 年 3 月 31 日：1 万人游行要求撤回修例

2019 年 4 月 3 日：修例草案进入立法程序，在立法会完成首读

2019 年 4 月 28 日：13 万人游行要求撤回修例

2019 年 6 月 9 日：103 万人游行要求撤回修例

2019 年 6 月 12 日：「修例草案」送交立法会进行二读，市民包围立法会被镇压

2019 年 6 月 15 日：行政长官宣布「暂缓」修例工作

2019 年 6 月 16 日：200 万人游行要求「谴责镇压撤回恶法」

2019 年 6 月 21 日：1 万人包围警察总部

第二阶段：「五大诉求」的确立及街头抗争的激进化

（2019 年 7 月 1 日— 11 月 18 日）

2019 年 7 月 1 日：50 万人游行，有示威者占领立法会议事厅并奠定「五大诉求」

2019 年 7 月 7 日：九龙区游行

2019 年 7 月 14 日：沙田区游行

2019 年 7 月 21 日：港岛区游行，示威者涂污中联办国徽；「元朗无差别袭击事件」

2019 年 7 月 27 日：元朗游行抗议 721「元朗无差别袭击事件」

2019 年 8 月 4 日：将军澳区游行

2019 年 8 月 5 日：「大三罢」七区集会；「不合作运动」

2019 年 8 月 11 日：深水埗区和港岛东游行，演变为多区堵路，有急救员右眼中弹

2019 年 8 月 12 日：「百万人瘫痪机场集会」迫使 150 个航班取消

2019 年 8 月 25 日：荃葵青区游行

2019 年 8 月 31 日：「太子地铁站防暴警无差别袭击事件」

2019 年 9 月 2-3 日：「大三罢」和「不合作运动」、罢课集会

2019 年 9 月 4 日：行政长官宣佈正式撤回「修例草案」

2019 年 9 月 8 日：「香港民主与人权法案集会」

2019 年 9 月 29 日：「全球反极权大游行」
2019 年 10 月 1 日：「十一国殇」遍地开花六区集会
2019 年 10 月 4 日：政府正式颁布《禁止蒙面规例》，夜晚各区堵路示威
2019 年 10 月 23 日：保安局局长在立法会会议上撤回修例草案
2019 年 11 月 8 日：示威者周梓乐在将军澳示威中堕楼后不治
2019 年 11 月 11-15：连续五日的「大三罢」和「不合作运动」
2019 年 11 月 12 日：中文大学的示威者和警方对峙，遭武力镇压
2019 年 11 月 18 日：警方封锁理工大学，宣佈将以暴动罪拘捕所有在场示威者，市民企图营救理工大学的示威者

第三阶段：抗疫即抗争 —— 不同际线的发展和交织

(2019 年 11 月 18 日— 2020 年 6 月 30 日)

2019 年 11 月 24 日：民主派议员在区议会选举大胜
2019 年 11 月 28 日：特朗普正式签署「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2020 年 1 月 1 日：103 万人「元旦大游行」，新工会联合街站挂起「组织工会，行业抗争」的旗帜
2020 年 1 月 17 日：各区「和你宵」
2020 年 1 月 22 日：香港出现首例新冠肺炎确诊个案
2020 年 2 月 3 - 7 日：「医管局员工阵线」发起为期五日的罢工
2020 年 2 月 - 3 月：抗议「检疫中心」的小型示威
2020 年 4 月 28 日：戴耀廷在报纸发佈〈真揽炒十步，这是香港宿命〉
2020 年 5 月 24 日：港岛区出现堵路示威反对《国歌法》、《港区国安法》
2020 年 5 月 27 日：多区出现堵路示威反对《国歌法》、《港区国安法》
2020 年 5 月 28 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港区国安法》草案
2020 年 6 月 4 日：数万名示威者在维多利亚公园以及各区集会
2020 年 6 月 20 日「二百万三罢工会联合阵线」联同「中学生行动筹备平台」就《港区国安法》举行罢工罢课公投
2020 年 6 月 30 日：《港区国安法》刊宪公布
2020 年 7 月 1 日：《港区国安法》列入《基本法》附件三正式实施，数万名示威者在港岛区流水游行

0 - 导火线：《逃犯条例》修订草案

/

背景

/

0 / 1 / 2 / 3

2019 年 2 月中，保安局以处理「香港居民台湾杀人案[1]」，和堵塞法律漏洞为由，向立法会提交《逃犯条例》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条例》的修订草案。香港现有条例规定移交逃犯安排不适用「中国大陆、澳门和台湾」，因此尽管香港嫌疑人已供称杀害女友，也无法移交至台湾受审。而保安局所提交的修订草案[2]，将允许香港政府向中国大陆、澳门和台湾司法管辖区移交嫌疑人，以行政长官的证明书代替立法机关的审议，用以启动拘捕和移交程序，最后交由当地法庭审理。

1. 2018 年 2 月，香港居民陈同佳于台湾杀害女友潘晓颖。陈承认自己杀害女友，但因警方因事证不足，无法就杀人罪对其提出控告，或移交台湾受审，只能就四项洗黑钱罪，判囚两年五个月。陈已于 2019 年 10 月获释。
2. 《2019 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法例（修订）条例草案》，2019 年 3 月 26 日。

2.

社会各界的反对声浪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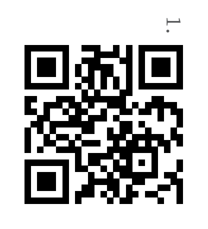
修订草案公佈后，法律界、商界、学术界、不同光谱的政党和社会大众纷纷表示反对，主要的原因是对中央政府及内地司法制度缺乏信任，也和近年内地人权侵害事件频传以及港人被强行跨境绑架至内地拘留的案例有关。

大律师公会数次发声明表示：「现行条例中不允许由香港移交逃犯至内地[1]，是立法时考虑到两地截然不同的刑事司法制度和内地的人权保障纪录后『慎思而达的决定』」。教育界团体「学术自由学者联盟」在其要求撤回修例的联署中表示「倘若特区政府坚持通过修订，所有在港人士的言论、出版、学术和其它自由，将受到空前威胁；一国两制以及香港的繁荣稳定，将敲起『丧钟』」。民主党[2]则是在意见书中，列举内地近年的维权律师大抓捕、不公正审讯的前例，认为《逃犯条例》的修订将为政权打压异见服务。

不同于其他界别，商界在原则上并不反对修例，但提出将移交范围内的经济罪行剔除，并对修例对外资在港建立基地的国际商业中心竞争力有所顾虑。

1. 〈香港大律师公会就保安局对第 525 章《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条例》和第 503 章《逃犯条例》修订建议的意见书摘要〉，2019 年 3 月 4 日。
2. 〈民主党就政府拟修订《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条例》和《逃犯条例》意见书〉，2019 年 3 月 4 日。

1.



2.



面对商界的担忧，保安局局长先后和厂商联合会等团体进行闭门会议，迅速采纳其建议，剔除 9 个和商业相关的可移交罪类，并提高可移交罪行的最高刑罚。该修订公佈后，商业界转而支持修例。然而，不全面的豁免突显了公众对修订案的根本疑虑，引起社会大众对于修例更大的不满和质疑[1]。

1. 大律师公会在声明中所述：「若提出上述豁免的原因为关注部分人士会因该修订而被移交至中国的其他地方，合乎逻辑地，此关注亦理应适用于所有罪行。这不全面的豁免罪行列表只突显了公众对于修订案的根本疑虑，枉论解决移交疑犯至中国其他地方所衍生的问题。」

政府的回应

/

面对社会各界的反对声浪，香港政府不断重申，修例是为台湾杀人案的逃犯移交提供法律依据。然而当台湾政府公开表示「不会与香港签署任何影响『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原则的移交协议」，港府仍不採纳各界所提出的替代方案并执意修例。自 2 月中提出修例以来，香港政府主要在商界的施压下两次调整草案[2]，然而一直未能解决最核心的矛盾——各界对内地缺乏公平审讯和保障基本人权的司法制度的不信任。4 月初，港府在未能释除社会各界的疑虑的情况下，态度强硬地将修例草案送交立法会首读。5 月初，当立法会法案委员会的建制派和民主派议员就审议程序发生衝突，保安局局长更绕过法案委员会讨论，于 6 月 12 日将草案直上立法会大会恢復二读。

2. 主要是剔除部分可移交罪类，并将可移交罪行的最高刑罚两度提高，以及加强人权保障。

1 - 第一阶段：「反修例」示威和第一发催泪弹（2019 年 3 月 — 6 月 30 日）

/

1
/
1.1
/
1.2

大规模和平游行是这个时期的抗争主旋律，最初「撤回修例草案」是示威者的唯一诉求。然而，当政府拒绝作出让步，并暴力镇压6月12日的「包围立法会行动」，激起了更大规模的民间反抗。特首虽在 6 月 15 日宣佈「暂缓」修例，但已无法平息民愤。

摄于 2019 年 6 月 12 日，金钟。(图片取自：区家麟网志)



1.1 - 全民动员「反修例」

/

1
/
▶ 1.1
/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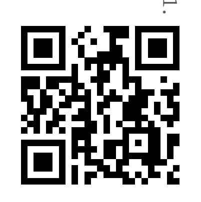
在政府呈交《逃犯条例》修订草案后，在谘询期间，虽有不同界别就此议题发声，泛民主派政党和民间团体曾至中联办抗议，并在政府总部静坐，数次在立法会大楼外举行集会及留守，但在社会上引起的关注和迴响有限。

在 3 月和 4 月，数万名市民参与民阵发起的游行要求「撤回条例修订草案」，示威者喊出「反送中」、「不撤不散」等口号。事实上，普罗大众未必仔细钻研具体的法条，但在过去数年争取普选无望、对中央政府和「一国两制」不信任的大背景下，民间联署和社区街站令修例草案的讨论迅速在社会上发酵，在各阶层网络散播开来。港府处理修例争议时无视民意的态度更是令民间的不满逐渐积累，很快触发社会上更大规模的动员和反抗。

根据众新闻的整理，由 5 月中截至 6 月 9 日大游行前共蒐集到高达 300 多份联署[1]，超过 27 万人联署。联署人士从各界别专业人士蔓延至中学校友、各区居民、师奶、大陆新移民、海外团体等。多样化的联署令各种背景的市民都能参与，在动员的过程中为往后的运动积累网络，并促成当日过百万人的大游行。

1. 〈【反引渡修例联署合集】多媒体互动专页〉，《众新闻》，2019 年 6 月 9 日。

1.



因应频繁的示威行动，示威者开始在社交媒体搭建沟通和行动协调的平台，为往后的行动动员建立基础。在 6 月的连续几个週末，逾百万名市民上街表达「撤回条例修订」的诉求。这些示威以大规模和平游行为主旋律，虽出现零星的占路、包围政府建筑、突破警方防线的尝试，大部分示威者仍认为和平示威表达诉求有望驱使政府让步，不认为需要以更激进方式衝击。



2019 年 6 月 9 日的「反修例」大游行。（图片取自：立场新闻）

1.2 - 「包围立法会」：第一发催泪弹

/

1
/
1.1
/
▸ 1.2

「612 事件」是运动的重要转折点。6 月 12 日，市民号召「包围立法会」示威以阻挡修例草案的通过，然而政府拒绝作出让步，更将示威定性为「暴动」、发射多枚催泪弹和橡胶子弹暴力镇压，引起社会舆论的反弹。

6 月 15 日，特首宣佈「暂缓」而非「撤回」修例，没有回应示威者的其他诉求。当晚，示威者梁凌杰在立法会附近的商场挂起横幅后坠楼自杀，顿时民怨沸腾。6 月 16 日，民阵发起「谴责镇压撤回恶法大游行」，基于梁的遗愿提出「五大诉求」：撤回修例、追究 6 月 12 日集会警方开枪责任、撤销定性 6 月 12 日集会为暴动、特首林郑月娥问责下台、不检控及释放示威者。当日共有 200 万人上街，黑衣的示威者人潮汹涌地溢出港岛的街道，创下香港歷史的纪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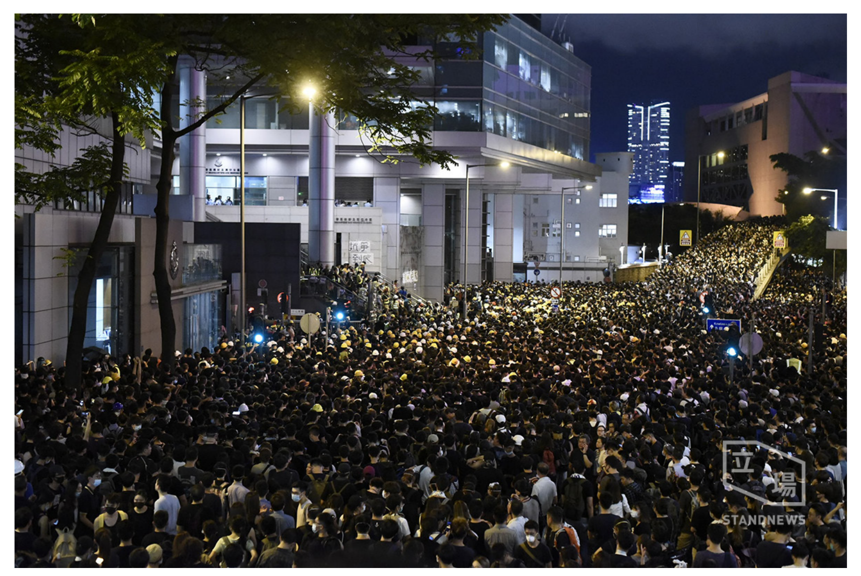


示威者梁凌杰及其横幅。（图片取自：路透社）

在这个时候，港府单是暂缓修例已无法平息民愤，示威者继续上街。根据6月下旬的民调，几乎所有受访示威者[1]表示希望运动继续。示威者就逐渐成形的「五大诉求」占领道路、和平包围礼宾府、警察总部和律政司。随着政府拒绝作出让步，激进的抗争手法逐渐在示威者间凝聚更多的支持。



2019年6月16日的「谴责镇压撤回恶法大游行」，每当有救护车出入，示威者的游行队列有如「摩西分红海」般开出车道。（图片取自：立场新闻）



2019年6月21日，市民不满政府未有回应诉求而包围警署。
（图片取自：立场新闻）

1. 根据6月21日的民调，只有2.2%的示威者希望「暂停运动，让社会恢復元气」；根据6月26日的民调，只有1.4%的示威者希望「暂停运动，让社会恢復元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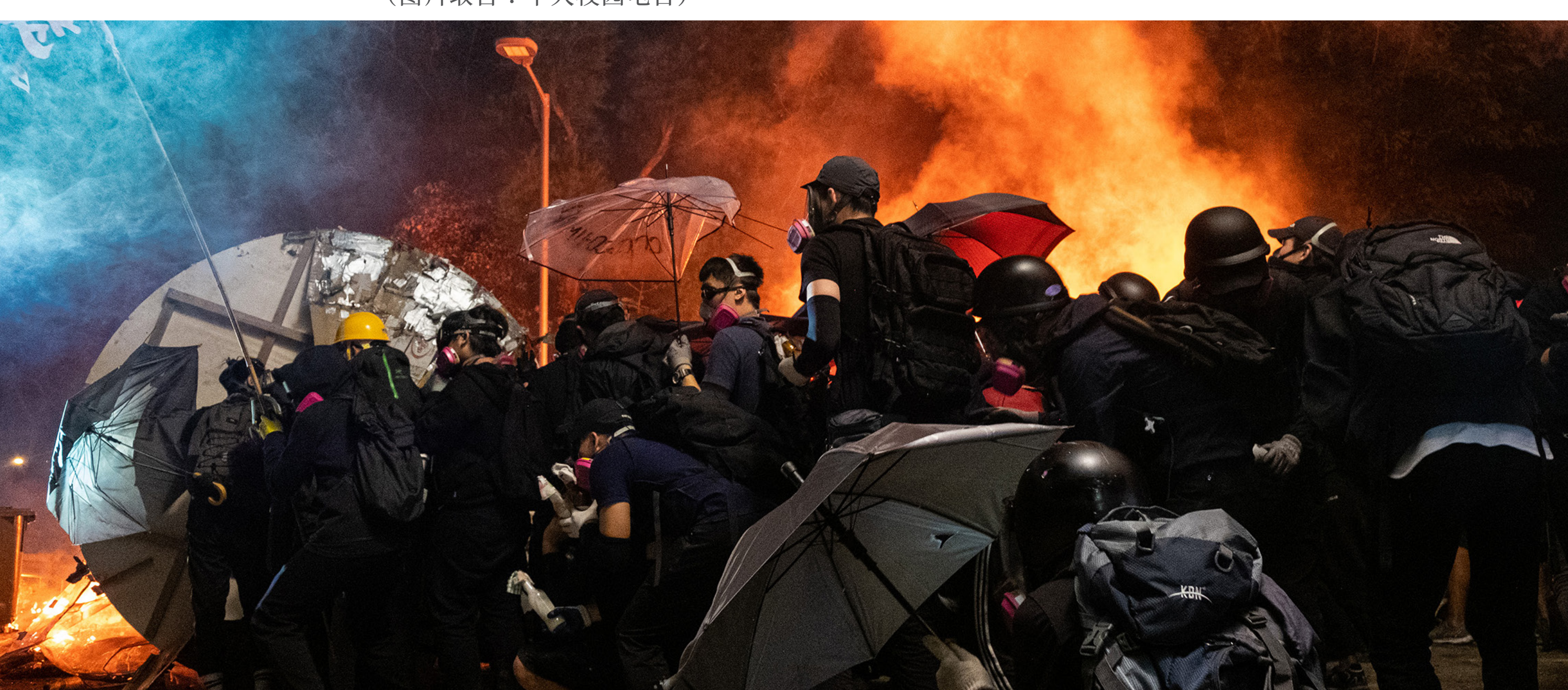
2 - 第二阶段：「五大诉求」的确立及街头抗争的激进化（2019 年 7 月 1 日— 11 月 18 日）

/

▶ 2
/
2.1
/
2.2
/
2.3
/
2.4

7 月 1 日的「立法会衝击行动」是重要的时刻，示威者确立「五大诉求」，也揭开激进化抗争的序幕。在 2019 年 7 月至 11 月，警暴和争取「政制改革」的目标令运动未有止息，造就群众的大规模和高度动员。「街头」是主要的抗争战线，以激进化、如水、遍地开花为特性。同时，抗争者也在日常生活中探索罢工阻碍生产的尝试、「黄色经济圈」、呼吁国际声援等方式向政府施压。在 11 月的几场大学占领中，示威者面对前所未有的镇压和大规模逮捕，激进化的街头行动达至高峰，却也面对无以为继的瓶颈。

中大示威者在 11 月的衝突中用圆桌和雨伞作防备，在火光中与警方对峙。（图片取自：中大校园电台）



2.1 - 「五大诉求」的确立

/

由特首林郑月娥在 6 月 15 日宣布「暂缓」条例修订，到 9 月宣布「撤回」逃犯条例修订，原本引发示威行动的主要原因看来是逐步得以解决，但为何在这数个月之间，示威活动的规模及激烈程度却是与日俱增？

在 7 月 1 日的「香港回归纪念日」，50 万人上街游行，数百名示威者击碎立法会的玻璃幕墙并占领议事厅、宣读由网民起草的《香港人抗争宣言》，奠定「五大诉求」的内涵。当香港政府数个月漠视「撤回修例」民意、强硬打压运动，「五大诉求，缺一不可」已成示威者的共同运动目标，当港府在 9 月撤回修例，这个让步对示威者来说来得太迟也太少。在五大诉求中，争取民主普选的「政制改革」和对「警暴」的咎责特别突出，驱使运动继续发展，我们在下面分别进一步介绍。

各种示威原因的重要性

	要求政府撤销「逃犯条例」修订	要求林郑月娥或主要官员下台	表达对警方处理示威手法的不满	争取香港民主發展/双普选	要求成立独立调查委员
6月9日	92.6%	NA	NA	NA	NA
6月16日	94.8%	63.5%	89.8%	NA	NA
7月1日	89.4%	47.4%	84.6%	82.5%	NA
7月14日	88.0%	46.8%	90.4%	74.9%	NA
7月21日	87.1%	54.8%	90.9%	87.2%	92.5%
7月27日	85.1%	55.7%	98.3%	88.1%	94.9%
8月10日	94.1%	50.8%	95.3%	89.9%	94.7%
8月13日	89.7%	51.5%	95.5%	87.0%	90.5%
8月16日	85.1%	41.0%	91.6%	91.1%	87.5%
9月8日	NA	40.4%	85.5%	91.4%	81.0%
12月8日	NA	65.3%	92.9%	88.3%	92.0%

（数据取自：香港中文大学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香港反修例运动中的民意状况研究报告》，2020 年 5 月。）

政改成为主流诉求

/

2
/
▶ 2.1
/
2.2
/
2.3
/
2.4

在《七一宣言》中，示威者以「行政命令解散立法会，立即实行双真普选」取代「林郑问责下台」的诉求，确立争取政改的目标，奠定最多示威者所认同的「五大诉求」。2019 年的民调显示，大多数示威者认同「争取香港民主发展 / 双普选」是参加游行重要目的，且比例随运动的发展上升。当多年来未能推进的政改成为「反修例」运动的主流诉求，运动难以在短时间内告终，变作长期的抗争。另一方面，高比例的示威者认为运动若在没有获得实质成果的情况下完结，北京会积极介入香港事务，将出现大规模政治清算及公民社会被打压的情况 [1]，这些担忧也驱使示威者在取得成果前继续抗争。

1 香港中文大学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香港反修例运动中的民意状况研究报告》第 57 页，受访者认为若运动没有进一步实质成果，将来很有可能面临以下后果：72.4% 至 91.6% 相信「政府会进行大规模政治清算」;75.4% 至 93.7% 认为「香港政治与公民自由大幅倒退」;70.9% 至 84.4% 相信「北京会积极介入香港事务」。



示威者占领立法会并宣读《香港人抗争宣言》，奠定五大诉求：「我们占领者，要求政府完成五大诉求：一、彻底撤回修例；二、收回暴动定义；三、撤销对今晚所有反送中抗争者控罪；四、彻底追究警队滥权情况；五、以行政命令解散立法会，立即实行双真普选。『反送中运动』发展至今，在三位年轻市民殉道。我等未忘忧愤，然心存善念，不愿香港再有为民主、为自由、为公义再添亡魂。希望社会大众团结一致，对抗恶法，对抗暴政，共同守护香港。」（全文见二维码 [2]）

2.



警暴成运动新动力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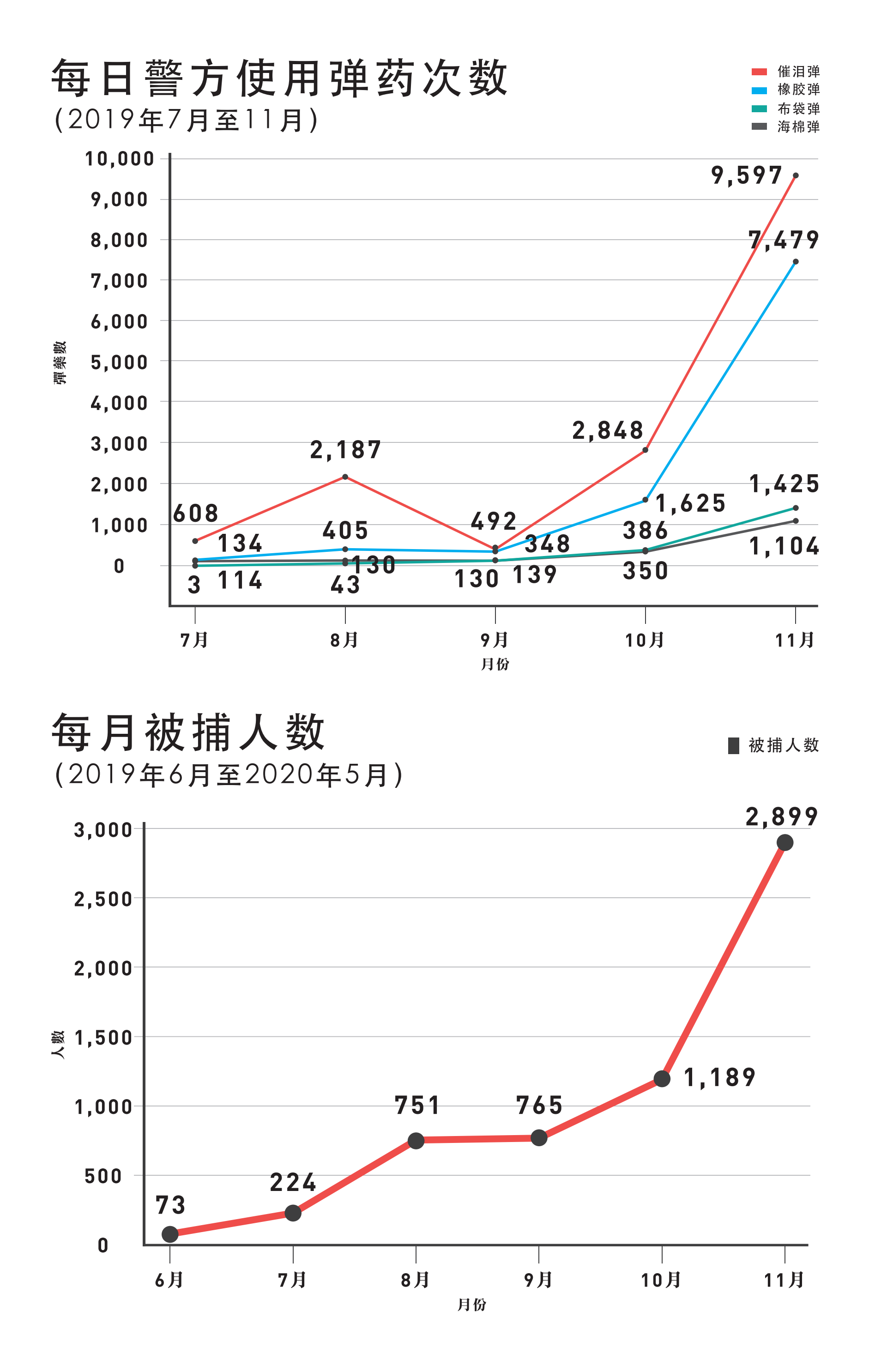
在「反修例」运动中，警队以武力镇压示威者，对被捕人士施以性暴力和酷刑，令「警暴」成为运动的驱动力。调查[1]指出，极高比例（84.6%-98.3%）的示威者认为「表达对警方处理示威手法的不满」是参加游行非常重要的目的；高比例（72.6% - 80.4%）的示威者认为警方的大规模拘捕增加其参与抗争的意欲。

在 7 月到 11 月之间，每隔几日都有示威者头破血流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其中，最受瞩目的包括 7 月 21 日「元朗无差别袭击事件」、8 月 11 日「急救员爆眼事件」、8 月 31 日「太子地铁站防暴警无差别袭击事件」、10 月 1 日「荃湾警长开枪事件」、和 11 月 1 日「西湾河开枪事件」、11 月 4 日「周梓乐堕楼事件」等。期间政府召开大量记者会，尝试用政治宣传指控示威者为「暴徒」以正当化警队的暴力，但并不奏效，不断出现的警暴事件成为运动的「助燃剂」，持续引爆民愤和大规模的示威。

警队的镇压非但没有「止暴制乱」，反令政权和警队失去治理的正当性。在 2019 年 6 月，示威者提出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咎责警暴；10 月，更激进的「解散 / 重组警队」诉求获得超过七成的示威者认同[2]；11 月，在示威者周梓乐坠楼身亡、及在大学的镇压和大规模拘捕后，示威者的口号更

1. 香港中文大学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香港反修例运动中的民意状况研究报告》，2020 年 5 月。
2. 在「香港中文大学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的调查中，10 月 14 日，10 月 20 日，12 月 8 日，分别有 76.9%、73.4%、84.5% 的示威者认为「要求解散/重组警队」是参加游行「非常重要」的原因。

变为「香港人，报仇」、「杀人填命，血债血偿」。当被捕和受伤的人数在示威浪潮中不断攀升、抗争者付出高昂的代价，倖存的抗争者则更不愿放弃运动，盼望向政府和警队讨回公道和咎责，这也是条例撤回后运动也不见止息的的重要原因。（关于警暴的详情，请见第四章〈抗争在街头〉）



2.2 - 「街头」作为抗争的主战场

/

2
/
2.1
/
▶ 2.2
/
2.3
/
2.4

第二阶段（2019 年 7 月至 11 月）是群众大规模且高度动员的阶段，而「街头行动」是运动的主要战线，也是群众直接反抗、试炼团结共作的场域。数以万计的群众高度参与在各种形态的示威当中，游行集会的数量持续增加。警方就示威游行展开大规模的镇压和拘捕，使用的武力强度和逮捕人数也不断飙升。政权的严厉镇压非但无法平息示威，反使更多人前仆后继地投入抗争，街头抗争出现激进化、如水、遍地开花的特性。

激进化

/

2
/
2.1
/
▶ 2.2
/
2.3
/
2.4

示威者在 2019 年 6 月的数个大规模游行没有令政府让步，在僵局下的 7 月 1 日，数百名示威者衝击立法会并占领议事厅，留下「是你教我和平示威是没有用的」的涂鸦。「立法会衝击行动」获得大部分示威者的支持，揭开抗争手法进一步升级的序幕。在随后的数个月，面对政权的强硬镇压、建制支持者的暴力袭击，示威行动开始出现激进化，主要体现在非法示威、和警方对峙、纵火破坏设施、以武力还击和制服施袭者等；激进的抗争手法普遍被社会大众所接受，认同度节节上升。

在 2019 年下半年，「和理非」示威和「勇武」的衝击行动以互补及交替的型态出现，「和理非」和「勇武」示威者各自发起行动，却又共同进退。「民阵」等团体持续申请「不反对通知书」，搭建相对安全的平台让市民参与大规模合法示威；部分示威者则用游击堵路、衝击、「装修」增加政府的管治成本和经济损失。示威的激进化在 11 月示威者和警队在大学的对峙达至高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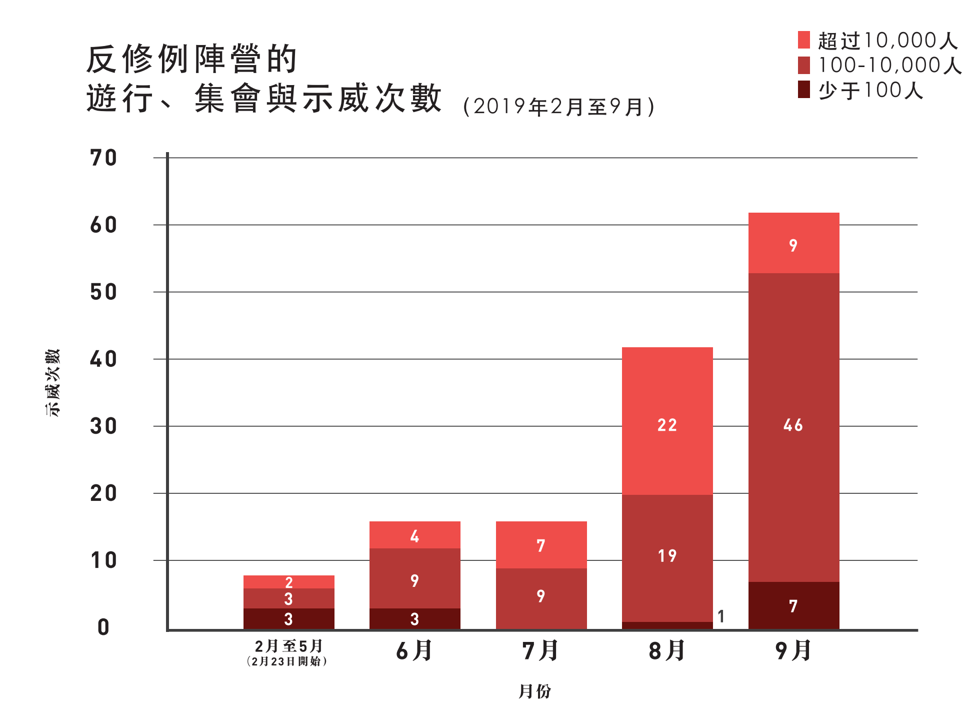
如水、遍地开花

/

2
/
2.1
/
▶ 2.2
/
2.3
/
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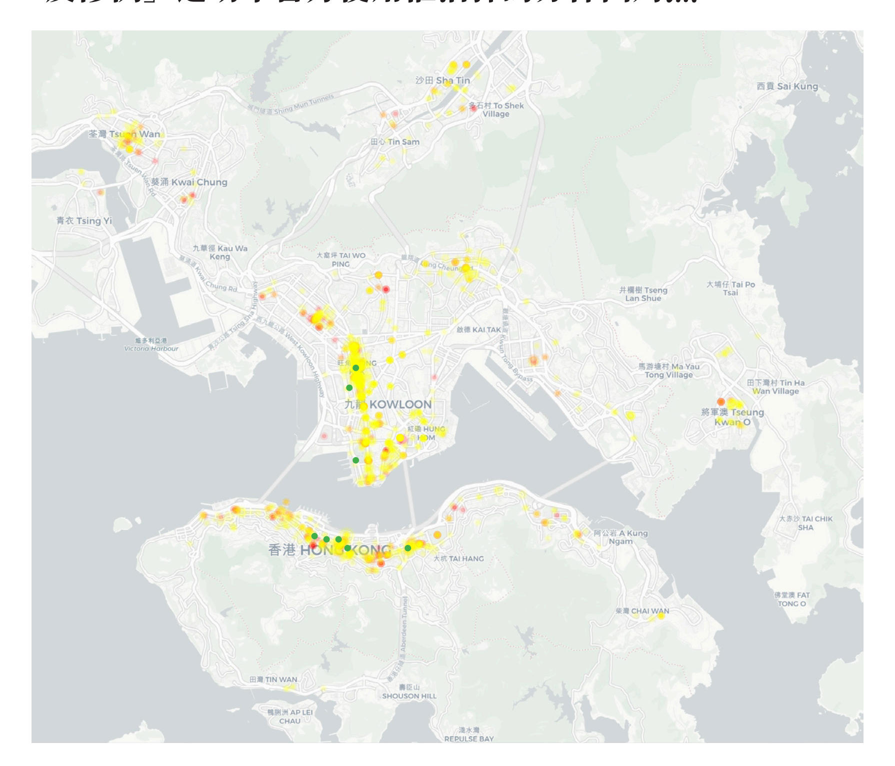
在「反修例」运动中，街头行动以「如水（Be Water）」和「遍地开花」的形式涌现。由 7 月初的连续几个週末开始，示威由香港岛的政经中心扩张至九龙和新界，各个地区出现自发号召的游行。8 月中，警方接连发出「反对通知书」非法化游行并且加大镇压的力度，令抗争者开始发展「城市游击战」——事先不向警方申请、无固定路线、同时在多区集会、随时转移和撤退。在 9 至 11 月间，示威者发展出分佈更广泛、方便居民就近参与的社区快闪行动。总括而言，不同于过去常见的「占领」，「反修例」示威不再长时间驻扎特定地点，变作「游击」和「快闪」；同时，大部分示威由匿名网友发起、分散在全城不同角落，令政权打压的难度增加并且得以持续数个月。

「催泪弹地图」可以见到示威遍及全港各区，远较「雨伞运动」的佔领区广泛。随着示威的遍地开花，警暴也进入日常的社区空间、商场和民居，更多居民目睹警队的滥暴和滥捕，认识到政权的打压。与此同时，各区街头行动的抗争经验，也带动各个社区的「连侬墙」、街站、「黄店」、和区议会的凝聚和参与，成为往后社区组织发展的基础。（关于街头抗争的具体策略，请见第四章〈抗争在街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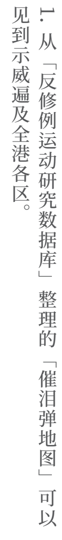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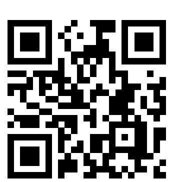
示威次数从2019年2月至9月持续增加，但大型游行随着警方频繁发出「反对通知书」减少。此后出现更多不事先申请、难以统计的游击示威。（数据取自：香港民意研究所公民实践培育基金《反对修订逃犯条例运动民间民情报告》第 24 页）

「雨伞运动」的占领区分佈图和「反修例」运动中警方使用催泪弹的分佈图对照 [1]



■「雨伞运动」的占领区分佈
■「反修例」运动中示威者 / 政治团体 / 新闻媒体记载的施放催泪弹地点


1. 从「反修例运动研究数据库」整理的「催泪弹地图」可以见到示威遍及全港各区。



动摇城市运作的尝试

/

7 月至 11 月是街头行动的高峰期，几乎每个星期都有不同规模的集会游行或「快闪行动」。在这些频密的行动中，示威者很快意识到假日上街「表态」对政府带来的压力有限，转而以香港的「经济繁荣稳定」为筹码向政府进行施压、迫使其作出让步。

示威者在这个脉络下展开各种阻碍经济生产的「不合作运动」，包括在上班日发起大罢工并瘫痪地铁和公路交通要道，令市民无法上班，店舖无法营业、透过频繁的示威游行和商场示威，令游客大幅减少、号召大量市民同时涌入机场、或者堵塞机场交通，令机场被迫取消航班。示威者也用「不合作运动」反击亲政府的企业，例如示威者透过名为「裝修」的快闪行动破坏商舖设施和货品，令其无法做生意，造成亏损。

抗争由週末的示威游行转化成以动摇经济运作为目标的行动，一方面开拓了新战线，另一方面也象徵「反修例」运动已渗进抗争者日常生活的各方面。过往民运人士间有一句话是「如果烛光没点燃生活每一面，我们每年就只能在维园见」，意指假若平反六四的精神不能体现在生活中，那么就只剩下每年一度的悼念活动，更广义来说，就是民主运动的精神必须在生活的各方面表现出来。在「反修例」运动中，有更多的烛光在生活

2
/
2.1
/
▶ 2.2
/
2.3
/
2.4

中被点燃，示威的「例外状况」和日常生活的界线被模糊，抗争者在示威以后，仍然在日常生活中想办法抗争，这个转化也带来之后在工会、社区、消费等各个战线的发展。



示威者认为机场是香港的经济要害，製作文宣呼吁市民涌入机场造成堵塞以对政府施压。（图片取自：反送中文宣谷）

2.3 - 其他抗争战线的开拓

/

2
/
2.1
/
2.2
/
▶ 2.3
/
2.4

在过去，激进的示威手法遭到其他示威者「割蓆」，并导致舆论反弹。然而，在「反修例」运动中，激进示威者受到大部份示威者和市民的支持，示威者的受伤和被捕，引起市民广泛的同情和愤怒，甚至驱使没办法走上前线的抗争者在日常生活中探索其他的抗争路线，望能用各种方式对政府施压和延续运动，其中，新工会、「黄色经济圈」、区议会、国际线都在这个脉络下开展，并在抗争者的实践中成型。

在这个阶段，不少以各行业从业员为主体的集会游行涌现，示威者交替发起週末示威和上班日的「大罢工」以癱痪城市运作和向政府施压。这些罢工动员主要透过社交媒体平台、「电报」群组和各区街站进行号召，尽管未达到癱痪经济的效果，却在过程中累积各行业工人的网络和行动的经验，成为日后「新工会」组建浪潮的基础。

在「反修例」运动爆发后不久，抗争者迎来区议会选举，过去不受重视的区议会在运动中变作寸土必争的战线之一。在 2019 年 6 月，网民整合 18 区区议会的「积极考虑」参选名单，并动员示威者参选以挑战建制派。抗争者通过连登、电报等网络平台连结、在各区开展地区工作、共享资源、组成选举联盟推出共同政纲。

2
/
2.1
/
2.2
/
▶ 2.3
/
2.4

此外，一些商舖公开支持运动、响应「罢市」的呼声被示威者称作「黄店」；也有商舖打压抗争者、支持警方等被示威者称作「蓝店」。示威者开始蒐集整理「黄店」和「蓝店」的资料，用作为日常生活中表态的方式以罢买蓝店、支持黄店，形成「黄色经济圈」的雏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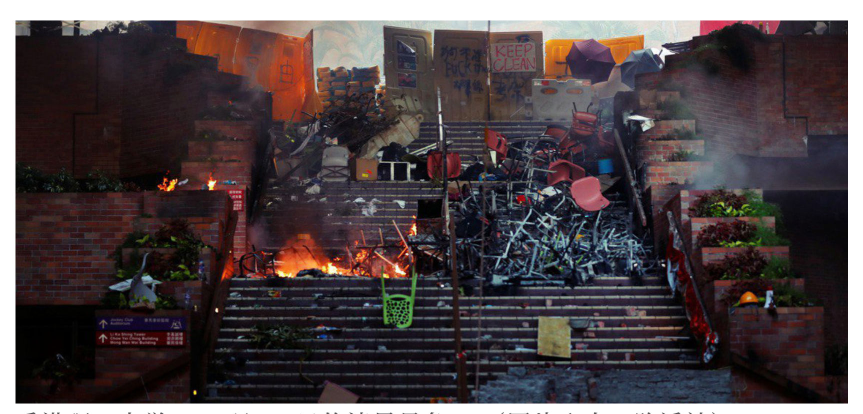
运动期间，示威者透过登报、集会、联署、分享讯息等方式争取国际社会对于香港抗争的关注和支持，并且盼望透过这些关注对中国政府施压。9 月初高达 25 万人参加示威支持美国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反映示威者对于国际社会介入以及「国际线」的期望上升。

2.4 - 「理大突围」：街头抗争升级的极限

/

示威者周梓乐在 2019 年 11 月初坠楼不治[1]，激起示威者占据位于交通要塞的中文大学和理工大学，瘫痪主要干道及海底隧道，以促成「三罢」。警方在中大和示威者激烈对峙数日后撤离，却封锁理大不允许示威者离开，保安局局长更宣佈以「暴动罪」拘捕所有理大内的人士。上万名市民连续数日发起「入 Poly，救手足」的行动，不畏严密的警力部署向理工大学推进，盼能「里应外合、杀出重围」，救出被围困的示威者，但却没有成功。

街头的勇武抗争在「理大突围行动」达至高峰，亦面对前所未有的武力镇压和大规模逮捕，警方单日使用共 7647 枚弹药，3 日之内被拘捕的示威者超过 1000 名。而后，示威者普遍意识到在国家的绝对武力当前，大量的示威者被捕，所付出的代价沉重，街头抗争难以升级或持续下去，「工会战线」、「黄色经济圈」、「国际声援」等路线成为延续运动的重要阵地。



香港理工大学，11 月 18 日的清晨景象。（图片取自：路透社）

1.《香港各区民众晚上悼念离世科大学生，演变堵路及警民冲突》，《端传媒》，2019 年 11 月 8 日。

3 - 第三阶段：抗疫即抗争 —— 不同战线的发展和交织

（2019 年 11 月 19 日—2020 年 6 月 30 日）

/

在 11 月的大学占领中，持续激进化的街头行动达至高峰，面对难以升级的困境。萌芽于运动中的区议会、国际线、工会、「黄色经济圈」成为延续抗争的重要阵地。2020 年 1 月底，香港出现首宗新冠肺炎案例，疫情成为社会运动的重要背景。政府藉抗疫之名打压集会游行自由；抗争者阵营则变作「自救抗疫」的主体，维繫网络和延续抗争。2020 年 6 月，中央政府强行通过《国安法》。「反修例」运动面对严峻的政治打压。

（图片取自：Studio Incendo）



3.1 - 议会、 工会、「黄色经济圈」、国际线

/

在 2019 年 11 月底的「理大突围行动」后，街头的勇武抗争面对延续的困境，街头抗争的规模缩减、频率减少、与警方对峙的场面亦大幅下降，与此同时，过去数个月在在运动中逐渐發展壮大的议会、工会、「黄色经济圈」、国际线则成为延续运动的重要阵地。

在 11 月底的区议会选举中，支持运动的议员在市民对运动的支持下取得胜利，为社区组织带来平台和资源，也展现市民对抗争的支持，被国际社会视为掌握香港社会民意的指标，间接带动国际线的上升。2019 年 11 月 28 日，美国总统签署《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该法案获得香港示威者的支持，当日有 10 万名市民参与「人权法案感恩节集会」。当街头抗争变得困难，更多抗争者将希望放在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的制裁和围堵。

另一方面，在 2020 年 9 月举行的立法会选举成为下一个备受瞩目的战场。在 2020 年上半年，社会上出现大量关于选举的政治路线讨论和民间动员。自 2019 年年底，职场上的同路人在各个行业成立工会，在新职工会登记申请数目攀升的同时，跨行业的工人网络也逐渐形成。新工会频繁组织各区联合街站招募新血并成为重要的抗争主体。随着公共空间的抗争空间收窄，「黄色经济圈」承接运动的能量，成为示威者在日常生活中的消费实践贯彻自己的政治理念、在日常生活中凝聚同路人的阵地。

3.2 - 区议会选举：民意的胜利

/

在持续数月的示威后，抗争者视 2019 年 11 月的区议会选举为体制内的战线，以取得多数席次，抢占长期被建制派所把持的地区资源为目标。抗争者阵营一方面视选举为市民对运动表态的民意公投。另一方面，抗争者希望阻止建制派区议员把持经济资源，利用区议员的位置将政治议题带入社区、联同地区网络支援运动，壮大抗争势力。

区议会选举在两所大学的激进示威高峰后举行，在选举前，抗争者阵营担忧激进的抗争会令「民意逆转」。然而，2019 年 11 月的区议会选举投票率超过七成，打破歴史纪录；民主派在全港 452 个议席当中夺得超过 85% 的席次取胜，大量政治素人因为其支持运动的立场而当选。选举结果反映非建制阵营的得票率近六成，建制阵营的得票率近四成，也就是说，有过半数的香港市民支持运动。区选的胜利对抗争阵营很是鼓舞，不仅开启「议会战线」的讨论和发展，带动「国际线」的关注上升。当延续街头行动困难重重，支持运动的新任区议员获得地区平台和资源后，成为在社区凝聚抗争者的长期据点。（关于抗争者在区议会实践的详情，请见第六章〈街头之外的抗争〉。）

3.3 - 参选立法会：瘫痪政府运作和揭露打压

/

3
/
3.1
/
3.2
/
▶ 3.3
/
3.4
/
3.5

在区选胜利的鼓舞下，原定在 2019 年 9 月举行的立法会选举成为下一个备受瞩目的战场。「反修例」抗争者计划取得过半数的议席[1]，利用投票结果彰显民意之余，也透过瘫痪议会的运作施压，迫使政府回应运动的诉求。

2020 年春天，戴耀廷等人开始酝酿民主派参选人间的「初选」协调机制，计划透过公民参与、投票让市民有机会就其对参选人的支持度表态，作为正式选举部署的参考，以确保民主派阵营能获得最多议席。4 月 28 日，戴耀廷在报章上发文提出「真揽炒十步」，明确民主派在掌握议会后对政府施压的路线图。6 月，35 名立法会参选人签署〈墨落无悔 坚定抗争〉的立场声明书，表明认同「五大诉求，缺一不可」，并承诺当选后运用《财政预算案》否决权，迫使特首回应五大诉求。

在 2020 年上半年，社会上出现大量关于选举的讨论和动员。一方面，抗争者视议会为寸土必争的阵地之一，以在「地区直选」和「功能界别」取得最多的议席为目标，积极动员市民参与投票、完成「功能组别」的选民登记；另一方面，部分抗争者预见在政府的强硬打压下，民主派的候选人难以进入立法会。但盼抗争派在初选成为主流，迫使政府大规模取消资格，以揭露政府对香港的议会的全面打压，继而「破局」至「揽炒」，争取国际制裁。

1. 香港立法会共有 70 个议席，35 名议员由地方选区直接选举（地区直选），其余 35 名议员则经功能界别选举产生。在过去的历史上，民主派从未能在议会中取得过半议席，抗争者阵营计划在 2020 年的立法会 70 席中拿下至少 35 席。

3.4 - 「抗疫」即抗争

/

3
/
3.1
/
3.2
/
3.3
/
▶ 3.4
/
3.5

2019 年 12 月，中国内地的新冠肺炎疫情曝光，2020 年 1 月底，香港出现首宗确诊，新冠肺炎疫情成为 2020 年的社会运动的重要背景。

香港政府抗疫的反应缓慢，却推进各方面的政治打压，并以「抗疫」之名打压集会游行自由，包括「反对」集会游行申请，再密集部署警力、截查搜身、发出控票、大规模围捕。在强硬的打压下，零星的示威仍然出现，2020 年 5 月底，数万名示威者就强推《国歌法》和《国安法》上街示威；6 月 4 日，数万名示威者在维多利亚公园以及各区集会。但随着风险的增加，街头抗争的频率显着减少，参与人数亦显着下降。

另一方面，抗争者阵营也透过抗疫来承接 2019 年的运动能量，维繫网络和延续抗争。在运动参与空间急遽紧缩的政治环境中，「抗疫」成为敏感性较低、容易动员示威者共同参与的事件。在疫情所带来的社会危机下，运动中形成的社区网络、工会、区议会、「黄色经济圈」则成为公民社会「自救抗疫」的主体，并透过抗疫的共同目标产生跨网络的连结和互助。

在社区，过去发佈示威动员的「连侬墙」网络转而发佈抗疫资讯；多个地区出现反对设立检疫中心的小规模示威；区议员和街头抗争的后勤网络成为搜罗和发放抗疫物资的据点。当公共空间的活动在疫情下被限缩，黄店成为在日常生活中延续抗争的空间。不少黄店将室内墙面变成「连侬墙」、免费发放抗疫用品、为有困难抗争者提供伙食；另一方面，疫情带来的经济寒冬令许多「黄店」的经营陷入困境，抗争者阵营则透过宣传「黄店」，实践在运动中养成的消费习惯，举办消费季，组织跨区外卖等方式支持「黄色经济圈」。

在职场，疫情是新工会成立后面对的首个社会危机。在 1 月底香港出现首宗确诊后，「医管局员工阵线」提出「禁止旅客经中国大陆入境香港」、确保工作安全等「五大诉求」并发起 5 日的罢工。其他新工会、「黄店」、社区街站、区议员也积极投入罢工的声援。尽管政府极力否认和医护罢工的关联，但在罢工后加强边境控管，包括停驶高铁、关闭口岸、实行 14 天强制隔离等政策。

另一方面，在 2020 年，当大规模的示威表态变得困难，政府也以防疫的藉口推进社会控制，区议员、新工会、「黄色经济圈」在维繫抗争者网络的同时，也抵抗政府在日常生活中的政治打压，直斥政府的纾困、全民检测和疫苗接种等政策上的问题。

疫情下的
社区游行

粉岭
抗议将该区公屋改作「检疫中心」
2020年1月26日

大埔
抗议设置「检疫中心」
2020年2月15日、3月18日

天水围
抗议设为「指定诊所」
2020年2月15日

葵涌
抗议设为「指定诊所」
2020年2月16日

西贡
抗议设置「检疫中心」
2020年2月9日

美孚
抗议设置「检疫中心」
2020年2月1日、2月6日

九龙湾
抗议设为「指定诊所」
2020年2月16日

长沙湾
抗议设置「检疫中心」
2020年2月16日

坚尼地城
抗议设为「指定诊所」
2020年2月6日

筲箕湾
抗议设为「指定诊所」
2020年3月1日

社区游行的时间和地点综合自媒体报导。

3
/
3.1
/
3.2
/
3.3
/
▸ 3.4
/
3.5

香港作为一个毗邻中国内地并且往来密切的城市，并没有出现严重的社区大爆发，甚至可说是疫情受控[1]。然而，超过七成的市民同意，若疫情没有大规模爆发，是「市民民间自救」的成果；仅近两成的市民同意是「政府处理得宜的成果」，足以见到市民普遍不满意政府的抗疫表现，并肯定民间抗疫扮演相对重要的角色。

1. 据统计数字，截至 2020 年 12 月，香港每十万名市民平均有约 110 人确诊。

3.5 - 《国安法》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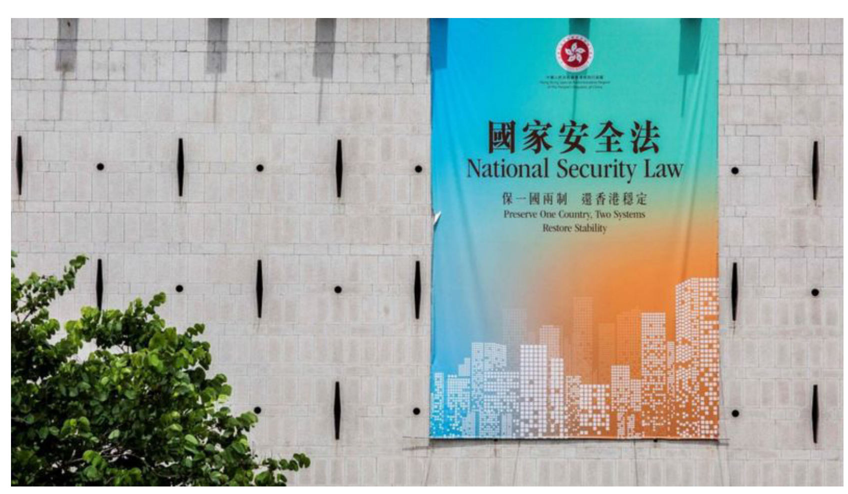
/

在 2020 年上半年，虽然街头抗争大幅减少，但议会、工会、「黄色经济圈」承载运动的能量，在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持续发展。然而，在 2020 年 5 月底，中央政府突袭公佈《国安法》的立法，对运动带来严峻的挑战。

2020 年 5 月 21 日，中央政府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前夕表示今届议程包括「香港国安法立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在会上指出，在 2019 年的「反修例」以来，香港的国家安全风险日益突出。「反中乱港」势力从事破坏国家、分裂国家的活动，而境外势力干预香港事务，严重危害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但在香港推行「廿三条」的本地立法十分困难，故从中央层面建立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

5 月 28 日，全国人大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并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制订相关法律。在中央强行通过《国安法》之际，示威者在 5 月 24 日、5 月 27 日游击示威反对《国安法》，警方大规模围捕数百人。6 月 20 日，「二百万三罢工会联合阵线」联同「中学生行动筹备平台」就《国安法》举行罢工罢课公投，高比例的投票者反对《国安法》，但因参与人数未达门槛而未能发起行动。

在 6 月 30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通过《港区国安法》以全国性法律的形式纳入《基本法》附件三，在 7 月 1 日，由香港特区在当地公布实施。在短短数週的时间，中央架空香港的立法机关，由人大常委会制定法律，再在香港刊宪实施，为「反修例」运动带来严峻的打压。



（图片取自：法新社）

4 - 关于「反修例」，一些你可能也有的疑问……

/

在这部分，我们透过简单的问答，回应在政府的官方叙事中经常出现的运动指控。

Q1 - 「反修例」运动的参与者是谁？

/

中央政府断言运动由「一小撮极端暴力份子」所策划，然而事实上，「反修例」运动无疑是一场大型的群众运动，背景多样的示威者以各种形式参与其中。

根据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的调查[1]，共有 52.6% 的受访市民曾参与至少一项「反修例」活动，按香港人口推算，即约 345 万人曾以各种形式参与其中。「反修例」运动的参与率较「雨伞运动」（18%-20%）、「阿拉伯之春」（35%）[2] 都要高。在参与的形式上，逾八成的抗争者参加过游行集会，逾六成曾以各种形式援助示威者，近六成曾张贴「连侬墙」，31% 及 8% 的抗争者曾参与包围占领以及与警察发生衝突。

1. 香港中文大学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香港反修例运动中的民意状况研究报告》，2020 年 5 月。
2. 如：美国反越战运动（14%，1964-73）、乌克兰橙色革命（22%，2004）、阿拉伯之春（也门：35%，2010-12）的参与率（资料来源：李立峯，「台湾以及国际观点，反送中一年后」研讨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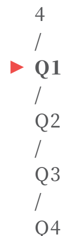
1.



市民参与各项「反修例」活动比例

分类	参与反修例活动比例	任何反修例活动	游行集会	援助示威者	贴连侬墙	包围佔领	与警察冲突
总计	总计	52.5	43.2	32.5	27.2	16.3	4.1
性别	男	55.8	46.0	34.0	28.5	19.3	6.2
	女	49.7	40.6	31.1	26.1	13.6	2.3
年龄	15-29 岁	79.7	69.2	52.5	54.2	33.2	12.3
	30-39 岁	62.0	53.7	41.6	33.9	21.4	5.7
	40-49 岁	49.5	41.6	30.4	24.1	12.6	1.6
	50-59 岁	52.9	42.5	28.6	24.1	13.3	2.1
	60 岁或以上	32.0	22.4	18.6	10.2	6.9	0.9
学历	中三或以下	37.0	27.0	19.4	14.8	9.5	1.5
	中四至中七	54.2	41.7	32.2	30.1	16.0	4.5
	大专或以上	66.5	60.8	45.5	36.7	23.0	6.5
职业	经理及行政级人员	60.1	51.3	41.9	29.2	16.2	3.7
	专业人员 / 助专业人员	71.0	63.7	46.8	38.0	25.8	6.6
	文员 / 服务工作及商店销售人员 / 劳动人员	55.9	46.7	32.0	29.3	18.0	5.2
	学生	80.8	68.0	48.5	58.6	35.1	12.3
	非在职人士	35.8	25.8	21.3	14.9	7.9	0.9
政治倾向 / 派别	本土派	81.6	67.7	57.1	52.7	35.4	11.0
	泛民主派	73.0	61.5	47.4	37.5	21.3	5.6
	建制派	6.3	5.0	1.1	1.2	0.7	0.7
	无任何政治倾向 / 不属于任何派别	24.3	18.3	10.3	10.3	6.2	0.7

（数据来源：中文大学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香港反修例运动中的民意状况研究报告》，2020 年 5 月。）



「反修例」运动的参与者来自各个年龄层和职业类别，其中，学生和 21-30 岁青年人的参与度最高。高达八成的学生和青年人曾参与「反修例」，他们也是激进示威的主力：三分之一曾参与包围占领、每 8 位中有 1 位曾和警察发生衝突。青年人在运动中的高度参与也反映在被捕人士的年龄分佈，30 岁以下的青年人占被捕人士总数的八成。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学生在前线的激进示威备受瞩目，但「反修例」运动并不是「学生运动」，刚出社会的青年人（21-30 岁）的运动参与率和学生不相伯仲，占总被捕人数的比例最高；各类在职人士和 30-50 岁的市民的参与率都超过一半。

在人口特性上，高比例的示威者有大专或以上学歷；在阶级分佈上，自认是「中层或中产阶级」和「下层或基层阶级」的示威者是运动参与的主力，前者的比例较后者高。值得一提的是，超过半数的示威者曾参与 2014 年的「雨伞运动」，但也有 10% 至 30% 的示威者是在「反修例」第一次参加社会运动。

另一方面，虽然大部分的运动参与者都认同「五大诉求」，但他们在政治立场、抗争手法等问题上并不是铁板一块。在政治光谱上，自认「温和民主派」的示威者是 2019 年的运动的中坚力量（占三至四成），自认「本土派」的示威者则是第二主力（占二至四成）。当部分示威者以激烈的手法抗争，示威者间的接受程度也存在差异。

簡而言之，在 2019 年，存在已久的政治派系并没有消失，只是相较「雨伞运动」的张力和衝突，「反修例」示威者有共识要尽量包容不同的立场和策略，并令跨政治光谱的合作变得可能。

Q2- 「反修例」运动在社会上受支持吗？

/

4
/
Q1
/
▶ Q2
/
Q3
/
Q4

一如过往在香港爆发的群众运动，部分媒体和政治人物声称「反修例」运动违背「沉默大多数」的市民意愿；他们宣称，社会上大部分的市民并不支持运动，只是尚未表态。然而这个说法经不起统计数据的推敲。

事实上「反修例」运动稳定受到超过半数的市民支持。示威爆发一个月后的民调显示，近七成市民反对修例；近六成市民认同「重启政改」、「撤回暴动定性」等诉求。在 2019 年 9 月，当大规模示威无法令政府让步，却遭受严峻打压，市民对政权和警队的信任跌至谷底，四成至五成的市民对中央政府、特区政府、警队信任度打「零分」。在街头衝突的高峰期，当市民被问及谁应为暴力衝突负最大责任，过半数市民认为是「特区政府」；仅一成市民认为是「示威者」[1]，足以见到示威者在社会上获得一定程度的同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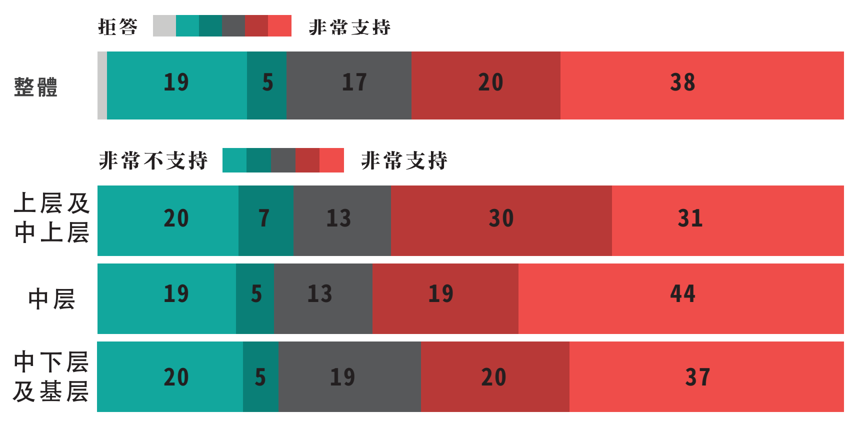
在 2020 年 6 月的民调指出，仍有近六成的市民支持运动，其中，年纪较轻、香港人身份认同较强、学歷较高的市民更倾向支持运动[2]，此外，尽管香港民主运动常被称为「中产」的运动，自认是上中下社会阶层的市民的运动取态分佈的差异并不大[3]。

1.「中大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第 86 页。

2. 2020 年 6 月，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李立峯、香港城市大学公共政策学系副教授郑炜等人，对超过 1500 名香港市民进行了涵盖 116 题的民意调查。

3. 2020 年 6 月，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李立峯、香港城市大学公共政策学系副教授郑炜等人，对超过 1500 名香港市民进行了涵盖 116 题的民意调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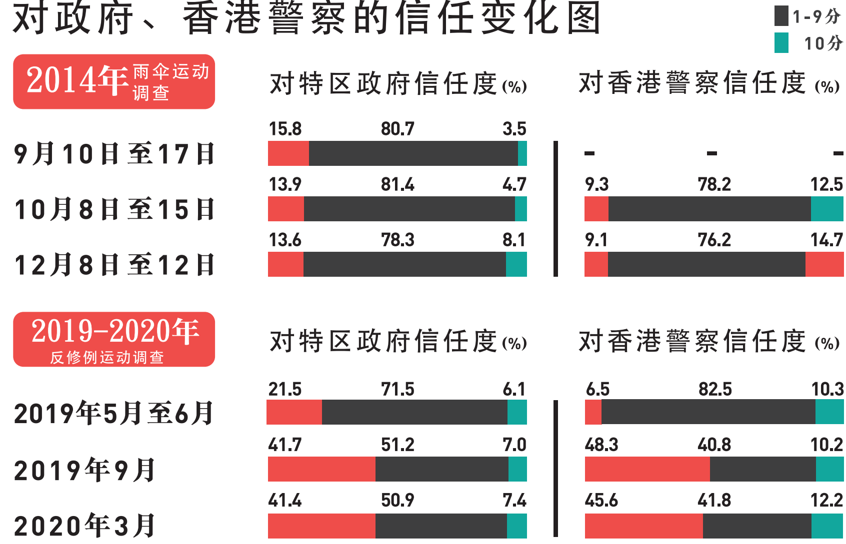
不同阶层的市民对「反修例」运动的支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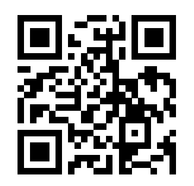


（数据取自：〈独家数据：香港人、本土派，他们如何理解此城未来？〉，《端传媒》，2020 年 6 月。[1]）



市民在「雨伞运动」和「反修例」运动中对政府、香港警察的信任变化图





在「雨伞运动」中，市民对特区、中央政府、和警队的信任度并没有显着变化。但在「反修例运动」中，对三者零信任的市民在三个月内攀升至超过四成。（数据取自：李立峯〈是两极化还是一面倒？当下香港民意的共识。〉[2]）

另一方面，虽然称不上是「大多数」，但社会上也确实存在支持政府和警队、谴责示威的声音。运动期间，建制派的政治人物、企业家、商会高调反对示威：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创立「803 基金」，用百万奬金悬赏「暴徒」资料、并搜集「专业失当」的教师举报；富商何超琼、伍淑清代表

4
/
Q1
/
▶ Q2
/
Q3
/
Q4

「香港各界妇女联合协进会」在联合国发表演说，抨击示威是「有组织、有预谋的暴力行动」；代表商界喉舌的四大商会也数次谴责示威者破坏设施和商铺，支持警方「止暴制乱」。在社会层面，建制势力用大量资源动员反对运动的集会、联署、街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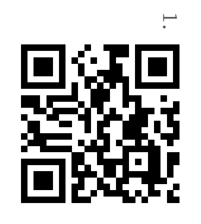
在 2019 年 7 月和 8 月，「守护香港大联盟」分别发起「守护香港集会」、「反暴力、救香港」集会，数万名市民到场支持。值得留意的是，在建制势力的社团、同乡会、甚至跨境的网络动员外，也有市民因认同大会的政治理念而参加，集会的参加者半数是「51 岁以上」或「中／小学或以下学歷」的市民[1]，和「反修例」运动参与者年纪轻、高学歷的特性形成明显对比，从访问[2]可见，他们特别强调示威对日常生活和经济的负面影响。

值得留意的是，民调一直是了解市民对运动支持度的重要媒介，但运动期间绝大多数的电话和问卷调查仅为操广东话、能阅读繁体中文的使用者设计，因此受语言的限制，仅能呈现在港操广东话的华人的声音。事实上，香港有近 40 万的外籍家务移工、60 万的少数族裔，还有大量和内地维持各种关係的人（新移民群体、在港就读的「内地生」、及在港就业的「港漂」群体）。但一直以来，在社会的主流讨论中，这些群体经常不被视为「香港人」的一份子；运动期间，在各种隔阂和障碍下，这些群体的参与和声音在主流讨论中并不多见。2019 年年底，有曾报导和声援香港运动的移工被拘留和遣返，引發抗争者的声援；

1. 〈李立峯：反修例运动，政府支持者心中，警察会永远伟大吗？〉，《端传媒》，2019 年 8 月 2 日。

2. 〈建制派再发起集会「反暴力、救香港」，参与市民怎样看现状？〉，《端传媒》，2019 年 8 月 17 日。

1.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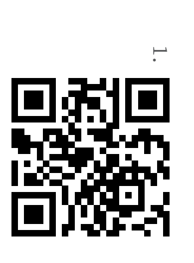
有南亚裔人士向示威者派水、组织导赏团鼓励市民了解少数族裔社群。其中，内地背景的市民对「反修例」运动支持和反对的声音并存。有内地生的自發调研指出，34.7% 的受访者支持运动、36.2% 的受访者不支持运动：有内地生在校园破坏连侬牆和示威者引起争执；有出身内地的学者主动發起联署并组织港漂群体参与集会；「内地生撑香港」的脸书专页搜集大量内地同学对于运动的观察、支持和困惑。

在「反修例」运动中，随着运动的规模扩大，影响力扩展至日常生活中的各个层面，不表态或「没有政治立场」的人减少，「黄丝」和「蓝丝」[1] 更加壁垒分明。「蓝丝」和「黄丝」发展出截然不同的信息获取渠道、形成各自的网络，在示威现场、日常生活中的各个层面出现衝突，例如：部分「蓝丝」清走示威者架设的路障、袭击示威者、配合建制的宣传在职场上举报「黄丝」的政治立场。

1. 山城学生研究小组，〈香港中文大学内地生反对反修例运动态度问卷结果报告〉，2019 年 10 月 14 日。

2. 从「雨伞运动」中，佔领者以「黄色丝带」作记号，支持警队、反对佔领者以「蓝色丝带」作记号。后来，市民以「黄丝」泛指民主运动的支持者；「蓝丝」泛指建制派的支持者。

1.



Q3 - 「揽炒」是什么？

/

4
/
Q1
/
Q2
/
▶ Q3
/
Q4



（图片取自：流伞）

「揽炒」字面上的意思是「玉石俱焚、同归于尽」，可以理解作「抗争者不惜让香港的制度变得更坏，或者自己付上代价，令政府付出（更大的）代价」。

几年前，有极少数本土派人士提出「揽炒」的思路，在当时并不受公民社会欢迎。但当「反修例」运动发展至2019年8月，过去在街头「示威施压」再和政府「谈判对话」达至让步的抗争想象破灭，「揽炒」渐成抗争的主导逻辑之一。邓键一曾撰文指出「揽炒发酵至今，它实实在在地代表着这场运场其中一个面貌，包含了某种精神状态、情绪，以至抗争策略。」

作为抗争策略，「揽炒」背后的逻辑可以拆解为三个部分，第一，香港政府不过是中央政府的傀儡，唯有向「中央政府」经济抗争和国际施压，才有望在香港推进政制改革的运动目标。第二，中国非常倚赖香港的集资功能，若运动迫使政府

镇压并取消香港的「一国两制」、将危及香港国际金融城市的地位，间接令中国经济崩溃并演变成政治动盪，最终令中共政府垮台。第三，示威者对政治情势感到绝望[1]，若中央政府终止「一国两制」并强硬镇压，则要面对国际制裁和经济围堵，而示威者的损失有限（因「一国两制」已近崩坏；强硬镇压已经发生，抗争者认为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失去）。

「揽炒」的逻辑除了反映悲观的社会情绪也是「终极一战」的成本计算，与其说抗争者坚信「揽炒」必然能推进政制改革，不如说当「反修例」运动揭露若沿袭过去上街表态以求谈判的互动模式不再可行，「揽炒」派的抗争者「宁做灰飞，不作浮尘」，愿意付出更大的代价杀出一条生路。

不论「揽炒」背后的政治分析是否成立，「揽炒」的策略在抗争者间有一定的影响力，促成在街头、议会、国际施压等战线的实际行动。在 2019 年下半年，示威者持续示威和罢工，透过干扰城市运作增加政府的管治成本和经济损失；同时成立「我要揽炒」团队众筹登报宣传香港的抗争、要求国际社会向中国政府施压。2019 年 9 月，高达 25 万名示威者参加「香港人权与民主祈祷会」，要求美国通过可制裁中国政府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草案。在 2020 年上半年，当街头抗争的空间急遽限缩、遭到严厉的打压，原先作为辅助的国际施压重要性上升，更多示威者以「国际制裁」中国政府为重要的目标。

1. 根据香港民意研究所进行的香港民意研究计划，在 2019 年 8 月，香港市民对中央政府和一国两制的信心创下纪录新低，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净值为 -40%，是 1994 年以来的新低；对一国两制则为 -28%，是 1993 年有纪录以来的新低。

4
/
Q1
/
Q2
/
▶ Q3
/
Q4

2020年7月的民主派立法会初选中，戴耀廷和「抗争派」候选人提出议会「揽炒」的策略，计划否决《财政预算案》停摆政府运作，并预计当议员大规模被政府取消资格，将带来抗争激烈化、引致「西方国家对中共实行政治及经济制裁」。议会「揽炒」路线扬弃泛民主派政党在过去数十年（向政权施压、谈判、互动仍然抱有期望）的议会想象，而是以主动揭露体制内的谈判空间不復存在为目标之一。

「抗争派」候选人何桂蓝提出：「议会与选举不应只是吸纳、消解运动能量的虚伪结构。面对九月立会选战，民主派必须重新掌握『揽炒』的主导权，说服民众，香港已经不可能回復那表面平和、实际上腐烂的『日常』。」在初选前，「抗争派」的候选人表明「揽炒」的意图，共同签署纲领，承诺动用《财政预算案》否决权迫使特首回应「五大诉求」；「民主党」候选人则以取得过半数议席为目标，拒绝在竞选阶段表态。「抗争派」候选人最后在初选脱颖而出，可见议会「揽炒」的路线获得部分示威者的支持。



初選中勝出的民主派立法會參選人出席記者會。（圖片取自：路透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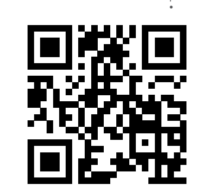
「反修例」示威者对揽炒的看法

註：数值为同意或非常同意的比例

游行日期	2019年9月15日	2019年10月20日	2019年12月8日	2020年1月1日
香港的情况已经太坏，即使政府採取极端手段镇压运动也没有什麽可怕	65.9%	74.9%	67.6%	62.1%
即使今次运动长远会严重打击香港经济，那只会损害到部分既得利益者，对我没有什麽影响	64.8%	59.1%	57.2%	55.3%
若香港出现极端情况（例如被国际社会制裁），北京政府的损失比香港更多	85.5%	83.2%	84.5%	82.7%
在国际社会关注下，香港局势更坏其实对运动更有利	75.2%	70.7%	72.6%	75.1%
样本数	911	921	902	1,306

数据来源：〈李立峯：揽炒论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明报》，2020 年 5 月 7 日[1]。

1.



尽管抗争者不惜为运动付上代价、有所牺牲是「揽炒」逻辑的一部分，但示威者间对「揽炒」的代价存在分歧的看法，2019 年下半年，过六成的示威者对「揽炒」的發展相对乐观，他们认为中央政府难以忽视港人的诉求，不会任由「揽炒」發生；即使「揽炒」真的發生，对一般市民的影响不大。但随着运动發展到 2020 年 4 月，有更多的示威者认为即使获得国际社会关注、损害香港金融地位，中国政府向「揽炒」让步的可能性不大 2，而认为自己的生活将受「揽炒」影响的比例也持续上升。

2.〈【独家数据】香港学者追踪 6000 示威者：他们信任谁？还参与抗争吗？〉，《端传媒》，2020 年 6 月 9 日。

2.



Q4 - 「反修例」运动是「港独」的运动吗？

/

2019 年 8 月的一幅街头涂鸦「Give us Democracy or we get Independence(给我民主，否则我们独立)」具体捕捉了示威者的心理状态。（图片取自网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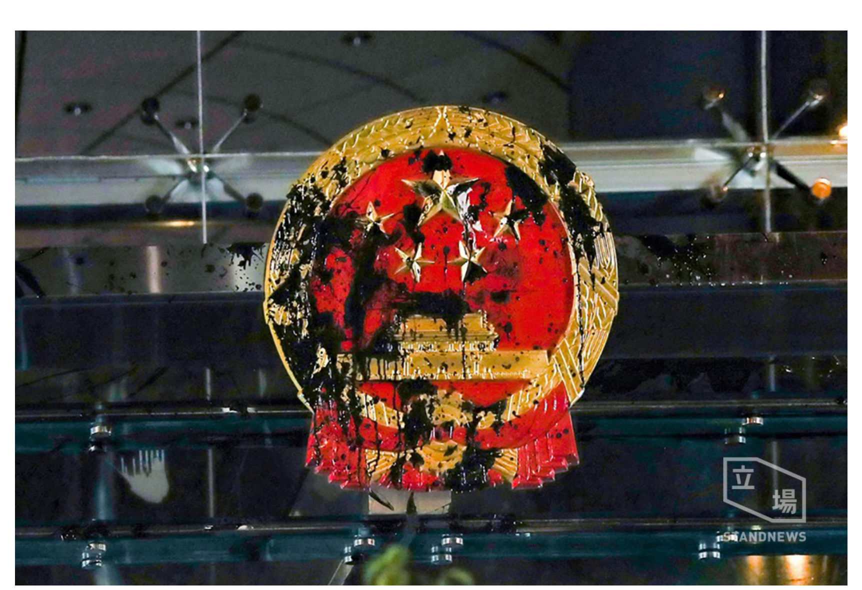
4
/
Q1
/
Q2
/
Q3
/
▶ Q4

2019 年的运动最初是防卫性的：示威者仅仅要求撤回限缩现有自由的修例草案。在政府镇压下示威者提出咎责警暴、释放被捕人士等诉求；当示威持续数星期，政府仍对民意置若罔闻，示威者在「立法会衝击行动」确立「政制民主化」的第五诉求。在运动中，受最多示威者认同的「五大诉求」并不涉及「香港前途」的讨论，更不涉及独立。

尽管挑战中央在港的统治基础并不是大部分抗争者的目标，但当过去几十年在现有制度框架推进香港民主化不果，在 2019 年的运动付出巨大的代

价却未能推进寸步，在「反修例」运动中，更多的抗争者否定过去几代人所相信的民主化道路（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民主回归」）、叩问香港前途的其他可能性。这个倾向表现在口号、「香港人」身份认同的上升、「本土派」在社会上的影响力扩大等面向上。

2019 年 7 月 21 日，数百名示威者在游行后，高喊「光復香港，时代革命[1]」的口号并向西环推进，短暂包围中联办并涂污国徽，原先由少数本土派支持者提出的「光时」口号伴随着这个激进的行动，在示威者间传播开来，成为「反修例」运动中最标志性的口号。这个口号的意涵模糊，也不涉及具体的运动策略，但揭示部份示威者将沸腾的民怨指向中央政府的统治合法性，并期盼行动升级的运动愿景。



示威者向中联办门口的中国国徽掷油漆弹。（图片取自：立场新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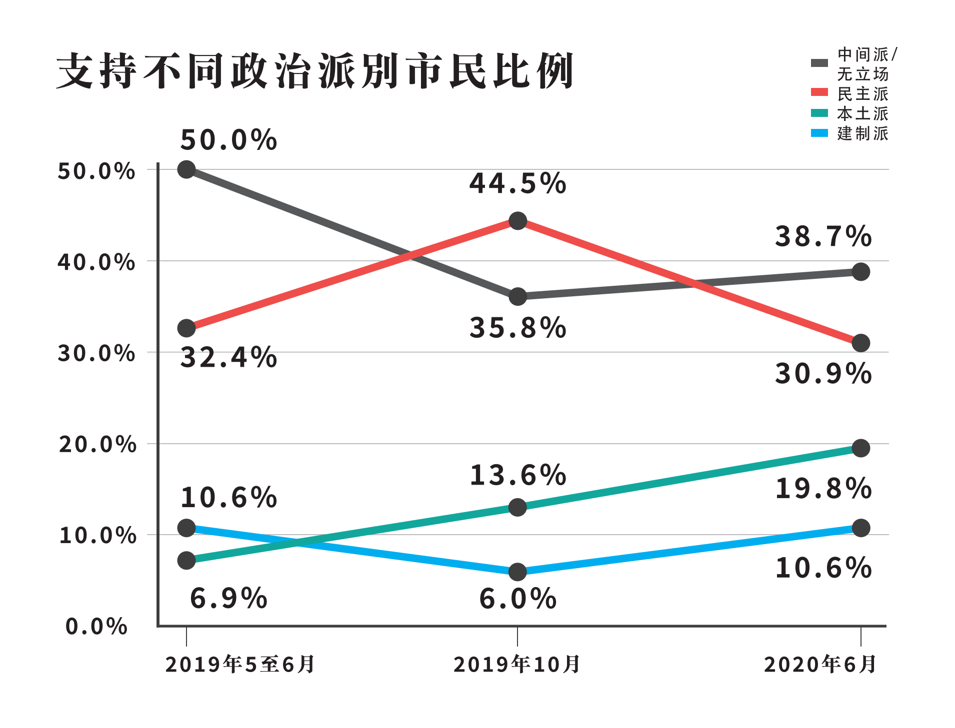
1. 「光復香港、时代革命」首次由「本土民主前线」的梁天琦在 2016 年的立法会新界东补选中提出。「光復香港」一词，取自 2015 年本土派于各区针对大陆自由行及水货客之示威活动，有从充斥水货客的社区中重夺家园之意味。香港政府不但认定该口号有「港独」的意思，更在《国安法》通过后作出声明：「『光復香港 时代革命』口号在今时今日，是有港独、或将香港特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离出去、改变特区的法律地位、或颠覆国家政权的含意。」

4
/
Q1
/
Q2
/
Q3
/
▶ Q4

另一方面，在「反修例」运动后，在 2019 年年底，市民的「香港人」和「中国人」认同分别创下 1997 年以来的歷史新高和新低，青年人（18-29 岁）对香港人的认同度更是非常高，仅有 1.8% 认同自己是「中国人」[1]。在政治立场上，在 2019 年 3 月，自认「本土派」的市民比例居末位；但在 2020 年 6 月，自认「本土派」的市民已上升至 19.8%[2]，与「民主派」的比例差距减少。其中，四成青年人自认「本土派」；四分之一的中年人自认「本土派」。

这些民调指出，在运动后「本土派」成为香港社会主流的政治立场之一，但值得留意的是，在「本土派」支持者规模急增的同时，社会上讨论本土政治想象的空间急剧限缩，自认「本土派」的市民对本土派也有分殊的理解和诠释。

1. 〈民研：「香港人」身分认同创新高 仅 11% 市民自称「中国人」〉，《立场新闻》，2019 年 12 月 17 日。
2. 〈港人对政治派别认同的持续转变 — 本土派的抬头〉，《立场新闻》，2020 年 7 月 25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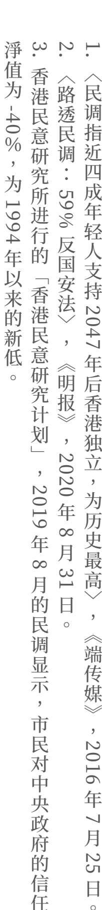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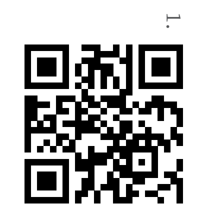
在「反修例」运动前，社会上已经出现「香港独立」的声音。在 2016 年的「本土派」高峰期，近两成市民支持「香港独立」的前途想象；在青年人当中，支持独立的比例高于反对的比例 1；提倡独立的政党在立法会选举中获得可观的支持。然而在政治打压下，支持独立的市民比例在 2017 年下降。

在「反修例」运动中，极少数的「本土派」示威者在游行中高举独立旗帜，却并不受其他示威者欢迎，运动早期的發展并没有使市民认同香港独立的愿景。但从 2019 年年底开始，「香港独立，唯一出路」的涂鸦频繁出现，在示威现场应和「独立」口号的示威者显着增加且来自各个年龄层。在 2020 年 12 月的调查 2 指出，支持独立的市民佔 17%，回到 2016 年的高峰，但仍称不上是香港社会的主流民意。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明确表示支持「港独」的市民比例并不高，但随着对中央政府和「一国两制」的信心跌到谷底 3, 4，更多市民认同脱离中国统治是需要考虑的出路。在 2020 年 6 月的电话访谈中，近四成市民 5 同意「如果香港的自由民主状况无改善甚至变差，港独是需要考虑的问题」。然而尽管「港独」的倾向在社会上發酵，但少有更具体的策略讨论，在《国安法》推出后公共讨论的空间随即被扼杀。


1. 〈民调指近四成年轻人支持 2047 年后香港独立，为历史最高〉，《端传媒》，2016 年 7 月 25 日。
2. 〈路透民调：59% 反国安法〉，《明报》，2020 年 8 月 31 日。
3. 香港民意研究所进行的「香港民意研究计划」，2019 年 8 月的民调显示，市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淨值为 -40%，为 1994 年以来的新低。
4. 香港民意研究所进行的「香港民意研究计划」，对一国两制则为 -28%，是 1993 年有纪录以来的新低。
5. 「中大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香港人、本土派，他们如何理解此城未来？〉。

1.



2.



4
/
Q1
/
Q2
/
Q3
/
▶ Q4

「如果香港的自由民主状况无改善甚至变差，港独是需要考虑的问题。」你同意吗？



1.



（数据取自：〈独家数据：香港人、本土派，他们如何理解此城未来？〉，《端传媒》，2020 年 6 月。1）

延伸阅读

1. Loong-Yu, Au. (2020). Hong Kong in Revolt The Protest Movement and the Future of China. Pluto Press.

2. 马岳（2020），《反抗的共同体：二〇一九香港反送中运动》，新北：左岸文化 / 远足文化。

3. 关震海、王纪尧、钟梓仪、陈萃屏、陈卓斯（2020），《香港大道》，香港：志传媒有限公司。

4. 《2019 香港风暴：《端传媒》反修例运动报导精选》，香港：春山出版。

5. F For 团队（2020），《香港抗争音乐志》，Newbee。

6. 〈【专访】「手语哥哥」反送中　黄耀邦和聋人们的无声抗争〉，《立场新闻》，2019 年 9 月 18 日。

7. 〈Yuli Riswati：不管你是否叫我们做香港人，我们都是香港的一份子〉，《流伞》，2020 年 5 月 2 日。

8. 〈【专题】不分肤色界限的抗争前线　被捕「南亚手足」：终于觉得我都係香港人〉，《立场新闻》，2019 年 10 月 20 日。

9. 〈萧云：揽炒的复杂意义并非求「制裁」望「支爆」可以蔽之　论蔡子强的问题〉，《立场新闻》，2021 年 2 月 4 日。

10. 〈【特写】揽炒之后，四个抗争派的后议会时代思考：保持困惑，保持等待？〉，2020 年 9 月 26 日。



「无大台」的群众协作如何发生？



PUBLIC COORDINATION ON A LEADERLESS MOVEMENT

虽然政府一直声称「反修例」运动背后「有预谋、有组织」，但 2019 年的运动事实上是在既有政治力量分崩离析、各方面组织基础薄弱的背景下，以「无大台」的方式爆发。与此同时，「新媒体平台」作为一个「平台」起重要的作用，是群众连结、动员、参与的阵地。在这一章，我们将从示威者的基本共识和沟通媒介切入，尝试回答：在运动中，当没有「大台」，大规模且持久的「群众协作」如何发生？

在第一部分，我们阐释被抗争者广泛接受的抗争共识。首先是「无大台」的原则，以及示威者在「群众自发」的背景下，因应分歧而生的「不分化、不割席、不笃灰」和「兄弟爬山，各自努力」两组概念。再来是「和理非」和「勇武」抗争者间的关係，如何由政治路线的分歧，变作在运动中的不同分工。

在第二部分，我们介绍在运动中「新媒体平台」扮演的角色。「电报（Telegram）」、「连登」等受示威者欢迎的平台运作的方式，以及其所受到的政府打压和侷限。

前页图片取自：新活水（上、下）。

1 - 「群众协作」的共识

/

1.1 - 「无大台」和群众自发

/

1
/
▶ 1.1
/
1.2
/
1.3

在「雨伞运动」后，既有政治力量分崩离析。一方面，抗争者对泛民政党、社运团体的信心跌落谷底，有意识地拒绝被泛民主派政党或组织「代表」；另一方面，「雨伞运动」的代表人物被判刑入狱，也令社会意识到明确的「大台[1]」会招来政府的重点打击。在这个背景下，「反修例」运动以「无大台」的方式爆发，与此同时，「新媒体平台」则成为接触群众、动员、参与的阵地，起重要的作用。

运动一开始的调研[2]指出，过半的示威者认为「连登」、「电报」的角色非常重要；却仅有低于三成的示威者认为政党、发起游行的「民阵」的角色非常重要。在本章的第二部分，我们会更详细地说明新媒体在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

各組織及平台對運動的重要性　　6月26日調查

	非常不重要	不重要	一般	重要	非常重要
民陣	3.3%	3.1%	20.6%	44.7%	27.5%
泛民政黨	2.9%	6.7%	27.0%	42.3%	19.9%
連登	0.7%	0.0%	4.8%	22.2%	69.4%
電報	2.4%	1.2%	8.4%	28.0%	50.2%

问题：你认为以下组织及平台在这场运动的角色有几重要？
（数据取自：香港中文大学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香港反修例运动中的民意状况研究报告》，2020 年 5 月。）

1. 在 2014 年「雨伞运动」中，示威者称「学联」、「学民思潮」和泛民组织主力运作的大型高台作「大台」，用以形容在运动中下指令做动员、统筹、对外发言或代表示威者的团体或个人，在当时的语境里有批判的意思。事实上，在「雨伞运动」中，虽然「双学」、占中三子担当部分动员的角色，但数以万计的群众自发斗争才是主要的力量。「雨伞运动」的发展既不是「大台」由上而下发号司令，亦不是群众的纯然自发，而是两者互动的结果。然而在话语权不对等、缺乏信任、沟通未能发生的情况下，在雨伞运动中「大台」所主张的「和理非」抗争剧目对「激进」示威者造成压制和边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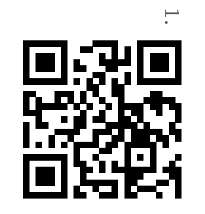
2. 香港中文大学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香港反修例运动中的民意状况研究报告》，2020 年 5 月。

「反修例」运动中「无大台」的共识和高度的群众自发相辅相成：「无大台」但「人人自己寻找角色，在自己的位置上『尽做』」[1]。运动期间由网民汇整抗争者的「职业图鑑[2]」获得很大的迴响，图鑑中列出回应当下运动发展和需要的「职业类别」，鼓励示威者找到自己适合的角色，发挥所长参与其中。

「反修例」示威者的主动性和参与感都很高，时刻留心运动需要、不断思考「还可以为运动做些什么？」，也正因为数量可观的群众高度参与其中，没有「大台」可以「控制」运动的发展方向。

需要釐清的是，「无大台」并不代表完全没有网络和组织的参与。在运动中，政党和社运团体作为「其中一个参与者」提供合法身份和支援，例如申请「游行不反对通知书」搭建平台开放予群众。在运动发展持续数个月后，部份抗争者在持续参与的过程中，和原先认识或者不认识的「同路人」发展出大量的微型网络，再后来一些网络在职场和社区落地生根。这些网络在不同的位置参与运动，网络间也发展出一定的协调和连结，然而大抵是「去中心化」和鬆散的。在所有团体或个人都不能够代表大部分人意志的情况下，「无大台」成为了运动参与者的行动宗旨，没有任何组织和网络能发挥领导角色，终究是以自发行动为主。

1. 张洁平，〈49 天，香港反送中运动如何来到临界点？〉，Matters，2019 年 7 月 27 日。
2. 〈香城 ONLINE 连登职业图鑑〉，连登，2019 年 10 月 14 日。

1.


2.


1
/
▸ 1.1
/
1.2
/
1.3





職業圖鑑目錄

✅ Blackbloc
1. 誅狗者
2. 魔法師
3. 消防員
4. 控場師
5. 結界師
6. 物資兵
7. 天氣之子
8. 神獸召喚師
9. 裝修師傅
10. 畫家

❌ Blackbloc
11. 哨兵
12. 醫療兵
13. 文宣兵
14. 文宣設計師
15. 技術支援師
16. 校巴司機
17. 家長
18. 軍火商
19. 清算師
20. 鍵盤戰士

特別鳴謝：記者、醫護人員、義務律師、銀髮族









































(图片取自：连登)

1.2 - 「不分化、不割席、不笃灰」；「兄弟爬山，各自努力」

/

参与「反修例」的群众规模是前所未见的，据估算高达 345 万人。在高度群众自发的情况下，示威者又如何处理运动中出现的分歧呢？

在「雨伞运动」中后期，不同政治光谱的示威者间出现怪责、指骂和分化，「和理非」和激进示威者割席；激进示威者攻击「泛民」和「左胶」。在「反修例」运动中，一方面，当大规模和平示威未能令政府退让寸步，反遭受前所未有的严峻打压，警暴的经歷和对政府的不信任促成示威者阵营的连结和团结；另一方面，示威者有意避免重蹈覆彻，于是摸索能让抗争者团结抗争的协作型态。在这个脉络下，「不分化、不割席、不督灰」[1] 和「兄弟爬山，各自努力」的概念被示威者广泛接受。

「不分化、不割席、不笃灰」指的是在抗争者阵营内部，示威者即使对个别行动有不同的意见，也不会与对方划清界线、不向警方指证而是保持团结。而「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则是指在共同的运动目标下，示威者强调要包容不同的抗争路线，让采取不同运动策略的抗争者有空间「各自努力」。

1. 不割席，故名思义是「不割席绝交」的简称，意指即使行动上不尽同意也不会与对方划清界线；不笃灰则是指不向警方指证这些人的行为。

这两套口号最初主要是处理「和理非」和「勇武」抗争手法的路线分歧，及后引申到运动中所有的路线分歧，一旦示威者提出的抗争路线获得群众响应就可以各自行动，因此出现多元并存的抗争方式，例如和平游行示威和衝击行动交替出现、「不合作运动」瘫痪交通、组织工会等。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反修例」运动的抗争者拒绝「大台」的代表，但并不像「占领华尔街」等运动，以「直接民主」和共识决策取而代之。在「反修例」运动中，示威者少有长时间的聚集，就运动目标或策略讨论并寻求共识。在这两套口号下，示威者倾向在对运动诉求和大方向有共识后，在不处理分歧的情况下「各自努力」，众参与者则以个人化的方式投身自己认同的运动路线。






（图片取自：反送中文宣谷）

1.3 - 「和勇不分，齐上齐落」

/

1
/
1.1
/
1.2
/
▶ **1.3**

在各种运动路线的分歧中，由 2010 年代起，「和理非」和「勇武」这两种抗争手法之间的张力成为焦点争议之一。

「和理非」是「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简称，是 1980 年代以降主流政党和民运团体提倡的行动原则。而「勇武」则是由激进本土派在 2010 年代开始提倡的路线，旨在一反当时以和平游行和议会议政为主的民运范式。在 2016 年「旺角事件」中，示威者和警察出现肢体碰撞、扔掷和燃烧杂物，被视为标志性的「勇武派」行动。

在「反修例」运动前，「和理非」和「勇武」被视为两种相互矛盾的政治立场和行动取向：「和理非」抗争者坚持「非暴力」的原则，认为任何的衝击行动会失去社会大众的支持；「勇武」抗争者摒弃旧有的游行和静坐模式，并且主张与警方武力抵抗。在 2019 年的「反修例」运动中，「和理非」和「勇武」抗争者的关係出现变化，由政治路线的分歧，变作示威者在运动中的不同分工。随着警队的暴力镇压，抗争者阵营普遍认为「和理非」的「公民抗命 [1]」手段已无法回应当下的打压。

1. 由学者戴耀廷主力在港提倡的抗争方式，旨在透过不抵抗警方武力，唤起香港和国际社会关注，削弱政权的正当性。

在 2019 年 7 月 1 日的「立法会衝击事件」中，数十位示威者赶在警方清场前，重返议事厅带走留守的「勇武」示威者。当被问及清场死线在即，是否担心自己会无法离开，受访示威者哽咽地说道：「每个人都害怕，但更害怕明天见不到他们四个，所以我们才一起进来，一起走。」翌日该视频被广泛流传，获得很大的迴响，也奠定了示威者「齐上齐落」的团结共识。



占领立法会的示威者在柱子上留下「是你教我和平示威是没有用的」涂鸦。（图片取自：立场新闻）





示威者将立法会清场前一起撤离的时刻画作文宣，访谈和视频见二维码。（图片取自：反送中文宣谷）



以「和勇不分」为主题的文宣（图片取自：反送中文宣谷）

「和理非」和「勇武」抗争者在面对警暴的共同经歷下，发展出强韧的情感连结，在 2019 年下半年，示威者对于激进抗争手法的认同显着增加。认为「抗争者採取激烈行动是可以理解的」的比例，在 7 月 21 日之后稳定高于九成，10 月底更达至 97.5%。当极高比例的示威者都认同「勇武」抗争，就算「和理非」不参与衝击行动，也不会阻止或向警方指证，更在示威现场发展出各种策略达至「和勇不分，齐上齐落」。

在装备精良的警队和掌握政治检控权的政权面前，「勇武抗争」无法实际上撼动政权，但「勇武」示威者不畏镇压、以激进行动抵抗的决心在很大程度上感召其他示威者。占大多数的「和理非」示威者尽管不参与衝击，也积极探索在街头衝击以外对政府施压的方式，高度投身在后勤网络和被捕人士支援、罢工、选举、社区网络、黄色经济圈等，也希望分担「勇武」示威者的风险和减少牺牲。这些抗争路线之间产生连结联动、相辅相成。在 2019 年 11 月之后，激进的街头抗争在碾压式的镇压下遭遇瓶颈，过去被认为是「和理非」的新工会、区议会、「黄色经济圈」等抗争路线也逐渐发展成熟，替补街头而上，成为 2020 年延续运动的主要阵地。

与此同时，在日趋严峻的政治打压之下，任何运动参与面对的风险骤升，「和理非」和「勇武」的标籤越来越无法准确描述当前示威者的光谱和参与。例如：过往做连侬墙被视为「和理非」的任务，然而随着打压的日趋严峻，袭击、滥捕的案例频传；过去议员被认为站在较安全的运动位置，然而在「反修例」中大量议员被捕、面对严厉的政治检控。在《国安法》实施后，抵抗的前线推移到日常生活各个方面，以任何形式继续抗争都需要克服很大的恐惧，「和理非」和「勇武」的区分不再明显。

2 - 「新媒体平台」：群众沟通的载体

/

2.1 - 运动中的新媒体平台

/

2
/
▶ 2.1
/
2.2
/
2.3
/
2.4
/
2.5

在「反修例」运动中，群众的规模前所未有。没有「大台」也没有既存的组织基础，新媒体在短时间内接触大量群众、即时集散资讯、可以隐藏身份的特性在运动中起到重要的作用，成为无数示威者建立连结和参与的起点。

在 2019 年下半年频繁的街头行动中，「新媒体平台」是传播运动资讯和行动号召的重要媒介，令不涉及正规组织的群众动员成为可能，在短时间内大大增加行动规模。自 2019 年 8 月开始，警方频繁用「反对通知书」将示威游行列为「非法」，更多的示威者开始蒙面。同时，出现卧底警员开始在示威现场伏击拘捕示威者。在执法机关的搜捕及渗透下，不相识的示威者间难以在亲身交流中建立信任，而「连登」和「电报」可以隐藏身份的特性，成为乘载大量微型网络的虚拟空间，使互不相识的群众在既有的社会网络外有匿名讨论、分享资讯及共同行动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在 2019 年的运动中，广场不再重要，在城市游击战中聚散的地点不断变迁，示威者迫切需要信息以作出判断和行动，而「新媒体平台」令即时资讯的搜集和传播变得可能，成为街头行动的重要资讯来源。

在 2019 年运动中，在网上新闻媒体和常见的社交媒体之外，「连登」和「电报」在运动中脱颖而出，成为示威者接受运动资讯的重要平台，下面我们分别介绍。

示威者接收运动资讯的渠道

示威日期	传统媒体（例如报纸、电视等）	网上新闻媒体（例如立场新闻、独媒）	脸书	电报	网上讨论区（例如连登）
6月26日	44.5%	89.0%	79.4%	51.0%	73.9%
7月1日	61.3%	83.4%	77.9%	31.9%	55.2%
7月14日	59.3%	87.9%	81.1%	42.4%	66.9%
7月21日	59.1%	87.7%	79.7%	42.1%	64.5%
7月27日	60.4%	96.2%	90.2%	55.3%	76.6%
8月4日（将军澳）	61.1%	95.4%	87.8%	55.5%	75.0%
8月4日（西环）	62.2%	96.3%	85.8%	58.3%	75.0%
8月10日	56.0%	97.4%	87.9%	62.8%	83.3%
8月11日	55.4%	95.2%	85.8%	62.9%	80.2%
8月13日	63.1%	96.7%	82.9%	68.5%	87.4%
8月16日	50.6%	96.8%	87.2%	75.9%	86.2%
8月18日	61.2%	95.0%	84.6%	57.3%	74.4%
8月25日	61.3%	95.7%	86.0%	63.4%	73.1%
8月31日	60.3%	96.4%	84.4%	67.0%	82.5%
9月8日	52.2%	95.5%	86.4%	65.0%	81.0%
9月15日	58.6%	96.8%	85.9%	71.1%	81.3%
9月28日	58.0%	97.3%	85.7%	65.4%	72.3%
10月1日	60.8%	95.8%	86.3%	60.0%	69.5%
10月14日	57.4%	97.1%	89.3%	76.3%	76.1%
10月20日	59.3%	97.3%	84.8%	66.0%	77.3%
12月8日	58.2%	94.5%	79.2%	72.8%	73.9%

数据取自：香港中文大学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香港反修例运动中的民意状况研究报告》，2020 年 5 月。

问题：你有几经常透过以下平台接收关于今次运动的资讯？
註：表中显示「颇多」和「经常」合计的百分比

2.2 - 「连登」：运动策略和行动方案的集散地

/

2
/
2.1
/
▶ 2.2
/
2.3
/
2.4
/
2.5

「连登」全名「LIHKG 讨论区」，在 2019 年的运动之前已经是全香港最多用户使用的讨论区，设有时事、科技、生活资讯、兴趣等数个板块，供网友讨论话题。在 2019 年 5 月，不少连登用户在讨论区指出《逃犯条例》修订草案的问题及提出行动方案，逐渐在示威者间受到欢迎。在 2019 年下半年，「连登」在示威者间的使用率稳定维持在七成以上。

在示威游行前后，网民在「连登」发佈大量帖文讨论行动策略，凝聚对于运动方向的共识。在连登上大家都只有一个用户名，许多行动的发起人是没有任何政治背景和往绩的素人，但只要理据清晰能够说服群众，就能得到支持。网民不时利用「正负评」的功能，对不同的运动策略和行动方案进行投票，令连登成为了解运动趋势的重要平台。

在运动期间，「连登」的许多讨论不仅是「键盘战士」间的閒扯，在网民提出行动方案后，受欢迎的方案获得同路人的响应，甚至组成义务工作团队将其付诸实现。5 月底，有连登用户撰文号召在全港各区摆街站宣传反修例，超过 200 位网民响应 [1]。

6 月底，在 G20 高峰会举办前，有网友提议众筹登报，于一日之内募集高达港币 673 万元，并成功在各大国际媒体刊出精美的视觉设计和香港示威者给国际社会的公开信。8 月底，网民更在「连登」组成数十人的政治联盟，分散至观塘、南区、深水埗区投身参选区议会选举 [2]。

1.《连登仔全球登报行动 众筹超额逾倍完成 将于纽时 FT 朝日等最少 9 国媒体刊出》，《立场新闻》，2019 年 6 月 26 日。

2.〈「连登仔」组平台拟参选区议会〉，《NOW 新闻》，2019 年 8 月 22 日。



2019 年香港的民间力量空前爆发，以各种形式反抗港共政府的打压（图片取自：反送中文宣群组）

1.
2.


2.3 - 「电报」：群众外包和匿名协作的空间

/

2
/
2.1
/
2.2
/
▶ 2.3
/
2.4
/
2.5

「电报」(Telegram) 是结合「信息发佈」和「即时通讯」的媒体平台，在「反修例」运动中，被示威者广泛使用。示威者用「**频道**」的功能大规模搜集和发佈信息，在「**群组**」里匿名通讯。

「电报」频道不只是编辑团队单向发佈资讯和动员的渠道，而是「群众外包（crowd-sourcing）」的互动平台。「电报」频道除了需要编辑团队搜罗资讯，也很大程度上倚赖其他示威者匿名提供的资讯、资源、服务，才得以运作。在数个月的运动发展后，固然出现特别有影响力的「电报」频道，但因为其「群众外包」、任何人都可以架设新频道的特性，个别频道难以垄断运动方向和论述。

在 2019 年 6 月中的「包围立法会行动」前，示威者为动员群众上街和共享示威现场消息，成立数个「电报」频道和「公海」[1]。而后在持续数个月的示威浪潮中，数百个支援「街头行动」的「电报」频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 2019 年年底，随着黄色经济圈和各界别工会蓬勃发展，推广黄色经济圈和发放工会资讯的「电报」频道也纷纷成立。

1. 任何人都可以进入的大型群组

「电报」群组可以隐去个人电话号码、容易更改帐户名的特性，令其成为示威者以小组形式合作时经常使用的平台。在运动中，参与文宣、前线急救、哨兵的示威者在「电报」工作群组共作，许多示威者不知道彼此的背景、职业或真实姓名，却在线上紧密合作长达数个月。另外，当组织者举办涉及风险较低的大型活动，亦经常透过频道和公海公开招募人手，例如：游行示威的纠察、人链的协调义工，再将义工加入一次性的大群组分派当天的任务和进行协调。

2.4 - 政府的监控和打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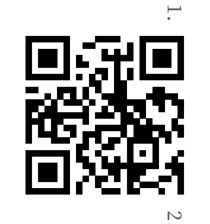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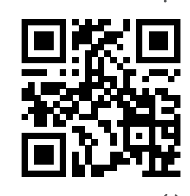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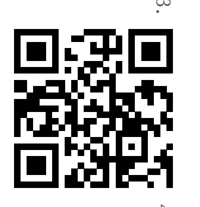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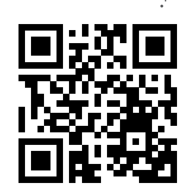
/

当大量的运动动员和参与在「新媒体平台」发生，网络媒体平台也成为政府重点监控和打压的目标。

被捕示威者被警方施以虐打酷刑，并胁迫交出手机密码的案例层出不穷。在 2019 年的示威高峰期，警方曾将大量被捕人士的手机集中扣留于警察总部，再申请搜查令「搜查自己的办公室」，规避跟从逐个被捕人士申请入屋搜查的程序，直接存取被捕人士的电子资料[1]。2020 年 4 月，上诉法庭就「民阵手机案」裁定警方上诉成功，指警方可以「保留证据」、「保障任何人的人身安全」为由，在无搜查令下搜查被捕人手机。

警方也拘捕和政治检控多个「电报」频道和群组的管理员以製造白色恐怖。在 2019 年 6 月中的「包围立法会行动」前夕，大型群组「【公海总谷】611 二读求助、讨论、情报交流区」的管理员，被警方以「串谋公众妨扰」罪名上门拘捕，更在警方要求下解锁手机并匯出群组成员名单[2]。2020 年年初，首名「电报」群组管理员因群组内的信息，被控「煽惑他人纵火」及「煽惑他人伤人罪」，被判囚 3 年[3]。另一「电报」频道管理员因发佈鼓励瘫痪交通的消息，被控「煽惑他人犯公众妨扰罪」等罪行，警方更删除频道所有内容，并发佈「此频道载有煽动刊物」等通告阻吓订阅者[4]。

1. 〈警获手令查警总内多名被捕人手机　摄影师入廪质疑滥用程序监控〉，《众新闻》，2020 年 1 月 14 日。
2. 〈逾万成员交流抗争资讯　Telegram「公海总谷」管理员　涉公众妨扰被捕〉，《立场新闻》，2019 年 6 月 12 日。
3. 〈反修例运动首名 TG 管理员认两煽惑罪　判囚 3 年　官：短时间内能煽惑多人　后果严重〉，《立场新闻》，2021 年 4 月 20 日。
4. 〈被指「开挂之达人」TG 管理员涉煽惑伤人等罪　控方指讯息提及 300 万可疑款项〉，《立场新闻》，2020 年 5 月 25 日。

1.

2.

3.

4.


2.5 - 「新媒体平台」的侷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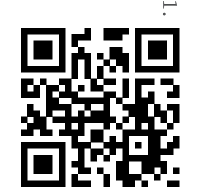
/

尽管「新媒体平台」因回应运动中的切实需要而冒起，在运动初期起到重要的作用，但也存在一些侷限。

「新媒体平台」看似是开放的，任何人只要有网络就能参与，大为降低动员和参与的成本，但事实上难以接触到不熟悉科技使用和阅读习惯不同的市民。调研發现，较年长、教育程度和收入较低、支持建制的市民依赖传统媒体接受资讯；较年轻、教育程度和收入较高、支持运动的市民，则倾向从社交媒体、「连登」、「电报」接收资讯。在运动早期，抗争者在日常生活中的公共空间开闢连侬牆、街站，使资讯可以突破同温层，然而随着运动的發展，实体空间的资讯传播和讨论在政治打压下出现收缩。

另一方面，在「反修例」运动中，抗争者阵营对政府对一些重要事件的定调和事实有所怀疑（例如：8 月 31 日在太子地铁站警方是否打死人？），然而因政府未能公佈更多资讯，开放公民监察，这些事件的真相无法核实。于是我们见到支持运动和反对运动的阵营对于运动事件有截然不同的「事实材料」，并在各自的社群媒体中传播，不同阵营的市民利用「新媒体平台」，在同质性较高的私人网络内传送和自己态度一致的讯息，而这些新媒体网络社群不用向更广大的群众问责，也容易成为传播谣言和假新闻的载体[1]。

1. 香港中文大学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香港反修例运动中的民意状况研究报告》，2020 年 5 月。

1.


2
/
2.1
/
2.2
/
2.3
/
2.4
/
▶ 2.5

尽管「新媒体平台」能快速且大规模地连结群众，但政府的情报人员也容易渗透，示威者若要靠线上互动建立信任的关係并不容易。大部分的线上共作以具体的行动和事件为核心，参与者素未谋面，在用户名之外对彼此一无所知，当一个示威者在群组裡不再活跃、甚至註销帐号，其他人无法判断他是不想再参与、遭遇困难、还是已经被捕？另一方面，新媒体平台的平台特性始终难以乘载直接的民主讨论和共同决策，当抗争者用「新媒体平台」动员行动，每个人只能决定自己如何行动，难以对响应的人数有预算、无法取得集体的共识。例如：有效的罢工难以透过新媒体平台發生；而当运动的热度减退，少数响应网络示威号召的抗争者则曝露在较大的风险中。

在 2020 年，当街头示威和动员的政治事件减少、网上言论受到严厉的打压和清算，示威者在「连登」和「电报」的活跃程度下降。「新媒体平台」的重要性下降，有部分的网络因此消散。但也有部分的网络在长时间的线上协作后，累积足够的信任，更愿意以真实的身份在现实生活中见面相处、更紧密的合作。当「反修例运动」迈向下一个阶段，在社区、职场、黄色经济圈中生根，这些新的「战线」则取代「新媒体平台」，成为乘载网络和连结群众的实体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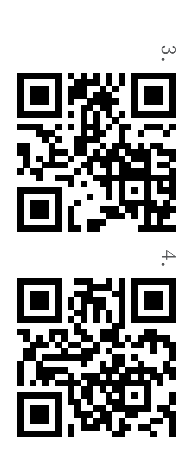
延伸阅读

1. Francis Lee (2020) Solidarity in the Anti-Extradition Bill movement in Hong Kong, Critical Asian Studies, 52:1, 18-32, DOI: 10.1080/14672715.2020.1700629

2. Francis L. F. Lee, Hai Liang, Edmund W. Cheng, Gary K. Y. Tang & Samson Yuen (2021) Affordances, movement dynamics, and a centralized digital communication platform in a networked movement,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DOI: 10.1080/1369118X.2021.1877772

3. 〈【连登动员 · 上】专访「我要揽炒」真身：香港人未放弃，我们也不放弃〉，《立场新闻》，2019 年 7 月 19 日。

4. 〈连登仔大爆发：「9up」中议政，他们「讲得出做得到」〉，《端传媒》，2019 年 6 月 28 日。



抗争在街头

STRUGGLES ON THE STREET



「街头抗争」是「反修例」运动的第一条战线。在 2019 年下半年，「街头抗争」作为重要的「事件」，是数以万计的群众直接反抗、团结试炼合作及发展支援网络的场域，也在抗争者间创造共同的经验和集体连结。示威者在街头抗争中所付出的代价是巨大且沉重的，成千上万的人们因此失去健康、生命和自由。然而，大规模的示威令抗争的能量在公共空间里持续可见，也驱使更多群众投身运动，并开拓其他「战线」对政权施压。在 2020 年，当街头运动的推进遇到困难，这些在街头行动驱使下涌现的战线（后勤支援网络、被捕人士支援、工会线、国际线、议会线）递补而上。

在「反修例运动」中，官方叙事将示威者描绘成破坏香港的「暴徒」，却避而不谈政权和警队挟庞大的资源、高强度的武力暴力镇压示威。在第一部分，我们整理政权的暴力镇压、酷刑、性暴力、大规模的滥捕及被纵容的法外暴力。在第二部分则介绍示威者在镇压下所发展出的街头抗争策略和示威形态，包括大型和平示威、激进化的衝击行动、阻碍城市运作的游击堵路、「私了」、「装修」、社区快闪表态行动等。

前页图片取自：Studio Incendo（上）、Anthony Kwan/Getty Images（下）。

1 - 政权的暴力镇压

/

在「反修例」运动中，政府用各种政治宣传指控示威者为「暴徒」，正当化政权对暴力的使用，并将暴力用作打压运动的工具。政府和警队挟庞大的资源以武力和司法检控打压示威，以製造恐惧，吓阻抗争者继续抗争。警队不但以致命的武力镇压示威者，也发出「反对通知书」打压集会游行自由、再大规模拘捕和检控示威者；当建制支持者频繁袭击示威者，但警队和律政司坐视不理、包庇轻放。政权的暴力非但没有「止暴制乱」，反令政府和警队失去治理的正当性，促使示威的手法激进化。

1.1 - 武力镇压、酷刑、性暴力

/

在「雨伞运动」中，警方共发出 87 发催泪弹；在「反修例」运动中，警方却发出 15,732 发催泪弹、9,991 发橡胶子弹，1,996 发布袋弹、1,830 发海绵弹、19 发实弹，总数接近 3 万发；更引入水炮车和震撼弹。

事实上，全副武装的警队就算面对示威者的「最高武力」（抛掷杂物、砖头、着火的玻璃瓶）人身安全也丝毫不受威胁，但却向示威者发射大量致命的海绵弹、橡胶子弹、布袋弹，造成无法回復的身体伤害，有救护员和记者因此永久失去视力。在逮捕过程中，大量示威者已经被制服，仍被暴力殴打，至少百名被告因伤缺席首次聆讯，伤势包括脑部受伤、多处肿胀瘀伤、暂时失去听力或视力、骨折骨碎等[1]。根据公立医院的统计资料，至少有 2,633 人在 2019 年的运动期间因参与公众活动受伤到急症室求诊（因警队频频在医院逮捕伤者，示威者转向民间医疗网络寻求医治，因此该统计仅是实际伤者数字的冰山一角）。

1. 〈【反送中运动】至少百名被告因伤缺席首次聆讯 20 人投诉遭警殴有明显伤势 8 人被打至骨折〉，《立场新闻》，2020 年 3 月 13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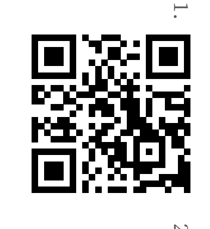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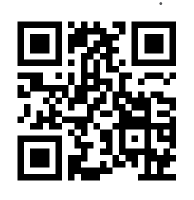
1.


在示威现场之外，大量针对被捕者的酷刑和性暴力在警署搜查室及扣留所的暗角发生。国际特赦组织收集的报告搜集来自被捕人士、律师、医护人员的证词，揭露警方毒打虐待、用雷射笔直射被捕人士眼球等构成酷刑的报復暴力行为。在运动期间，示威者被要求全裸搜身[1]、遭警方拍打胸部和私处、性侵、性暴力的案件[2]层出不穷。根据民间自发架设的「香港警察滥权实录资料库」，资料库截至2020年年中已搜集约1,700宗警暴案例供公众分类检索。


2019年9月29日，在采访「全球反极权大游行」期间，记者 Veby Mega Indah 右眼中弹失明。Veby 入禀高院要求警方交出涉事警员资料以提起民事诉讼，但困难重重。[3]（图片取自：立场新闻）


2019年8月11日，急救员K近距离被布袋弹射中，她的右眼球、眼眶骨、鼻骨爆裂，右眼失去视力。[4]（图片取自：法新社）

1. 被捕女示威者遭全裸搜身 警署房间有窗 律师：控罪不涉毒品，做法不合逻辑〉，《众新闻》，2019年8月23日。
2.〈中大女生除口罩 哭诉被捕学生新屋岭遭警察性暴力、性侵〉，《众新闻》，2019年10月11日。

1.

2.

3.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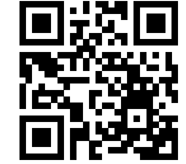

1
/
▶ 1.1
/
1.2
/
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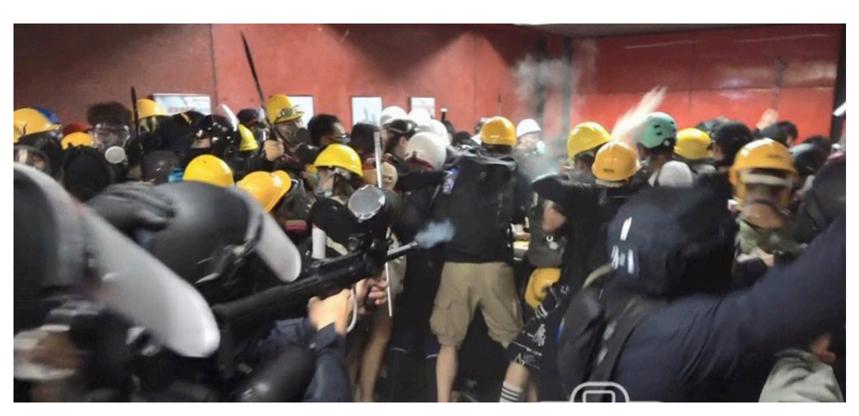
在「反修例」运动中，绝大部分的警暴受害者并没有办法讨回公道，不仅现有的投诉机制存在结构性的限制，有案在身的示威者迫于压力难以发声、市民也担心因追究警暴反被检控。在现有机制下，市民只能向「投诉警察课」投诉，再由「监警会」审核由该部门提交的调查报告。但因「投诉警察课」隶属警队，「监警会」亦没有调查权和惩处权，投诉的效用存疑[1]。在过去十年来，仅一成投诉被「证明属实」、涉事警员往往仅受到训谕或警告，只有一名员警受到刑事检控。若市民自行循民事途径申索或者提交司法覆核，不仅需耗费大量时间和金钱，因警员没有佩戴识别编号、蒙面隐藏身份，市民在蒐证和咎责的过程中困难重重。在「反修例」运动中，没有一位警员为示威期间的暴力被刑事起诉[2]。

1.〈当市民面对酷刑或不人道待遇……〉，「国际特赦组织」，2019年12月10日。

2.〈监警会去年接近 1500 宗须匯报投诉 仅 57 项指控获证实 无殴打、捏造证据及恐吓投诉成立〉，《立场新闻》，2020年12月9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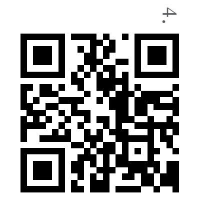
1.


2.






3.


4.


2019 年 8 月 11 日，警方在铜锣湾将示威者以头按地殴打，在伤口上喷胡椒喷雾。示威者的伤口剧烈疼痛、失去两只门牙、眼皮和鼻的伤口都要以针缝合。同日，警方在太古地铁站内以胡椒球近距离扫射欲离开的示威者。警暴短视频[3]及相关报导[4]见二维码。（上图取自中央社；下图取自苹果）

1
/
▶ **1.1**
/
1.2
/
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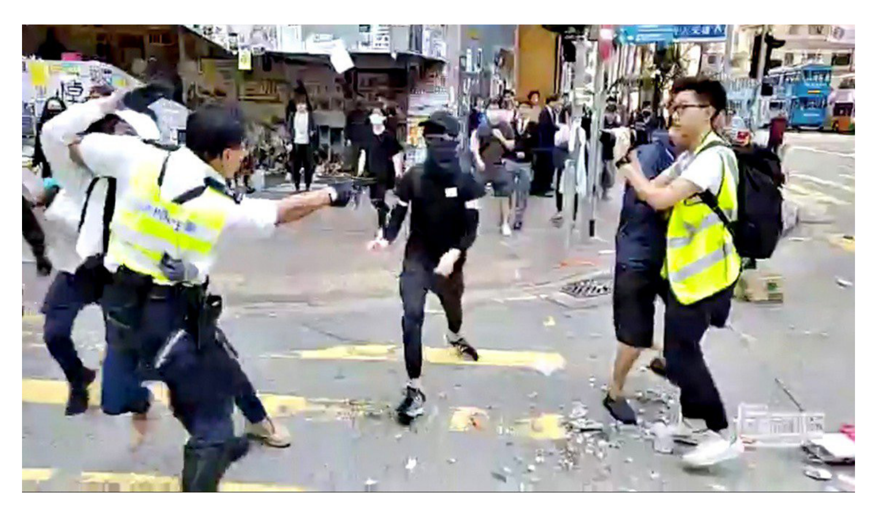




1.


2.


2019 年 8 月 31 日，警方衝入太子地铁站月台殴打市民。在「831 事件」中被殴打的中学生 Ken 在明报的访谈中表示自己当时身穿白色上衣、没有佩戴口罩或携带装备在车厢内，却有约 10 名警员从背后用警棍殴打他。Ken 随后被送医治疗并留医 9 日，验伤时发现左肩血肿，左大腿、左膝盖、左小腿严重瘀血；头部穿三洞，需缝 14 针。他提到：「洗伤口时剧痛无比，一辈子都难以忘怀，不明白为何自己如此年轻便要承受这些痛楚。」警暴短视频及访谈见二维码 [2]。（图片取自：明报）





3.


4.


2019 年 11 月 11 日，西湾河有示威者堵路，遭交通警近距离以实弹射击。示威者一度危殆，最终须将切除部分右肝、整个右肾。
警暴短视频 [3] 及相关报导 [4] 见二维码。（图片取自：丘品新闻）

1.2 - 大规模逮捕和检控

/

1
/
1.1
/
▶ 1.2
/
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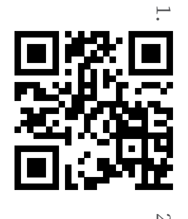
一直以来，沿用殖民时期的恶法，香港的《公安条例》对集会游行自由有很大的限制，超过一定人数的示威须事先提交路线和时间，在警务处处长的「不反对通知书」确认下进行，否则可能被控最高刑期五年的「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另外，「暴动罪」的罪行定义非常宽鬆、最高却可监禁 10 年。根据「公安条例」第 19 条，当参与的集会被视为「非法集结」；而参与该集会的人士破坏社会安宁，则构成「暴动」。换言之，只要示威者所参与的「非法集结」当中有人「破坏社会安宁」，则法官可能在考虑整体暴力程度后控告在场人士干犯「暴动罪」。

在「反修例」运动中，警方经常对示威发出「反对通知书」，再在示威现场进行大规模围捕，在 2019 年的 6 月至 11 月，单月被逮捕人数急剧上升，由 73 人增加至 2,899 人。在过去，特区政府并不严格执行对示威活动的法律限制，因这些殖民恶法被定罪的案例不多，在 2003 年至 2014 年的 5,529 次公众活动中，只有 16 名示威者被起诉，然而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警方在「反修例」运动中，拘捕 9,216 人、1,972 人被起诉。被捕示威者须面对漫长的司法程序、宵禁、潜在的刑期，变相阻吓示威者继续参与运动。

整体而言，「反修例」运动示威者的控罪较「雨伞运动」示威者严重许多，在「雨伞运动」中，判刑最长的占中三子入狱 16 个月，在「反修例」运动中，共 653 名被捕人士被控最高刑期 10 年的「暴动罪」，占所有控罪比例最高。示威者冼嘉豪因在 612 包围立法会行动中向警方防线投掷头盔、雪糕筒和雨伞等杂物，量刑起点 6 年，在认罪后减刑三分之一，判囚 4 年，成为首名被以「暴动罪」判刑的示威者 [1]。

另一方面，和平示威也获严厉的判刑，例如：在 2019 年以前，未经批准集结案例大多仅判处罚款，但在 2019 年 8 月 18 日参与和平游行的 9 月民主派人士被裁定组织及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罪成、判处 8 至 18 个月的刑期 [2]。律政司多次以裁判官判刑过轻为由提出刑期覆核，2020 年已审结的覆核申请全数成功加重刑期 [3]。

1.〈律政司刑期覆核暂全胜 9 人变监禁 反修例案 18 人加刑 近半未成年〉，《明报》，2021 年 3 月 24 日。
2.〈【6.12 金钟衝突】21 岁救生员认罪 首名反修例示威者承认参与暴动〉，《立场新闻》，2020 年 5 月 4 日。
3.〈【特写】818 案庭内：一个个白髮苍苍的被告 一次令人错愕的严厉判刑〉，《立场新闻》，2021 年 4 月 16 日。

1.

2.

3.


「雨伞运动」和「反修例」运动被捕人数和罪名概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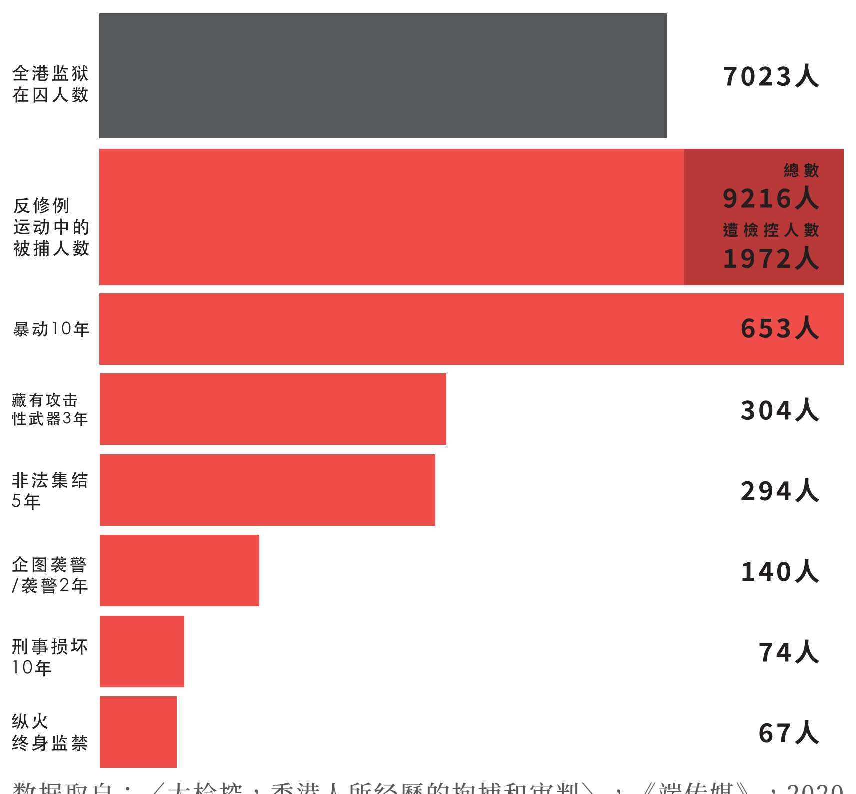
	雨伞运动	反修例运动
被捕人数	1,003人	9,216人
被控罪名及最高刑期	被捕人士大多被控袭警（2年）、妨碍警务人员执行职务（2年）、非法集结（5年）等罪名。	最多被捕人士被控告的前三项罪名为暴动（10年）、藏有攻击性武器（3年）和非法集结（5年）。截至2020年6月共有653人被控暴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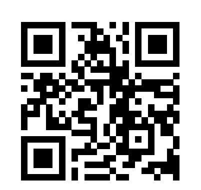


「雨伞运动」的统计数据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反修例」运动的数据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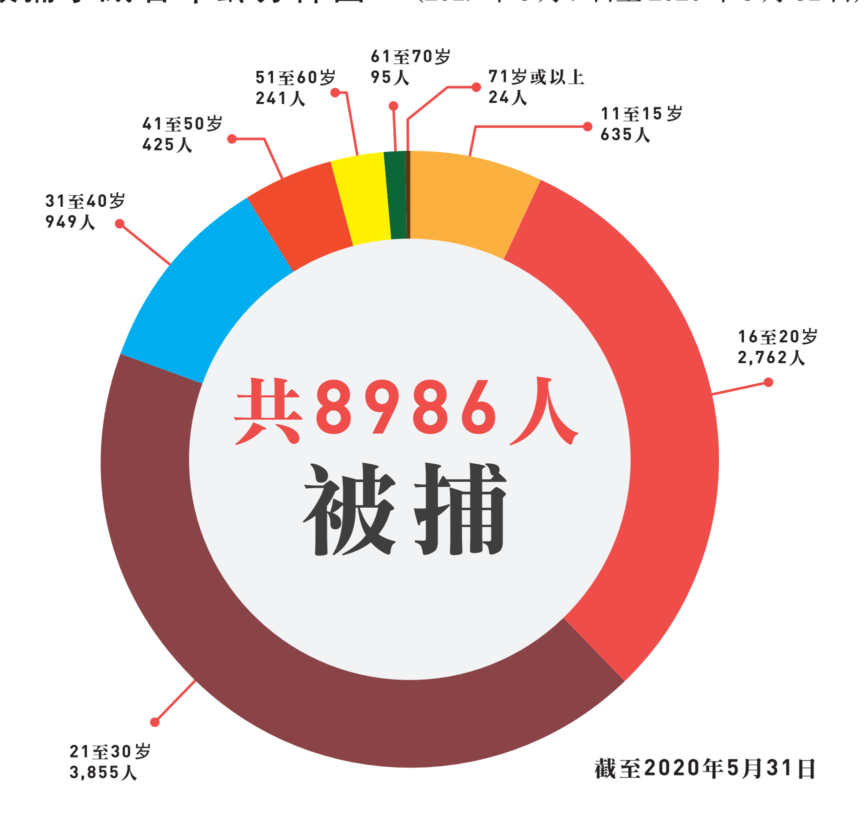






数据取自：〈大检控，香港人所经歷的拘捕和审判〉，《端传媒》，2020年7月24日。

被捕示威者年龄分佈图 （2019年6月9日至2020年5月31日）



1.3 - 「法外暴力」

/

1
/
1.1
/
1.2
/
▶ 1.3

在运动期间，除了来自政权的直接打压，示威者、连侬墙和街站义工、游行申请人、区议会候选人屡受建制支持者的暴力攻击。在 7 月 21 日，元朗白衫人无差别袭击市民和示威者；有社团背景的亲建制人士数次携带武器高调在北角和荃湾集结；8 月 7 日，蓝衣人在荃湾持刀施袭示威者；8 月 20 日，将军澳连侬墙义工被利刃刺伤送院 [1]；10 月 19 日，青年在连侬墙派发传单被袭，腹部中刀重伤等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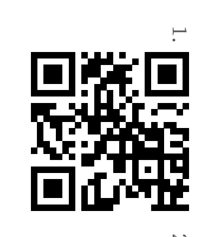
在这些不胜其数的袭击案件中，警方、律政司、法官经常维护施袭者（律政司介入撤控深水埗撞示威者司机；法官称讚连侬墙斩人者「情操高尚」[3]）。在「721 事件」中被白衫人袭击、向警方报案的林卓廷在事隔一年后被以「涉嫌参与暴动」逮捕。这些建制施袭者不被咎责，受袭者反被政治打压的案例是示威者随后发展出「私了」的重要背景。





在 2019 年的区议会选举之前，数个非建制派候选人受暴力袭击。岑子杰在宣佈参选区议会后，遭铁槌攻击头部致大量出血，非建制派候选人联署谴责暴力袭击。声明全文见二维码。（图片取自：立场新闻）

1. 〈【连侬墙斩人案判词】女记者被牛肉刀袭击至少 5 次 患创伤压力症申搬迁〉，《众新闻》，2020 年 4 月 27 日。
2. 〈19 岁青年大埔派游行传单遇袭 腹部中刀见肠情况严重 22 岁内地刀手被捕〉，《立场新闻》，2019 年 10 月 19 日。
3. 〈【连侬墙斩人】法官讚囚徒「情操高尚」律政司决定不申请覆核刑期〉，《立场新闻》，2020 年 5 月 18 日。

1.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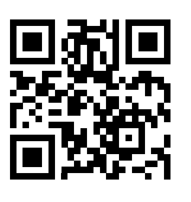
3.






2019 年 7 月 21 日，过百名白衫人在元朗聚集并无差别袭击市民，共 45 人受伤。其中，传媒人柳俊江被袭击，身上多处瘀伤、头部和手脚需缝针。（图片取自：小丽民主教室片段截图、法新社）

香港电台「铿锵集」製作「721 元朗黑夜」节目还原真相（2019 年 7 月 30 日）。



香港电台「铿锵集」製作「721 谁主真相」节目追查检控情况（2020 年 7 月 13 日）。



2 - 抗争者的街头示威

/

在「反修例」之初，多达 100 万、200 万的示威者和平示威要求撤回修例草案，但政府拒绝作出让步并强硬镇压示威。在 7 月 1 日，示威者衝击立法会占领议事厅，揭开激进抗争范式的序幕。在 2019 年的 7 月至 11 月间，警队和政府对示威的打压未有平息示威，更促使抗争「激进化」。在「反修例」运动中，持续的大规模和平集会游行和激进化衝击相互补足、交替出现。示威者持续举办大型和平游行；部分示威者则用游击堵路、衝击、「装修」、「私了」回应暴力镇压、提高管治成本和造成经济损失向政府施压。因「反修例」示威者普遍认同激进抗争手法，「和理非」和「勇武」示威者各自发起行动，却又「齐上齐落」。

「反修例」示威以「遍地开花」和「Be Water[1]」为特性。「遍地开花」指的是示威在地理空间上的「去中心化」，在 2019 年 7 月由港岛的政经中心扩张至九龙和新界各区，再进入各个社区。「Be Water」指的是示威不被固定型态所框限、灵活应变且不断流动。当警方「反对」游行申请、暂停提供大众运输服务，市民在网络上发起不事先申请、不按固定路线的游击游行示威、在主要干道堵路瘫痪交通、在社区快闪表态。在 2019 年年底大学抗争的强硬镇压后，大型示威和衝突性的行动难以发生，社区快闪表态行动则成为示威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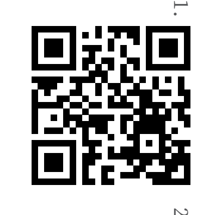
1. 意即「如水」，出自李小龙的名句：「Empty your mind, be formless, shapeless, like water. Put water into a cup. Becomes the cup. Put water into a teapot. Becomes the teapot. Water can flow or creep or drip or crash. Be water my friend.」

▶ 2
/
2.1
/
2.2
/
2.3
/
2.4
/
2.5
/
2.5.1
/
2.5.2
/
2.5.3

在公共空间做出政治事件表态的重要方式。直到2020年年中，在疫情和政治打压下，社区表态行动也因参与人数大幅减少而逐渐式微。

街头抗争不仅是公共表态，也是群众实践抗争的重要场域。当警暴随着「遍地开花」的示威进入社区、商场和民居，更多居民亲身目睹警队的滥暴和滥捕（例如：有警队以催泪弹驱散示威者时射上民居[1]、居民在社区散步却被防暴警警告非法集结[2]），运动触及更广泛的群众并且创造连结。各区的示威者也在行动的试炼中凝聚自发网络（例如：地区连侬墙、街站、哨兵台）。大家在街头「打过照面」后，这些累积的网络、资源、反抗的经验成为运动在社区落地生根的基础。接下来我们分做几个部分介绍不同形式的街头抗争。

1. 〈【10.20游行】警射催泪弹上旺角民居 社区干事：街坊全家要即走〉，《香港01》，2019年10月24日。
2. 〈【抗暴之战】一家三口饭后散步被警告非法集结 母激动：係咪要射死我哋三母子〉，《苹果日报》，2019年10月6日。

1.


2.


2.1 - 大型和平示威

/

尽管「反修例」示威有「激进化」的特性，但大型和平示威在运动中仍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激进行动因风险高、节奏快而参与门槛较高，大型和平示威则让最多市民有机会公开表态。

在运动初期，「民阵」等团体举办事先申请「不反对通知书」的大型合法游行，搭建相对安全的平台予市民发声。若将合法游行的规模视为检视民意的依据，可观的参与人数反映出社会上对运动的庞大支持。在 2019 年下半年，有数次的百万人大游行，在 2020 年 1 月 1 日的「毋忘承诺，并肩同行」游行亦有超过 100 万人参加。

在这些游行中，因人数众多，前往游行现场的跨海渡轮和地铁站人潮汹涌，市民须在集合地点「维多利亚公园」等候数个小时才能出发。因「不反对通知书」的保障，示威者能较长时间在公共空间聚集、带着自製口号、单张、物资，在发声之余和「同路人」产生交流。在 8 月开始，各区出现数以万计的市民响应的大型示威。

2
/
▶ **2.1**
/
2.2
/
2.3
/
2.4
/
2.5
/
2.5.1
/
2.5.2
/
2.5.3

随后警方开始频繁「反对」游行申请，令游行申请人不得不宣佈「取消」游行，但出于运动「无大台」的特性、「被批准」的大型和平示威也遭警方的镇压和大规模逮捕的经验，大量市民逐渐突破申请「不反对通知书」的框限，随机占路「非法游行」。例如：7 月 27 日，数十万市民自发以「郊游」、「李鹏悼念会」等名目在元朗占路游行；8 月 18 日，170 万市民自发在港岛占路游行。在警方的打压下，预先申请的大型和平游行减少，却出现更多散落各区、难以统计的游击式示威。











2019 年 6 月 16 日，民阵举办「谴责镇压，撤回恶法」大游行，共有 200 万人上街游行，创下香港的歷史纪录。因抗争者梁凌杰前一日身穿黄雨衣，展示横幅标语后坠楼，市民予以悼念，主办方公布数字时，特意将人数加一，变成「二百万零一人」。当日游行队伍的缩时视频见二维码。（图片取自：新传网、端传媒、美联社、立场新闻）







在 2019 年 7 月 27 日，有市民发起游行谴责 7 月 21 日的元朗无差别袭击事件，在警方发出反对通知书后，示威者用其他占路游行，因游行并没有被批准，示威者用雨伞作为遮挡避免被辨识样貌。（图片取自：反送中文宣谷，众新闻）

2.2 - 激进化的衝击行动

/

在「反修例」运动中，警队使用的武力较「雨伞运动」高得多，密集的使用催泪弹、施用大量足以致命的弹药。然而，部分「反修例」示威者认为，唯有以激进的手法反抗才能推进运动升级，否则会像「雨伞运动」在长时间的占领后失败收场，所以「反修例」示威者经常在大型游行后出现衝击堵路的升级行动。只有简陋防护装备的示威者，在路障筑成的防线后和警方对峙；透过灭熄催泪弹的方式延长逗留的时间、时有向警察扔掷杂物、行人路的砖块、汽油弹，直至警方开始推进抓捕才撤离或转移。

尽管示威者比以往更主动的出击，然而警队和示威者的武力极度悬殊，警员身着全套防火阻燃、刀石不穿的保护背心，手持大量致命武器，示威者的攻击（远距离抛掷砖头杂物、有火苗的玻璃瓶）并不会对警员造成伤害，只能拖延警队进攻的时间。诚然，面对装备精良的警队及握有检控工具的司法机构，激进抗争遭到严厉的打压，也难以撼动政权，但所展露出来的反抗决心起到感召的作用，驱使更多人投身运动。

激进的衝击行动受到示威者的支持。「和理非」在后排聚集掩护前线的衝击，直到一起撤离；当交通管制和搜身变得普遍，「和理非」分散携带敏感物资至现场、组成「人链」将物资传递至前

线。当「勇武」在游行现场进行「装修」，「和理非」也经常举起伞阵遮住摄像头的视线，避免「勇武」之后被追究，称作「落雨开遮（下雨撑伞）」。这些行动策略背后的逻辑都是：「和理非」在低风险岗位支持「勇武」，发展出分摊风险的共同行动策略，希望所有的参与者都能安全离开。



示威者在 11 月 12 日中文大学用汽油弹燃成大火筑成防线，用圆桌和雨伞作防备，在火光中与警方对峙。（欧嘉鸿摄）



在 2019 年 11 月底，当示威者被围困理大，过万市民响应网上「救理大」的呼吁，大量市民组成人链传递物资往靠近理大的前线，人链由太子开始，绵延数公里。(图片取自：gettyimages)

2.3 - 游击堵路瘫痪城市运作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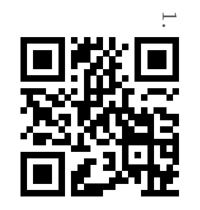
2019 年 8 月，警方接连发出「反对通知书」、在游行前暂停大众交通服务、加大镇压力度，促使示威者开始发展更灵活的城市游击战，即无固定路线、随时转移和撤退。另一方面，示威者意识到示威表态对政府带来的压力有限，往往在和平游行后堵路、也探索动摇城市经济运作秩序的「不合作运动」。

8 月 5 日，网民发起「八五全港大三罢、遍地开花七区集会[1]」，数十万名示威者首次同时在多区集会、「快闪」包围警署、堵塞主要干道瘫痪当日的部分交通。此后每当出现政治事件，示威者发起大罢工、在所到之处大规模占据马路、架设路障、和警察对峙，令市民无法上班，店舖无法营业。例如：8 月 11 日的多区游击示威、10 月 4 日政府宣佈实施蒙面法后引发的多区堵路抗议、11 月中警方包围理工大学期间，连续几日的多区堵路示威。运动期间，示威者也屡次号召市民涌入机场堵塞交通，令航班被迫取消，造成庞大的经济损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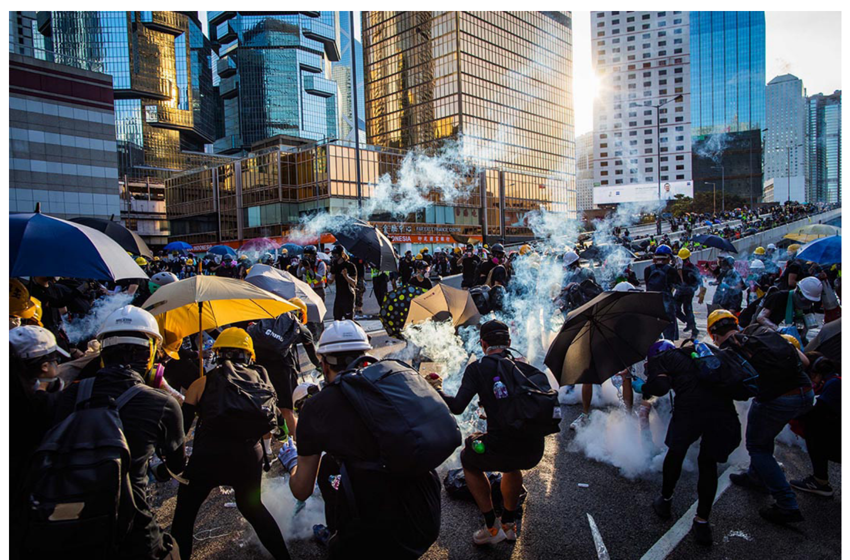
这些游击堵路瘫痪交通的尝试对市民日常生活的干扰较大，在过去往往被舆论所挞伐，但在「反修例」运动中，当大量示威者在镇压下付出高昂的代价，更多示威者愿意在日常生活中继续抗争、接受一定的不便和经济损失。在运动支持者中，仅有 15% 不接受示威者「堵塞机场」，9% 不接受示威者「阻碍港铁运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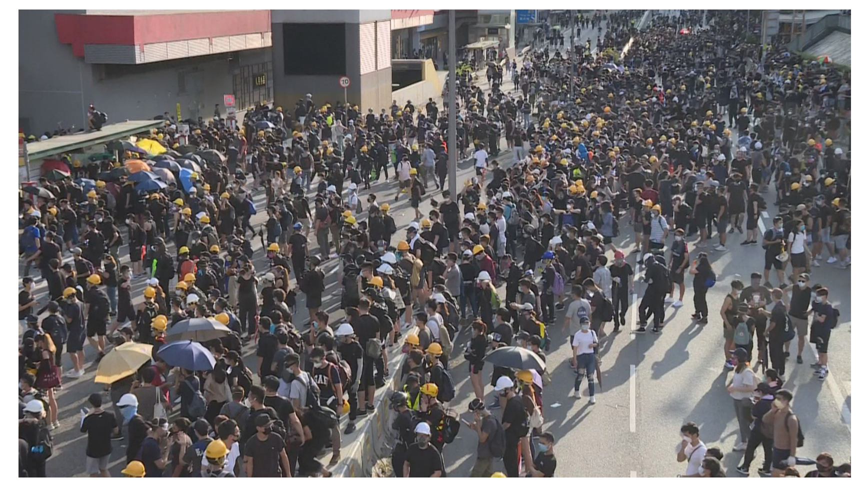
1. 〈八五香港罢工：交通瘫痪，七区集会，多个警署被围，荃湾、北角再现白衣人〉，《端传媒》，2019 年 8 月 5 日。

1.









2019 年 8 月 5 日，示威者发起「大三罢」，并在港岛、九龙、新界多区架设路障堵路示威。（图片取自：明报、端传媒、Now 新闻）

2.4 - 「私了」、「装修」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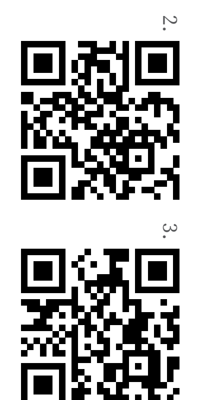
在 2019 年 8 月后，「私了」和「装修」两个激进的抗争手法变得普遍。「私了」指的是示威者向施袭者使用武力。在 7 月初，曾有连侬墙义工挨十三拳不还手获得讚扬，但随着多个抗争者被施袭重伤、警方却纵容施袭者、甚至逮捕受袭者，示威者不再诉诸公权力的介入，而是自卫还击、甚至群起使用武力惩戒施袭者。

2 / 2.1 / 2.2 / 2.3 / **2.4** / 2.5 / 2.5.1 / 2.5.2 / 2.5.3

示威者以「装修」指称「对公共设施或亲建制商舖的破坏」。运动中首场「装修」是2019年8月底的「荃湾麻雀馆事件」，之后示威者在游行中大规模破坏支持警察、和建制施袭者有关的商舖、中资银行和中资书局的门面。例如：在10月、11月的示威高峰期，零售商「优品360」因被指与「福建帮[1]」有关，共72间分店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中资银行柜员机被毁坏，全港3,000部柜员机一度有一成无法正常运作。此外，因香港铁路公司配合警方暂停列车服务打压示威游行、协助警方调度警力、逮捕示威者，示威者以砸碎售票机、涂鸦、纵火等方式破坏地铁站设施[2]，逾九成的车站曾遭受破坏，衍生的维修费用高达数亿元。这些大规模的「装修」除了对于施暴者不被公权力惩处而衍生的私刑，也是「揽炒」逻辑的一种体现，示威者透过破坏设施瘫痪企业甚至城市运作，以增加其管治成本和经济损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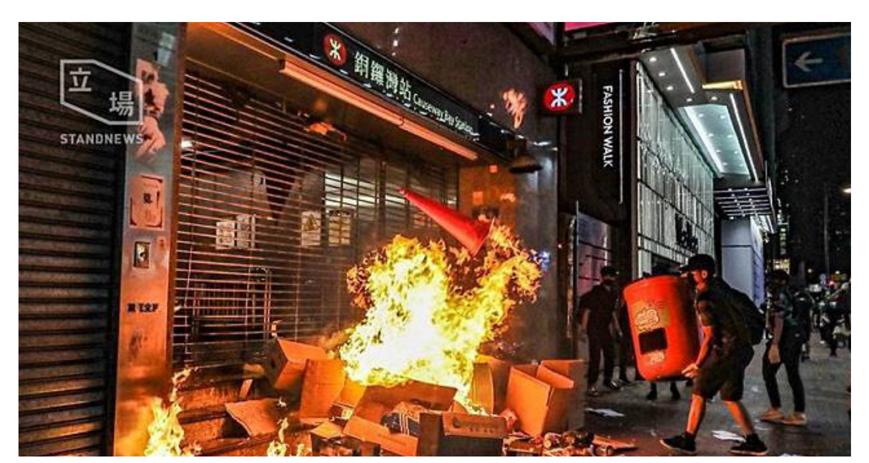
因「私了」和「装修」涉及武力的使用，也造成生活不便，在舆论上引起较大争议。但多月来所累积对政府的不满和对警暴的愤怒，使这些抗争手法较大程度上被示威者和市民理解。不接受「私了」和「装修」的市民低于一半；不接受两者的运动支持者低于三成。然而，运动期间也出现数宗不符合比例原则的「私了」或「装修」案例（政见不同的人士在指骂示威者后被淋易燃液体点火[3]，被部分抗争者认为行为过火）。这些事件在示威者内部出现较大的争议，也促使示威者讨论出行动原则（例如：「黑装修、红装饰、黄帮衬、蓝罢买」；「勇武和理非大和解：终极行动守则上线了」）和其他示威者寻求共识。


1. 香港的福建省移民团体之统称，以「香港福建社团联会」为首。2019年8月至9月期间，有自称「福建帮」人士主动在示威现场袭击游行人士。
2. 《香港示威中屡成目标的港铁：从国际「样本」到被封「党铁」》，《英国广播公司》，2019年9月18日。
3. 《马鞍山一男子与人争吵被泼液体点火致烧伤》，《NOW新闻》，2019年11月11日。





深水埗游行期间，有出租车剷上行人路撞向示威者，司机则被示威者拖出车外殴打。（图片取自：法新社）



香港铁路是示威者「装修」的对象，示威者在地铁铜锣湾站出口放火。（图片取自：信报）

市民对激进示威行动不接受比例

分类		不同意见武力冲突	破坏特定商户
	总计	48.4	43.0
性别	男	46.1	41.6
	女	50.5	44.2
年龄	15-29 岁	25.0	15.5
	30-39 岁	40.2	34.5
	40-49 岁	56.5	50.4
	50-59 岁	55.6	48.0
	60岁或以上	58.1	57.0
政治倾向/派别	本土派	18.3	7.4
	泛民主派	34.3	27.4
	建制派	96.3	96.4
	无任何政治倾向/不属于任何派别	69.1	66.2
对运动的态度	支持	27.6	21.1
	一半半	70.1	60.8
	反对	96.1	97.8

（数据来源：中文大学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香港反修例运动中的民意状况研究报告》，2020 年 5 月。）

2.5 - 社区快闪行动

/

由 2019 年 9 月开始，示威者频繁在各区的商场中庭、屋苑、学校、工厂大厦附近发起「人链 / 和你拖」、「和你 Sing」、「和你 lunch」。这些表态行动的规模较小、性质较温和、发起门槛较低，当示威者在一个地区发起商场合唱或午餐示威，其他地区的抗争者起而模仿，造就遍地开花的多区行动。由于这些行动的参与者往往是在社区生活的人，因此当示威者以日常装束快闪参与行动，市民、居民、示威者混杂的空间特性增加警队镇压和逮捕的难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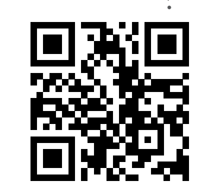
2.5.1 - 人链

/

2019 年 8 月，示威者借鑑「波罗的海之路」，自发组织长达 44 公里、连接三条地铁线的「人链」，望以「和平」的方式引起世界对运动的关注。而后「人链」的抗争手法在职场、校园、地区性的示威中不断出现，在地理区位上更加零散、日常生活化。9 月初，医护人员在院内筑起人链控诉警方滥用武力、阻碍急救人员治理伤者。为抗议警暴和重申五大诉求，数所中学发起罢课和人链[1]，获得大量在校生和校友响应。12 月 31 日示威者在尖沙咀连成「除夕之路」，重申运动诉求和纪念 831 太子地铁站警暴事件等。

1.《反修例运动三个月 全港约 170 所中学学生筑成人链表达诉求》，《端传媒》，2019 年 9 月 9 日。

1.







2019 年 8 月 23 日的「香港之路」人链，视频见二维码。(图片取自：TVBS NEWS)



2
/
2.1
/
2.2
/
2.3
/
2.4
/
2.5
/
▶ **2.5.1**
/
2.5.2
/
2.5.3







2019 年 9 月 6 日，200 间中学学生筑起分区人链，视频见二维码。(图片取自：独立媒体、美联社)





2019 年 9 月 2 日玛丽医院医护人员在院内筑成人链，视频见二维码。(图片取自：头条日报)

2.5.2 - 「和你 Sing」

/

2019 年 9 月初，市民自发在沙田的商场中庭合唱由示威者谱写的歌曲《愿荣光归香港》，而后有人发起同一时间在各区大型商场合唱、高喊示威口号并且展示标语。而后「和你 Sing」在各区频繁出现。



2019年9月11日，有抗争者创作歌曲《愿荣光归香港》并在网络上发佈。



2019 年 9 月 12 日夜晚，千名示威者在中环的 IFC 商场自发快闪合唱《愿荣光归香港》。

（图片取自：头条日报）

2.5.3 - 「和你 Lunch」

/

自 10 月初起，示威者几次在工作日的午饭时间发起「中环快闪游行」抗议警察枪杀示威者、《禁止蒙面规例》的推行，超过一千名市民响应。10 月中，在葵芳、荔枝角、尖沙咀、观塘工作的上班族在各地写字楼区发起快闪游行。在 11 月 11 至 15 日的「三罢」和「不合作运动」中，港岛多区也出现「和你 lunch」的行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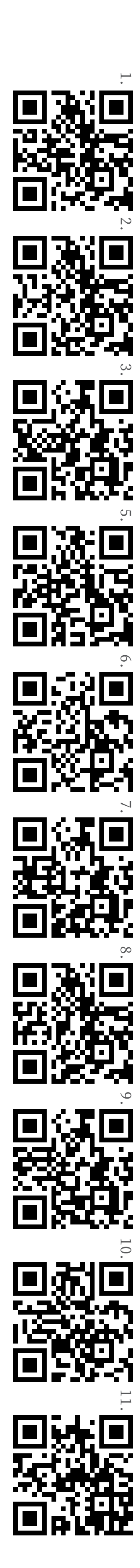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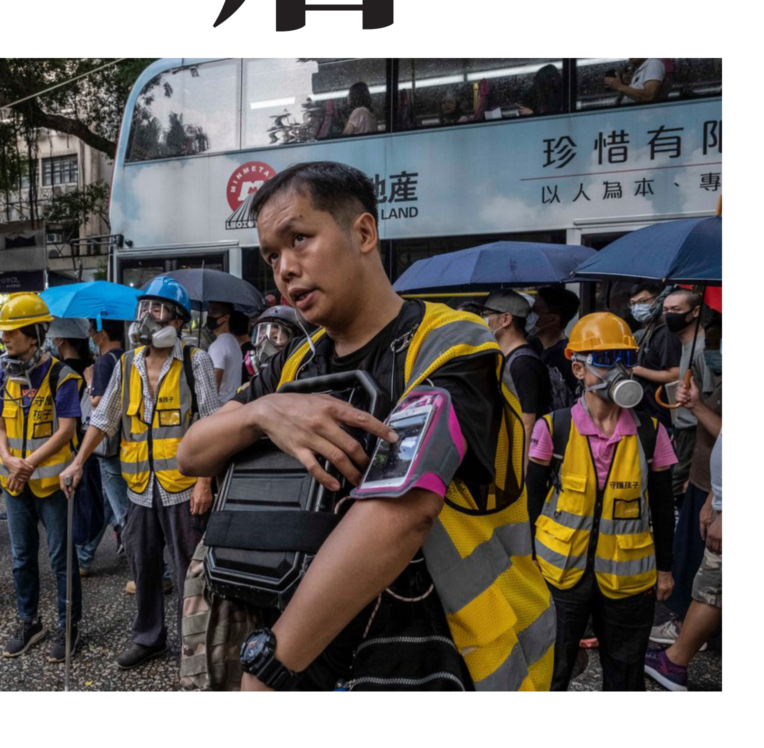
（图片取自：香港 01、Studio Incendo）

延伸阅读

1. 〈大检控是「依法治港」抑或司法灾难？——专访大律师吴霭仪〉，《端传媒》，2019 年 12 月 27 日。
2. 〈滥捕、棍打、延迟十二小时送院，被捕后他们经歷了什么？〉，《端传媒》，2019 年 11 月 5 日。
3. 抗争者整理的警暴报告。
4. 柳俊江（2020），《元朗黑夜 - 我的记忆和众人的记忆》，香港出版。
5. 〈【专访】三个放火的少年　和理非怎样变「火魔法师」？武力边缘上的抗争〉，《立场新闻》，2019 年 10 月 14 日。
6. 〈【专题】抗争进化、文明倒退？　「狮鸟」的长成及其后〉，《立场新闻》，2019 年 9 月 28 日。
7. 铿锵集：控诉（2020 年 4 月 27 日）
8. 志：愿梓乐主怀安息（2019 年 12 月 21 日）
9. 众新闻：理大围城歷史纪录　逃脱者愧疚剖白「无法齐上齐落」（2019 年 12 月 8 日）
10. BBC 香港示威一週年纪录片：前线示威者的心路歷程（2020 年 6 月 30 日）
11. 立场新闻：被控暴动罪的人数据统计：他们有多年轻？做什么职业？何时被捕？（2020 年 6 月 13 日）



街头抗争背后的后勤网络





SUPPORT AND AID NETWORKS

在「反修例」运动中，多样的后勤网络是「街头抗争」背后的重要支援。对运动的抹黑中，庞大的后勤工作和经济物资支援经常被视作运动背后有「金主」指使的证据。事实上，示威者背后的确有很多的「金主」和义工，然而他们并不是什么境外势力资助的机构，只是无数自发出钱出力的普通市民。

这些抗争者后勤网络紧贴政治环境的变化和抗争者的需求，在不同环节予以支援，造就街头行动面对政治打压的韧性，令大规模的示威得以长时间持续。我们分别介绍文宣、即时资讯台、后勤支援、医疗和情绪支援、被捕抗争者支持这 5 种后勤网络。

「文宣队」带来「去中心化」的资讯传播和群众动员。在「反修例」运动中，扮演媒体「发言人」和领导角色的「大台」不再存在，示威者间发展出文宣网络以传播资讯、提出运动路线及动员群众。

「即时资讯台」让群众可以在瞬息万变的示威现场共享信息。从 2019 年的下半年起，示威者发起数百场各种型态的示威行动，示威者间时常需要进行大量的资讯交换和协调，因应警力的部署转移至新的地点聚集、留意撤退的路线。

前页图片取自：纽约时报中文网（上）、众新闻（下）。

「后勤网络」是街头行动的重要后盾。在日趋严峻的打压下，示威者需要越来越多样化的后勤支援，包括集散防御装备和物资、提供经济支援、寻找避难之所、安排离开的交通接驳等。为回应示威者不断变化的需求，抗争者发展出集散资源和配对服务的「大型开源平台」以及小型「家长网络」。这些「后勤网络」令不少示威者即使面对打压也不致孤立无援。

在运动中，无数的示威者遍体鳞伤、出现情绪困扰、甚至被捕检控。抗争者自发组织「医疗和情绪支援」和「被捕抗争者支援」。因运动被捕的上万名示威者从被捕的那一刻、到上庭审讯、入狱服刑、出狱之后的生活，都有不同层面的需求。大量的抗争者投入「法律支援」、「旁听师」、「在囚支援」、「再就业」等方面的支持。在 2020 年，街头趋于静寂，但每一日都有数十名示威者上庭面对审判和刑期，如何支援被捕抗争者成为运动中的核心工作。

在「反修例」运动中，街头行动的时间被压缩得非常短。在大规模涌现、又如水消散的示威浪潮中，这些扮演不同支援角色的「自发组织」成为重要的节点，促使抗争者透过「一起做点什么」建立连结并形成网络。当抗争者找到参与的「位置」，因身边有一些伙伴共事，反过来也令他们更能持续参与运动。这些「遍地开花」的网络所培养的信任和承载的连结，在「街头抗争」无以为继后转化爲其他阵线发展的契机。

1 - 「文宣[1]队」：资讯传播和群众动员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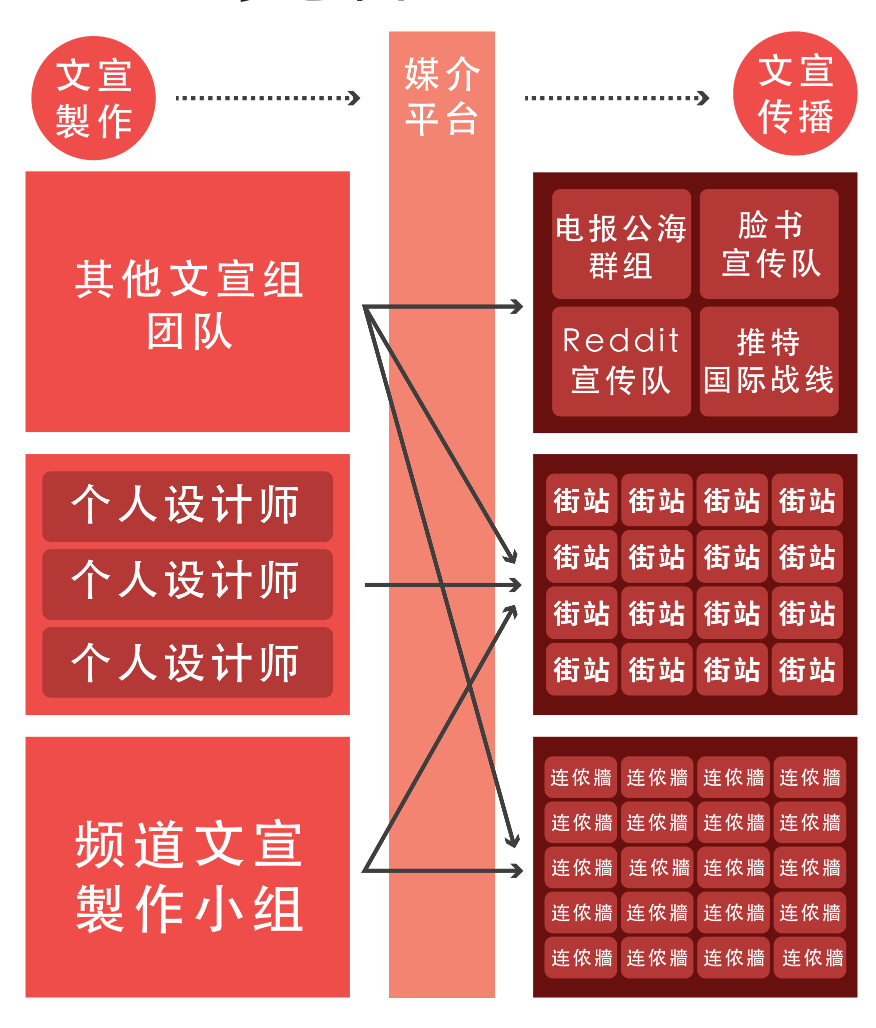
在「反修例」运动期间，政府密集召开记者会抢占主流媒体平台，并用大量资源抹黑示威者，主流媒体对于运动的报道并不全面。为了抗衡主流电视台和报章的论调，示威者发起数十场「民间记者会」和「政府记者会」抗衡；学生和网络媒体的义工则在示威现场进行直播和报导，捕捉重要的警暴镜头。在这些媒体外，大量的抗争者自发投入文宣的创作和传播、发展出大规模且「去中心化」的文宣网络，在不断变化的运动中凝聚抗争者的共识、争取社会支持。

在运动爆发初期，抗争者自发设计图文单张，并摆街站宣传《逃犯条例》的恶劣影响，动员群众参与大游行；从 2019 年 6 月中开始，示威者架设「电报」频道，并且印刷实体文宣在各区「连侬墙」和街站传播。在持续一年的运动中，抗争者逐渐整合各部分的文宣协作，摸索出令文宣传播得更广泛、更即时的协作流程。

1.「文宣」原指搭配图片或文字说明的广告文件，示威者以「文宣」指称「运动相关的创作」。

概括来说，文宣网络并没有统一的运作方式，但离不开「创作」和「传播」两个部份，「创作」包括：查核信息，文案、製图设计；「传播」包括：网络传播、印刷、派发或者张贴于连侬墙。在中间汇整文宣的「电报频道」则是促成资源共享，令「创作」和「传播」可以同步进行的重要平台。任何人可以投稿文宣创作；任何人也可以下载现成文宣贴上连侬墙或在街站派发。在这个章节，我们分作「创作」和「传播」两部份介绍背后的协作工作，以及这些网络的发展和变迁。

文宣链示意图



1.1 - 文宣「创作」

/

文宣「创作」是「文宣链」的第一步。「反修例」期间，新媒体平台在短时间内搜集到高产量且切中时事的文宣，它们由无数的匿名示威者投稿，没有署名和着作权，供群众下载。例如：「反送中文宣谷」电报频道在 2019 年 6 月中成立以来，发佈超过 3 万 8 千份图片和视频，虽然频道管理员身兼创作和发佈，但频道上近 7 成的文宣都是由其他示威者投稿。运动期间，大量的文宣频道、匿名创作的文宣不断涌现，这个百花齐放的情景令个别频道或者创作者都难以垄断运动论述。

由于创作者众多，「文宣」的创作形式和主题都非常多样，有视觉效果强烈的绘画创作、图文搭配的海报、漫画、图解新闻点评等。碍于「文宣」的形式所限，双向的讨论和对话难以发生，「文宣」有用情感、资讯、观点在短时间内说服和动员群众的特性。「**统整资讯**」、「**行动动员**」、「**凝聚共识**」则是运动中常见的文宣主题，我们接下来列举实际案例进行说明。

1.1.1 - 统整资讯：发生了什么？应如何理解资讯？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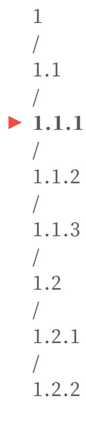
2019 年下半年，几乎每几日都有不同的示威行动、新增的抓捕和打压；与此同时，政府密集召开记者会攻占主流媒体平台、抹黑示威行动，示威者难以密切追踪所有的新闻信息并且掌握整体的动态。在这个背景下，「文宣网络」持续归纳运动中的关键事件、查核信息反驳政府的说辞、也将庞杂的资讯整理成易于消化的「懒人包」。文宣的主题包罗万有，从警暴事件的汇总、选举制度的解析、到疫情的简报和抗疫对策都有。

事实上，「文宣网络」所提供的不只是「资讯」本身，也体现抗争者阵营对资讯的解读与关注角度。「文宣网络」透过「炒热」易引起共鸣的画面和新闻、提供一种解读资讯的取态、在社会舆论中潜移默化批判政府的立场。





（图片取自：反送中文宣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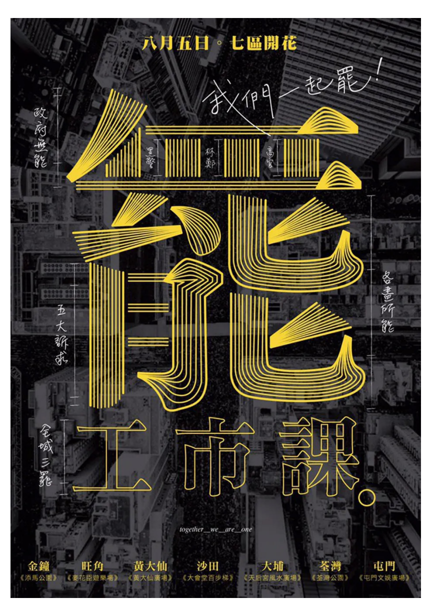
搶槍？鐵通？
唔洗依張相，
有睇直播重播既都知警謊
不斷講大話。
8.31前夕大搜捕
立場新聞 STANDNEWS
陳浩天 前香港民族黨召集人
黃之鋒 香港眾志秘書長
周庭 香港眾志成員
林朗彥 香港眾志主席
（林與黃之鋒及周庭一同被控，身在外地尚未被捕）
孫曉嵐 香港大學學生會前會長
鄭松泰 熱血公民立法會議員
許銳宇 區議員 沙田區政成員
元朗 7/21
- 多次放生白衣凶徒
- 遲到39分鐘方到場
- 警署落閘拒絕處理元朗恐襲
7/27
- 向老人院投射催淚彈
- 速龍闖入元朗站無差別攻擊
- 疑改裝警棍加上金屬環
- 施放過期催淚彈
葵芳 7/31
- 用雷明登長槍指嚇示威者及在場市民
- 用盾牌襲擊記者
- 向記者噴胡椒噴劑
馬鞍山 8/2
- 向橋上市民開槍
- 擅闖民居雅景臺
上水 7/13
- 放走涉嫌襲擊人士
- 向區議員施胡椒噴霧
- 警棍打傷立法會議員尹兆堅
- 沒有出示委任證或展示編號
天水圍 7/21
- 警署落閘拒絕處理元朗恐襲
7/30
- 無拘捕警署門外放煙花凶徒
沙田 7/14
- 圍捕新城市廣場市民
- 無視不反對通知書拘捕集會人士
- 向被制服示威者插眼及180度拗斷手腕
警暴濫權
全港巡迴
18區惡行一覽
屯門 7/6
- 放生4個涉襲擊人士包括「大波MAN」石房有
中西上環 7/21
- 信德中心外天橋上，
- 未有示警地向橋下開槍
旺角 7/7
- 多次用盾牌推撞及
- 襲擊記者撩路人「隻揪」
- CID聲稱無需出示委任證
金鐘 6/12
- 以催淚彈夾擊中信大廈，沒留逃生路線
- 多次用橡膠子彈、布袋彈及催淚彈攻擊沒衝擊的示威者
- 用警棍毆打以被制服的示威者
黃大仙 8/4
- 向居民施放過期催淚彈
尖沙咀 8/3
- 強行拆走立法會議員許智峯揚聲器

（图片取自：反送中文宣谷）

1.1.2 - 行动动员：可以做什么？怎么做？

/

示威者深知「人多」是运动有力量的关键，因此在运动的各个阶段，示威者都不断用文宣动员抗争者付诸行动，强调每个人的参与都能带来改变。在运动初期，动员主要围绕着频繁的游行示威，但在街头之外，示威者也在日常生活中挖掘生活各个方面、各种形式的参与可能性。例如：散播文宣、做哨兵、做家长车、光顾黄色经济圈、加入工会等。文宣将复杂的任务拆解为简单的步骤、手把手的教抗争者「如何做」、倾向降低行动门槛，让零经验的同路人也可以快速上手。例如：文宣组汇整各行各业新工会的二维条码总匯，方便示威者找到属于自己行业的工会加入。





（图片取自：反送中文宣谷）

1
/
1.1
/
1.1.1
/
▶ 1.1.2
/
1.1.3
/
1.2
/
1.2.1
/
1.2.2













（图片取自：反送中文宣谷）

1.1.3 - 凝聚共识：同步抗争者诉求和争取社会支持

/

在「反修例」运动中，示威者较少有时间和空间面对面开展讨论，于是文宣变作处理分歧、凝聚共识的重要平台。当激进示威者的抗争行动引发争议，示威者透过文宣解释衝击背后的原因，争取理解。随着运动发展，抗争者以诉求和口号为主题创作文宣，同步运动的方向。

因文宣十分倚赖群众的自发创作和传播，当某些口号的文宣被大量创作、广泛传播，则反映出抗争者对这些诉求的认可。例如：在 7 月 1 日的立法会衝击事件后，围绕着「五大诉求，缺一不可」的口号创作被广泛分享；当运动不断升温，文宣中的口号由：香港人「加油」变作「反抗」和「报仇」。文宣的目标读者并不限于运动的支持者，正如文宣创作人「热血小薯」所言：「想突破同温层，拉拢更多属中产阶层的浅黄、中间、浅蓝的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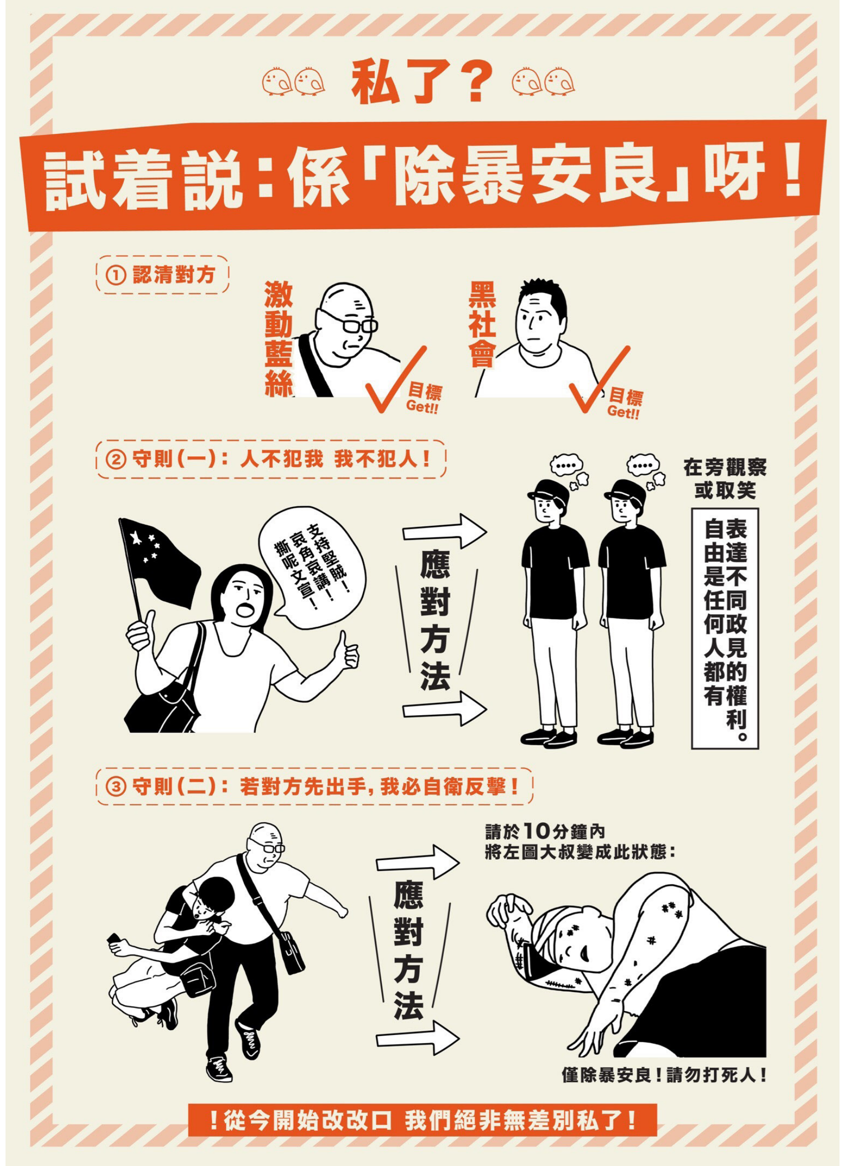




（图片取自：反送中文宣谷）


康復香港時代抗疫


真普選
Genuine Universal Suffrage
撤回送中惡法
Withdraw the Extradition Bill
五大訴求 缺一不可
5 DEMANDS NOT 1 LESS


私了？
試着說：係「除暴安良」呀！
① 認清對方
激動藍絲
目標 Get!!
黑社會
目標 Get!!
② 守則（一）：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支持堅賊！
哀角哀講！
撕呢文宣！
應對方法
在旁觀察或取笑
表達不同政見的權利。
自由是任何人都有
③ 守則（二）：若對方先出手，我必自衛反擊！
應對方法
請於10分鐘內
將左圖大叔變成此狀態：
僅除暴安良！請勿打死人！
！從今開始改改口 我們絕非無差別私了！

（图片取自：反送中文宣谷）

1.2 - 文宣「传播」

/

文宣的内容再好，能否触及群众才是关键。在「媒体平台」的汇整下，传播文宣的门槛大大降低。不仅连登讨论区、数个电报频道和雨伞时活跃的脸书专页持续推送文宣；大量示威者也在电报群组、个人社交媒体平台上转发文宣、甚至和其他国家的网友互动抢占舆论的支持。

然而，若仅依赖社交平台发行，部分市民仍难以接收到这些信息，而社交平台的演算法亦倾向将这些资讯停留于同温层，所以实体的公共空间也是传播文宣的重要基地。全港遍地开花的「连侬墙」和「街站」成为文宣的「最后一哩路」，灵活且即时地将运动的消息散落各个社区。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因应文宣传播而生的「连侬墙」和「街站」网络，意外地在社区的公共空间开辟出实体的据点，连结支持运动的居民。这些网络的义工大多是附近社区的居民，大家也会在「做墙」和「摆站」的地方聚集閒聊、打排球、逢节日自发组织市集。当居民透过这些活动互相熟识、建立起信任，每当社区出现突发事件，也能守望相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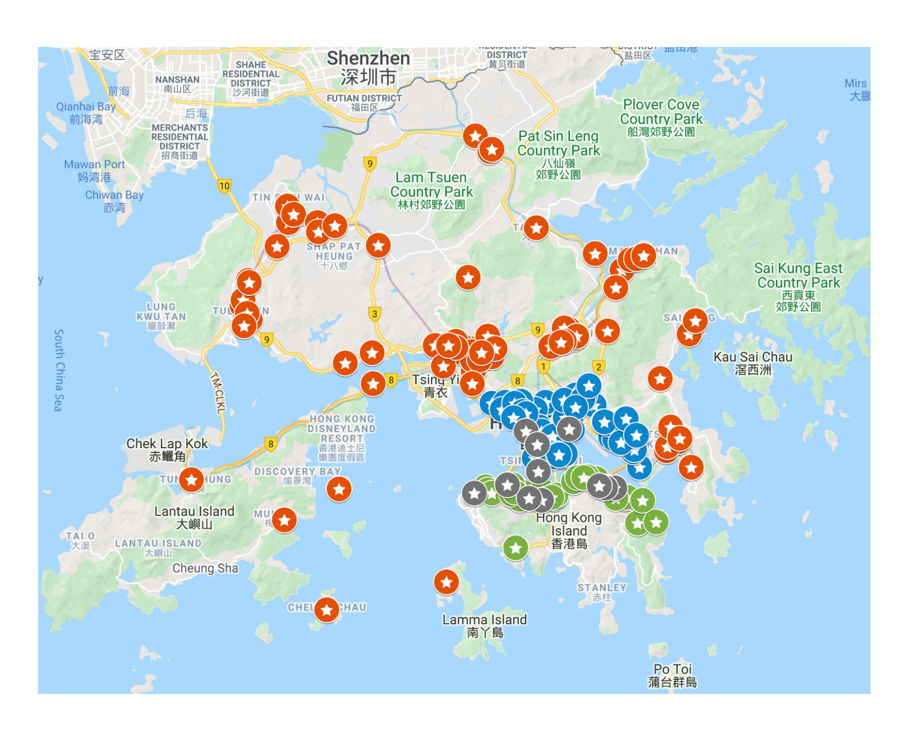
1.2.1 - 「连侬墙」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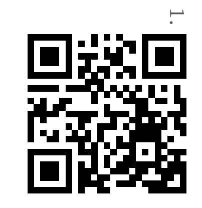
「连侬墙」原本是捷克布拉格修道院大广场的一道墙，市民在那里以涂鸦表达对政权不满[1]。在 2014 年的「雨伞运动」中，示威者在金钟占领区的水泥墙贴上「我哋点解企出嚟？[2]」的字条，大量市民用便利贴写下自己的心声作为回应，这道墙被示威者称作「元祖连依墙」，后扩散至其他占领区。

在「反修例运动」中，「连依墙」伴随着地区游行在各区「遍地开花」，示威者将对政府的愤怒、运动的诉求写在便利贴上，并广泛张贴在各区的天桥、社区屋苑、大众交通运输通道等公共空间。随着「文宣」的製作逐渐成熟，抗争者发现「连依墙」不仅是集合街坊心声的空间，更可成为集散即时资讯的佈告栏，向市民介绍抗争者的观点、宣传示威的日程。在数个月的时间里，各区的示威者因应地理区位、社区的特性，发展出不同形式的「连依墙」，有视觉效果震撼的壁画式「连依隧道」巨型文宣；也有精心排版、按主题介绍时事、发佈各类资讯和行动呼吁的大型佈告栏。

1. 1980 年代捷克的群众开始在墙上涂鸦，写下约翰・连依（John Lennon）的歌词，而后该墙变成表达对政权不满的地方。
2. 翻译：「我们为什么站出来？」



「反修例运动」全港连侬墙地图，图片取自：香港连侬墙地图 [1]



1.

当「连侬墙」遍佈全港各个社区，维护与更新「连依墙」的网络在各区慢慢建立起来，示威者将讯息透过「连侬墙」即时传播。在运动初期，参与「连侬墙」的风险较低，各个地区的示威者成立连侬墙群组，频繁轮流组队做墙及即时修补被破坏的文宣。但当「连侬墙」义工频繁被建制人士袭击、有市民因张贴文宣而被警方以涉嫌刑事毁坏拘捕，示威者随机创作「连侬墙」的景象减少。

随着维护「连侬墙」的风险增加，示威者组成固定的义工小队快闪「做墙」。在义工小队中有不同的岗位，为了应对袭击和抓捕的风险，做墙的任务往往需要在短短的十多分钟内完成：有人负责拣选文宣、研製胶水进行张贴；有人事先勘查地形和摄像头，留意现场的情况；有「近身保镳」负责制服施袭者。有意思的是，同区的「连侬墙」文宣队也形成鬆散的互助网络，当大型「连侬墙」

被破坏，数个连侬墙文宣队则同时出动迅速完成重建；跨区的连侬墙义工也互相交流，分享做墙的新技术和心得。

独立媒体「元朗连侬墙」义工专访：
「大声哥哥忆述，有街坊本来很冷感，但眼见文宣组日夜坚持，便上前看看这班人在贴什么，结果看到『TVB 冇讲嘅嘢』[1]；有蓝丝[2]经过撕纸、大骂『痴线』，他劝人不妨停低睇睇，果真留住某些人的脚步；有街坊支持游行却批评很暴力，二、三十个街坊即场围圈讨论抗争手法，你一言我一语激发思考；有手足在抗争路上感气馁，在便利贴和文宣中觅得安慰；他还见过，有伯伯在墙前驻足十数分钟，仔细阅读文宣并一一把重点抄下。」[3]

1. 译：「TVB 没有讲的东西」，TVB 是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的简称，以新闻偏颇亲建制着称。
2. 明确不支持民主运动的人。由于 2014 年占领者以黄色丝带作记号，反对占领者则以蓝色丝带作标记，因此得名。
3. 〈【专访】做一个坚持的榜样 —— 元朗连侬墙手足八个月的辛酸与收穫〉，《独立媒体》，2020 年 3 月 20 日。



沙田新城市广场的「连侬柱」：在 2019 年 7 月中，警方在游行后闯入商场殴打和抓捕示威者，后来示威者每晚将文宣贴在中庭的「连侬柱」，因在商场遇袭的风险较低，有附近居民留下平板电脑播放警暴短片、自行带扬声器播放音乐、聚集和谈论时事。（图片取自：立场新闻）

3.




葵芳的「连侬隧道」：位于地铁站葵芳站附近的「连侬隧道」以巨型的壁画式文宣闻名。（图片取自：Studio Incendo）



元朗连侬墙：2019 年 7 月 21 日白衫人在元朗西铁站内无差别袭击市民，后来示威者在附近搭建「连侬墙」，元朗「连侬墙」以将资讯分类、排版清晰易读为特色，被誉为「教科书式连侬墙」。（图片取自：独立媒体）



大埔连侬隧道：地铁站附近的大埔连侬隧道被称为全港最大的连侬墙。（图片取自：立场新闻）

1.2.2 - 街站

/

「街站」指在公共地方设立临时摊位，透过演说和派发传单的方式宣扬理念，是本地政治团体多年来常见的宣传方法。在「反修例」运动期间，随着数个「电报频道」汇整现成的传单供公众下载，素人发起的街站在各个社区遍地开花，抗争者透过街站向大众阐述观点、鼓动更多人参与抗争。在演说之外，放映街站也十分普遍，有示威者将警暴的画面做成短片合辑，再在各区发起「警暴放映街站」，唤起普罗市民对警暴的关注。抗争者也同时在数个地区播放运动相关的纪录片，吸引居民的观影。



2019 年 8 月 29 日在美孚桥底举行的《凛冬烈火：乌克兰为自由而战》放映会。（图片取自：白夜）

1
/
1.1
/
1.1.1
/
1.1.2
/
1.1.3
/
1.2
/
1.2.1
/
▶ 1.2.2

第一波的街站浪潮在 2019 年 5 月出现。连登网民、中学生在社交媒体平台组队摆街站，动员市民参加 6 月 9 日的大游行。在半个月内，街站数目暴增，市民对「反修例」的关注亦急升。

> **街站义工：**
> 「摆了一个『全港巡迴街站』讲反送中，在脸书发文公佈摆街站的时间，然后就有几位义工加入；那些义工又多带几位义工来，这个群组愈来愈大。接下来那些搞过一次街站、进取一点的人直接自己又开新街站……这样走一圈，街站群组就几何级数成长了。」
>
> 「只要有人在群组内发起街站：『要单张』『有没有人可以准备物资？』大家就会在群组内『举手』。我试过有一个街站很夸张，因为每个人都自己带单张过来，那天就派五六款单张，好有五饼二鱼的感觉。不同人有不同的点子，有些人带萤光板过来、有些人自己准备便利贴、有些人马上在地下做『打小人』，些就是有生命力的地方啰！」

此后，在游行示威或罢工号召前，各区出现大量呼吁市民参与行动的街站。然而随着警方不断「反对」游行集会的申请，行动动员减少，更多街站聚焦在区议会选举、新工会会员招募、「健康码」等议题。过去不少居民可以在街站组织放映会较长时间的交流，但随着街站义工受袭的事件增加，街站义工更须倚赖「哨兵」、由居民组成的「自卫队」以增加安全性。

1
/
1.1
/
1.1.1
/
1.1.2
/
1.1.3
/
1.2
/
1.2.1
/
▶ 1.2.2

在2020年上半年，警方时有以违反防疫「限聚令」为由阻隢街站进行，虽然区议员和工会仍在打压下摆街，但遍地开花的盛况有所减少；而支持政府的街站却非常活跃。



2019年的「师奶反送中」街站。（图片取自：立场新闻）



2019年的深水埗警暴街站，有市民驻足观看。（图片取自：香港01）



2019年的中大反送中街站。（图片取自：中大反送中关注组）



2019年的中学生反修例关注组街站。（图片取自：众新闻）



2019年的反送中街站。（图片取自：维修香港）

2 - 「即时资讯台」：共享行动资讯

/

► 2

「即时资讯台」是在运动中最早出现的自发网络之一。在「雨伞运动」中，一些有运动经验的朋友搜集占领区的一手消息、核实整合后发佈于脸书专页。在「反修例」运动中，少有人发号司令，示威地点遍佈全港且不断转移，现场情况瞬息万变，示威者迫切需要准确的信息以衡量风险来做出行动。「即时资讯台」的资讯则成为示威者各自规划行动的重要参考，例如：示威者在出门前透过频道了解路况和交通情况，选择合适的运输工具和路线；在示威中，透过频道得知防线衝突的情况和周围的部署，评估撤离的时机和路线。

在 2019 年 6 月中「包围立法会行动」中，「反修例」示威者有鉴于现场消息不流通，自发成立首个即时资讯台，在短时间内蒐集、核实统整、并且发佈已核实的即时消息。资讯台在蒐集信息时，不仅须留意媒体的直播报导，同时也倚赖「哨兵[1]」网络回报现场消息。大部分的资讯台有固定合作的「哨兵网络」，以确保信息的准确度，然而随着示威的范围不断扩张，普罗市民也是重要的现场信息来源，透过「群众外包」获得更广泛和即时的信息。资讯台用文宣传授示威者如何用标准化的格式匯报现场实况，当值管理员则会同时留意新闻媒体报导和网民的爆料，在短时间内尽量比对核实发佈。

1.「哨兵」原指位于前线以警示敌军来袭的士兵，后被用来指称在示威现场观察情况并回报消息的通讯员。

▶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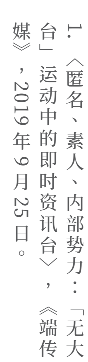
示威者製图协助哨兵辨识各种类型的警车；资讯台製作报料指南传授如何以标准化格式匯报警方位置；最后于电报频道呈现的即时资讯更新。（图片取自：Scott Scout 认证哨兵主频道）

随着示威「遍地开花」，同一日内数个地区同时有行动，全港资讯台无法负荷庞大的信息量，于是出现各区资讯台，方便示威者集中关注当区动向。随着警队推进速度加快，不熟悉地理环境的示威者在短时间内难以文字陈述掌握整体情况，有抗争者建立「103.hk 实时地图」，将警力部署和武力使用的情况标记在地图上，令其他示威者可以一目了然地规划撤退路线。抗争者留意到移民家务工和外籍人士难以获得资讯，也建立英文的即时资讯台。

▶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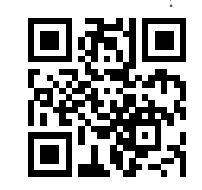
「103.hk 实时地图」创办人之柔：

「612 当天，他的一个学生处于中信大厦被两边催泪弹围困的人群之中，当时示威者无路可走，惊慌地从大厦两道玻璃门挤进去，险造成人踩人意外。而 7 月 14 日，身在外地的之柔从直播看到他熟悉的沙田瞬间变成白烟战区，看着警方在商场间包抄围捕，示威者在他长大地方奔走，不知去路。目堵无助人群的之柔决定要做实时地图，一是让参与者减少现场不安感，二是让大家得到现场资讯后，能自己判断去向。」[1]



1.〈匿名、素人、内部势力：「无大台」运动中的即时资讯台〉，《端传媒》，2019 年 9 月 25 日。

1.





「103.hk 实时地图」所汇整的现场实况，黄色为示威者人潮；紫色为警方部署。地图亦标记出水炮车、装甲车的位置和警队人数、警车数量。（图片取自：103.hk 实时地图）

3 - 「后勤网络」：街头行动的后盾

/

3
/
3.1
/
3.1.1
/
3.1.2
/
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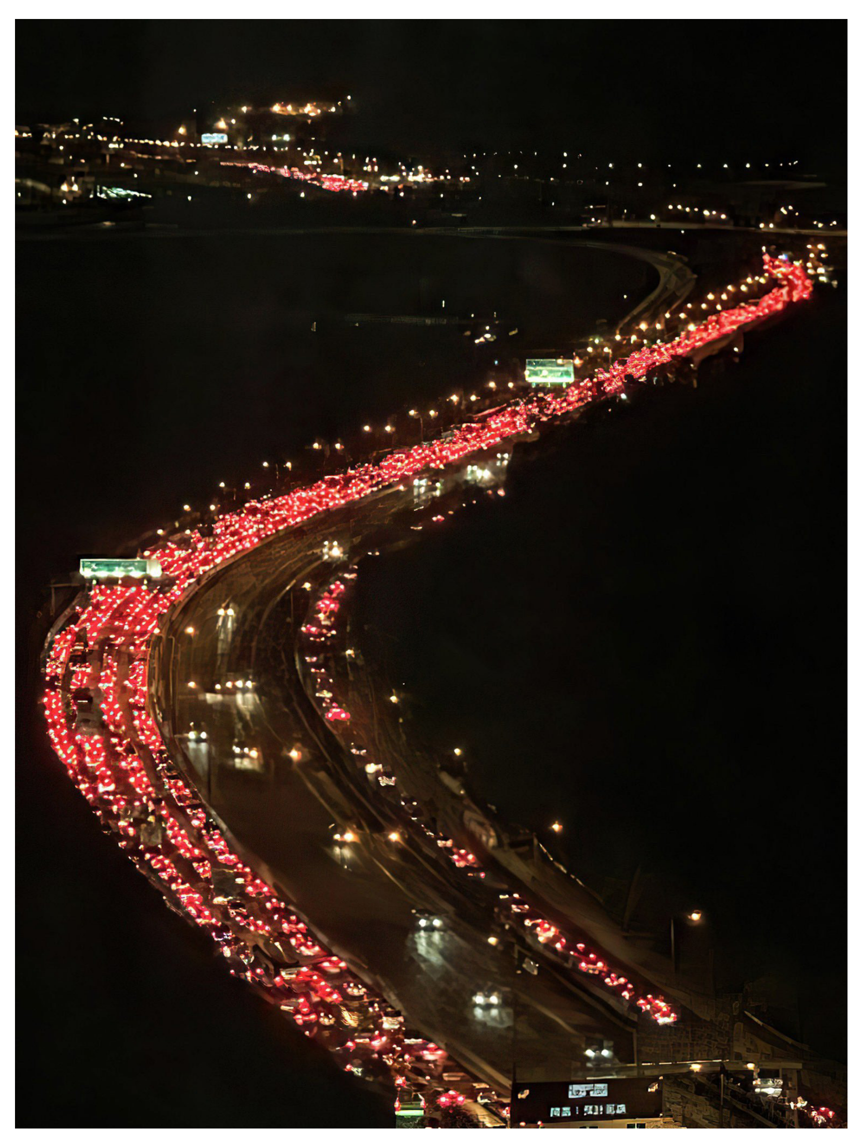
随着「反修例」示威演变为持续数月的长期抗争、打压日趋严峻，示威者所需的后勤支援持续时间越长、类型也更多样化，包括防御装备和物资、经济支援、避难之所、离开的交通接驳等。亲政府媒体时常用示威者所获得的经济支援、装备作为运动背后有「金主」指使的证据，事实上，示威者背后的确有很多的「金主」和义工，然而他们不是什么境外势力资助的机构，只是一个个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普通市民。在运动中大规模涌现的后勤支援，不论是物资或是义载车流，也反映出广大的市民对示威高程度的支持（不只是嘴上支持，而是亲身参与进来）。

在数个月的运动中，抗争者因应不同示威群体的需要，发展出大规模集散资源的「开源平台」和紧密同行的「家长网络」，这些后勤支援网络持续回应示威者的需求，令他们在打压下也不致孤立无援，可以支撑得久一些。

3.1 - 「开源平台」：集散资源和配对服务

/

电报频道作为「开源平台」在游击式的游行中，高效且大规模地调配和集散资源和服务，将防御装备、经济支援送到有需要的抗争者手上；让义载司机可以有效率地触及撤离的示威者。但「开源平台」的开放性也带来一定的风险。



在 2019 年 9 月初的瘫痪机场行动中，部分公共交通停摆或受警方搜查，大量示威者由公路徒步 20 公里回市区，市民自發出动私家车前往接送。（图片取自：Studio Incendo 脸书）

3.1.1 - 物资

/

3
/
3.1
/
▶ 3.1.1
/
3.1.2
/
3.2

运动之初，示威者在现场架起多个定点的物资站。「即时资讯台」在地图上标註物资站的位置，鼓励群众捐赠和拿取物资；游行结束后，则动员示威者搬运现场遗留物资，并调动货车协助运输和仓储，避免被警方或者食环署清走。

在运动发展一段时间后，示威者不断转移，定点的「物资站」减少。另一方面，随着警方的镇压强度增加，前线示威者所需的物资（防毒面罩、盾牌、眼罩）涉及一定风险，难以公开筹措和发放。因应集散物资的需要，示威者架设数个「电报频道」公开向市民徵求物资、或者筹款以购买物资，再供有需要的示威者匿名联繫平台交收。在持续数个月的示威中，这些由匿名的示威者营运的平台、累积一定的公信力，替示威者集散资源和过滤风险。

尽管这些平台在集散特定物资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但大量的简易物资仍然倚赖每位示威者在游行时多带几包索带、手套、矿泉水，即场分给有需要的人。「蚂蚁搬家」的作法在处理敏感物资时尤其重要，例如：砂糖、布料、油等製造燃烧弹的原料若由单个示威者集中携带，截查时则面对很大的风险。但若大量市民分散携带少量物资，再透过人链传递至前线，则可分摊风险。

3.1.2 - 「义载」

/

3
/
3.1
/
3.1.1
/
▶ 3.1.2
/
3.2

由于香港的公共运输系统堪称完善、同时空间成本非常高昂，基层市民难以负担拥有私人汽车的花费并靠公共交通出行。然而自 2019 年 7 月中开始，政府多次在游行前后暂停港铁服务，再在主要干道，包括红隧、东隧外设置路障和搜查市民，以及登上巴士和电车搜查；港铁若维持营运，亦会由警队驻守出入口，甚至衝入港铁站内以警棍击打、施用催泪弹以及滥捕。



2019 年 9 月，警队截停并搜查巴士长达 2 小时。（图片取自：欧新社。）



2019 年 8 月，警察在地铁站太古站拘捕示威者。（图片取自：端传媒。）

3
/
3.1
/
3.1.1
/
▶ 3.1.2
/
3.2

为了让示威者可以安全离开现场，在有示威行动的夜晚，大量义载司机在示威现场来回穿梭接送示威者离开，为了令「义载司机」和「示威者」的媒合更顺利，数个电报频道成立。

然而，平台难以核实大量义载司机的真实身份，任何人（包括卧底警察、政府的支持者）都可以透过平台登记义载；任何人也可能声称有义载需要却滥用资源。尽管示威者间有共识不向义载司机透露个人信息和在运动中的参与，也透过「校巴安全检查及匯报 BOT[1]」供示威者检验义载车辆是否是警察用车，但仍无法完全阻隔风险。



「大消物」的接放学服务资讯发佈。大部份的频道会要求义载司机填写上车和下车的地点、可乘载人数供示威者联繫。

1. 即因应使用者指令而自动提供资料的机器人

3.2 - 「家长网络」：以人为中心的安全网

/

在「反修例」运动中，学生和青年人（15-29 岁）的整体运动参与率高达 8 成 ，他们和警察衝突的比例最高[1]。换言之，大量参与激进抗争的「勇武」示威者非常年轻，当尚未财政独立的他们若因参与运动遭原生家庭经济封锁，生活顿时陷入困境。另一方面，他们在持续参与运动一段时间后，自然透过共同朋友、示威现场的偶遇，和其他较有资源和网络的抗争者建立关係，形成一些由熟人关係发展出来的支援网络。在运动中，年轻示威者被暱称为「仔女」，支援他们的人被称作「家长」，这种由年轻示威者与有较多资源的成年人组成的关係网络，就被统称为「家长网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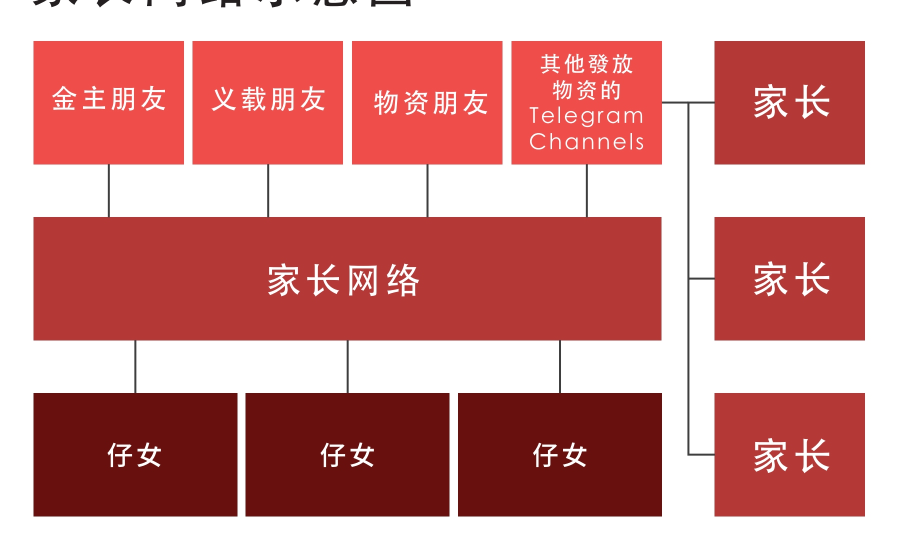
不同于透过开放的匿名通讯软件随机建立的连结，「家长网络」以抗争者既有的社会网络为基础发展而成，不但能够减少接触陌生人所带来的风险、也容易建立更深厚的信任。相较「开源平台」无法照顾到曝露于高风险的前线示威者的需要以及所提供的支援较单一，家长网络是前线示威者很重要的安全网，以每个「仔女」的需要为中心，提供更多不同面向的深层支援。

1. 香港中文大学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香港反修例运动中的民意状况研究报告》，2020 年 5 月。

在运动初期，许多「家长」从筹钱买饭券、订购防御装备开始接触「仔女」，再慢慢建立信任形成长期的网络。「家长网络」因为亲身接触高风险的前线示威者，是警察监控和追查的重点，难以公开招募义工或在线上匿名协作，大部分的家长从既有的社会网络寻觅队友和搜罗资源。

「家长网络」的型态有很多种，有家长以个人身份参与，有的由几个家长组成鬆散网络，一些则发展出较系统性的制度和分工。为控制风险，单个家长网络的规模并不大，但彼此间发展出有机的联繫，宛若匯聚和分享资源的小水塘。家长网络时有共用庇护空间、义载司机、订购物资的渠道；而当一个家长网络收到大量物资，也会分享给其他的网络。

家长网络示意图



「家长网络」所提供的不仅是经济和物资上的支援，而是由众人织成一个「社会安全网」接住「仔女」，令他们不至孤立无援。当彼此建立信任后，「仔女」会在示威行动中报平安，「家长」视情况安排义载和避难所；当「仔女」因参与运动导致学习跟不上进度，则帮忙招募义务补习老师追赶课业进度；当「仔女」饱受情绪困扰，「家长」会找心理辅导的资源帮助舒缓；若「仔女」在行动中受伤，会陪同看医生；若不幸被捕，则会跟进法律支援，以及后续的探访。

很多年轻的示威者来自基层家庭、拥有的资源并不多。当因运动参与和原生家庭关係破裂、学校的师长又随时可能报警。这些没有血缘关係的「家长」便在运动中和「仔女」一路同行，成为信任的朋友和陪伴者。

问：「为什么想做『家长』？」

> **家长：**
> 「最主要是我好不喜欢大部分的媒体将这个运动标籤为「年轻人」的运动，将这个责任摆在年轻一代那里。我觉得这件事是全香港人的事，我觉得好不公平，那些年轻人真的会这样想啊。我相处过后觉得，他们真的觉得原来是他们的责任，是因为我爸爸妈妈没有做好，我现在要替他们补救，令我更加……心痛这些小朋友，或者让我现在更加想和他们同行。」

家长：

「曾经有个手足在群组里面说想要自杀，我私讯他聊完好像有好一点，我意识到情绪支援好重要，但我又不是社工，我就想……最终是想陪他们走这一段路，因为这段路对我们成年人来说都已经这么艰难，对他们来说简直影响生命太多，所以会好想陪他们安全，完整的走出来。你派饭券、家长车、宿舍，陪他们看医生，或者什么都好，都是一些方式让他们知道有人支持他们，关心他们，让他们知道如果遇到什么困难是有人可以沟通的。」

4 - 医疗和情绪支援网络

/

在「反修例」运动中，频密的示威被警方以武力强硬镇压，抗争者在示威中遍体鳞伤，但运动期间警队长期驻守医院，病人的资料亦多次外泄。另一方面，大量示威者亲歴各种程度的暴力、长时间曝露在各种恐惧、不安、无助和愤怒之中，然而在白色恐怖的气氛下，示威者对体制内的社区及驻校社工不再信任，害怕因泄漏参与运动的经歴被捕。

在运动中，抗争者身上被烙印着可见和不可见的创伤，在充满不信任的社会中，它们难以被公开讨论、更难以被治癒，更无法透过体制内的医疗或社会资源来处理，于是许多医护专业、心理谘商背景的抗争者纷纷自发组织医疗和情绪支援网络与示威者同行。下面我们分别介绍运动中的「义务急救员」、「义务医疗团队」、「情绪支援网络」。

4.1 - 义务急救员

/

在「反修例」运动的街头示威中，身穿反光衣、戴着头盔、背着医疗物资的急救员是第一个处理示威者伤口的岗位。他们之中有些是专职医护人员或医护学生，有些则是考获急救牌照的急救员。在运动初期，急救员大多在急救站驻守、尾随游行队伍，帮中催泪弹的示威者洗眼、处理伤口、提供紧急医疗帮助接触。

在 2019 年 8 月后，警方频繁「反对」游行申请，「香港红十字会」、「香港圣约翰救伤队」等大型急救团队无法派员至「非法」游行。但与此同时，警队使用越来越强硬的武力镇压，伤者人数不断攀升，自发组队穿梭前线的急救员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随着街头行动的遍地开花，急救员小队须不断转移阵地，和车队网络合作，以应付快闪的抗争模式。另一方面，警方对急救员的态度转差，如拉起封锁线阻止急救员为被捕伤者处理伤势、甚至逮捕急救员。因应骤升的风险，不少急救员小队里有明确分工：在现场的队员定时报告实时位置确保安全；没有出队的成员则会为现场的队员整合衝突现场的消息。

4.2 - 义务医疗团队

/

当到医院看诊不再安全，支持运动的医护人员组织数十至上百人的义诊团队，在示威期间秘密为示威者诊疗伤患、復健、舒缓长期吸入催泪弹引致的症状[1]。受伤的示威者可以透过电报频道匿名求助，义务医疗团队会分流给当值的医生免费进行医治。在游行衝突的高峰期，每位医生在一週内时常接到十多位伤者的求助、甚至通宵看诊。

其中，一众中医师在 9 月初组成「国难忠医[2]」，连结约 100 名註册中医师和中医学生，看诊服务覆盖全港 18 区，治疗逾 6,000 名患者。在义诊外，他们观察示威者的需要，开始派发调配中药冲剂「咽痛饮」及「救肺散」舒缓吸入催泪烟的喉咙不适、聘请示威者做包装冲剂帮补收入、更向公众筹款推动开发处理伤口的「后勤医医」和精油舒缓焦虑助眠的「碌下仙」等项目。2019 年 12 月，「国难中医」正式成立诊所。

> **义诊医师：**
> 「我觉得一个人有病或者受伤能够得到治疗应该是基本的人权，但是原来他们去医院求诊，是会令他们有被捕的风险，我觉得这件事是好荒谬的，不应该发生。当然我们的能力都未必可以扭转到去医院竟然会被警察逮捕的事情。但是起码我们能够给到安全的地方，让他们看医生……所以我有好大的决心要做我现在想做的事情。」

1.〈不能说的伤口 义务医师秘密疗伤〉，《大学线》，2019 年 12 月 21 日。
2.「国难忠医」诊所社交媒体专页。

2.



4.3 - 情绪支援网络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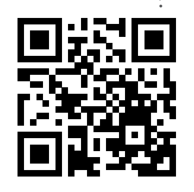
在「反修例」运动中，大量的暴力、恐惧、愤怒令不少抗争者出现情绪的困扰，甚至有数个示威者在运动中自杀，民间也涌现大量围绕情绪支援的网络。

2019 年 6 月，在伞后成立的「良心理政」开始组织社工、心理学家义务开设热线，辅导逾 700 名个案，其中 30 岁以下的占近 6 成。2019 年 9 月，原先帮被捕示威者找工作的「我要返工平台」发觉示威者的情绪需要，开始营运「我想倾计（我想聊天）」计划，联同社工和义工在线上提供辅导及聆听抗争者的心事。2019 年 11 月，「创伤同学会」[1] 成立，他们透过各种网上情绪支援课程及展览，引导参加者互相倾诉、聆听、互相支持、共同转化社会运动带来的集体创伤，「有别于寻找心理医生一对一的辅导，他们更想壮大同路人互相治癒的能力。」



「创伤同学会」的「和你活下去」互助计划。（图片取自：含蓄。）

1.《Breakazine 前总编辑山地：聆听集体创伤 思考社会转化》，《端传媒》，2020 年 5 月 1 日。

1.


5 - 被捕抗争者支持网络

/

截至 2020 年年中，近万名抗争者因「反修例」被捕、被控以严重的罪名。大部分的被捕人士不具政党或社运背景、没有镁光灯关注和资源。在运动中，示威者以「手足」相称，流露出如同至亲的深厚情感，并经常强调「手足不是 condom」，意指被捕示威者不是用过即弃的，需要大家的关注和同行。

运动初期，示威者發起在警署等候被捕人士保释（俗称：接放学）的行动，但随着所面对的镇压风险增加，冲突性的警署声援行动减少，但發展出更多长期支援被捕抗争者的工作。

每一位被捕抗争者作为一个「人」，从被捕的那一刻、到上庭审讯、入狱服刑、出狱之后的生活，都有不同层面的需求，除了经济和法律支援、更需要社会的关注、长期的陪伴同行、以及在出狱后被社会接纳的空间。面对大规模的需求，抗争者集众人之力付出时间和心力为被捕人士提供各种面向的支持。下面我们分作「法律支援」、「旁听师」、「在囚支援」、「再就业支援」四个方面介绍。



在 2019 年 7 的 28 日的港岛游行中，首次出现示威者大规模被控暴动罪，网民旋即發起在葵涌警署声援被捕人[1]。

17. 示威者包围葵涌警署 声援被捕人士 警民爆衝突。但随着运动发展，镇压的风险增加，衝突性的警署声援行动減少，发展出更多长期支援被捕抗争者的工作。（图片取自：亚新社）

5.1 - 法律支援

/

「反修例」抗争者成立「被捕人士关注组」电报频道，搜罗和发佈被捕者姓名、照片、地点及被送往的警署，让义务律师和亲属可以即时到警署跟进个案。频道亦设有「蒐证台」替示威者徵求现场视频以还原案发经过。

被捕的抗争者须面对漫长的法律程序，从律师陪伴录口供、提堂答辩、申请保释、探访都需要庞大的开支，而政府所提供的法律援助申请不一定成功或足够支付所有费用，众筹平台「星火同盟[1]」和「612 人道支援基金」在整合经济支援上扮演重要的角色。「612 人道支援基金」在运动中成立，共募得超过 1 亿 5,000 万港元，主要用来为被捕及被起诉者提供法律、紧急经济、医疗、心理辅导、还押、探监交通费等支援，至今惠及超过 14,000 人。在经济支援外，自发网络的参与也是关键，在运动被捕的高峰期，律师、教牧社工团队日以继夜在警署和法院奔波跟进案例、令被捕人士得到即时的协助[2]。

1. 在 2016 年的「旺角事件」之后成立，向身负暴动重罪但获得甚少关注的被捕人士提供支援，在「反修例运动」中向被捕人士提供法律支援、探访和经济援助。但在 2019 年 12 月，警方冻结星火户口高达 7000 万港元的款项，并拘捕 4 人，以洗黑钱罪方向调查。星火谴责警方的不实抹黑，暂停以银行帐户形式接收款项，改呼吁支持者在网店消费支持。
2.〈暗夜中守护公义　反修例运动义务律师〉，《大学线》，2019 年 10 月 29 日。

2.













「被捕人士关注组」发佈的被捕现场照片和影片徵求（图片取自：被捕人士关注组）

5.2 - 「旁听师」、「法庭直播师」、「送车师」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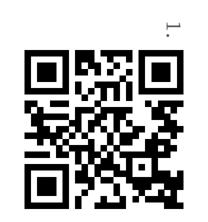
在「反修例」运动中，抗争者为了陪伴和支持每个被捕示威者，汇整审讯的日程表、旁听教学、交通资讯、疫情安排，令抗争者更容易加入「旁听师」的行列[1]。抗争者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佈「旁听师」的心得感想、也动员更多市民参与旁听。

「旁听师」时常也是记录审讯过程的「法庭直播师」和护送囚车的「送车师」。当数宗「反修例」审讯经常同时发生，媒体难以报导所有案件，而抗争者的纪录就变得格外重要。当抗争者将被捕人士的案情、审讯诘问的过程记录下来，并将案件整理成资料库，政治检控和司法的不公义被揭露也令更多人关注事件发展。在审讯结束后，「送车师」在法庭的车位聚集护送囚车，让抗争者见到同路人的手势、听见呐喊的口号[2]。送车不仅须在审讯结束后长时间的等候，警察更常以违反「限聚令」为由滋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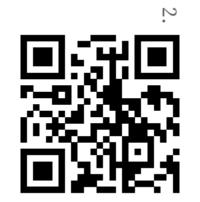
1.〈女生退下前线转任法庭「旁听师」：陪伴被捕手足，延续运动〉，《众新闻》，2020 年 6 月 20 日。

2.〈交通灯送给我们的片刻〉，《立场新闻》，2021 年 4 月 21 日。

1.



2.



5
/
5.1
/
▶ 5.2
/
5.3
/
5.4

全港九新界离岛师奶反送中师奶仔 2019 年 11 月 25 日：

「……阿姨讲得眼泛泪光：『有一个案件我印象好深刻，那个男生好斯文，我怎么样都不相信他一个人可以在警署袭击三个警员！他好有礼貌，第一次上庭，我问他可不可以给阿姨拥抱一下。第二次，他说他认得我。我说我支持他，他眼框泛红。我已经请好假，下次再去他的庭旁听。』

中年型男又说：『我平时轮班工作，週间如果放假就可以来，在一天里面去旁听几个审讯。』他无奈地说：『星期六日如果有游行，我要上班不一定可以去，尽量去，但有时真的去不了。像旁听这些我做得到的就赶过来！上个星期 11 月 18 日油麻地 242 人案，几个庭都要人旁听，我赶紧过来。我从 2 点半等到 6 点多才开庭，每个人都不敢离开……』

银髮 A：『我担心没有人去支持少数族裔，会特别选他们的审讯去旁听！虽然我都听不懂英文！……上次少数族裔少年都会讲一些广东话，大家聊两句，我们也支持一下他的妈妈。』」



旁听新手教学（图片取自：被捕人士关注组）



有送车师甚至为多陪「手足」一段路而追车。[1]（图片取自：立场新闻）

1.



5.3 - 在囚支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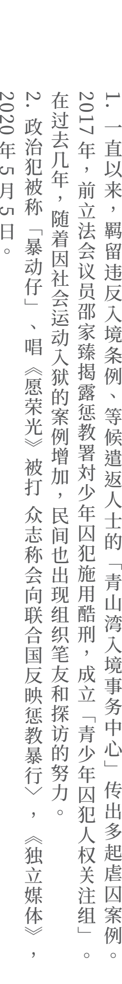
/

5
/
5.1
/
5.2
/
▶ **5.3**
/
5.4

在囚人士遭受酷刑、人权受侵害并非是次运动独有[1]，然而直到「反修例」运动的抗争者大规模被囚，狱中的压迫和囚权议题才进入大众的视野，「反修例」抗争者数次揭露[2]在惩教所内因其政治立场被辱骂、酷刑虐打的情况，狱政改革受到更多人的关注。尽管监狱制度的结构性问题难以在短时间内改变，但大量的抗争者透过探访、写信、改善膳食令在狱中的抗争者可以维繫和墙外的连结、生活得有尊严一些。

不少民主派区议员在选举胜出后，想以公务探访在囚的抗争者，但没有编号、对囚权议题也不甚了解，长期关注囚权的议员和「被捕人士关注组」、义务律师团促成「区议员探监协调」电话热线，整合在囚示威者的资料，协调各区区议员的探访。

抗争者也透过节录网络文章、和「墙内的手足」通信令他们知悉外界的动态，有固定的交流和连结。在监狱里无法上网，但在「解闷工厂」的努力下，在囚的抗争者仍然可以阅读到网络文章。「解闷工厂」成立于 2017 年，在反新界东北规划拨款的抗争者与「双学三子」入狱后，为了让他们仍能掌握社会的脉动，朱凯迪议员办事处的职员和义工分工搜集网媒报导和网络热话，排版后打印为信件的形式，每週分数次寄给在囚者。在「反修例运动」爆发后，有收信需要的在囚人士激增，同时有更多新晋区议员和义工「开设分厂」分摊部分工序。



1. 一直以来，羁留违反入境条例、等候遣返人士的「青山湾入境事务中心」传出多起虐囚案例。2017 年，前立法会议员邵家臻揭露惩教署对少年囚犯施用酷刑，成立「青少年囚犯人权关注组」。在过去几年，随着因社会运动入狱的案例增加，民间也出现组织笔友和探访的努力。
2. 政治犯被称「暴动仔」、唱《愿荣光》被打 众志称会向联合国反映惩教暴行〉，《独立媒体》，2020 年 5 月 5 日。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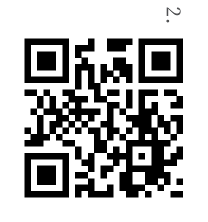
很多抗争者也成为「写信师」。数个「电报平台」搜集来自公众的信件再寄给在囚人士；每逢节日，多区的区议员摆设街站，将市民写下的节日祝福转交其律师团队。2020 年年初，前立法会议员邵家臻也发起「和你写、和你做笔友」计划，收集公众来信，为狱中抗争者配对笔友或送上鼓励的信件，已近 5,700 封信，配对了 600 对笔友。2020 年年初，邵家臻创立公司「石墙花[1]」，持续向被捕人士和家属提供情绪、物资支援、推动笔友计划和狱政改革。

> **解闷工厂义工：**
> 「你能够给他一点资讯，让他不至于与外面的世界脱节，也支撑了很多坐紧嘅手足嘅意志。[2]」「对于一个被困住嘅人嚟讲，定时定候嘅 connection 好重要。[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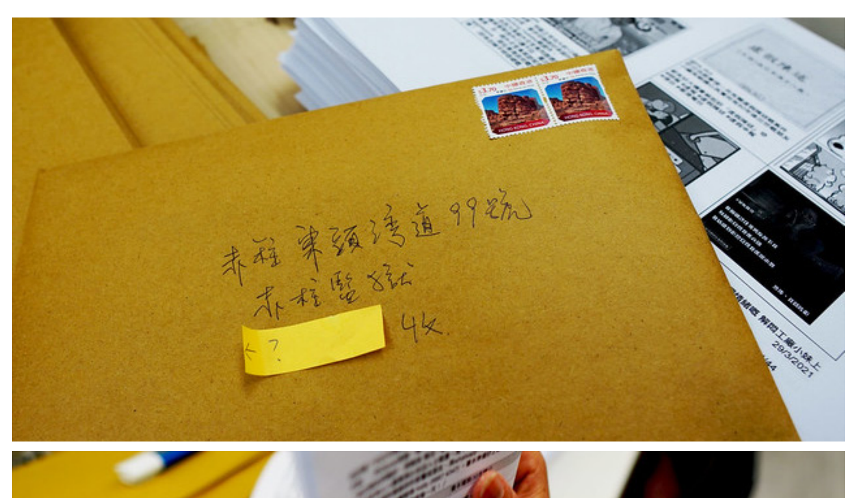
在狱中，不仅环境卫生欠佳、膳食更是恶劣。尽管法律容许「候审囚犯」申请持有合法牌照食物供应商提供的私人膳食，俗称「私家饭」。但惩教署的条件严格，数间惩教所长年没有餐厅成为供应商。在「反修例」运动期间，数间「黄店」申请成为供应商，最终由「潮食阁」成功申请成为励敬惩教所的供应商，不惜亏本也以低廉的价格为还押人士提供膳食。

1. 「石墙花」网站
2. 〈监狱高墙之下，写信师写给被囚示威者的一封封信〉，《端传媒》，2020 年 9 月 8 日。
3. 〈朝云：点解还押抗争者仲睇到连登？全靠解闷工厂的义务工人〉，《立场新闻》，2020 年 4 月 3 日。

1.


2.


3.



「解闷工厂」的义工将资料包摺叠好、放入信封。（图片取自：独立媒体。）



石墙花的「和你做笔友」计划文宣。（图片取自：石墙花。）

5.4 - 「再就业」支援

/

5
/
5.1
/
5.2
/
5.3
/
▶ 5.4

截至「反修例」运动一週年，被捕人士仅 2 成人被起诉、逾 6 成案件仍在调查中。虽然被捕人士在审讯前是「无罪之身」，但由逮捕、检控、辩护到判刑，需要面对冗长的司法程序。即使被捕人士获得保释，也需按法庭要求于指定时间到警署报到，有被捕人士因此失去工作。另外，在香港干犯刑事罪行被定罪后会留下刑事记录（俗称案底），令求职变得困难重重。为了令被控或完成服刑的示威者不用再为生计及前途忧心，民间纷纷成立再就业平台，为手足媒合支持运动的「良心僱主」。

其中，「我要返工 良心平台 [1]」在 2019 年 7 月成立，创办人眼见朋友因「暴动罪」而失去工作，开始构思这个配对手足及良心僱主的平台。示威者可以透过电报频道联繫平台，在平台义工核实身份、了解需求后再和雇主的职缺进行配对 [2]。平台更义务提供就业培训、写履歷面试技巧分享、情绪支援，帮助失业的抗争者度过难关。截至 2020 年年底，平台累积超过 1,100 位良心僱主，服务超过 4,000 名失业人士。在 2019 年年底，随着「黄色经济圈」的网络逐渐成熟，不少商舖公开表示会优先聘请被捕的示威者。

1. 「我要返工 良心平台」网站
2. 《抗争中搵食难 网上平台助配对》，《大学线》，2019 年 11 月 20 日。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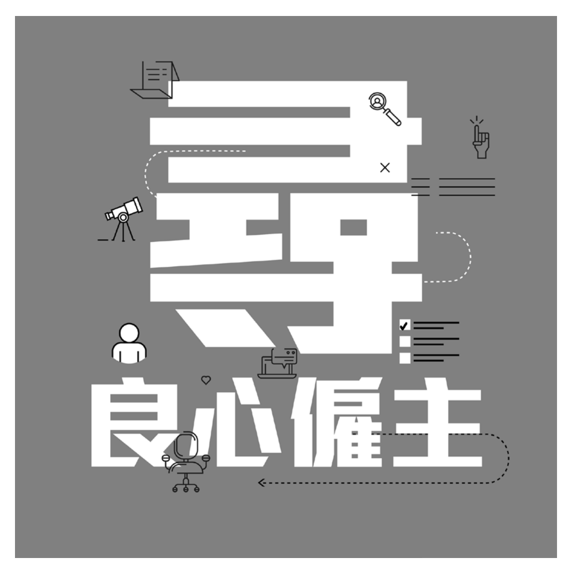


2.



「我要返工 良心平台」创办人：

「我的感受是法律支援是一定有的，这个不需要担心，但其他事呢？你的生活、家庭、情绪……很多生活的细节是社会不会照顾到你的……你定期要上庭，要找一个怎样的雇主？如何跟别人解释『我是暴徒』、背着暴动罪？」



「我要返工 良心平台」在2019年7月成立(图片取自：我要返工良心平台 facebook)



「和你译」媒合翻译客户和抗争者，翻译费用一半支付负责翻译工资，另一半给 721 基金会支援流亡海外的抗争者。（图片取自：和你译）

6 - 街头沉寂后 这些网络去哪里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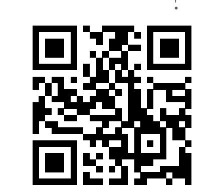
▶ 6

在 2019 年，大量「去中心化」的微型自发网络因应「街头行动」的需要而诞生，各方面的后勤支援不仅增强街头抗争面对政治打压的韧性，也在如水聚散的示威浪潮中，创造不同年龄和背景的抗争者参与和连结的节点。在运动初期，参与前线示威被视为「勇武」；参与「自发组织」支援则被视为「和理非」。但随着政治打压日益严峻，这些后勤网络所面对的风险急遽增加，也成为被抓捕的对象。

在 2020 年，部分后勤网络因示威的减少令活跃度下降，公共活动空间也持续收窄、连侬墙凋零、街站不再蓬勃发展。 然而，随着疫情的爆发，过去统整资讯、动员群众的文宣网络立即投入抗疫的实践中。抗争者所架设的区议会候选人资料站变作新冠肺炎一站式资讯站；社区的「连侬墙」小队张贴和疫情有关的新闻、对防疫政策的剖析批判、公共卫生的知识，在提高民间抗疫意识上发挥很大的作用。同时，书写社区的「社区报」也蓬勃发展[1]。

1. 〈【特写】连侬墙倒下 文宣何处寻？ 办社区报的师奶、前线、中学生〉，《立场新闻》，2020 年 5 月 26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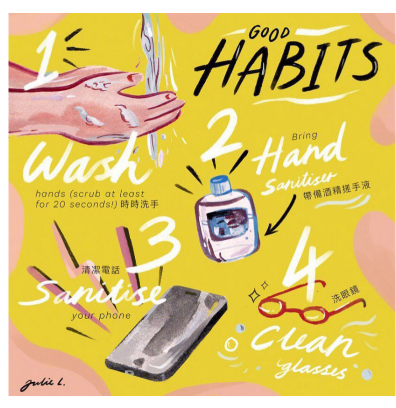
1.



► 6

在 2019 年的运动中所凝聚的抗争者网络并没有完全消散，部分网络所乘载的信任和连结在其他的抗争阵线（黄色经济圈、工会、区议会）「遍地开花」；部分则在社区中扎根，形成互助网络，投入民间的自救抗疫行动中。在 2020 年，大量的示威者面对审判和漫长的刑期，抗争者阵营笼罩在运动被强硬打压所带来的创伤里，被捕和在囚抗争者支援、情绪支援的网络获得更多的关注。





文宣网络创作倡导公共卫生和呼吁罢工的文宣再在社区连依墙张贴。（图片取自：反送中文宣谷）



全港各区「社区报」地图（图片取自：屯敘）

延伸阅读

1. 〈文宣组的故事：合作可以带来很大的创意〉，《端传媒》，2019 年 10 月 9 日。
2. 〈【连侬墙袭击背后 】专题〉，《明周文化》，2019 年 9 月 5 日。
3. 〈义载中年：与年轻陌生客的暗夜逃亡〉，《端传媒》，2019 年 10 月 5 日。
4. 〈【特写】社工、急救、接放学　屹立在前线后的支援者们〉，《立场新闻》，2019 年 9 月 9 日。
5. 〈「石墙花」为还柙民主派送物资包　邵家臻：我哋係坐监共同体〉，《众新闻》，2021 年 3 月 14 日。



街头之外的抗争

PROTESTS BEYOND STREETS





在 2019 年下半年持续的示威浪潮中，抗争的种子在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播种生根。当两所大学的示威在 2019 年 11 月被严厉镇压后，街头抗争面对无以为继的困境。在运动中诞生的新工会浪潮、区议会、「黄色经济圈」则承载运动的能量，成为示威者继续抗争的主要阵地。

2019 年 12 月，内地的新冠肺炎疫情曝光，2020 年 1 月底，香港出现首宗确诊。在疫情中，港府在抗疫政策上的反应迟缓，却以「控制疫情」的名义打压集会游行自由，推进对公民社会的监控；而新工会、区议会、「黄色经济圈」等网络则成为「自救抗疫」的主体，动员公民社会在「抗疫」中「抗争」，产生更进一步的跨网络连结。

另一方面，在急遽紧缩的政治环境中，抗争者要在公共空间的大规模示威表态十分困难，围绕着区议员、新工会、黄店的网络是持续发声反抗政治打压的重要力量，而这些街头之外的抗争空间也是抵抗政治打压对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侵蚀，维繫抗争者之间连结的重要阵地。

前页图片取自：端传媒（上）、立场新闻（下）。

1 - 新工会浪潮

/

在 2019 年，各行各业的工人在示威浪潮下投身运动。各界别的抗争者发起以行业为号召的集会游行，对政权提出控诉。民间发起罢工尝试瘫痪经济对政府施压。在 2019 年，绝大部分参与罢工的抗争者并非工会成员，亦非以工会决议集体发起罢工，但在这些行动中所累积的经验和持续的社交媒体动员和「罢工试验」，开启了抗争者在职场连结的契机，并且在 2019 年年底炼成现时可见的新工会浪潮。

本章介绍「反修例」运动中新工会浪潮的炼成、香港过去的工运格局、以及工会在疫情下的抗争。



在 2020 年的元旦大型游行中，数十个新工会沿途摆联合街站招募会员。
（图片取自：立场新闻）

1.1 - 过去的工运格局

/

在主权移交后，香港政府巩固殖民时期高度维护资本利益、劳工权益没有保障的社会政策，而议会里少数的政策倡议迟迟未能推动标准工时、合理最低工资、退休保障等政策。在工人的组织上，香港在 1970 年「去工业化」后，产业结构高度向金融、服务业倾斜，但数十年以来，这些行业的工会会员数目和动员能力非常有限。尽管香港建立工会的门槛低[1]，工会参与率亦不低，但大量工人受亲建制「工联会」的低廉会费和优渥福利招揽入会，实际上职场的组织基础十分薄弱。

2000 年后的扎铁、码头、清洁工罢工等数个个别工人斗争将劳工权利的讨论带入公众视野，却未能成为有影响力的大型群众运动。另一方面，当职工盟以「独立工会联盟」[2] 的角色，致力在香港推动既「反抗资本剥削」亦「反抗极权统治」的进步力量时面对许多挑战。虽然职工盟和工党代表在争取政制改革的民主运动中公开发声，然而其属会会员的集体参与并不活跃。也因为其属会不论是覆盖率、会员人数、或者动员能力都非常有限，在 2003 年、2014 年的民主运动的关键时刻，工人未能透过「罢工」瘫痪生产以在民主运动中发挥影响力。

1. 根据《职工会条例》，向职工会登记局提交至少 7 名会员的签署即符合申请资格，
2. 1948 年，共产党扶植的「香港工会联合会」和国民党扶植的「港九工团总会」分别成立，受内地的政治斗争影响，香港的工会被这两大阵营所垄断。1990 年，连结独立工会的「基督教工业委员会」成立「香港职工会联盟」，推动工人争取权益并向政府争取劳工立法。到 1990 年代，随着「工团」失去影响力；「工联会」被亲政府的建制体系吸纳；「职工盟」成为连结跨界别独立工会、社会运动网络、民主政党的力量，「工联会和职工盟在民主化和劳工权利上彼此抗衡」。

在 2014 年的雨伞运动之后，关心劳权、批判资本的左翼团体成为本土派的攻击对象，在社会上开展工人权益和组织的讨论举步维艰。过去职工盟和学生组织数次在不同的罢工中合力声援和筹措资源，但在 2016 年，九所大学学生会发表联合声明，拒绝参与职工盟举办的劳动节团结大游行；李卓人在同年的立法会选举中落选，上届取得四席的工党仅有一席连任。

总而言之，在 2019 年的运动前，过去的劳权团体大抵上陷入低潮，工人运动并不活跃。而在民主运动中，政府经常以「保民生、拼经济」作为打压的藉口，导致在社会上普罗大众的讨论里，关乎「民主政制」的政治斗争和关乎「民生经济」的经济斗争彷彿并不相干，甚至相互对立。

工会战线的形成

（引用自职工盟《工会革命攻略》）

2019

2019 年 6 月 12 日： 民间号召罢工以配合「包围立法会行动」
2019 年 6 月 17 日：民间号召罢工
2019 年 7 月 26 日：空中服务员号召机场集会
2019 年 8 月 1 日：金融业从业员号召中环集会
2019 年 8 月 2 日：医护工作人员和公务员发起中环集会
2019 年 8 月 5 日：民间号召罢工＋不合作运动＋集会
2019 年 8 月 17 日：教师游行
2019 年 8 月 23 日：会计师中环午餐时间游行
2019 年 8 月尾：民间跨界别罢工筹备组成立
2019 年 9 月 2 - 3 日：民间号召罢工＋不合作运动＋集会、医护人员午餐集会
2019 年 10 月：两百万三罢阵线成立
2019 年 11 月 11 - 15 日：民间号召罢工＋不合作运动
2019 年 12 月 2 日：广告界五天罢工
2019 年 12 月 8 日：多个工会在游行中摆街站，挂起「组织工会，行业抗争」的旗帜
2019 年 12 月 11 日：医疗业界工会集气大会
2019 年 12 月 15 日：社福界集会
2019 年 12 月 17 - 19 日：社福界为期三天的罢工
2019 年 12 月 17 - 19 日：跨工会街站
2019 年 12 月 20 日：音乐界罢工五天

2020

2020 年 1 月 1 日：元旦大游行
2020 年 2 月 3 - 7 日：医护工会两阶段罢工，要求政府禁止旅客经中国大陆入境
2020 年 2 月 7 日：巴士业职工会联盟和「港铁新动力」通过罢工议案但谈判不成暂缓议案
2020 年 2 月 19 日：新公务员工会集会抗议政府防护衣物不足
2020 年 5 月 1 日：新工会设立逾 50 个街站
2020 年 6 月 20 日：「二百万三罢工会联合阵线」联同「中学生行动筹备平台」就《国安法》举行罢工罢课公投，因参与人数未达门槛而未能发起行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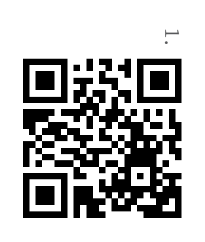
1.2 - 「反修例」中的工人行动

/

在「反修例运动」中，工人、学生、市民都高度参与在数个月的频繁示威中，炼成共同的经验和连结，也是随后工人行动的基础。广告和设计业从业人员不眠不休创作文宣；「阵地社工」在催泪烟弥漫的衝突前线，站在警队和示威者的伞阵中间调解；医护人员在隐蔽的临时诊所救治伤者，避免示威者因就医被捕；有保安因阻止警队进入私人地方而被拘捕和控罪[1]；有酒店从业员揭露警方在酒店的部署和搜查以避免示威者被捕。在运动中，各行各业的工人都是抗争者的一份子，起而反抗、在各自的岗位贡献所能。

在 2019 年的 8 月至 11 月间，随着政权镇压示威的强度增加，前线的年轻示威者付出巨大的牺牲，更多示威者认同：「越多人选择承担这场运动的责任，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年轻人就不用再走上街头，被滥权的警方用过份的武力伤害……他们不用再押上自己的前途，去争取我们共同的远景。[2]」在这个背景下，示威者在各自的行业发起行动对政权提出控诉。民间也发起数次罢工，尝试瘫痪城市的经济运作向政府施压。这些行动催生各个行业的工人网络以及跨界别的行业连结，为 2020 年的新工会浪潮打下基础。

1. 《新港城保安阻防暴警进商场后被捕 警方：五人暂获释 保留检控权》，《立场新闻》，2020 年 3 月 30 日。
2. 8 月 2 日的医护集会开场发言人道出工业行动背后的想法。

1.


2.


1.2.1 - 行业工人的行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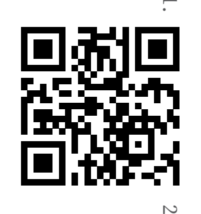
/

在过去的民主运动和劳工政策讨论中，亲建制阵营的工联会和功能界别选委经常垄断各个行业工人的声音，然而在「反修例」运动中，多个过去组织基础薄弱的界别（金融业、公务员、医护、酒店、白领文职）的前线工人以示威游行、联署发声表达支持运动的立场。

在这些行动中，各个行业的工人往往从职业身份出发、着重相关议题，然而他们也强调「香港人」身份认同和是参与运动的重要驱动力。例如：医护界集会发言人在开场致词中说：「我们是一群来自各阶层但同属医疗行业的辛勤工作者，虽然来自不同的部门，但却拥有共同的身分：香港人[1]」；会计公会的理事在访谈中说：「我们先是香港人，然后才是会计师[2]。」

1. 〈【遍地开花】医疗专职界别集会详情〉，连登讨论区，2019 年 7 月 30 日。
2. 〈【专访】会计师公会理事争取民主发声「我们先是香港人，然后才是会计师」〉，《苹果日报》，2020 年 2 月 2 日。

1.



2.



金融业从业人员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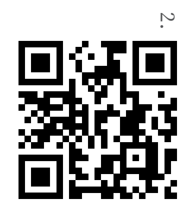
在「反修例」运动中，占本地的生产总值首位（19.8%）的金融界从业人员率先表示对运动的支持。在 8 月 5 日的罢工前，他们在中环遮打花园举行「香港金融同路人快闪中环遮打花园」集会，有数千人响应。抗争者将行业的发展扣连香港的法治和自由，出现「自由不保，资金走佬」的文宣。

另一方面，当示威者在中环发起午间快闪示威，金融业工人因行业的区位特性[1] 而就近积极参与。2019 年 10 月，示威者在午间在中环快闪游行抗议政府推行《禁止蒙面规例》，并呼吁在附近的金融从业员参加。当日近千名西装笔挺的示威者出现在游行队伍并占领道路，开启「和你 lunch（工作日的午间示威）」的先例[2]，其他商业区的白领上班族也纷纷响应发起「和你 Lunch」。



中环和你 Lunch（图片取自：立场新闻）

1. 中环是香港的交易所、跨国银行、金融机构的总部所在。
2. 〈大批市民中环快闪游行抗议立《禁蒙面法》〉，《NOW 新闻》，2019 年 10 月 4 日。

2.


医护人员

/

在 2019 年的示威中，许多医护人员不仅成为前线急救员，为示威者提供义诊，更持续发起行动抗议政府、警队和医院在运动期间的表现。在 8 月 5 日的罢工前，过万名医护人员和市民在中环发起集会[1]，控诉医管局未能保护病人私隐、警队阻碍现场救援。

在随后数个月频繁的街头行动中，多间医院的前线医护人员自发组织多轮午餐示威[2]、在医院搭建连侬墙，表达对运动的支持，声援被捕的医护，谴责警暴滥权阻碍救援。其中，警方以橡胶子弹射盲急救员、拒绝让急救员进入太子地铁站等事件触发数十间医院的医护在同一日示威，不少医护以纱布遮盖右眼，声援右眼中弹的急救员。



数千名医护人员 8 月 13 日中午在十多间公立医院举行静坐集会，抗议警方滥用武力，政府漠视民意，参与人数总计过千人。（图片取自：立场新闻）

1. 〈医护界集会迫爆爱丁堡广场　出席者称受压「但怯都要做正确的事」〉，《立场新闻》，2019 年 8 月 2 日。
2. 〈医护界集会迫爆爱丁堡广场　出席者称受压「但怯都要做正确的事」〉，《立场新闻》，2019 年 8 月 2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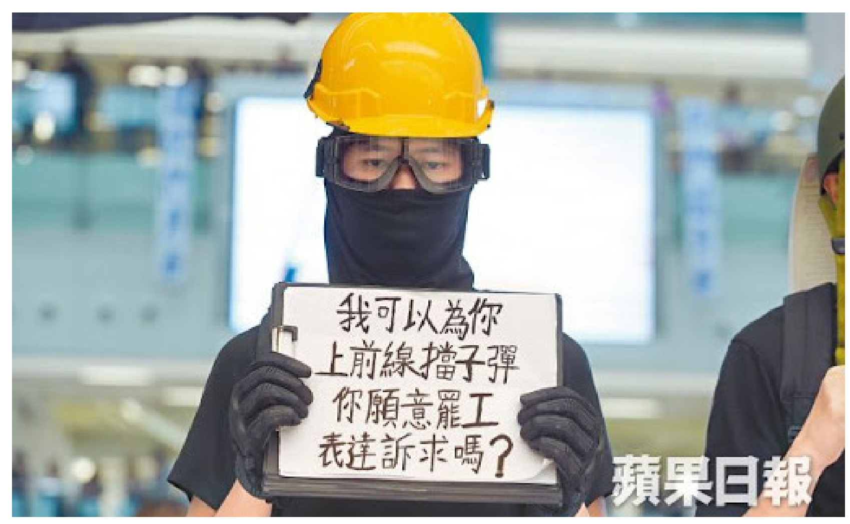


1.2.2 - 民间大三罢

/

在职场的组织基础薄弱、主要行业的工会覆盖率和动员能力都非常有限的背景下，「反修例」的抗争者主要透过社交媒体动员罢工。在 2019 年 6 月 12 日，抗争者首次在社交媒体上发起「三罢（罢工、罢市、罢课）」阻止政府二读通过「修例草案」，当日大量示威者罢工、瘫痪立法会附近交通，成功阻止条例通过。

随着政府拒绝让步且警暴日趋严峻，抗争者开始讨论用「罢工」瘫痪经济以向政府施压。「和理非」示威者自认应响应罢工来推进运动的升级，避免「勇武」示威者继续流血和被捕。从 7 月底，号召罢工的街站在各区遍地开花；前线装束的示威者举着「我可以为你挡子弹，你愿意为我罢工吗？」动员市民罢工的照片在社交媒体上成为话题，抗争者成立各个行业的群组交流，促成 8 月 5 日的首场大规模罢工。



（图片取自：苹果日报）

在 8 月 5 日，共有 35 万人参加罢工和各区集会，其中，超过一半的航空业工人罢工，使 170 班航机因控制塔人手不足而取消，造成一定的影响[1]。虽然响应「八五罢工」的人数可观，但罢工者分散各个行业，不到一成（8.4%）的受访者是工会会员，过半（53.8%）的受访者是以其他原因放假、年假或病假的方式「罢工」[2]，因没有共同的罢工方式和协调机制，难以评估罢工的成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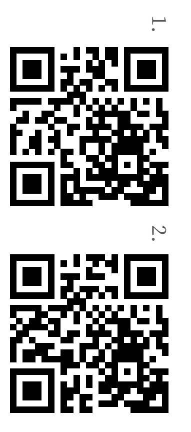


2019 年 8 月 5 日的七区罢工集会文宣图（图片取自：反送中文宣谷）



2019 年 8 月 5 日的金钟添马公园罢工集会（图片取自：立场新闻）

1.〈吴敏儿：8.5 有 35 万人罢工 推动新形态抗争方式〉，《立场新闻》，2019 年 8 月 6 日。
2.〈从「8.5 罢工」调查 看新形态抗争方式的走向〉，《香港 01》，2019 年 9 月 1 日。

1.
2.


当日，交通「不合作运动」所筑成的「罢工封锁线」发挥重大的影响力。在上班的尖峰时间，数条地铁线路因示威者阻止车门关闭而停摆，主要干道因路障和慢驶出现堵塞，城市交通运作大规模受阻。示威者在各区集会地点就近占领道路，警方施放大量弹药，进行大规模清场行动，拘捕 148 人。

在 8 月 5 日的尝试后，抗争者在 9 月至 11 月间发起数次罢工，但因长期薄弱的职场组织基础，响应罢工的人数逐渐递减，在没有工会或其他组织基础作为后盾的情况下，分散在不同行业的抗争者倚赖「不合作运动」合理化其缺勤[1]；也用瘫痪交通来强制停摆生产，令想上班的市民上不了班。在 11 月中连续五日的「三罢」号召更不再举办罢工集会，着重堵路瘫痪交通，虽然这种透过「不合作运动」强制市民「被罢工」的抗争手法被抗争者阵营所理解，但也引起部分市民的反弹。



示威者在港铁钻石山站、荔景站、炮台山站阻止车门关闭，以瘫痪地铁运作。（图片取自：美联社）

1. 〈8.5全港罢工访问概述：参与集会的打工仔所思所想是甚么？〉，《惟工新闻》，2019年8月7日。

1.



1.3 - 新工会浪潮的炼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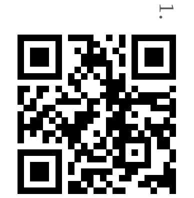
/

在 2019 年的民间罢工中，抗争者建立行业通讯群组以发起集会和动员罢工，而后这些群组成为串连行业同路人的平台，各个行业的积极份子在群组内结识并筹组工会。在筹办跨行业罢工集会的契机下，各行业的积极份子产生交流，组成「民间跨界别罢工筹备组」发表共同声明，更催生随后的跨行业工会网络。

在 2019 年 11 月后，当街头示威的升级面对瓶颈，「大罢工」被视为运动的出路之一，而过去的罢工经验让抗争者意识到：职场的组织基础能造就更有杀伤力的大罢工。在这个背景下，2019 年所累积的跨行业工人网络炼成「新工会」的筹组浪潮[1]。其中，「二百万三罢联合阵线」（简称：三罢阵线）扮演重要的角色，促进工会间的信息交流和共同发声，也透过「罢工日程表」汇整不同行业的集会和街站资讯。在阵线的媒合下，过去动员市民参与示威的学生、社区居民、区议员义工网络和新工会连结，遍地开花向抗争者宣传组建新工会，发起「具组织具计划」的罢工抗争路线，招募新会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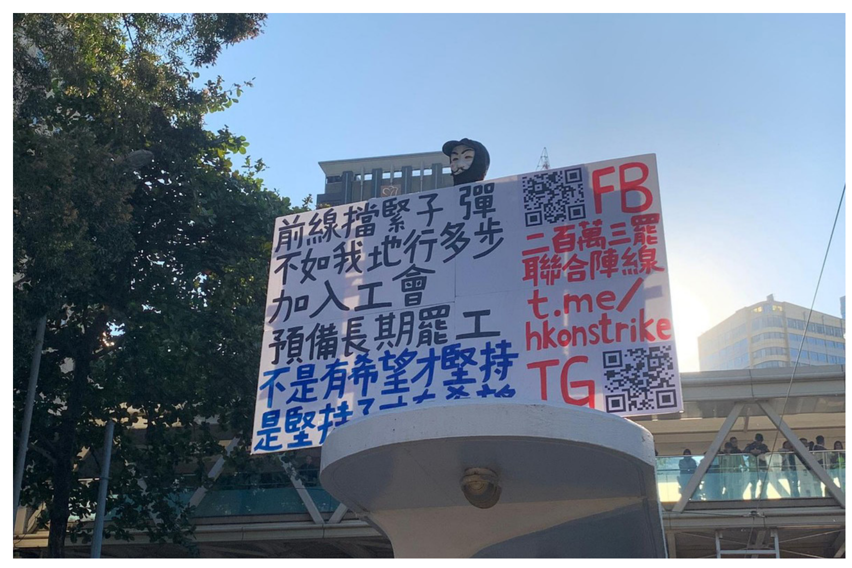
1. 两百万三罢联合阵线的工会列表。

1.



香港每年新增的工会数目一向非常低，但从 2019 年 11 月开始，职工会的登记申请数目大幅攀升。其中，有大量的新工会是示威者为登记劳工界选民、抢占立法会功能组别和特首选委议席而註册；但也有数十个工会是抗争者为了组织同业工人，发起「政治罢工」而筹组，它们以「凝聚同业、重夺行业工人的话语权」为方向，计划争取政治民主、社会公义和劳工权益。随着新工会的成立，工会成为抗争者连结彼此和发展组织的阵地，也在 2020 年紧接着爆发的疫情中成为重要的行动主体，在不同的政治和经济议题上发声和行动。

1
/
1.1
/
1.2
/
1.2.1
/
1.2.2
/
▶ 1.3
/
1.4
/
1.4.1
/
1.4.2
/
1.5



「三罢阵线」将罢工路线图简化为「四部曲」：第一步，「组织工会」，在各界别成立 20 个工会；第二步，「扩大工会」，在 40 个工会中，20 个工会的会员人数占该行业从业人员一成；第三步，「决议罢工」，发起会员大会和投票，了解会员的想法和参与罢工的人数；第四步，发起罢工。（图片取自：立场新闻）



在多个网络的努力下，各个行业的工会街站在全港遍地开花。
（图片取自：两百万三罢「电报」频道）

1.4 - 疫情下的新工会

/

2020 年 1 月 22 日，首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透过高铁输入香港，港府却未有在边境实施控管和检疫政策，引发民间社会的担忧和愤怒，新成立的医护工会率先用罢工挑战边境控管政策。

在街头抗争沉寂的 2020 年，政府在各行各业进行「整顿」、清算和控制，新工会则持续就疫情下的职场生计问题和社会上的不公义发声。

1.4.1 - 罢工封关救港

/

香港发现首宗确诊的翌日，新工会「医管局员工阵线[1]」要求医管局[2]要求政府禁止旅客经由中国入境，并确保医护人员的工作安全，否则发动工业行动。随后，逾十个新工会举行「工会防疫联合新闻发佈会」，并提出「禁止旅客经中国大陆入境香港」的共同诉求。

在医护工会宣佈发起工业行动的动议后，会员人数在短时间内呈海啸式增长（由 300 人增加至 18,000 人），占员工总人数的 22.5%。2 月 1 日，医护工会在会员大会大比数（以 3123 票赞成，10 票反对）通过五日的两阶段罢工计划，9000 位来自各职系的工会会员签署《罢工宣言》[3]。在工会和医管局、政府谈判不果后，工会在 2 月 3 日发起非紧急服务员工的罢工，当晚和医管局的公开谈判破裂后，工会再启动第二阶段持续四日、包含紧急服务员工的全面罢工。



罢工救港。（图片取自：职工盟团结报）

1.「医管局员工阵线」是在「反修例」的大三罢浪潮中成立的新工会，2019 年 10 月中在「电报」群组形成核心的筹组工会小组，11 月递交申请，12 月初正式成立。

2.「医管局」是负责管理香港公立医院的法定机构，并透过食物及衞生局局长向香港政府负责。在 2018-2019 年，医管局逾 9 成收入来自政府拨款，僱员总数近 8 万人。

3. 2 月 2 日，工会和医管局及政府的谈判因「抗疫督导委员会」主席林郑月娥不出席而取消。



2020 年 2 月 3 日，罢工的医护在医管局大楼内与医管局行政总裁高拔陞对话。摄：陈焯煇（图片取自：端传媒）

抗争者阵营积极向市民解说医护罢工以争取市民的支持，在罢工投票当晚，「三罢阵线」联同各区的文宣网络、区议员在全港将近 30 处自发组织「医护罢工点票直播和集气街站」，数百名市民直播见证工会大比数通过罢工议案的歷史性一刻。在罢工期间，各界别的新工会、黄店、社区抗争网络，区议会积极投入动员和宣传声援、向市民解说医护罢工的原因，并鼓励和医护同罢。

在社会的支持下，医护罢工对政府产生一定程度的压力。虽然特首屡屡批评罢工，强调「任何人如果认为用极端手段可以威迫政府，都不会得逞」。然而，在医护工会要求「封关」并动议罢工后，政府修改入境政策，关闭跨境高速铁路及多个口岸、实行 14 日强制检疫，虽然无法完全堵塞漏洞，但使由内地入境人数显着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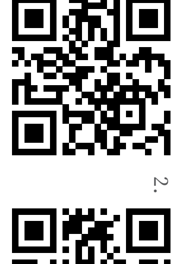
医护罢工是 2019 年新工会浪潮发起的首场罢工，在实际入境政策上的推进之外，在运动中也有划时代的开创性意义。正如职工盟干事邓建华所总结，「『医管局员工阵线』提出的『抗疫五大诉求』将罢工中的政策要求和员工的实际需要扣在一起，罢工因此既是政治罢工，也是经济罢工。[1]」医护的罢工打破香港过去社会运动中经济和政治斗争割裂的局面。工会在罢工的试炼下经歷海啸式的会员增长，在短时间内成为组织基础遍布各个职系，有行业代表性的大型工会，也成功发起首场以「工会」为集体行动主体、经民主程序决议发起的罢工。

医护罢工也创造了两个重要的连结：连结跨界别工会和连结社会。在医护罢工期间，其他行业工会动员公众声援，并在工会内部发起罢工动议，虽然最终未能出现接力罢工，但也奠定未来跨工会的团结基础。过往香港社会对罢工并不支持，但在 2019 年的运动的积累、市民对政府抗疫表现不满、抗争者阵营动员的大背景下，医护罢工连结市民，罕见地在社会上得到广大的支持。民意调查显示「逾 6 成受访者认为，若政府未能有效处理疫情，将支持前线医护人员发动罢工，迫使政府回应诉求。」[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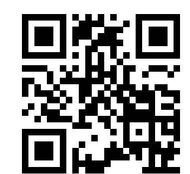
1.〈罢工救港——时代革命下的医护罢工〉，《工盟团结报》，2020 年 2 月 20 日条

2.〈港研：近八成人支持全面封关 逾六成撑医护罢工 陈沛然：前线诉求清晰〉，《立场新闻》，2020 年 1 月 31 日。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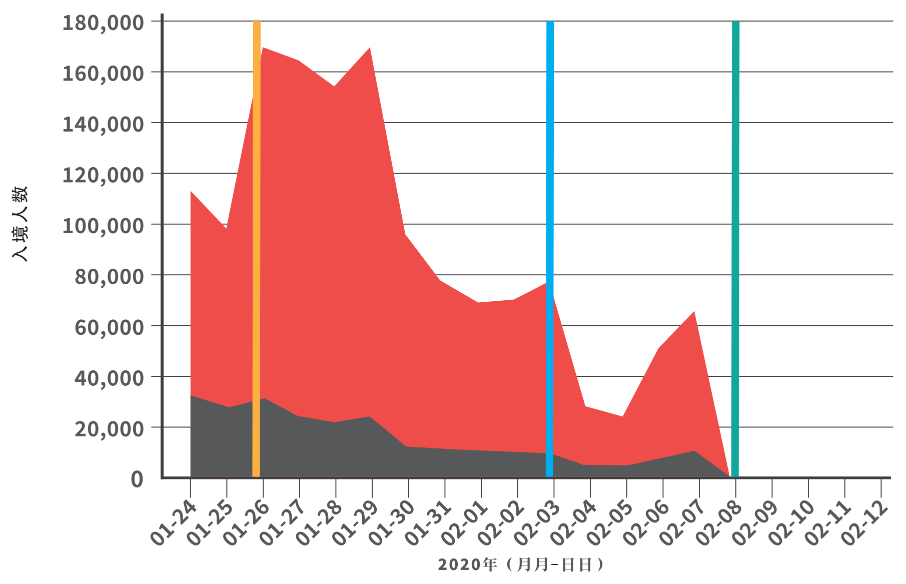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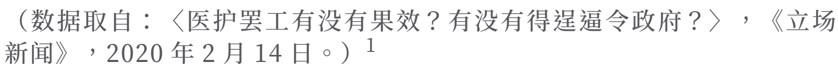
2.





（图片取自：立场新闻）




（数据取自：〈医护罢工有没有果效？有没有得逞逼令政府？〉，《立场新闻》，2020 年 2 月 14 日。）[1]

1.



1.4.2 - 行业发声、坚守专业、政治表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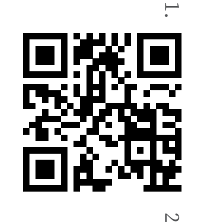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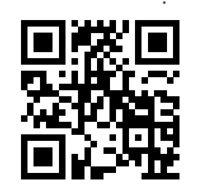
/

在疫情下，因政府不作为、企业只顾搾取最大的利益，工人面对严峻的健康风险和经济萧条下的就业困境；与此同时，政府也在疫情下大力推进各种社会控制和打压。各个行业的新工会既关注职场上的劳动问题，也关注政治问题，并且积极用行业的立场发声。

在 2020 年疫情爆发期间，多个密切接触潜在病患的行业工会揭露企业为节省成本，没有为前线员工提供足够的防疫装备和有薪隔离假。更有企业隐瞒工作场所的确诊个案，令员工曝露于感染的风险中。2020 年 4 月，港府推出高达 810 亿元的「保就业」计划，向僱主提供财政支援以支付员工薪金。但新工会和职工盟搜集前线员工的求助和「爆料」，揭露在政策的漏洞下有公司领取保就业补贴却解僱员工、放无薪假、零散化用工[1]，计划未能保障前线员工的生计。

在疫情和运动的低潮中，政府以「防疫」之名推行监控措施，并且在各行各业推进政治打压和社会控制。工会则担当重要的角色来捍卫专业自主、直斥政府政策的不合理。例如医护工会带头杯葛恐增加社区传播的「全民检测」[2]、对抗侵害个人隐私的「安心出行」监控系统；当政府就《电讯条例》订立电话卡实名登记制度展开公众谘询，资讯科技界工会则要求撤回电话智能卡实名登记制度。

1. 〈【47 宗保就业投诉】职工盟列 6 大漏洞及僱主剥削招数　民间发起监察黑心企业〉，《众新闻》，2020 年 7 月 9 日。
2. 〈医管局员工阵线联民主派初选人　吁杯葛全民检测　忧假阴性致掉以轻心反爆疫〉，《立场新闻》，2020 年 8 月 30 日。

1.

2.


与此同时，各工会也持续在抗争者间推动工会战线，招募会员，并解答疫情下的劳资问题。当《国安法》在 2020 年 5 月压境，「三罢阵线」联同「中学生行动筹备平台」就《国安法》举行罢工罢课公投，绝大多数的会员反对《国安法》，惟参与人数未达门槛而未能发起工业行动[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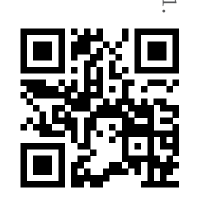
1.〈【国安法压港】罢工罢课公投票数未达门槛　罢课未能启动　跨工会未定下一步行动〉，《立场新闻》，2020 年 6 月 21 日。



医管局员工阵线在街站指出「全民检测」的风险呼吁民众杯葛「安心出行」。（图片取自：医管局员工阵线脸书）



2020 年 6 月 20 日「工会阵线」联同「中学生行动筹备平台」就《国安法》举行罢工罢课公投。（图片取自：立场新闻）

1.


1.5 - 新工会浪潮的意义和挑战

/

1
/
1.1
/
1.2
/
1.2.1
/
1.2.2
/
1.3
/
1.4
/
1.4.1
/
1.4.2
/
▶ 1.5

新工会浪潮是在 2019 年的政治运动中炼成的。在 2019 年的示威浪潮中，各行各业的工人为推进运动、支援前线示威者而发起罢工；示威者遍地开花的堵路、以「不合作运动」拉开罢工封锁线以「支援罢工」，以共同达至瘫痪生产的目标。民间的「大三罢」作为未竟的尝试，将经济抗争大规模带入政治民主运动的实践中，是过去三十年的民主运动中前所未见的。

在长达数个月的直接行动中，抗争者创造了职场同路人的连结、跨界别行业网络的连结、和经济抗争的想象和主流民运范式的连结。这些「连结」是一个开端，也是新工会浪潮炼成的重要背景。在 2019 年年底，部分抗争者为发起更有力量的罢工而组建工会，「工会抗争」的路线也在新工会的共同动员下引起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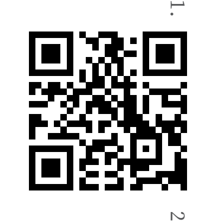
在 2020 年初，疫情在香港爆发，政府未能及时推出适切的边境检疫政策，但示威者又难以大规模聚集，而数个行业的新工会网络则是公民社会中积极发声的主体之一。医护工会不仅在短时间内成为组织基础遍布各个职系的工会，更发起新工会浪潮以来首场以「工会」为行动主体、经民主程序决议发起的罢工。医护的罢工将「罢工救港」的政治要求和员工的职场需要结合在一起，在当时支持运动、恐惧疫情、对政府充满不信任的社

会上产生不少迴响，也令新工会在运动中的参与在普罗市民眼中变得更加可见。

在「反修例」运动中，工人网络在严峻的政治打压、急遽收缩的公民社会空间中发展起来。在 2019 年，工人在职场表态或罢工后被解僱的例子不胜其数，也出现职场的白色恐怖。例如国泰航空向员工发出内部电邮，要求员工不得支持或参与在机场举行的未经批准示威活动，公司内部也出现同事间的大规模举报[1]；「港龙空勤人员协会」主席施安娜更因社交媒体的言论被解僱[2]。在 2020 年上半年，政府开始在各个行业推进控制、清算参与运动的行动者。新工会不仅站在职场的最前线连结同路人一起抵抗职场上的打压，也和其他的公民社会网络（区议会、社区）一起，以行业的专业角度，就政府的政治打压、社会不公义、劳工健康和生计问题发声。

和所有的运动网络一样，新工会的发展也面对严峻的挑战：如强硬打压下，当初为参与政治罢工而入会的会员是否会续会？工会理事作为核心的积极份子，如何和其他职场的同路人建立紧密的联繫，成为群众基础更加坚实的网络？不同行业的工人网络如何扣连其他的公民社会网络，回应大时代的变化？

1. 〈同事猜忌、安全成疑、工运倒退 — 国泰风暴后遗〉，《立场新闻》，2019 年 11 月 27 日。
2. 〈港龙前空姐施安娜入禀　控国泰无理解僱、歧视工会〉，《立场新闻》，2019 年 12 月 27 日。

1.

2.


延伸阅读

1. 潘文瀚，黄静文，陈曙峰（2012），《团结不折弯：香港独立工运寻索 40 年》香港：进一步多媒体有限公司。

2. 陈敬慈，〈「双层危机」下的香港民主工运〉，《社运年代：香港抗争政治的轨迹》，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3. 〈邓建华：现在即是开端：给工盟狱中书〉，《独立媒体》，2020 年 10 月 15 日。

4. 《工会脉搏》，2020 年 9 月

5. 〈医护罢工号外 1、2〉，《中大学生报》，2020 年 2 月。

6. 〈工会炼成阵 — 跨工会专栏〉，《立场新闻》。

7. 〈社运中的工会专栏〉，《立场新闻》。

8. 〈工运要人专栏〉，《立场新闻》。

9. 〈誓不「罢」休〉，《铿锵集》，2020 年 2 月 17 日。

10. 〈抢滩〉，《铿锵集》，2020 年 4 月 13 日。



2 - 区议会

/

在过去的民主运动中，体制内的议会选举和体制外的街头抗争间长期存在张力。过去几年，随着争取民主无望，越来越多抗争者认为：泛民主派政党的议会路线不但未能推动政制上的改变，更压制和消解体制外的直接行动，因此对选举抱批判的态度。「立法会」和「区议会」是香港主要的两个议事机关，2019 年的区议会选举在 2019 年 11 月 24 日（「反修例」运动爆发后五个月）举行，是运动中的第一个选举。「反修例」的抗争者开创出「议会」不同的意义，不再在体制内和政府斡旋，而是利用议席彰显民意、支援体制外的抗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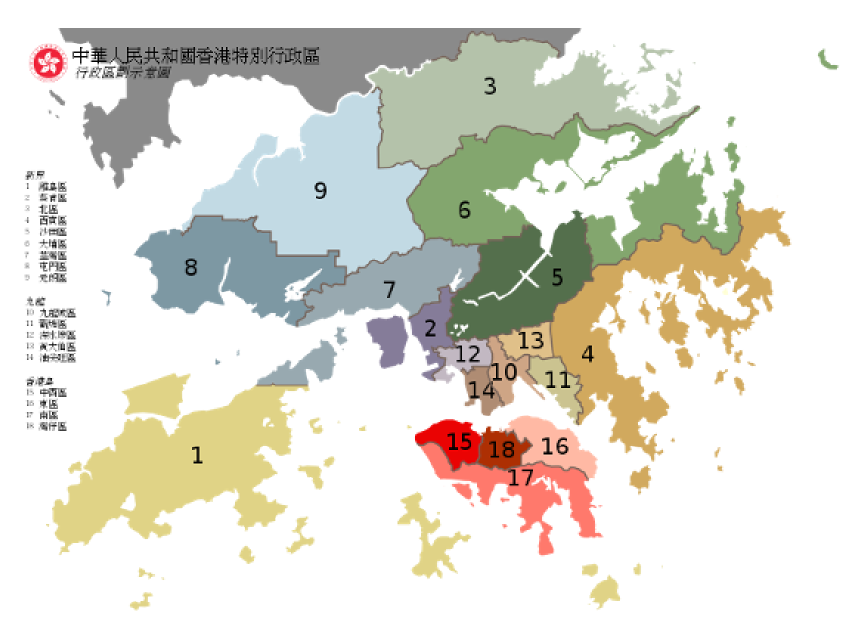
本章分作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在 2019 年以前，「区议会」所扮演的角色和现况背景；第二部分介绍「反修例」抗争者在区选中抢占议席的动员；第三部分则介绍区选的胜利和意义；第四部分介绍抗争者利用区议会平台的实践；第五部分介绍区议会的意义和限制。



在 2019 年 11 月 25 日，民主派区议会选举大胜翌日，共 60 区议员在理工大学附近集会声援被困的抗争者。（图片取自：众新闻）

2.1 - 过去的区议会格局

/



香港 18 个行政区划分。（图片取自：维基百科）

香港共划分为 18 个行政区，每个行政区各有其所属的区议会。区议会是谘询机构，并没有独立财政权和政策制定权，主要职能是向政府提供地区工作的意见，在政府拨款后审批当区的文娱活动和公共设施相关预算。区议员在行政长官选举中也有一定的影响力 [1]。在区议会选举制度的设计上，全港 18 个行政区再被划分作多个覆盖数个街区或屋邨的狭小选区，居民每 4 年以简单多数制在每区选出一名区议员。

1. 在选举行政长官的 1200 名选举委员会成员中，有 117 人是由区议员互选产生，占整体约十分之一，人数亦是选举委员会各组成界别中最多。由于这些委员是互选产生，换言之只要某政治阵营能够连结全港半数的区议员，就可以一次过在选举委员会拿走 117 票。

2
/
▶ **2.1**
/
2.2
/
2.3
/
2.4
/
2.4.1
/
2.4.2
/
2.5

从 1990 年代起，区议会选举是各个政党抢夺资源的阵地争夺战。在 2003 年的区选中，建制派政党承接市民反对「国家安全立法」的示威能量而失利，而后中央政府调拨大量资源发展和巩固亲建制的地区政治动员网络。

从此建制派政党在政府行政资源的配合下，透过举办活动、提供服务、派「蛇斋饼糭」（蛇宴、斋宴、月饼、糭）来获取区内居民的认识和选票，形成「社区福利主义」。此后，区议会长期被建制派政党所控制。在 2015 年的区选中，近七成当选区议员[1]和建制派有政治联繫（299 席），政府也利用建制政党在区议会的优势为政策做民意背书，例如：18 区区议会主席发佈联合声明支持「一地两检」和「逃犯条例」修订草案直上立法会。

另一方面，因区议会在地方工作并没有实权，民主运动参与者一直以来并不积极参与区议会，市民投票率也并不高，多区的建制派议员因没有竞争对手而「自动当选」，这些选区被称作「白区」。

1. 2015 年区议会合共有 458 名民选议员，有 431 席是由民选产生，另外 27 席是当然议员，由每区的乡事委员会主席出任。

2.2 - 「反修例」抗争者抢占区议会

/

在「反修例」运动爆发后不久，抗争者迎来区议会选举的竞选期，过去不受重视的区议会在运动中变作寸土必争的战线之一。在政治表态上，抗争者透过动员市民投票给非建制候选人，彰显社会上大多数的民意支持「反修例」，并且杯葛建制派。在实际层面，尽管区议会的实权有限，但抗争者盼能利用议席所带来的资源和位置促成政治表态平台、配合地区抗争网络扎根社区，也计划透过抢占区议会席次阻断建制派从议席获得的经济资源、在地方工作中巩固「桩脚[1]」的机会。

在「反 23 条」和「雨伞运动」后，民主运动的参与者也曾受社会运动的影响投入选举，然而 2019 年的规模是史无前例的。在 2019 年 6 月，网民整合 18 区区议会的「积极考虑」参选名单[2]，并动员示威者在「白区」参选以挑战建制派。抗争者通过连登、「电报」等网络平台连结[3]、在各区开展地区工作、共享资源、组成选举联盟[4]推出共同政纲。在「反自动当选运动」等平台的协调下，共有 115 位没有政治参与经验的「素人[5]」参选，也是首次所有选区（452 个）都有民主派的候选人参选。

1. 指选举中在基层为候选人拉票的工作人员。
2. 〈【1/4 选民有票投！】区议会积极考虑名单一星期通顶完成！119 个建制派将自动当选！〉，连登讨论区，2019 年 6 月 24 日。
3. 〈【区选光復香港】网民伙连登组「自由系」平台 助 30 地区素人撼建制派〉，《苹果日报》，2019 年 8 月 12 日。
4. 包括：屯门十兄弟、湾仔起步、离岛连线、动元十八、西贡乡民、天水连线等。
5. 根据蔡子强「区选数据库」的定义，素人指的是并非代表泛民政党及在 6 月 9 日反修例运动前已成立的地区组织；6 月 9 日以后才在地区开展工作；候选人名字在选前各泛民协调参选名单中有出现过。



2019 年区议会参选素人

傅佳琳

23 岁[1]，居港福建人第三代、应届毕业生



傅佳琳出战被视为「建制派老巢」的北角的堡垒选区，最终以 59 票的差距击败连任十多年的民建联议员。

梁晃维

22 岁，学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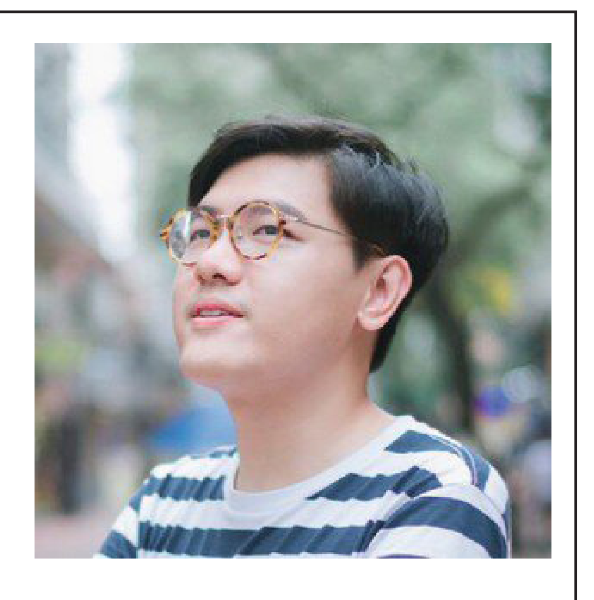


梁晃维是香港大学生物医学系学生，曾任学生会外务秘书。在民建联区议员连任十数年的观龙区当选区议员。梁在 2021 年年初因参与立法会初选被控违反国安法的「颠覆国家政权罪」罪，现正被还押。

1. 下列全部为 2019 年参选区议会的年龄。

张可森

26 岁，文化评论人、大学助教、编辑



张可森是「反修例」中诞生的社区网络「屯结新墟」成员，在屯门新墟参选，击败在该区续任五届的建制派区议员古汉强。张在 2021 年年初因参与立法会初选被控违反国安法的「颠覆国家政权罪」，现正被还押。

刘伟聪

51 岁，大律师



刘伟聪是执业 20 载的大律师，参选区议员击败属建制派的自由党候选人。刘在 2021 年年初因参与立法会初选被控违反国安法的「颠覆国家政权罪」，后获保释。

在竞选政纲上，有别于过往聚焦地区的民生事务，2019 年的民主派候选人提出扣连「反修例」运动的竞选论述，例如：独立候选人提出「齐上齐落光復区会，民主民生缺一不可」、「黑白良知，寸步不让」[1] 等选举口号；民主党以「五大诉求，缺一不可」、「追究警暴，防止滥权，改革警队」为重点政纲。部分联合政纲和运动直接相关，例如设连依墙 [2]、彻查「721 无差别袭击事件」[3] 等。

1. 西营盘候选人黄永志的参选宣言
2.《南区民主派联合政纲 倡公众可区议会发言、民政处设连依墙》，《独立媒体》，2019 年 10 月 27 日。
3.〈元朗民主派造势力争过半：共同政纲彻查 7.21〉，《独立媒体》，2019 年 11 月 16 日。



旺角北的区议会候选人萧德健以抗争者的装扮竞选，并以「五大诉求，缺一不可」的运动口号作为竞选口号。（图片取自：候选人选举信息）



2.3 - 区议会选举的胜利

/

2019 年的区议会选举在 11 月 24 日举行，当时正逢「反修例」运动第 5 个月，街头的衝突在持续升温中达至顶点，示威者持续数日堵路瘫痪城市运作，两所大学的示威则遭到强硬的镇压和拘捕，在市民对警暴感到愤怒的同时，社会上也出现对示威影响日常生活的不满，建制派再三提出「民意逆转」（运动支持者大量减少，运动不再受大部分人支持）的说法。

在这个背景下，区选的重要性骤升，成为建制派和民主派对决的民意「公投」：抗争者动员市民投票给民主派的候选人以支持运动、谴责警暴、并惩罚支持政府的建制派；建制派政治人物和报纸则号召市民票投建制派候选人以「止暴制乱」、「向暴乱说不」。



2019 年的区议会选举投票率非常高，市民须在票站等候投票长达数个小时。（图片取自：报导者）

在各阵营的高度动员下，当日的投票人潮汹涌，在票站排队等候投票的时间长达数个小时，投票人数（294 万）和投票率（71.2%）（图 1）都创下歷史纪录。民主派获得 167 万票，建制派则获得 120 万票，得票率分别是 57% 和 41%（图 2）。在简单多数制下，非建制派在全港 452 个议席中取得 388 席，在 17 个区议会取得大多数，建制派仅有 59 席[1]（图 3）。

区选的结果显示建制派所声称支持运动的「沉默的大多数」并不存在，「民意逆转」也没有发生，大量市民向政府和建制派投下「不信任票」，对抗争阵营是很大的鼓舞。另一方面，区选作为运动期间的首次选举，被国际社会视作重要的民意指标，民主派大胜的结果带来国际社会对香港政府的施压。

1. 〈2019 年区议会选举结果互动专页〉，《立场新闻》，2019 年 11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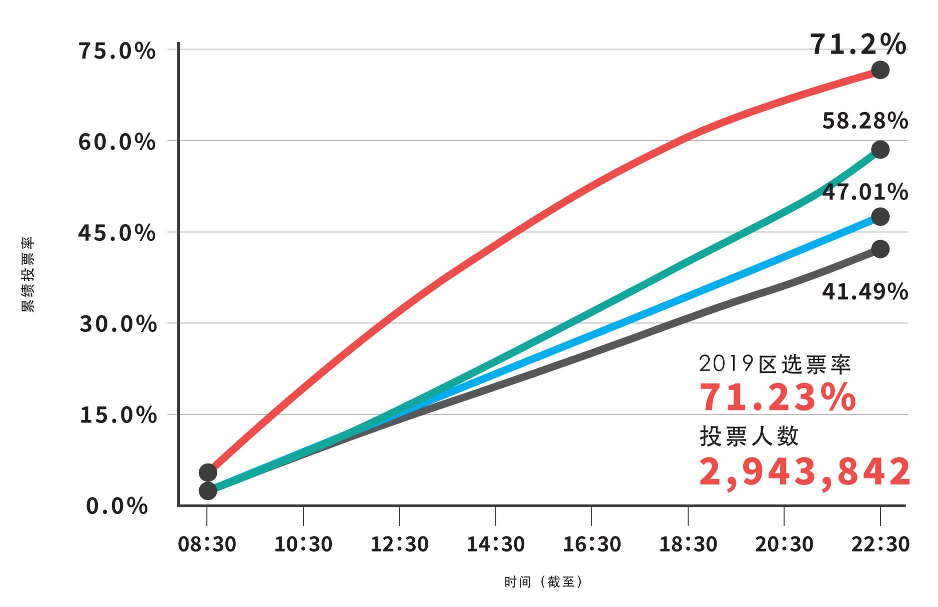


图 1

2019 区选
破香港各级议会选举纪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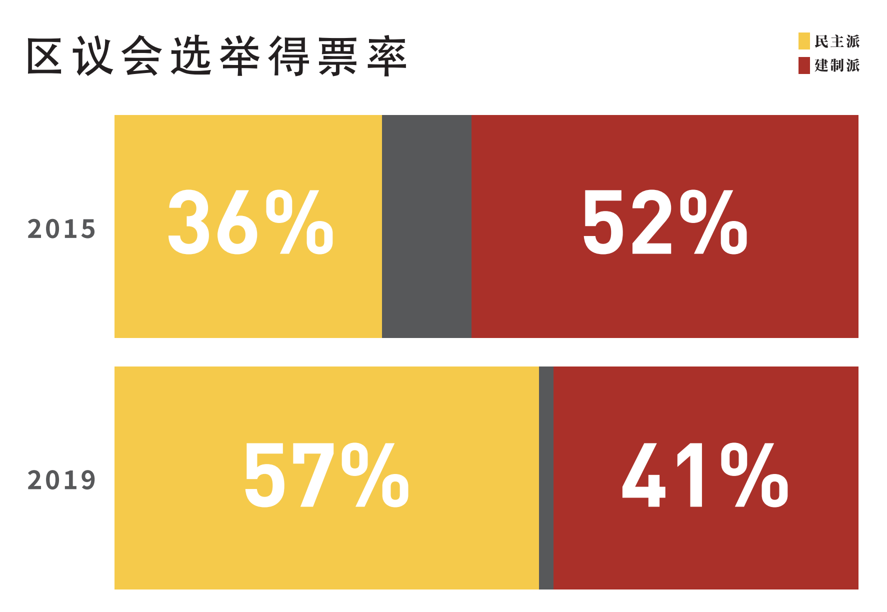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香港选举事务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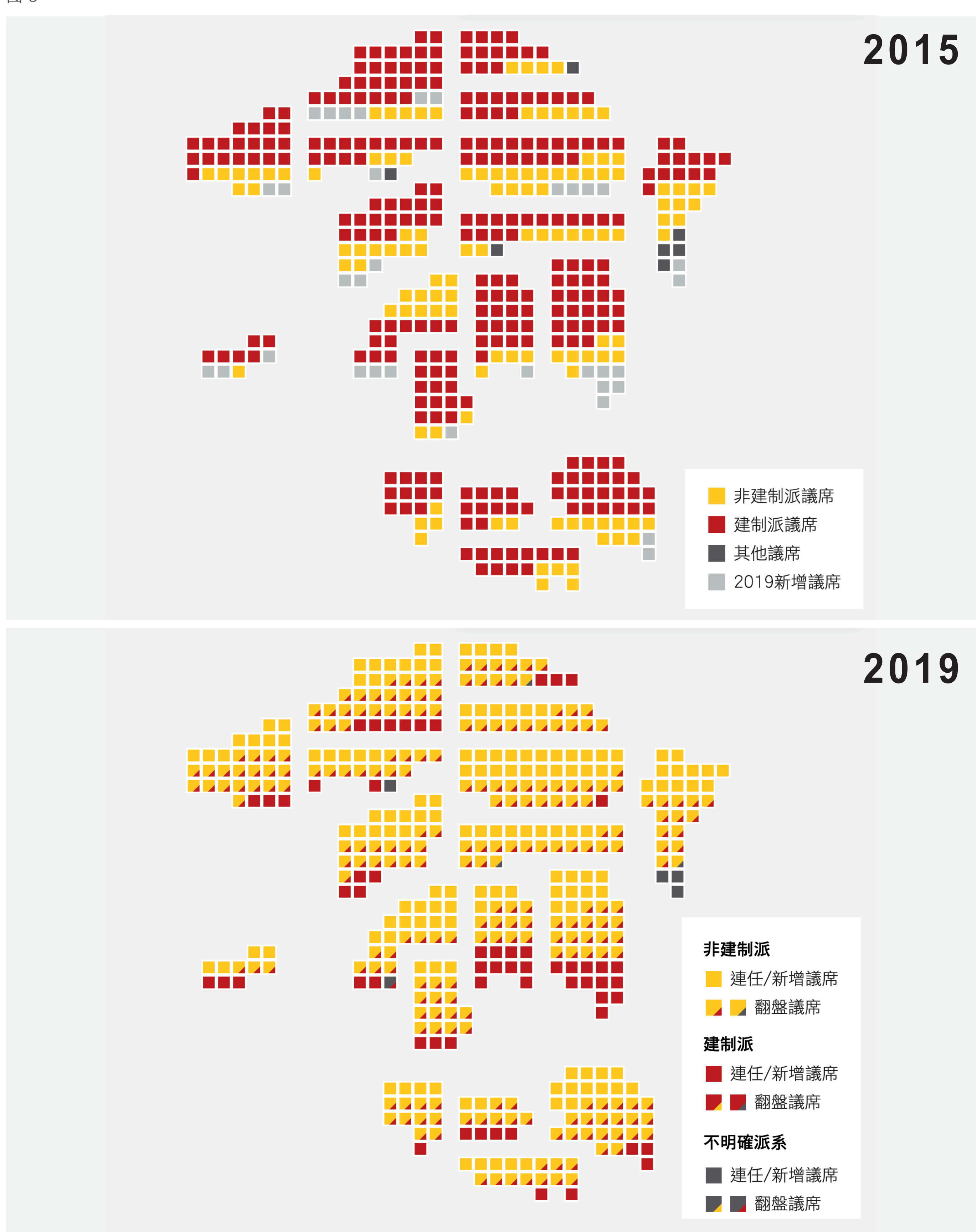
2019 年区议会的投票人数和投票率都创下歷史纪录。

图 2



两届区议会选举的得票率。和 2015 年相比，民主派在 2019 年的得票率增加近两成，建制派则减少一成。

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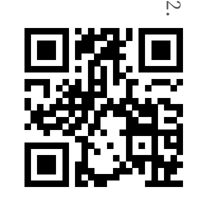


上图是 2015 年区议会议席分佈；下图是 2019 年区议会议席分佈（截图自：2019 区议会选举专页立场新闻）

2019 年民主阵营在区选的胜利很大程度上是「反修例」运动的大政治气候和示威者半年来在街头的捨身抗争的结果。在民主派的当选区议员中，有五分之一是因「反修例」运动而投身选举的素人。根据学者蔡子强的统计，在 115 位参选的素人中，有 81 位胜出区选，当中不少年轻的参选人毫无政治资本，却击败扎根地区多年的建制候选人[1]。而这些没有地区工作履歷的素人候选人的平均得票率（55%）和在地区长时间深耕细作的泛民主派政党（57%）的平均得票率相若，反映出在 2019 年影响选民投票的关键因素是民主运动的政治立场，而非从政履歷和地区工作的成绩[2]。

1. 例如：27 岁的陈梓维在缺乏政治包装和人脉资源的情况下，击败民建联副秘书长叶傲冬，成为首个在佐敦南夺得议席的民主派。
2.〈从「反送中政治素人」身上揭开今届区选海啸之谜〉，《立场新闻》，2019 年 11 月 29 日。

2.



2.4 - 区议会的实践

/

正因「反修例」运动在很大程度上造就区议会的翻盘，区议会的实践从第一日开始就是运动抗争的一部份。新任区议员也明白议席来自运动中人民的授权[1]、将会为运动所用。另一方面，社区的性质在「反修例」的示威浪潮中发生根本的变化，社区不但是示威和政治活动的阵地，也是警暴的最前线。在这个脉络下，区议员不再只是传统意义上代居民投票、承揽社区治安民生的官职，也无法只聚焦在民生议题和福利、避而不谈日常生活中的政治问题。

在 2020 年，不论是市民或区议员对区议会的想象都出现了变化，区议会的议席更像是承载和延续「无大台」群众运动的能量的平台，日常生活中的民生议题、社区大小事、政治运动和民主参与的连结也被指认出来，打开了抗争者和区议员在体制内外共同摸索出突破过往的实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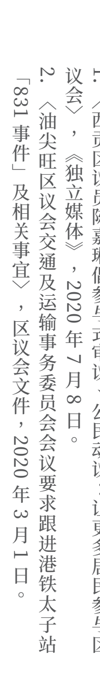
1. 不少区议员都在访谈中提到自己的议席来自「反修例」运动的抗争，其中一个例子是在 2020 年，香港并没有法律要求区议员上任时宣誓，但天水围区的民主派议员自发举办向人民宣誓的仪式，其中提到「一众新任议员应时代革命而生，他们在选举的胜利，建基在千千万万香港人的付出上，是时代和人民的呼声造就了他们，所以在上任首日，向人民宣誓。」

2.4.1 - 议会里：将运动内容带入议程，重新审视拨款用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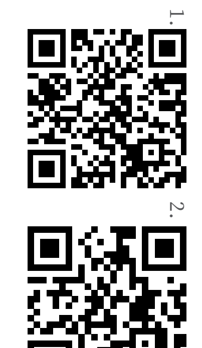
/

在过去，区议会因议事程序不透明、市民难以监察等问题为人詬病。民主派在区选得压倒性胜利后，部分区议会兑现政纲中的承诺，透过直播区议会议事过程、公佈会议纪录增加议政透明性，并且开放大众在社区规划和资源分配等议题的直接参与。而在社会运动的背景下，居民也有很大的热诚关心自己的社区和积极参与，有区议会也致力推动公民提案、参与式预算工作小组的新的尝试。[1]

非建制的区议员利用议席过半的优势将「反修例」相关讨论带入议会，重新调度地区的拨款。有区议会就警暴问题质询警务处处长、通过成立「721元朗西铁站白衣暴徒无差别袭击市民事件工作小组」、公佈「831 事件」闭路电视视频[2]对「反修例」事件发起调查。在地区性事务以外，民主派区议员也就全港性政治议题共同表态，例如：17 区区议会召开联合会议，通过撤回「港版国安法」的动议。



1. 〈西贡区议员陈嘉琳倡参与式审议、公民动议：让更多居民参与区议会〉，《独立媒体》，2020 年 7 月 8 日。
2. 〈油尖旺区议会交通及运输事务委员会会议要求跟进港铁太子站「831 事件」及相关事宜〉，区议会文件，2020 年 3 月 1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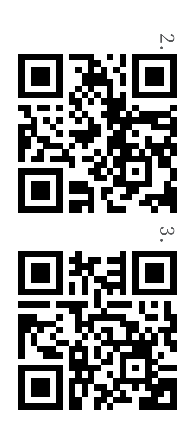
在拨款方面，一方面，区议会减少输送资源予建制网络建「小白象工程[1]」，减少国庆、回归、警方相关活动的拨款 1,800 万元（油尖旺区议会的国庆拨款更是由 190 万归零[2]）。另一方面，区议会将拨款用于居民所关注的社区事务，例如：深水埗区议会下的健康及安全社区工作小组 4 月通过议案，拨款委託机构调查催泪弹对该区的社区和环境的影响；多区区议会决议拟定小型拨款，设立社区连侬墙[3]，令抗争者在公共空间表达意见免于被拘捕。

由民主派议员主导的南区区议会否决不少建制派相关组织的经费，因此「社区参与拨款」中有 100 万将用作南区的防疫基金。（图片取自：袁嘉蔚社交媒体）



警务处处长邓炳强首次出席中西区区议会回应议员质询，会上多名民主派议员要求交代警队滥暴问题，惟他否认指控并立即率领所有警务人员离席。（图片取自：信报）

1. 指造价费用高昂但没有实际效用的工程项目。
2. 〈区选一年—断建制派财路 区议员截千八万国庆回归拨款〉，《苹果日报》，2020 年 11 月 23 日。
3. 〈北区区议会通过增设社区连依墙〉，《立场新闻》，2020 年 1 月 20 日。



2.4.2 - 议会外：发声，运动支援，社区网络的节点

/

在 2020 年，市民街头抗争的空间急剧限缩，在每月的运动纪念日、「12 港人被送中」事件、或是当政府强推「全民检测」和「健康码」，民间都难以再发起大型的示威来表态反抗。在这个背景下，区议员公开发声的角色变得突出，不少区议员持续在街头摆街站，连结起政治议题、社区事务、和民生大小事。在做公众倡议的同时也凝聚抗争者阵营的士气，在「反修例」之后的社区匯聚居民讨论。

区议员也是抗争者和在囚人士支援、疫情自救等网络的节点。在示威期间，区议员到现场监察警方执法，彻夜驻守协助保释被捕人士；区议员也和黄店合作为经济有困难的「手足」张罗生计，向居民发放抗疫物资，用团体代购的方式鼓励居民支持黄店；区议员也利用职权探访在囚抗争者，将他们和市民配对成为笔友，以让市民持续表达对在囚抗争者的关心。

在 2020 年，区议员办事处除了处理各种居民个案求助、公共环境和设施的疑难，也提供平台让居民就大小事讨论和交流、实验和探索社区参与的可能性。在区议会履新后的第一个星期，沙田区网络举办大型的居民大会，数百民居民和区议员讨论对社区事务和资源使用的看法；在区议员的推动下，更多居民参与在各区的自主垃圾回收分类、发起节庆活动和文化墟市；也有区议员和医护工会、在示威中医治伤者的义诊网络合作，为居民提供免费的健康检查。

在 2019 年的运动后，社区里有黄店、连侬墙和街站网络、和想继续参与运动的抗争者，但在高压打压之下公共空间的聚集并不容易。在社区的组织实践中，非建制派区议员也在维繫支持运动的社区网络上发挥一定的作用，不仅促成社区不同网络之间的连结，也开拓扣连社区、民生、政治议题的阵地，带动更多人关注社区的发展，也实践社区层面的直接民主参与。



2020 年 4 名区议员就「721」一週年在元朗游行，高呼「走上街头，寻找真相」的口号，有少量市民跟随。警方中途截停游行并以涉嫌组织未经批准集结拘捕 4 人。（图片取自：立场新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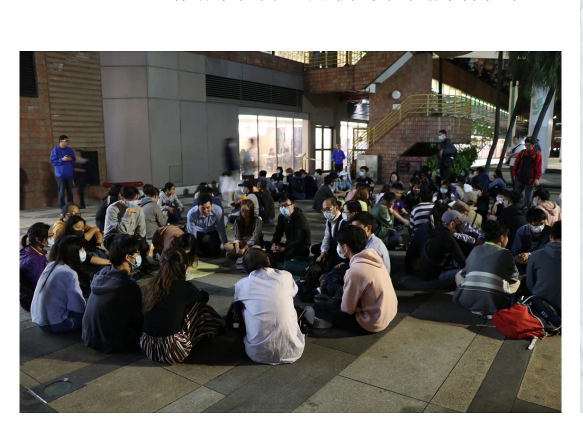
2020 年 3 月 31 日是「831 事件」第七个月的纪念日，区议员代市民收花纪念。（图片取自：加山传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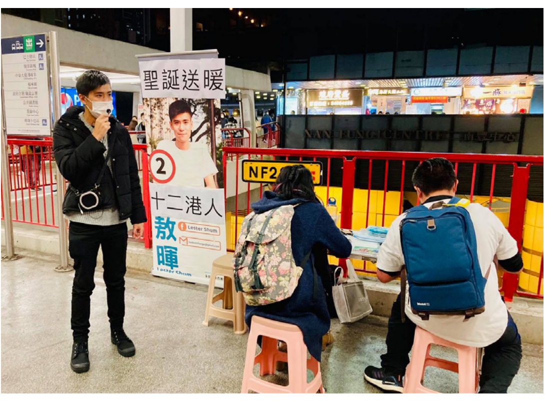
◀大埔区议员连桷璋和民间团体合作，固定时间在办事处收集居民的厨余用作堆肥。（图片取自：连桷璋社交媒体）

大埔区区议员和支持运动的医护网络合作，为居民提供健康检查和义诊。（图片取自：连桷璋社交媒体）▶





▲ 2020 年 1 月 7 日，沙田地区组织「沙田一隅」举行「和你 plan」活动，35 名沙田区议员和约 500 名居民就社区事务进行交流。（图片取自：独立媒体）



▲区议员岑敖暉在街站呼吁市民在圣诞节写信给在深圳被囚禁的 12 港人。（图片取自：岑敖暉社交媒体）



▲区议员袁嘉蔚和黄店「程班长」合作发起团购。（图片取自：袁嘉蔚）

2.5 - 区议会的意义和挑战

/

民主派的区议员尝试在议会内外支援运动，但也面对来自政府、建制团体等各方面的打压。在议会里，政府在权力和资源上架空区议会，许多通过的议案和提出的建议难以付诸实践；在议会外，区议员在社区里所搭建的平台和积累的网络却开创社区直接民主的实践，在居民间种下行动的种子和连结。

在现有的谘询框架下，民政事务总署应协助区议会开展活动，各区的民政事务处则在地区层面提供行政支援。然而，在2020年，不论是最低工资、政府大型建设发展计划对地区发展的影响、或是「反修例」中的警暴，民政事务局经常以讨论议题不符合区议会职能为由，拒绝提供场地、不派官员出席。

在资源方面，政府以预留金额作抗疫用途为由削减区议会拨款；负责签发支票、落实库房取款的民政事务专员，则是拖延或否决区议会所通过的预算[1]。根据18区民主派联络会议的统计数据，一年内民政处共169次指各区区议会越权，离席89次，民政事务总署拒绝或拖延支援的拨款高达近3,000万，其中，抗疫拨款（防疫物资、区内消毒）共1,837万元。在打压民选区议员的同时，民政事务总署却「委任」建制派地区组织成员「十八区分区委员会」[2]，并主动向其输送资讯和资源。

1. 分区委员会为民政事务总署辖下的地区委员会，除缺乏拨款权力外，职能大致与区议会相同。
2.〈区会1837万抗疫拨款 民政总署拒批拖延〉，《明报》，2021年2月22日。

1.



18区民主派联络会议
区选一週年回顾统计数字

	被指越权提问数目	公职人员离席次数	拖延金额
中西区	15	15	1,500,000
湾仔区	9	4	1,500,650
东区	15	7	1,000,000
南区	7	3	1,550,000
油尖旺区	7	6	NA
深水埗区	14	4	5,550,000
九龙城区	15	6	6,400,000
黄大仙区	4	4	2,300,000
观塘区	4	3	1,000,000
荃湾区	12	9	1,200,000
屯门区	6	6	75,000
元朗区	19	7	1,000,000
北区	2	1	NA
大埔区	2	3	NA
西贡区	22	4	NA
沙田区	5	3	NA
葵青区	7	4	6,210,000
离岛区	NA	NA	NA
总计	165	89	29,285,650

图片数据取自：〈18 区民主派联络会议：区选一週年回顾〉，《香港独立媒体》，2020 年 11 月 23 日。



在区议会的权力被架空之余，在 2020 年，数十名区议员被以「煽动谣言罪」、「非法集结」等罪名被捕和政治检控 [1]。而落选的建制派议员所成立的「议会监察」，搜集民主派区议员的「罪证」向政府举报，推动修改条例强制区议员宣誓效忠政府。许多区议员身负数条罪名，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继续负重前行。

1.〈【特写】警方照拉、政府打压、小白象照起…… 当光復区议会不似预期〉，《立场新闻》，2020 年 4 月 19 日。

1.



尽管区议员在议会内的实践处处受阻，不少区议员也身陷囹圄，在高压的政治环境下，一些区议员用资源聘请组织者、租办公室、积累热心参与的义工，在社区里撑出一个重要的空间让抗争者聚脚。扎根社区的区议员在一定程度上支持社区里居民网络的实践，也促成社区网络间的交流和连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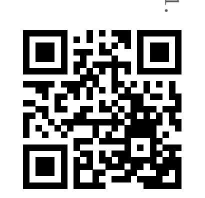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区议员在凝聚地区网络上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更重要的是居民的自发参与。区议员的角色比较接近「同行者」，而不是领袖、代议士、或者纯粹的服务提供者。在抗争者的自发组织下，区议员能连结更多的抗争者，一起将大家的想法付诸实现。

用区议会平台作其中一个基地，抗争者也在日常生活中开拓和斗争出其他的社区阵地。例如：更多区的居民发起社区报[1]，凝聚居民共同纪录社区的大小事；过去建制政党和屋邨「互助委员会」和「立案法团委员会」关係紧密，然而在2020年，身为户主的抗争者在自己的屋邨参选委员会，望能用委员会的平台增加社区资源使用的透明度，重新掌握屋苑的资源和行政权，开闢多一个抗争的阵地。

另一方面，区议会的取胜和实践也鼓舞了「反修例」的抗争者将另一个议会选举——原定在2020年9月举行的立法会选举——视为下个抢占的目标和抗争的阵地。

1. 〈【特写】连侬墙倒下　文宣何处寻？　办社区报的师奶、前线、中学生〉，《立场新闻》，2020年5月26日。

1.



延伸阅读

1. 梁启智，〈区议员的职责不就是服务街坊，为何要政治化？〉，《香港第一课》，2019 年 6 月 9 日。
2. 马岳，〈民主运动三十年：自由专制下的防卫战〉，《社运年代：香港抗争政治的轨迹》，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3. 马岳，〈从居民运动到社区福利主义〉，《端传媒》，2015 年 8 月 13 日。
4. 〈新丁区议员抗疫战专题〉，《立场新闻》，2020 年 2 月。
5. 〈区选一年专题〉，《众新闻》，2020 年 11 月。
6. 〈区议员的最后挥春？〉，《立场新闻》，2021 年 2 月。
7. 铿锵集：光復议会？（2020 年 7 月 7 日）。



3 - 「黄色经济圈」

/

在「反修例」运动中，先是各别商家表态支持运动并提供支援，后有抗争者光顾支持运动的「黄店」并抵制打压运动的「蓝店」。在抗争者阵营持续的资讯汇整、宣传和动员下，「黄色经济圈」（下称：「黄圈」）逐渐成型，由各别的事件转变成日常生活中的持续实践。抗争者藉消费实践贯彻其政治理念，也带来实际的经济影响。另一方面，遍地开花的「黄店」网络也和各区的区议会、社区网络、工会发展出连结。在街头抗争沉寂的 2020 年，「黄店」的实体空间得以凝聚「同路人」，在疫情下承载互相帮助的社会网络。

本章分作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黄圈」的形成；第二部分介绍「黄圈」的实践，包括对抗争者网络的支援、日常生活中的消费抗争、疫情下的资源共享和互助；第三部分则介绍「黄圈」实践的意义和限制。

3.1 - 「黄圈」的形成

/

早在「反修例」运动爆发，有商家表态支持运动、向示威者派发物资，响应「三罢」[1]（罢工、罢课、罢市），会被抗争者称作「黄店[2]」；有商家则是支持政府、打压抗争者（例如：吉野家解僱嘲讽警队的广告公司职员[3]、美心集团创办人长女伍淑清以校监身份威胁勒令参与罢课的中学生退学[4]），则被称作「蓝店」。

当各别的商家在事件中展示其政治立场，抗争者动员光顾「黄店」并且抵制「蓝店」。「黄店」支持运动的事蹟在社交媒体平台传开后，翌日餐厅门前大排长龙；「蓝店」则门可罗雀。从2019年8月起，示威者更以「装修」「蓝店」以造成经济损失。中央政府所投资的中资银行和书局、及港府是大股东的「香港铁路公司」都是「装修」的目标。

当「黄店」和「蓝店」的数量随着运动的发展持续增加，抗争者系统性地搜集相关报料，查证零散的资讯，并将黄蓝名单扩展至各个行业。示威者也将各区的黄蓝店列表张贴在连侬墙；为方便在日常生活中按图索骥持续光顾黄店，更打造结合周遭黄蓝店地图、营业时间的手机应用程式。各区的居民也在社交媒体上开设地区的「黄色经济圈」群组，分享在黄店的用餐感受和食评。「黄圈」在抗争者阵营的资讯汇整、推广、讨论中，由各别的事件转变成市民在日常生活中的持续实践。

1. 在2019年6月12日，共有1,630间店铺参与三罢
2. 在「雨伞运动」中，占领者以「黄色丝带」作记号，市民以「黄店」泛指支持民主运动的商家。
3. 〈【狮子狗风波】吉野家炒广告部员工　职工盟抗议：无理解僱、罢食〉，《立场新闻》，2019年7月12日。
4. 〈【逃犯条例．罢课】中华基金中学传打压学生罢课　过百校友街坊声援　署理校长否认打压〉，《明报》，2019年9月4日。

1.



3.

4.







抗争者按照地理区和消费类别整理出黄蓝店名单，再放上连侬墙、手机应用程式，令抗争者容易在日常生活中实践。（图片取自 ：和你 Pay、终极黄蓝地图、独立媒体）

3.2 - 「黄圈」的实践

/

遍佈各区的「黄店」在运动中提供资源、空间、就业机会给抗争者；抗争者则透过持续的消费作出政治表态，并且向「黄圈」输入资源。在 2020 年，疫情令香港社会陷入经济寒冬，防疫措施和政治打压也令市民难以在公共空间聚集，在这个背景下，抗争者和「黄圈」所形成的资源共享循环和互助发挥很大的作用，「黄店」也成为凝聚「同路人」的节点，打开发展新社会关係的可能性。

3.2.1 - 「黄店」支援抗争

/

随着运动的发展，「黄圈」向抗争者提供各种相应的支援。在 2019 年 6 月的大游行中，「黄店」向示威者派发饮品和食物表示支持；当警队的镇压激烈化，「黄店」开始筹措头盔、防毒面罩、和防护用具，在示威中为示威者提供安全的庇护之所。

当运动持续数个月，有抗争者生计出现困难、被捕失去工作，「黄店」则为被经济封锁或失业的抗争者供应三餐；有「黄店」聘请在被捕获释后就业出现困难的抗争者，更出现「黄色经济圈」的就业配对平台；当大量的示威者被捕还押，为了让狱中抗争者有更好的私人膳食，「黄店」申请成为惩教所的供应商，不惜亏本以低廉的价格为还押人士供应饭菜。

另一方面，在疫情和政治打压下，公共空间的活动被限缩，而遍佈各区的「黄店」则成为凝聚「同路人」的阵地。抗争者在黄店「连侬墙」张贴文宣表达想法、派发社区报、寄卖抗争者的手作商品、设立民主派选举的票站。



在 2020 年 7 月 11 日，西湾河一间「黄店」的民主派立法会初选票站外，有市民排队轮候投票。（图片取自：立场新闻）



黄店的外墙和室内贴满文宣。（图片取自：英国广播公司）

3.2.2 - 示威者的经济抗争

/

3
/
3.1
/
3.2
/
3.2.1
/
▶ 3.2.2
/
3.2.3
/
3.3

用消费行为表态并不是新的概念，除了过去数十年的反血汗工厂、支持环保的消费者运动，中国民间亦曾在中日关係紧张时发动「爱国买国货、杯葛日资公司」的经济对抗。近年，因影星杜汶泽发表支持台湾太阳花运动的言论、纪梵希的商品图样中将台湾、香港与其他国家并列等事件，都引来中国官方媒体和民间的大规模抵制。

在「反修例」中，随着大型连锁店「美心」旗下餐厅因创办人长女高调支持政府的言论、多间大商场因打压示威成为被杯葛的目标，抗争者开始关注平日的消费所支持和壮大的是什么资本、思考如何减低对政权和「蓝色」资本的依赖。因被指和袭击示威者的福建帮有关，「优品 360」，共 72 间分店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盈利在 2020 年录得较上年跌 4.5%；「吉野家」接连关闭在港 10 间分店；「香港铁路公司」的客运业务乘客量则是按年下跌 33.3%、收入按年下跌 41.7%。

另一方面，在「黄圈」的带动下，抗争者在餐饮、零售、物流、影视等消费寻找「同路人」，其中不少是大型连锁集团之外的社区小店。抗争者也在长期被建制资本垄断的行业创立新的商店。例如：因不想使用中资物流「顺丰」，有抗争者创立以「黄店」做为自取点成立「人链速递」，并且聘请抗争者做送货员；三名学生在「电报」群

组认识，见到本地的大米市场被「蓝店」或者中资垄断，而自行开发「光城香米」，包办生产线的开发、广告、开发市场、包装、到运送。[1]



弥敦道的「优品 360」多次遭破坏。（图片取自：立场新闻）



2019 年 9 月 22 日，抗争者在新城市广场发起「和你 Shop」，将美心旗下餐厅等候入座的单据连成长条，长度跨越数层，由八楼至三楼中庭。



「人链速递」的标志。（图片取自：「人链速递」社交媒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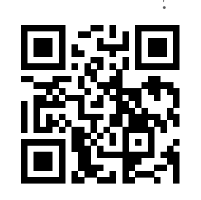


「光城香米」的产品包装若颠倒来看是一个头盔。（图片来源：众新闻）



「走访深黄大地 Yellowland HK」对「人链速递」的访谈。

1.《3 科大生创山上米业 个半月卖 2000 包 南亚裔休学 1 年发展望能请手足》，《众新闻》，2020 年 8 月 8 日。

1.


3.2.3 - 疫情下的互助网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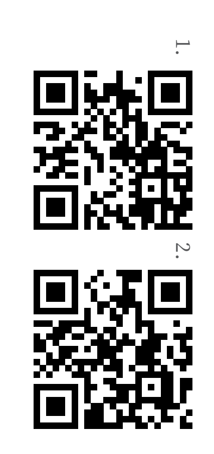
/

在 2020 年上半年，全城一罩难求，市民为口罩周围奔波、大排长龙，但政府却迟迟没有安排发放抗疫物资，当时有不少「黄店」搜罗抗疫物资再向基层市民派发。但另一方面，不少「黄圈」餐厅在政府的「禁堂食令」下生意惨淡频临倒闭。这时抗争者阵营持续的消费成为「黄店」的救生艇，各区纷纷成立地区「黄店」外卖平台，不仅支撑「黄店」的生意，也聘请抗争者做外卖员增加就业。抗争者也数次举办全港「黄圈」消费季，例如：鼓励抗争者在「五一黄金週」集中在黄店消费，该活动共 2305 间商店参与，超过 40 万人响应，总营业额超过一亿元[1]。

值得注意的是，多区推出地区黄店「储印记」活动和联合优惠，避免抗争者集中光顾知名黄店，而是平均支持不同的黄店。有「黄店」老闆在受访时提到，自己心目中的「黄圈」应是横向发展的圈：「你在『惩罚』我的时候，我要带起其他店；或者你『惩罚』我，我给你其他店舖的优惠，这样你同一时间会『惩罚』两间舖头。[2]」

在疫情下，「黄圈」是一个资源共享互惠的网络。面对疫情下基层员工失业的问题，过去「家长」和「黄店」发起的饭劵计划有更大的需求，但黄店自身的生意也面对困难，于是多区区议员和黄店网络合作推行社区自助饭券，提供启动基金或是向公众

1.〈【黄店黄金周】逾 40 万港人齐撑 料 2,300 店获「惩罚」〉，《苹果日报》，2020 年 5 月 4 日。
2.〈【回应施永青】鸡煲店老闆黄色经济圈横向想象：你愈惩罚我，我嘅优惠就愈夸张〉，《众新闻》，2019年 12月 6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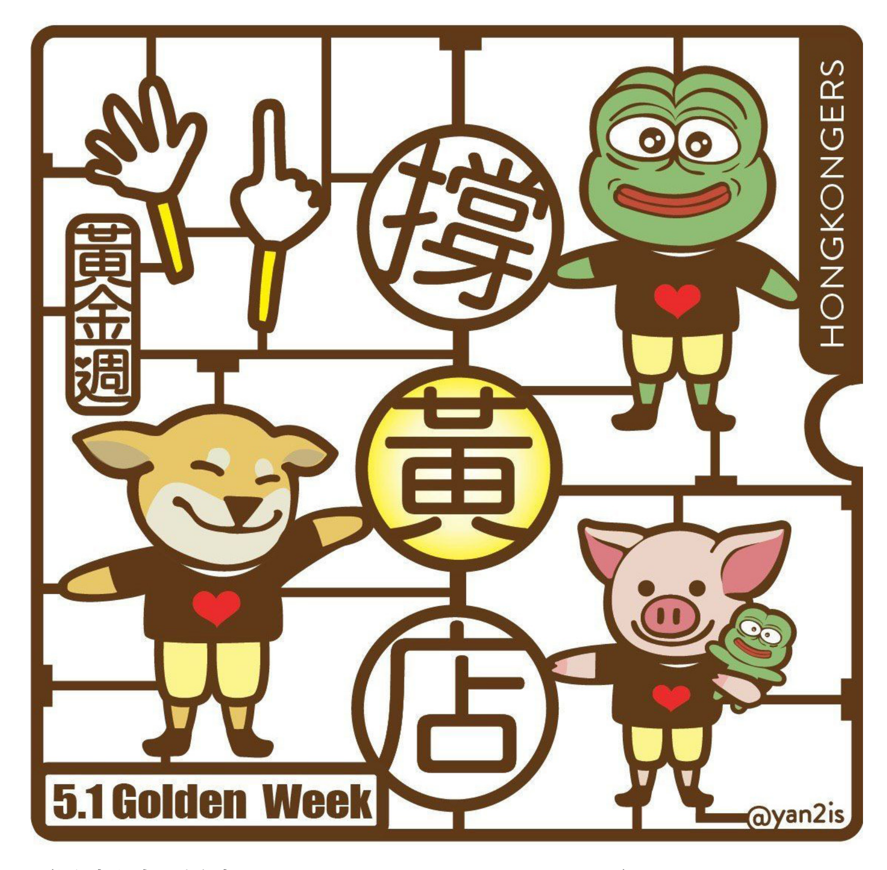
募款向「黄店」购买饭券支持营运，而有需要的抗争者则可以到「黄店」免费使用饭券。例如：在 2019 年向抗争者派发饭券，纾解经济困难，在疫情下和超过 150 位区议员、近 400 间「黄店」合作，用社区抗疫券的方式，供有需要的在学和待业人士申请膳食津贴。在这个过程中，受助者与「黄店」又可建立关係。



「上善若水」是油尖旺区议员萧德健和朱江玮的社区项目：他们在募集启动经费后开始运作支援抗争者的消费券，「期望壮大互助经济圈，更重构社区关係，建立跨阶层的自救系统。」（图片取自：萧德健社交媒体）



「黄圈」发起的同区黄店储印记换礼品计划。（图片取自：「黄圈」）



（图片取自：活动 TG channel @HKGoldenWeek）

3.3 - 「黄圈」的意义和挑战

/

3
/
3.1
/
3.2
/
3.2.1
/
3.2.2
/
3.2.3
/
▶ 3.3

在香港，租金长期高企，普罗市民平时的消费选择被屈指可数的连锁集团所垄断，中资的影响力无所不在。直到 2019 年，在「反修例」运动的能量下，市民首次大规模在日常生活中用消费作出政治表态，连结支持运动的商铺，尝试在「蓝色」资本垄断的产业建立「黄店」，无疑是一大进步。另一方面，随着运动的发展，在 2020 年，当抗争者难以再在公共空间示威，「黄店」作为遍佈各区的商业空间，不但能持续发放运动的消息，承载新的社会关係，连结同路人，也在经济萧条的疫情下开闢资源共享、互惠互助的网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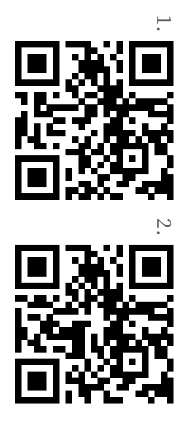
然而在实际操作上，「黄圈」仍然面对许多的挑战和限制。首先，虽然抗争者盼能脱离对中资、「蓝色」资本的倚赖，但若考虑商铺租赁的业主、原物料和产品的生产，要确保供应链的每个环节都来自「黄店」非常困难。再者，尽管「黄圈」带来一定的经济影响力，但「黄圈」未能涵盖占本地生产总值最高的主要行业（例如：金融保险、旅游），若抗争者想用「黄圈」向政府、亲建制的势力施压，效果则相当有限。

另一方面，「黄店」的性质是一门需要营利的生意，当中存在僱佣关係，尽管「黄店」的老闆支持运动，但也出现捐款的去向不透明、食物素质参差、劳权和剥削的问题，例如：有抗争者透过

关注劳权的团体「劳工组」揭露黄店「膳心小馆」解僱员工并拒支付 7 日代通知金，在舆论的压力下最终支付员工相关款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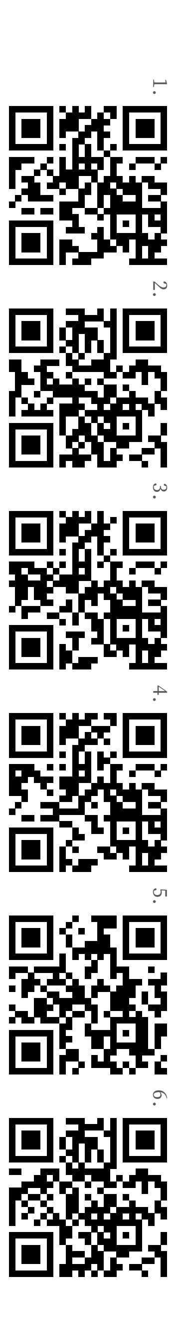
另一方面，在「反修例」出现「黄圈」以来，政治打压并没有平息过，建制派、政府以及中联办的高调狙击[1]。中联办发声明指「五一黄金週」是「反对派政客为在立法会选举中争取席位，罔顾自由市场规则，极力炒作『黄色经济圈』，人为製造社会撕裂，『不择手段滋扰、破坏无辜商户』」的行为」。有「黄店」被业主威胁拒绝续租、店面被破坏、员工遭伏击。在疫情下，「黄店」经常被政府支持者针对防疫措施[2]（《预防及疾病控制条例》 599F 章条文）举报[3]，被执法人员针对性地巡查[4]，因此，「黄店」空间是否能维繫也面对挑战。

1.〈中联办谴责五一假期「违法聚集」 批「黄色经济圈」政治绑架经济〉，《立场新闻》，2020 年 5 月 2 日。
3. 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长官梁振英更在其社交网站呼吁支持者踊跃举报黄店，让执法人员「严正执法」。
4. 天水围知名黄店「樱花树下」 更多次遭到食环署及警察多次不合理的巡查及检控。

1.
2.


延伸阅读

1. 〈由反产霸权到黄色经济圈　庞一鸣三大贴士：开生产线、扩各行业、渗入蓝店〉，《众新闻》，2019 年 12 月 23 日。
2. 〈黄色经济圈的理想和挣扎：红蓝之外，他们要重掌经济自主〉，《端传媒》，2020 年 5 月 6 日。
3. 〈黄色经济圈自救　疫情国安公署「夹击」大坑黄店　太古居民团购救远火〉，《立场新闻》，2020 年 9 月 13 日。
4. 〈【全日禁堂食】90 后搞黄店外卖平台　落单外送一脚踢：意义比收入更重要〉，《众新闻》，2020 年 7 月 29 日。
5. 走访深黄大地 Youtube Channel
6. 【挑战】年宵每日超过二千人排队！振兴黄色经济圈！自家产品热卖！五天年宵全纪录



后国安法时代

攝影：曾梓洋。



THE POST-NATIONAL SECURITY LAW ERA

在前面六章，我们爬梳了香港社会运动的历史脉络、和 2019 年春天至 2020 年年中的「反修例」运动發展轨迹。在 2020 年，运动迎来新冠肺炎的爆發，疫情作为一个社会危机，打开公民社会网络间进一步连结、互助的契机，尽管街头运动趋于寂静，抗争者在日常生活的不同方面抗争。

然而，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在 2020 年 5 月底公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草案）》，6 月 30 日通过《国安法》，7 月 1 日列入《基本法》附件三正式实施。在短短数週的时间，中央政府架空香港的立法机关和市民民意制定法律，在特首都没有看过法律条文的情况下，《国安法》在香港刊宪实施，香港也进入后《国安法》时代。

值得留意的是，《国安法》并不只是一部法律，而是一个新时代的意识形态纲领和管治思维。在后《国安法》时代，《国安法》固然是有力的政治打压和恫吓工具，但政府也并用既有的法律框架和行政手段来清算体制内外的「反修例」运动网络，开展社会改造和控制。下面我们简单梳理《国安法》的政治意涵，分作意识形态、大检控、议会线、公民社会网络等面向回顾《国安法》实施后香港社会所面对的各种打压。

前页图片由曾梓洋拍摄。

0 - 《国安法》的实施

/

《国安法》的条文主要针对四大罪行：「分裂国家罪」、「颠复国家政权罪」、「恐怖活动罪」和「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罪」，最高刑罚可判以终身监禁，这些罪行的定义非常广泛而模糊。在《国安法》框架下，法院的权力被削弱，但特首和警方则被赋予很大的权力。特首有权批准国安开支[1]和人员编制，并且毋需公开相关资讯。特首也更能选择审理国安案件的法官，并且判断案件涉及国家秘密，而向法院發出有约束力的证明书要求不公开审案。

中央政府按《国安法》在港设立两个执法机构，分别是港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和「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国安委」由特首担任主席，负责处理国家安全工作，其工作信息不公开，所作的决定不受司法复核；「驻港国安公署」负责监督和指导香港的国安工作，执法权力凌驾香港的司法机关，特定情况下可按中国的《刑事诉讼法》进行司法程序。过往已经曾出现内地国安在港跨境执法的案例，《国安法》进一步为中央在港执法提供正式的执法机关和法律框架。此外，香港警务处也根据《国安法》成立维护国家安全部门（简称：警方国安处）侦办相关案件。过往香港警方在调查案件时，须得到法院的批准，才能对嫌疑人採取搜查、截取通讯、强制限制离境等措施；但在《国安法》下，警权扩大，不再受到法庭的限制。

1. 2021年的财政预算案拨款，有80亿元作未来数年「维护国家安全」用途。

1 - 意识形态的斗争：噤声和製造「真相」

/

在 2020 年，意识形态是重要的斗争领域。公民社会的噤声、真相的抹杀、和维稳论述的再建构笼罩着后《国安法》的社会。政府透过整顿传媒机构、教育体系、打压公民社会的發声，来压制反对势力的资讯發放和论述传播；而在消灭民间声音的同时，政府製造另一种「真相」和意识形态灌输给市民，包括大力谴责所谓的 2019 年「黑暴」、大张旗鼓地宣传《国安法》中维护国家安全的意识形态。

政府通過收緊資格認定、逮捕、行政手法「整頓」傳媒機構。2020 年 9 月，警方聲稱因「發現有自稱記者的人混入人群，涉嫌阻礙警方工作」，修改《警察通例》中對「傳媒」的定義[2]，變相由官方定義何謂「記者」，限縮獨立媒體的採訪權利。2020 年 8 月，數百名員警進入《壹傳媒》大樓搜捕；2020 年 11 月，負責「721 事件」調查報導的記者因查冊被捕；2021 年 2 月，通訊管理局裁定數宗有關香港電台[3]節目的投訴成立，政府提早與時任廣播處處長解約。此外，數間傳媒機構的管理層出現人事變動、解僱資深記者、諷刺時政的節目被叫停、部分報導被抽起未能播出。

在高等教育界，活跃参与政治的学者戴耀廷被校委会解僱；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向资助大学發出的「优配学额」启动筹划信中，将《港区国安法》

2. 在原有「传媒代表」的定义中移除「持有香港记协或香港摄影记者协会会员证的人士」，改为「持有已登记为政府新闻处新闻发佈系统的传媒机构的身份证明文件的记者、摄影师及电视台工作人员；国际认可及知名的非本地新闻通讯社、报章、杂志、电台和电视广播机构的人员」。

3. 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辖下的部门，是香港广播史上首家广播机构，同时是香港唯一的的公共广播机构。

教育列为必修纳入「宏观规划指标」；在基础教育界，教育局在「反修例」爆發以来，共接获超过 200 宗运动相关的专业失德投诉，数十名教师接获书面警告。在《国安法》生效后，数名教师因讨论港独等原因被吊销註册资格。教育局表示「通识教育科」有过多时事讨论；过份聚焦政治议题，因此改名并且删减大部分的课程，新增内容只聚焦国家正面發展及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角色。

此外，社区和「黄店」的「连侬牆」、抗争相关的文宣和电影创作一直是抗争者传播资讯和凝聚士气的来源。但在后《国安法》时代，有「黄店」被警方警告文宣涉违《国安法》要求清除；有「黄店」因运动标语的涂鸦被数十名警方国安处便衣警员搜查、拉起橙带围封店舖，搜查顾客。纪录「反修例」运动的电影创作被官媒标籤违反《国安法》大举批斗，戏院在压力下取消放映，而民间团体的内部放映则被抹黑和通讯局滋扰。

政府也开始改写「反修例」运动事件的历史事实和定调、例如：2020 年 8 月，警方以涉「暴动罪」拘捕多位「721 事件」中的非白衣人人士，包括多位受袭击者，将一场亲建制势力的无差别袭击扭曲为两方「势均力敌、旗鼓相当」的冲突。同时，政府也以《国安法》为意识形态纲领製造新时代的新论述、新秩序和对应的管制思维。在「国家安全教育日」的开幕致词中，特首指出 2019 年中起「黑暴」横行，出现恐怖主义活动，带来极大安全风险，而《国安法》则「立竿见影地恢復

了社会的稳定，让香港走出『黑暴』的阴霾」。特首以国安委主席的身份，承诺提高市民的国家安全意识，把国家安全的讯息带入社区和校园，加强指导、监督和管理学校、媒体、网络，并令爱国者掌握政府的管治权。

政府的论述不只阐释了国家安全体系下的统治纲领，也揭示其整肃公共领域的言论、打压和严控公民社会各个板块的企图（在接下来的几个部分会展开介绍）。在《国安法》实施后，政府大力推动「爱国爱港者治港」的意识形态，在公务员、议员、和数个行业推行强制宣誓。《国安法》也被用来恫吓公民社会的参与者。警方以「防疫」的藉口反对示威的申请，对高喊口号的示威者举出警告违反《国安法》的紫旗；抗争者批评时政的倡议街站被粗暴滋扰、摄录警告。有团体被「警方国安署」警告街站發言内容违反《国安法》，有政治人物则因街站言论涉「發表煽动文字罪」被捕还押超过半年。在《国安法》相关打压的笼罩下，公民社会的讨论空间在恐惧下收缩，自我审查在个人的层面广泛發生；符合新治理思维的论述则在政府的宣导和引导下，通过建制力量的动员、逐渐被控制的媒体、教育系统广播。

2 - 大检控：审判、牢狱、流亡

/

2020 年是审判和清算的一年。数以万计参与在「反修例」运动中的抗争者经历漫长的司法程序，但与此同时新的抓捕和检控并没有停止。从 2019 年 6 月 9 日的大游行和 2020 年 6 月 30 日国安法生效之前，已有超过 9,000 人因「反修例」运动被捕，最多抗争者被控最高刑期长达 10 年的「暴动罪」，示威者、区议员、政治人物不论参与和平或非和平的示威都面对回归以来最严峻的判刑。2020 年 5 月，示威者冼嘉豪因向警方投掷雨伞及头盔而被控「暴动」，认罪后被判刑 4 年，是承认犯「暴动罪」的首例，多名涉「暴动罪」的示威者陆续被判以重刑；2020 年年底和 2021 年年初，黄之锋等青年行动者和民主派人物分别因 2019 年的示威被控「未经批准集结罪」并被判以重刑。

在《国安法》实施的 2020 年下半年，尽管街头示威大幅减少，但在警方的围捕之下，每次示威被捕的人数动辄数百人，也有抗争者因涉「协助罪犯」、「串谋诈欺」而被捕。「香港警务处国家安全处」也进行多次大搜捕，根据《端传媒》的统计，自《国安法》生效起至 2021 年 1 月 26 日，至少有 95 人因涉国安法被捕、30 人被通缉、4 人被起诉。2020 年 8 月 10 日，警方拘捕 10 名壹传媒相关人士涉嫌「勾结外部势力危害国家安全」和串谋欺诈罪；2021 年 1 月 6 日及 7 日，共 55

名民主派初选计划的参与者因「颠复国家」被捕。其中，国际连结也是重点打压的目标，「港独」和其他香港前途的讨论成为不可逾越的红线，数个组织在立法后解散、多名曾参与国际连结工作的抗争者被以「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煽动分裂国家」等罪名遭到逮捕或者流亡，包括前香港众志主席罗冠聪、前大专学界国际事务代表团發言人张崑阳等。

在一连串的审判和判刑中，抗争者见证不公义和持续崩坏的司法制度。在 2020 年，律政司因不满数宗「反修例」相关案件判刑过轻，向十数宗案件提出刑期复核申请得直。在《国安法》下，保释条件极其严苛，明定「除非法官有充足理由相信其不会继续实施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否则无法保释。大部分因《国安法》被捕的抗争者被还押、审讯遥遥无期。面对长达终身的最高刑期，不少政治人物做出退出其所属政党、不再参与政治的声明。「反修例」运动以来的大规模逮捕和严峻的惩罚性判刑是政治迫害的一部份，政权用司法制度之名剥夺无数抗争者的自由，也以此作出恫吓意图使其他抗争者在恐惧中却步。

3 - 议会线的终结：制度内空间的收窄

/

在过去数十年，议会是民主阵营在体制内的重要平台，而主流民主派政党的议会路线着重向政权施压和谈判。但在「反修例」运动中，议会的角色出现转变，在 2019 年区议会选举的胜利后，议会成为承载民意、获取资源、在政治打压下持续發声的阵地。在 2020 年上半年，围绕着立法会选举的政治路线讨论是抗争者的关注点。部分非建制派候选人提出「议会揽炒」 的路线，共同签署纲领，承诺动用「财政预算案」否决权迫使特首回应「五大诉求」，并在 7 月中的民主派初选中获得一定程度的支持。

然而 2020 年 7 月底，政府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大规模取消民主派立法会候选人的参选资格，再以疫情严峻为由，用《紧急法》延后选举一年。2021 年 1 月，数十名民主派初选的参与者被以《国安法》中的「颠复国家」罪逮捕。2021 年 3 月，中央的全国人大表决通过《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大幅度修改《基本法》中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特首在访问时称，修改选举制度的重点之一是确保选举参选人符合「爱国者」的条件。在新的选举制度下，所有候选人须经多重的资格审查，国安委有权判定候选人是否符合「拥护《基本法》、效忠特区」的要求。行政长官的选委会中不再有区议员代表的席次；在立法会中，民选议席的比例下降。

4. 这些候选人预见在政府的强硬打压下，自己或难以进入立法会，但盼抗争派在初选成为主流，迫使政府大规模取消资格，以揭露政府对香港的议会的全面打压，继而「破局」至「揽炒」，争取国际制裁。

另一方面，少数区议员因被判刑超过三个月，按区议会条例会失去议席。2021 年 5 月，强制区议员宣誓的《2021 年公职（参选及任职）（杂项修订）条例草案》刊宪生效，根据新修订的草案，律政司有权决定什麼行为和言论违反宣誓，并即时暂停议员的职务开展法律程序。面对强制宣誓的规定，尽管民主派建议党员宣誓，但也有为数不少的区议员担心言论和行动将受到限制，主动辞任。

2020 年和 2021 年的选举改革揭示中央将严密控制香港的选举。过往民主派政党在制度内向政府施压，或「反修例」抗争者以制度内的资源支持运动的空间不再存在，也标志着香港在过去三十年就政治体制变革的争取不进反退。

4 - 公民社会网络：打压和控制

/

在「反修例」运动中，大量公民社会网络涌现，投入在运动的浪潮中，在后《国安法》时代，这些曾在运动中活跃的社会网络是承载运动能量的阵地，也成为政治打压和严密控管的目标。下面我们分别介绍学生、抗争者支持、行业工人、社会组织等公民社会网络所面对的打压和控制。

學生是 2019 年的運動的重要參與者，也是政府重點監控和打壓的目標。2020 年 11 月，香港中文大學校方就校內遊行報警，國安入校園「調查」並以未經批准集結、《國安法》相關罪名拘捕數人。過往，學生會是學生實踐政治參與的地方，但先是香港科技大校方勒令舉辦周梓樂紀念會、拒絕移除文宣的學生會成員休學，再有中文大學和香港大學校方以學生會「利用校園作政治宣傳」、「公開發表煽動性並可能涉及違法的言論」暫停代收會費和提供場地。

在 2019 年，绵密的后勤网络提供「反修例」示威者经济和各方面的支援，是街头运动得以持续长时间的重要后盾。但在《国安法》的框架下，银行公会有义务就怀疑违反《国安法》的交易通报警方。警方也接连高调以「洗黑钱」、《国安法》相关罪名拘捕筹措经济资源支持抗争者的网络。

各行各业的工人网络在「反修例」运动中炼成新工会浪潮、在《国安法》下，政府要求公务员宣誓「效忠《基本法》及特区政府」才能履行职务，2021 年 1 月，在「反修例」运动中诞生的新公务员工会在宣誓的压力下解散。此外，政府也在研拟其他行业的宣誓规定，包括教师、医管局员工等。在「反修例」以来，各行各业出现工人因政治言论被投诉举报、被取消专业资格或者失去工作，而当《国安法》的意识形态体现在模糊的誓词中，结合建制力量的举报投诉，更是加大对职场上的政治参与者的无形监控。在职场白色恐怖的氛围中，工人的言论發表和政治参与、各个行业工人网络的连结和组织都面对挑战。

2021 年 4 月，在「反修例」运动中發起数起大规模游行的「民间人权阵线」收到警方警告涉嫌违反《社团条例》，若未能依照要求递交完整资料，可能被罚款。在民阵成为政治打压的对象后，数个民间团体退出战线。在政府的打压和监控下，出于恐惧，不同风险承受能力的社会网络间要建立连结变得困难；公民社会网络可进行组织的实体空间亦缩小，连结和信任的建立变得困难。与此同时，随着多个国家先后宣佈向香港居民放宽既有签证政策，越来越多的市民离开香港。

后记:灯下仍有人

/

首先特别感谢所有的记者和纪录者，如果不是各位不眠不休的在现场书写和报导，我们不会有关于运动的丰富材料可以彙整。在这裡也想要指出，碍于精力有限，本书无法囊括香港运动的全貌，在难以同时兼顾纪录和分析的限制下，亦未能写下更多对运动的分析和反思。我们非常欢迎读者用各种方式给我们反馈和开放讨论。

香港的抗争经验不只是香港的，也和世界上所有地方反抗极权的经验有共通之处，我们在苦难和挣扎中，看见其他地方的人们一直以来所受到的压迫，和更多的人连结在一起，我们并不孤单。「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只要灯下还有人，历史的真相就不会被埋没。如果他们的目的是用片面而简化的叙事来遮掩真相，在人民之间製造隔阂和撕裂，那我们期盼能凿开一道破口，开启交流。

在 2020 年的春天，我们开始整理这场在 2019 年爆發的运动浪潮。在写作的同时，运动持续發展，打压也没有停过。开始的时候，材料还是温热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少电报频道的纪录、连登的文章、社交媒体的贴文开始消失；当搜寻运动的关键字，排在前面的搜索结果经常是官媒的报导和建制派对「黑暴」的抹黑。

在 2021 年，那些在 2019 年被众人拆走的栏杆都更牢固地装了回来、行人路的红砖下裸露出来的细沙被水泥填满、满是文宣的连侬隧道被漆上和谐的风景再挂上《国安法》宣传；电视台开始删除过去發佈在社交媒体上的节目内容。我知道他们正在悄悄地改写历史、粗暴地抹去城市裡运动的痕迹、用宣传机器震耳欲聋地广播他们的「真相」——然而，我们不会忘记 2019 年發生了什麼。在 2019 年，数以万计的群众以「行动」反抗政权步步进逼的压迫，不惜付上高昂的代价揭露「原来的正常就是问题」。在 2019 年所揭露的冷硬现实是一个开始，在 2019 年以后的香港，人们不再假装生活如常。

在 2021 年，灯下仍然有人。有人捨身在红线面前不愿退让，撑出一道道缺口；有人在公共领域用行动划破沉默，点一盏灯；有人在谎言取代真相的时代裡，不愿指鹿为马；有人在职场、在社区连结同路人，做一点事；有人在用记忆和遗忘作斗争。庆幸的是，不论在哪裡，我们都不会是一个人，一起有尊严的活下来、一起找路、一起负重前行。